


*Light
from
Old Times*



旧日光辉

英国宗教改革人物志

(英) J.C.莱尔 / 著 维真 / 译

Light
from
Old Times

旧日光辉

英国宗教改革人物志

(英) J.C.莱尔 / 著 维真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旧日光辉 / (英) 莱尔 (Ryle, J. C.) 著 ; 维真译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4. 10
书名原文 : Light from the old times
ISBN 978-7-5108-3314-4

I . ①旧… II . ①莱… ②维… III . ①宗教—人物—
生平事迹—英国—16 世纪 IV . ① B929.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0576 号

旧日光辉

作 者	(英) J. C. 莱尔 著 维真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32 开
印 张	15.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314-4
定 价	45.00 元

| 目 录

01	/	译序
001	/	威克里夫
017	/	为什么改教家葬身火海
057	/	约翰·罗杰斯
067	/	约翰·胡珀
115	/	罗兰·泰勒
135	/	休·拉蒂默
183	/	约翰·布拉德福德
209	/	尼古拉斯·里德利
233	/	撒母耳·沃德
259	/	劳德大主教和他的时代
301	/	理查德·巴克斯特
341	/	威廉·葛诺尔
403	/	詹姆士二世与七主教
451	/	译名表

| 译序

英格兰历史上，宗教改革是这个国家成形的重要时期。可以说，从亨利八世脱离罗马教会，到1688年光荣革命推翻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是英格兰社会最具变革、影响最大的时期。正是这段时期的改革为英国工业革命、政治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英格兰彻底脱离了罗马教廷的控制，近代民族国家开始形成。在这段时期里，英国国教扮演了重要角色，也是斗争的焦点。本书就精选了此期间英国国教的一些代表人物，从他们的生平、观点、与政治人物的关系着手，让读者置身于当时的风云变幻之中，进而洞悉那个时代。

本书从中世纪末期的威克里夫开始讲起。威克里夫被誉为“宗教改革的晨星”，他在宗教改革之前一百多年就提出了类似的诉求，可以说为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撒下了最初的种子。接着，本书又考察了多位在玛丽女王统治期间罹难的改教家的生平。他们都是当时的精英，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拥有非凡的热情，为了理想而奋斗，并且也坚持原则，毫不妥协。正是因为

他们的工作，英格兰的社会面貌和人民思想状况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使得迷信思维一扫而空，为之后的工业革命预备了一群思想理性、勤勉奋进的人民。

然而，进入19世纪，随着宗教改革的远去，人们对昔日迷信不再警惕，甚至怀念那时修道院的“浪漫气氛”；同时，也有人发起了回归罗马教的运动。因此，作者希望能让人们警惕，希望他们能了解宗教改革的本质、改教家是什么样的人。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回归罗马教是要让教廷的手重新伸入英国，让外国势力重新作威作福。

然后，作者跳过了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进入了清教徒兴起的时代。他选择了清教徒撒母耳·沃德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作为正反两面的代表人物，考察那个时代，探讨了后来内战悲剧的成因和教训。此后，作者又针对英国革命之后，国王复辟时期国教对清教徒的镇压，分别选择了支持国教的威廉·葛诺尔和不从国教的理查德·巴克斯特，探讨了当时社会的分裂。最后，作者探讨了宪政确立前的最后一位国王詹姆士二世时期国教与不从国教者的联合，考察了国王审判七位主教对社会的影响。对于写清教徒传记的目的，作者写道：

“我相信，再没有什么人像清教徒一样不为人知又饱受诽谤。如果沃德、巴克斯特和葛诺尔的传记能帮助读者明白什么是清教徒，我觉得我已经为真理的事业做出了贡献。”

克伦威尔、欧文、曼顿、巴克斯特和查诺克都属于这一群体，任何见多识广的英格兰人提起这样一群人都不会语带不敬。麦考利勋爵在历史方面颇有权威，他在讲论弥尔顿的文章中说得好：‘我们毫不犹豫地宣布，清教徒是一群勇敢、聪慧、诚实而有益的人。’了解他们越多，对他们的评价就越高。”

总而言之，本书由点及面，深入地研究了这两三百年间英格兰社会在思想层面的激荡，是研究英国近代史不可多得的有益读物。

翻译这样一本经典之作，译者自感才疏学浅，难免有疏漏之处，欢迎读者指正，不胜感激。

维真

2014年5月

(译者邮箱: weizhenwakeman@126.com)



约翰·威克里夫 (1324~1384)

威克里夫

有句老话说得好：列国往往对某些他们最大的恩人一无所知。这话正应验在威克里夫身上。威克里夫是英国宗教改革的先行者、奠基人。英格兰亏欠威克里夫的太多了，大多数英国人对威克里夫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

在着手起草这位善良伟人的传记时，我脑海中浮现出圣彼得的话语：“我以为应当……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这正是我写作此篇的目的。我希望激发读者，提醒他们绝不要忘记这位“英国宗教改革的晨星”。

首先，请您回想威克里夫时代英格兰的信仰情况。

简要地回顾当时英格兰的宗教信仰状况是理所应当的。正确地认识当时的状况，是本文的基础。否则，对于我要写的这人及其所要克服的巨大困难、所作之工的伟大，不可能有正确的评价。

约翰·威克里夫于1324年爱德华二世在位期间出生于北约克郡蒂斯河畔，卒于1384年理查二世在位期间，距今已有五百多年^①。请注意，他出生的时间比印刷术的发明至少早了一百年^②，他逝世后大约一百年，伟大的德国改教家马丁·路德才诞生。这两点应该谨记。

英国宗教改革之前的三个世纪，即威克里夫生活的年代，很可能是英国基督教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当时英国的教会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罗马教。罗马的主教是教会的属灵领袖，从怀特岛到特韦德河畔伯立克、从兰兹角到北佛兰，罗马教义拥有绝对权威，神职人员和百姓都是罗马天主教徒。毫不夸张

^①本书写于19世纪晚期，所以作者说“超过五百年”，如果按今日来看，已经超过六百年了。对今日的读者来说，本书中所有的此类说法，都要加上一百多年。——译注

^②指欧洲的印刷术。——译注

地讲，宗教改革前的三个世纪里，英格兰的基督教已经埋葬在无知、迷信、神职权术和伤风败俗之中。这一时期的宗教信仰与使徒时代鲜有相似之处，要是圣保罗复生，恐怕绝不会称之为基督教。

这就是威克里夫生活的时代并他所要面对的艰难险阻，请谨记在心。一个人能在那样的时代完成他所做的那些工作，在那个世代留下印记，必定不是庸碌之辈。进一步讲：他必定是忠心的仆人，得蒙罕见的恩典，拥有罕见的恩赐。我认为他配得所有的荣誉，绝对值得我们纪念。

现在我们来查看威克里夫的工作。

威克里夫在异常黑暗的日子里行了大事——给那个世代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英格兰的教会和议会都认可他是“一种力量”，任何有学识的人都无法否认，在一段为期二十五年的日子里，他是历史的中心。

但他的早年岁月却是个谜。今人对他发蒙的学校和启蒙老师一无所知，只能猜测他是在蒂斯河畔的埃格尔斯顿小修道院接受了基础教育。不过可以确知，1335~1340年间他入读牛津，受益匪浅，声名鹊起，被视为当时最有学问的人。1361年，他成为贝利奥尔学院院长，后来又在王后学院、墨顿学院和坎特伯雷学院任职。从那时起，直到他退休去了拉特沃思，约有

二十年时间，他以牛津为中心活动，尽管他显然也经常去伦敦。授课、讲道、分别为有学问的人和没文化的人写作、辩论、论战，似乎成了他的日常生活。但没有任何同时代的传记作者把他的生平系统、详细地记录下来。他纯正的神学观念最初是怎样得来的——有没有从他的前任、布拉德瓦丁大主教那里学到些什么？他是否与牛津校长、拉马的费茨拉尔弗或著名的林肯主教格罗斯特关系密切——简言之，谁是他的帮助者和同工，还是说他单枪匹马？对于这些，我们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然而，抱怨没有用，因为威克里夫的时代没有印刷术，能读会写的人很少。我不会浪费时间无端猜测，而是要心满意足地列出四项无可争议的事实，这四条理由说明了为何英格兰应当以威克里夫为荣。

首先，应当感恩地谨记，威克里夫是首批坚持《圣经》——作为信仰和实践唯一准则——完备性及其权威的英国人之一。这条原则贯穿在他的作品中，无须我补充什么别的旁证了。在他存留至今的作品中，《圣经》都具有首要地位。

这条原则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是更正教的根基，是英国国教以及基督教世界各个纯正教会所有行为的支柱。基督要真正的基督徒借着神的话语去验证一切，包括所有的教会、牧师、教训、讲道、教义、讲章、书籍、观点和实践。《圣经》

是他的行军口令。圣徒要借着神的话语来验证一切、用《圣经》的度量来量度一切、用《圣经》的标准来比对一切、用《圣经》的天平来衡量一切、借着《圣经》的光照来查验一切、用《圣经》的炼炉来试验一切。经得住《圣经》火炼的，就接受、持守、相信并顺服；经不起《圣经》火炼的，就拒斥、拒绝、否定并丢弃。这是威克里夫在英格兰竖起的标准，是他钉在桅杆上的旗帜。愿这一条标准永不降低！

听起来太熟悉了，但我们并未认识其价值。五百年前，打下这一根基的人十分勇敢，而且形单影只。让我们绝不要忘记，最早迈出脚步树立这条原则的人中，有一位是约翰·威克里夫。

第二，应当感恩地谨记，威克里夫是最早抨击并公开指责罗马教会谬误的英格兰人之一。弥撒献祭和化质说、神职人员的无知和败德、罗马主教的暴虐、毫无用处地信靠基督之外的其他中保、忏悔室的危险倾向——所有这些，还有其他教义，他都在作品中无情地揭露了。就此而言，他是彻底的更正教改教家，比宗教改革要早一个半世纪。

如果今日众人在这一领域能有像威克里夫一样清晰的洞见，那英格兰的状况定然会好得多。不幸，今日，不列颠对宗教改革的集体感受锋刃已钝。有人宣称厌倦了所有宗教争论，准备为了和平而牺牲神的真理。有些人觉得罗马教义也是众多英国

宗教形式的一种，跟其他的比起来不好也不坏。有些人试图说服我们，罗马教义已经改变了，不像从前那样糟糕。有人大胆地指出更正教的缺陷，大声疾呼罗马教徒跟我们一样好。还有人认为这样坚持是正当且开明的——对于热心于自己信条的人，无权认为他们错了。然而，请注意两项历史事实：四百年前，在罗马教笼罩下，无知、败德和迷信主宰了英格兰；宗教改革是这片土地得到的最大的祝福——五十年前，除了教皇的死忠门徒外，没有谁会认为这两项事实存在争议！今日，看呐，我们轻而易举就忘掉这些事实，这甚至成了潮流！简言之，照此下去，如果不久后有人提议废除《王位继承法》，允许天主教徒戴上英格兰王冠，我不会感到奇怪。

如果要遵从某些冷静的人的提议，把时间推到宗教改革之前，那么我相信不应止步于亨利八世、七世甚至六世，而应该追溯到威克里夫。

此外，也应感恩地记住，威克里夫就算不是第一个，也是第一批接受使徒传道方式的英国人之一。人们把他派去乡下布道的人称为“穷司铎”，这一举动是他对同时代的人最大的造就之一。人们不可能完全忘记“穷司铎”撒下的思想的种子，我相信这些撒种者铺下了宗教改革的道路。

就算威克里夫除了派“穷司铎”之外没做过任何事，我仍相信仅仅这一件事已经配得让我们深深地感激了。我坚定地认为，牧师首要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传讲《圣经》。

之所以如此强调，是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生活的土地上，基督徒的斗争面临的特有危险。我相信，神职人员虚伪的“圣品制度”是曾经流毒基督教世界的最古老最有害的谬误。产生这一制度的原因很多：部分源于无知地渴望摩西时代的祭司身份，尽管这一制度随着基督的受难而终结；部分源于喜爱权力和虚荣，这对神职人员是自然而然的，就像对其他人一样；部分源于未得救的敬拜者喜欢看得见的假祭司和中保，而不是在天上看不见的那位祭司和中保；部分源于《圣经》印刷流传之前人类普遍的无知。种种原因导致过去的十八个世纪里一直存在着这种倾向——将神职人员抬高到一种不合《圣经》的位置，视他们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而非传讲他话语的人。

对此，读者应当留心记住，并要牢牢坚守古旧的原则，不要丢弃古旧的道路。不要受诱惑而认为，各种各样的仪式、礼拜中宣读一成不变的话、或者频繁的圣餐，相比有力、恳切、火热地宣讲真道，能带给灵魂同样多的益处。没有证道的日常聚会也许能够满足、造就屈指可数的部分信徒，但绝不可能触

及芸芸众生，吸引他们，俘获他们的心。如果有人想要造福大众，想要触及他们的心灵和良知，就要踏着威克里夫、拉蒂默、路德、屈梭多模和圣保罗的足迹而行。必须向他们的耳朵发动进攻，大声吹响永恒福音的号角，让号声绵长；必须传讲神的话语。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让我们感激地谨记威克里夫是第一个将《圣经》译为英文的英国人，是他让大众能明白《圣经》。今日的我们很可能对译经的困难没什么概念。那时很可能译者得到的帮助——不管什么方式——极少极少。那时没有印刷术，整本书都是费劲的手写本，要复制也只能手抄。看看蒙福的《圣经》公会位于布莱克福莱尔斯的机械设备，再想想威克里夫需要克服的惊人困难，足以让人喘不过气来。但世上没有难成的事。事情成就了，数百份《圣经》抄本流传开来。尽管有当局的压制，历经时间、火灾、敌人的毁坏，四十年前在牛津重印威克里夫《圣经》的时候还是发现了至少一百七十份抄本存世，实际存留的数量肯定更多。

翻译《圣经》的益处究竟有多少，恐怕在末日来临之前没人能数算，所以我不想作任何形式的推测。但我要毫不犹豫地断言，有一项事实无可争议地得到了证实——拥有母语《圣经》是一个民族有可能拥有的最大祝福。

第一个将《圣经》译为英文的人已经去世五百年。今日的

任何人都可以来看看世界地图，借此来认识《圣经》不受限制地广泛流传带来的价值。

今时今日^①，在哪些国家，自由、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都达到顶峰？是那些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获得《圣经》的地方，比如英格兰、苏格兰和美国。当英国君主登基时，要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圣经》，倾听这句话：“这本书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

国家的福祉往往与这本书息息相关，基督教世界各国的至上利益与之不可分割。在一片土地上，光明或黑暗、道德高尚或败坏、真信仰或迷信、自由或专制、善法或恶法谁主沉浮，正好与《圣经》是否得到尊重成正比。随我打开史书吧，你会在旧事中读到证据。读一读以色列在列王治下的历史。那时罪恶是多么盛行！但谁会惊讶？众人完全对耶和华的律法视而不见，约西亚在位时在圣殿的角落里才找到律法书。读一读主耶稣基督时代犹太人的历史。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有他们的宗教，是多么可怕！但谁会惊讶？他们借着人的传统“废”了神的话语。读一读中世纪基督教会的历史。还有哪个时代的无知和迷信胜过那段日子？但谁会吃惊呢？当人们得不到《圣经》的亮

^①本书写于19世纪末，本段指的是当时的情形。——译注

光，时代当然会黑暗。

真相明白无比，《圣经》是自由思想和精神生活之母。有意思的是，英国的外国圣书协会就在《泰晤士报》办公室隔壁！

地上哪些教会对人类产生最大影响？就是那些高举《圣经》的教会。英格兰和苏格兰哪些教区的信仰和道德水准最坚固？是那些《圣经》流传最广，读《圣经》最多的教区。英格兰哪些牧师最能对民众的思想产生真实影响？不是那些喊着“教会！教会！”的人，而是信实地传讲主话语的人。不尊重《圣经》的教会就跟无生命的躯体、熄了火的发动机一样无用。不尊重《圣经》的牧师就跟没有武器的士兵、没有工具的建筑师、没有罗盘的领航员和没有信件的信使一样无用。罗马天主教会、新派神学、提倡只进行世俗教育的人很容易嘲笑那些喜爱《圣经》的人；但罗马教徒、新派神学家和提倡只进行世俗教育的人却从未给我们展现一个新西兰、廷尼弗利或塞拉利昂作为他们的原则结出的果实。这只有尊重《圣经》的人才能做到。这是神话语的工作，是其能力的证据。

文明世界的众多最好最值得称道的制度要归功于《圣经》。很少有人意识到，有多少为公共利益而采行的善举，其根源可以显而易见地追溯到《圣经》。凡接受《圣经》的地方，都留下了这本书持久的痕迹。有许多最出色的法律是根据《圣经》

起草的，藉此社会秩序得以维持。基督教国家通行的有关真理、诚实和夫妻关系的道德标准来自《圣经》，这些标准——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并未得到当事人尊重——使得基督徒与非信徒截然不同。安息日这一条对穷人最恩慈的规定也要感谢《圣经》。几乎每个人道主义和慈善机构都是因《圣经》的影响而建立的。

《圣经》介入世人生活之前，很少有人，甚至从未有人关心贫、病、孤、老、疯子、弱智、盲人。想要在雅典或罗马的历史中寻找任何帮助这类人的机构是徒劳的。看呐，好些人嘲笑《圣经》，说没有这本书世界会更好，却不想想自己从《圣经》得益多少。躺在大医院里的不信者不会认为自己此时享受到的安适竟是拜《圣经》所赐，这本书本是他自己鄙视的啊。要是没有《圣经》，他可能没有人照顾、没人留意、孑然一身，悲惨地死去了。确实，我们生活的世界对自己所蒙的恩惠无知得可怕。我相信，只有末日才会讲尽《圣经》加给这世界的益处。将这本书翻译成英格兰人的母语并分发给他们的第一人就是威克里夫。重复一遍，如果他没有做其他任何事，但仅仅因为翻译《圣经》这件事，他就配得所有讲英语的基督徒、英格兰的爱国者、英格兰的教士感恩地纪念。

这就是威克里夫值得尊敬值得纪念的四条主要原因。

我不是说这位伟人没有弱点，没有秉持有待商榷的观念，

每条神学教义都纯正无比。我从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活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必须自己处理许多有问题的神学观点，因为他连来自他人的最轻微帮助都无法获得。他写的东西很多，也许写得太匆忙，所以我不可能假装赞同他的全部作品。像路德和克兰麦一样，一开始他并不是对所有要点都清楚。但考虑到他单独、孤立的困难处境，只能惊叹他如此惊人地远离了谬误。人们指责他有缺陷，但有一项事实使得所有这类指责黯然失色——他是第一个把《圣经》翻译成英格兰本地语言的人。他怎样逃过迫害，没有暴死在敌人手里，最后在拉特沃思平静地死在卧榻上，其实是个神迹。照我看来，显然是出于护理之工的神迹般的方式保护了他。“地却帮助妇人。”是主兴起冈特的约翰和威尔士公主，让他们眷顾威克里夫。是主在他将要遭到非难时用地震破坏了伦敦的宗教会议。是主让牛津大学给他支持。

康斯坦茨会议并没有树立烧死异端的榜样，天特会议也没有明确具体地阐明所有教皇的教义。但首要的是，我看到上主的手护佑着威克里夫——他曾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華喜悦，耶和華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的确！护佑威克里夫的手是救主的钉痕手，他曾对使徒们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曾在哥林多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

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在工作完成之前，威克里夫不会死。

本章结束之际，我要给出几条具有实践意义的结论，是本章整个主题给我们理所当然的教训。

首先，让我们恢复威克里夫的首要原则，要比我们从前的日子更为坚定地持守这些原则。要坚持《圣经》的权威性和完备性，也绝对有必要警醒、抵制罗马教会的危险主张，还要留意传讲神话语有多么重要——所有英国更正教信徒都应在此基础上团结起来，用心做工。

其次，我们要明白，如果某人为了基督奋勇向前，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观点，那他会获得多么惊人的力量和影响力。摩西、以利亚、施洗约翰、哥林多的保罗、佛罗伦萨的萨万纳罗拉、德国的路德、慈运理、卫斯理、怀特菲尔德、伦敦的罗梅恩，让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思考，撼动了沉睡的世界。真理之友需要更多的勇气。坐着不动，等着委员们行动，并数点支持者的倾向太严重了。我们需要更多人像威克里夫一样，绝不惧怕单枪匹马。

最后，不要忘记约翰·威克里夫的神没有死，是活着的神。人在改变，今日的世界喊着新奇的口号——更自由地解释《圣经》吧！让神学更包容更宽松！这是许多人期待的。但倘若我

们想要行善,那么什么都比不上古旧的福音。耶稣基督绝不改变。五百年过去了,他仍是一样的。他没有丢弃拉特沃思的教区长威克里夫,那么我们如果追随他的脚踪,他也绝不丢弃我们。



人称“血腥玛丽”的玛丽一世（1516~1558）

为什么改教家葬身火海

整个世界都想忘记、忽略某些历史。这些史实与世人钟爱的某些理论格格不入，麻烦得很。结果，人们要么视其为粗俗的入侵者，佯装不识，要么视其为令人厌烦无聊之事而置若罔闻。渐渐地，这些史实就像遥远海平面上的船舶，或似遗弃在偏僻轨道上的报废行李车厢，淡出了历史学者的视野。本章的主题——英格兰改教家被处火刑及其原因——涉及的史实便是鲜活的例子。

有时，否认存在对信仰真理的确信，否认存在任何值得为

之遭受火刑的观点，已经成了潮流。然而，三百年前，有人确信自己找到了真理，为了他们的观点甘愿去死。另一方面，则是忽略历史中所有不愉快的事，涂以乐观的粉饰，成为普遍的潮流。一部非常流行的英国诸女王史几乎没有提及玛丽女王治下众多殉道事件！但“血腥玛丽”这称号可不是无中生有，无数更正教信徒在她统治之下葬身火海。最后，同等重要的一点——多数情况下，人们认为任何羞辱罗马教廷之事都是非常无礼的。但是，天主教会烧死了英格兰改教家，就跟征服者威廉赢得黑斯廷战役一样，是确凿的事实。当我开始准备本章将要展现的主题时，这些困难迎面扑来。我知道这些困难有多么严重，无法逃避，所以只有恳求读者读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和包容。

毕竟，我相信英国读者有诚实的心，对此信心满满。真相就是真相，事实就是事实，尽管多年之后可能已经尘封掩埋。我只想从时间的沙土覆盖之下发掘出一些古老的史实，让英格兰从前一些遭人忽略已久的丰碑般的事件重见天日，疏通一些今世之王竭力想要用土堵住的泉源。请读者集中片刻的注意力，我自信能让您明白，探讨“为什么我们的改教家会遭火刑”这一问题，绝对是值得的。

大范围的改教家殉道事件众所周知，事实确凿，下文将会详述。但简要概述一下这些史实，提供本章主题的框架，将很

有益处。

爱德华六世——博内特主教称之为“无与伦比的年轻君主”——死于1553年7月6日。也许，这片土地上再没有哪个王室成员的死比他更令人哀恸，身后留下比他更美的名声。也许，从人易于犯错的判断来看，他的死让真理在英格兰受到的打击是空前的。不要忘记他死前最后的祷告——“主啊，求你护佑这国免遭天主教的毒害，保守真正的信仰。”我相信，这个祷告没有落空。

珍·格蕾愚蠢而可悲地争取王位失败后，亨利八世同第一任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所生的女儿、爱德华六世的长姐玛丽继位，人称“血腥玛丽”。玛丽从襁褓开始就接受宗教训练，目的在于将其培养成顽固的罗马天主教拥护者。她确实是天主教徒中的天主教徒，其认真、狂热、顽固和心胸狭窄达到极致。她一登基就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把弟弟的事业全部推翻，目的是要将罗马天主教恢复到最糟糕最富有攻击性的形式。她和臣下一步步回到罗马天主教，将障碍一个个踏平，就像斯特拉福德勋爵那样彻头彻尾地向着目标直线前进。弥撒恢复，英语聚会取消，路德、慈运理、加尔文、丁道尔、比塞、拉蒂默、胡珀和克兰麦的作品遭禁。玛丽邀请红衣主教回到英格兰，将定居英格兰的外国更正教信徒驱逐出境。更正教的英国国教领袖

们丧失了职权，有的逃到欧洲大陆，更多的则锒铛入狱。针对异端的旧制度再次披挂上阵，整装待发。于是，1555年初，舞台已经清理妥当，血腥的惨剧预备上演了，而邦纳主教和加德纳主教是重要角色。

人性的尊严惨遭羞辱，因为仅仅剥夺英格兰改教领袖的职权，下在监里，并不能满足玛丽的一众谋臣。改教家若不发誓放弃自己的原则，就要受死。玛丽的人组成了专门的委员会，把改教家一个个地召来，审查他们的信仰观念，要求他们放弃，否则就要丧命。他们没有其他选择，没有第三条路。要么放弃更正教教义，接受天主教，要么就要被活活烧死。他们拒绝变节，于是一个个都被交给世俗政权机构，在大庭广众之下用铁链捆在火刑柱上，周围堆满柴火。玛丽一党公开地用这种最残忍最痛苦的刑罚——火刑——夺去改教家们的性命。这都是广为人知的事实，所有罗马教会的卫道士都无法否认。

玛丽统治的最后四年里，至少二百八十八人因坚持更正教信仰而遭火刑，这是广为人知的史实。

1555年	烧死了71人
1556年	89人
1557年	88人
1558年	40人

合计 288 人^①

实际上，玛丽在世期间，火刑从未中止，并且在她死前的一周里，又有五位殉道者在坎特伯雷被烧死。请记住，二百八十八位遇难者中，有一名大主教，四名主教，二十一名教士，五十五名妇女，四名儿童。

众所周知，这二百八十八人被烧死不是因为人身或财产犯罪，亦非反抗玛丽的统治，也不是行凶作恶被逮个正着。他们不是窃贼、杀人犯、酒鬼、不信者或生活败坏的人。相反，他们都是英格兰最圣洁、纯洁的模范基督徒，少有例外，其中有些人还是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

我得谈谈他们在受审讯期间遭受的无比不公待遇。对他们的审判——要是真的可以称为审判的话——是在嘲弄“公正”这个词。他们中大多数人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恶待，不仅是在刑场，在监狱里也是一样。您肯定读过福克斯《殉道史》中对这些事的描述。对血腥玛丽整场迫害期间的这一愚蠢苛政，我无话可说。罗马天主教在玛丽统治期间对其自身造成的无可挽回的损害，是其他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就算是没什么辩才的

^①数据出自索姆斯编写的宗教改革史 (Vol. iv. i. 587)，斯特莱普曾引述。其他历史学家给出的数字更高。

文盲都可以清楚地看明白，犯下如此严重血腥暴行的教会恐怕不会是基督真正的教会^①！不过我没有时间多着笔墨了。对本章主题的概览行将结束，我得作出两条简短的结论。

其一，我劝读者绝不要忘记，罗马教会要为改教家们遭受的火刑负全责。想把责任推给世俗政权是卑鄙阴险的花招。犹大人并没有杀死参孙，但他们把他捆起来交给非利士人！罗马天主教会没有屠戮改教家，却给他们定罪，并由世俗政权来行刑。至于各个罗马天主教会代表具体的责任大小，我不想谈论。斯特里克兰女士在《英格兰诸女王生平》一书中，徒劳地想要给可悲的玛丽推卸责任。她尽一个妇人的全部热情，费尽心机地想要洗清玛丽的责任，读者在她的书中丝毫也找不到殉道事件。但这毫无作用。弗劳德先生的书讲述了截然不同的一幕。玛丽女王和臣僚、议会，以及罗马教会的主教、枢机定然都要心甘情愿地分担责任。这已经是板上钉钉，卸除罗马教会的责任绝不会成功，正如犹太人和本丢彼拉多都要为基督钉十字架负责一样。流人血的罪归在他们身上。

其二，希望读者记住，时至今日，对玛丽时代烧死殉道者

^①一位身居高位的贵妇告诉邦纳，菲尔波特死后，他遭受的残忍待遇在二十个月里让教皇失去了两万名信徒的心。

的行为，罗马天主教会既未批判否认，也未为之道歉或忏悔。他们精美的徽章上沾有巨大的污渍，同时他们也从未试图将其洗净。他们并没有为对待瓦勒度派^①和亚勒比根斯派^②的恶行而忏悔，没有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③无数的屠夫忏悔，没有为圣巴多罗买之夜^④的大屠杀忏悔，没有为烧死英格兰改教家而忏悔。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一事实，铭记在心。罗马教会从未改变，绝不会承认错误。三百年前，他们烧死了英格兰改教家。他们无法通过辩论来阻止更正教信仰的传播，就卖力地诉诸武力。

^①瓦勒度派为中世纪在法国和意大利兴起的教派，坚持《圣经》权威，将其翻译成各地本土语言，并用这些语言讲道。后被罗马教廷视为异端而倍加迫害。16世纪时，瓦勒度派加入宗教改革的洪流，接受了许多加尔文主义教义，成为更正教的一个宗派。许多更正教学者将该派视为宗教改革的先行者。——译注

^②勒比根斯派是12世纪兴起的教派，反对罗马教士的权威，自行聚会。后被视为异端，遭教廷派十字军残酷地屠戮剿杀。——译注

^③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是为维护天主教正统性于1478年设立的，19世纪初才因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而逐渐废止。该组织起初意在审查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后来成为迫害各类异端的撒手铜，受审查的人会遭遇各样折磨，令人闻之色变，尤其是对更正教更是残酷镇压。——译注

^④圣巴多罗买之夜是16世纪在法国天主教徒对更正教的胡格诺派进行的一场大屠杀，当时胡格诺派重要人物都聚集参加婚礼。后来屠杀蔓延到全国，血流成河。教廷为此兴奋不已，专门发行纪念币，制作壁画，以示庆祝。——译注

如果罗马教会还有能力的话，我不敢保证他们不会故态复萌。

至此我们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出这个问题：被烧死的英格兰宗教改革领袖都有哪些人呢？他们叫什么，死的时候是怎样的处境？接下来我会一一作答。

本章行文至此，我很清楚，有人会认为我提了太多旧事。但我大胆地说，我们理应时常回顾这些旧事。其一，我希望在这片土地上，更正教的家庭能对这些殉道者的名字耳熟能详。因此我毫无歉疚，要按照殉道时间的先后次序给出九位最重要的英格兰殉道者的姓名，以及他们各自的一些情况。我相信，从基督离世以来，基督徒们从未见识过有谁在面对残忍死刑时，会像玛丽时期的殉道者那样具有荣耀的信心、盼望和忍耐。也没有任何将死之人留下如此丰富的高尚遗言，配得以金字铭刻在史书上，为子子孙孙代代流传。

玛丽统治期间第一位作为殉道者跨过死亡之河的改教领袖是伦敦的神职人员约翰·罗杰斯，他是圣墓教堂的教区牧师，并且在圣保罗教堂担任受俸牧师及神学讲师。他于1555年2月4日，星期一，在史密斯菲尔德受火刑。罗杰斯出生在伯明翰附近阿斯顿教区的底里屯特。他为更正教信仰所做的贡献远超那些与他一起受刑的难友。他曾协助丁道尔和科弗代尔推出极为重要的一版英语《圣经》，即通常所说的马太《圣经》。

实际上，他受审时被称为“罗杰斯，化名马太”。因此，他自然而然的是众矢之的，成为第一个上火刑柱的殉道者。

罗杰斯在加德纳面前受审的场面让人看到他是个勇敢的、彻头彻尾的更正教徒。他坚决地与罗马教会公开论战，条理清晰地给出自己的观点。不管怎样，他似乎让行刑者无话可说，窘迫不已，就此而言，他强过大多数殉道者。当然，论据不会扭转判决。“征服者有祸了！”如果他有真道，敌人却有刀剑。

受刑的那天早上，敌人到新门监狱的囚室匆匆唤醒他，几乎不让他有时间来穿戴整齐。然后，押解他步行前往史密斯菲尔德，从他曾讲过道的圣墓教堂可以看到他慷慨赴义的脚步，他穿过了自己曾辛勤牧养的教区的街道。他的妻子和十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是婴孩）站在街道旁，残暴的邦纳主教在他下监时干脆断然拒绝让他们探监。他仅仅是看了眼家人，却无法停下，镇定地走向火刑柱，口中一遍遍念着《诗篇》51篇的话语。蜂拥而至的人群挤满了街道，填满了史密斯菲尔德的每处可以立足的角落。那日之前，人们无法想象英格兰改教家面对死亡时的表现，很难相信领取俸禄、地位显要的神职人员真的会为了信仰而舍身被火焚烧。但看到第一个殉道者约翰·罗杰斯镇定、毫不畏缩地走进炙热的死地，群众的热情就难以压抑地爆发了，他们热烈欢呼，呼声震天。甚至法国大使诺阿雷

在家信中描述这一场景时说，罗杰斯赴死“好像是去结婚一样”。借着神的大怜悯，他死得相对轻松。玛丽时代第一个殉道者就这样离去了。

玛丽统治期间第二位为了基督的真理而献身的改教领袖是格洛斯特主教约翰·胡珀。他于1555年2月9日，星期五，在格洛斯特葬身火刑架上。

胡珀是萨默塞特郡人。从许多方面来看，他或许是殉道者中身份最尊贵的。爱德华六世的所有主教里，就个人圣洁、在教区内殷勤讲道做工而言，没有人在身后留下的声望胜过他。在他留下的作品中的全部神学要点上，没有人比他的看法更清楚、更合乎《圣经》。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爱德华六世的这位格洛斯特主教太过于加尔文主义了，但他的加尔文主义并没有超越《三十九条信纲》^①。胡珀很有远见，看到了在英国国教中留下罗马天主教的余孽有多危险。关于在自己的奉献礼上要不要穿罗马天主教服饰，他同克兰麦及其他主教进行了争辩，据我所知，人们大都批评他在这场著名的辩论中太呆板顽固。但我大胆地说，英国国教的历史让我们疑心是不是该为他翻案了。真相一目了然，胡珀的原则是正确的，对手错了。

^①英国国教的信仰宣言。——译注

胡珀坚定、毫不动摇、宁折不弯并且毫不妥协地谴责罪，他不是天生就和蔼可亲的人，当然会有很多仇敌。罗马天主教的地位一恢复，他就成了要消灭的头号目标。玛丽的迫害甫一开始，他就被召去伦敦，在狱中拖延一年半，经由邦纳、加德纳、滕斯托尔和达伊审查后，他被剥夺教职，被定为异端判处火刑。

起初，本打算让他在史密斯菲尔德同罗杰斯一起受刑。但因为某些未知的原因，这一方案撤销，胡珀被押解到格洛斯特，让他大为满足。他在自己的教区，在自己的教众面前被烧死。他一抵达，就有众多人群来到赛伦塞斯特大道迎接他，众人脸上既有悲伤又带着尊敬。当夜，当局让他住在因格拉姆先生家，那栋房子现在还在，可能没多大改变。安东尼·金斯顿爵士——神曾借着这位善良的主教使之脱离罪恶的生活——流泪恳求他，让他留下性命，劝他说：“生则甜蜜，死却痛苦。”这位尊贵的殉道者的答复万古流芳：“永生更甜蜜，永死更痛苦。”

他受刑的那天早上，刽子手领他出来，走到刑场，无数群众等待着他。那天是赶集的日子，估计有约七千人在场。火刑柱直接就安在大教堂西门门口，距他的宅邸和大教堂东沿不到一百码。现在，人们在圣玛丽-德-楼德教堂墓地东沿他受难之处竖起了美丽的纪念碑。教堂大门上方的窗子——天主教修士曾在此观看胡珀主教受刑时的痛苦挣扎——至今还未改变。

胡珀抵达刑场后，获准祷告，不过绝对禁止他向人们说话。他跪下来祷告，内容被福克斯记下来了，非常感人。即便此时，当局也丢给他一个盒子，里面有教会的赦免令，只要他放弃信仰就可获得赦免。他的回答是：“拿走；要是你爱我的灵魂，就拿走。”于是刽子手用铁链缠住他的腰绑到火刑柱上，然后他开始跟打最后一仗。所有的殉道者中，可能除了里德利之外，胡珀是受苦最多的。因为柴火燃烧不当，刽子手不得不点火三次。这位高贵的受难者承受了四十五钟的痛苦，“他既没有前后摆动，也没有挣扎，”福克斯说，他只是祷告：“主耶稣，可怜我吧，主耶稣，求你收纳我的灵魂。”他用一只手捶胸，直到手被烧残。善良的格洛斯特主教就这样走了。

第三位玛丽治下受难的改教领袖是萨福克郡哈德利教区长罗兰·泰勒。他于1555年2月9日，星期五，也就是胡珀在格洛斯特受刑的同一天，在他自己教区附近的阿德汉被烧死。

罗兰·泰勒是我们知之甚少的人之一，我们只知道他是克兰麦的挚友，神学和教会法规博士。但显然他在改教家中地位甚高，因为仇敌将他与胡珀、罗杰斯和布拉德福德同列；而且从福克斯记载的对他的审讯来看，他是个大有能力、训练有素的神学家。实际上，福克斯收集了那么多关于他的感人且震撼的事，远超其他殉道者，让人觉得他们可能是朋友。

在哈德利，当加德纳第一次召他去伦敦时，朋友们劝他逃命，他也逃得掉，但他的回答很震撼：“你们要我做什么？我老了，活得已经够久，见多了邪恶可怕的日子。你们逃吧，随你们良心的带领而行。我意已决，要靠着神的恩典去见那个主教，不客气地让他知道他一无所成。我相信在神面前，我为神所做的善工中没有一件比我现在要行的这事更美好了。”

他对加德纳和其他审查者的回答也令人惊讶。没有人比这位萨福克郡牧师的话更简洁而沉重有力。

他最后的见证和给妻子、家人和教众的遗言也十分震撼，令人为之动容，限于篇幅，在此只摘录最后一句：“为神的缘故，要小心罗马教。因为表面上罗马教似乎是在团结教会，但实质是虚空的，是敌基督的，并非出于对基督的信心，没有真理。”^①

当局将他从伦敦解到哈德利，要当着他教众的面烧死他，这正合他意。离哈德利已经不到两英里时，萨福克郡治安官问他感觉如何。他答道：“当赞美神，治安官大人，感觉再不会比现在更好了。因为我快到家了。再走过两条街，我就要安居在我天父家里了。”

他穿过哈德利小镇的街道，看到两边都是他的教众。他们

^①福克斯《行为与丰碑》，第三卷，138页。

听说他回来了，纷纷走出家门来问候他，流泪、哀哭。他只对他们说出了自己一贯的话：“我已经向你们传讲了神的话语和真理，今天要来用我的血来印证。”

去刑场所在地阿德汉的路上，他们告诉他身处何地，他听后就说：“感谢神，我就快踏进家门了。”

当刽子手脱去他的衬衫，准备把他绑上火刑柱时，他大声呼喊：“好人们啊，我教训给你们的只有神的圣言，以及我从《圣经》中得到的，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了，如今在此我用我的血来印证。”他的话很可能不止这些，但像其他殉道者一样，当局禁止他说话，甚至因为讲了这些话，他头部遭到了重重一击。之后他跪下祷告，教众中有一位贫穷的妇人不顾当局的尽力阻止，与他跪到一起。此后，刽子手把他绑到火刑柱上，他口中重复着《诗篇》51篇的话，并向神呼求：“慈悲怜悯的父，求你因耶稣基督的缘故，将我的灵魂收归你手。”他站在火焰中，没有哭喊也没有动，直到一个兵丁拿戟戳入他的大脑。萨福克郡这位善良的老牧师就这样走了。

玛丽治下第四位受刑的改教领袖是威尔士圣大卫教堂主教罗伯特·费拉。他于1555年3月30日，星期五，在卡马森就义。关于他的生平，留下的资料很少，只知道这个好人生在哈利法克斯，是约克郡的最后一任诺斯特修道院院长，1540年卸任。

他也是克兰麦大主教和护国公萨默赛特的随扈教士，因此得以升到主教的位置。他起初是在爱德华六世在位末期，护国公萨默赛特倒台后，因一些世俗琐事上的荒唐指控而入狱，后来就跟胡珀、罗杰斯和布拉德福德一道被带到加德纳那里，接受教义方面的审查，这可要严重得多。起诉书清楚表明，他在所有关乎信仰的问题上与一同罹难的殉道者如出一辙。像胡珀和泰勒一样，他被判处火刑，并要在他最出名的地方烧死。于是当局把他从伦敦押解到卡马森。福克斯只是简略地记述了他受刑时的事，原因一方面无疑是在那个没有铁路的时代，卡马森距伦敦太远了，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目击费拉受刑的人大都只会威尔士语。史书只记下了一件事，足以表明他的勇气和不屈不挠。在行刑的前一天，他告诉一位朋友，只要看到他在烈火焚身的痛苦中稍有动弹，就无须相信他所教导的教义。可怕的时刻来临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允诺，借着神的恩典，他真的做到了。他站在火焰中，紧握双手，直到手都被烧残，最后一个旁观者出于怜悯敲了他的头颅，结束了他的痛苦。这位威尔士主教就这么走了。

玛丽统治期间第五位殉道的改教领袖是圣保罗教堂的神职人员，里德利主教的随扈教士布拉德福德。他于1555年7月1日，星期一，在史密斯菲尔德就义，年仅三十五岁。布拉德福德在

英国殉道者中恐怕是名声最大的，很难说有谁能得到比他更美的名声。斯特莱普称布拉德福德、克兰麦、里德利和拉蒂默是改教后英国国教的“四巨头”。他出生在曼彻斯特，终其一生都深深顾念着这一地区。年轻时，他的天赋就引起了教会高层的注意，成为教会差遣到英格兰各地传讲宗教改革教义的六位教士之一。布拉德福德的使命是在兰开夏郡和柴郡传道，他似乎以非凡的能力完成了任务，获得巨大成功。他总是在曼彻斯特、利物浦、博尔顿、布里、维冈、阿斯顿、斯托克波特、普雷斯特威奇、米德尔顿和切斯特讲道，大大促进了更正教教义的传播，对人们的灵魂产生了广泛影响。结果预料得到，玛丽女王即位刚一个月，布拉德福德就下监了，再没有出来过，直到葬身火海。他的朝气、圣洁以及作为声名显赫的传道人所拥有的名望，使得他在狱中成了仇敌眼中极有价值的目标，他们付出了许多努力来让他离弃更正教信仰。然而，这些努力都白费了。他怎样活着，也怎样死去。

他就义的那天，大约上午9点，他从新门监狱出来被押去史密斯菲尔德。围观的群众之多空前绝后。一位后来活到九十六岁高龄，1620年才去世的杭尼伍德妇人记得去看布拉德福德受火刑的情景，她的鞋都被拥挤的人群踩掉了。其实，当他走上火刑柱时，伦敦治安官因人群鼎沸非常紧张，没等他

和一同赴难的里夫祷告完，就叫道：“起来，结束祷告吧，人群太拥挤了。”

布拉德福德长老拿起一捆柴薪亲吻，也吻了火刑柱。他来到火刑柱上时，举起双手，举目望天，说：“英格兰，英格兰，为你的罪悔改吧！要当心偶像崇拜，当心敌基督者的虚假！小心，别让他们欺骗了你！”然后他对一同就义的年轻人里夫说：

“弟兄，应该大感安慰，因为今晚我们就能与主同享欢乐的晚宴了。”后来他再没说什么其他人听得到的话，除了拥抱芦苇捆时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富勒说：“他拥抱了火苗，就像炎夏的一缕清风。”他就这样英年早逝。

玛丽在位期间第六、第七位就义的改教领袖是两位英国家喻户晓的人：伦敦主教尼古拉斯·里德利和曾经的伍斯特主教休·拉蒂默。1555年10月16日，他们在牛津，在同一根火刑柱上背对背身受火焚。里德利出生在诺森伯兰郡边境的维利蒙兹外克。拉蒂默出生在莱斯特郡的瑟卡斯顿。这两位伟大的英格兰更正教徒的生平众所周知，就无须多言了。除了克兰麦以外，无疑他们两人为英格兰宗教改革原则的确立作工之多无人可比。拉蒂默是大受欢迎的布道家，而里德利则学富五车，是令人钦佩的首都伦敦教区的管理者。他们留下的美名还无人超

越。玛丽登基后，他们自然而然成为邦纳和加德纳首批打击对象，遭受了残酷迫害一直到死。

审查者怎样一次又一次就更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之间争论的要点审查他们，怎样以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无理手段可耻地引诱、戏弄和折磨他们；他们如何自始至终英勇地打了一场美好的仗，从未向对手低头——这些事我无须多言，不都清楚地记在好心的古人福克斯的殉道史籍里面吗？在此，我仅稍微提及他们死时的情形。

他们就义的那天，分别被带到刑场，就在牛津宽街的尽头，靠近贝利奥尔学院。里德利先到，看到拉蒂默来了，就跑去吻他，说：“弟兄，应该带着好心情，因为神要么会减轻火焰的暴虐，要么会刚强我们，叫我们能经受得住。”接着他们恳切祷告，彼此谈论，不过没人听得到他们在说什么。此后，他们不得不听一个卑鄙的叛徒史密斯讲道，并且无权作出任何回答。然后，官吏下令让他们准备受死。

这是点火前里德利最后的话：“天上的父啊，我全心感谢你，因你召我在传扬你的职位上一直到死。我恳求你，我主我神，求你怜悯英格兰这片土地，把她从仇敌手中救出来吧。”拉蒂默最后的话则像响亮的号角，声音至今仍回响不已：“里德利长老，当大得安慰，我相信，今日我们借着神的恩典在英

格兰点亮的火把绝不会熄灭。”

火焰升起来了，里德利用拉丁语大声喊叫：“主啊，我把灵魂交在你手中了，求你收纳。”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拉蒂默则在火刑柱的另一边高喊：“天上的父啊，收纳我的灵魂吧。”

拉蒂默很快就死去了。他已是八十高龄的老者，须臾之间，他的灵魂便脱离了尘世的桎梏。里德利受苦要更久、更痛苦，因为行刑者没有把火焰控制好。不管怎样，火苗最终吞没了他的躯干，他倒在了拉蒂默脚下，安息了。就这样，两位伟大的更正教主教离去了。“他们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

玛丽治下第八位蒙难的改教领袖是温彻斯特副主教约翰·菲尔波特。他于1555年12月18日，星期三，在史密斯菲尔德受火刑而死。对于菲尔波特，我们所知相对较少，只知道他生在汉普郡的康普顿，家庭条件优越，人脉关系上佳，以学识而获得盛誉。玛丽刚登上王位，他就在特别会议上举行的模拟辩论中担任捍卫更正教信仰的主辩之一，由此足以表明他并非庸碌之辈。加德纳以无休止的审讯裁判来逼迫他，原因很简单，要知道加德纳在爱德华六世期间担任温彻斯特主教，后来被剥夺主教职权，自然会对顶替他职位的珀特尔主教及其随从恨之入骨。罗马教会的主教不太可能饶过更正教的副主教。

福克斯用了很长的篇幅记述了菲尔波特在罗马天主教众位

主教面前接受的十三项审查，在帕克协会出版的一卷书中，占了至少一百四十页。如此长时间的审查清楚地表明，法官们多么焦急地想要让他放弃自己的原则。这位副主教孤立无援，仅仅凭着勇气和耐心就坚守住了立场，并且让人对他的学识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到达史密斯菲尔德后，跪下来，说：“我要向你还愿了，史密斯菲尔德。”接着，他亲吻火刑柱，并说：“为了我，救赎主没有拒绝忍受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羞辱，我怎么会不甘愿在这柱子上受难呢？”然后，他轻声背诵《诗篇》106、107和108篇。刽子手把他绑在火刑柱上，行刑后，他安静地死去了。这位善良的副主教就这么走了。

玛丽统治期间第九位受难的改教领袖是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他于1556年3月21日在牛津就义。克兰麦出生在诺丁汉郡的阿斯拉克顿。历史上的英国殉道者中没有谁像他那么有名。无疑，整个英国国教对他的感激应该超过其他英格兰改教家。必须承认，他只是肉体凡胎，有软弱和缺点。但是，他仍是个伟人，一个好人。

一定不要忘了，克兰麦在英格兰宗教改革相对较早的时候，就平步青云，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时，他的信仰观还未定型，并不完全，这已是公论。不管何时，只要英国国教内拥护半天

主教教义的人引用了克兰麦的话，都要小心地确认这是他在人生的什么时期说的。在评价克兰麦时，不要忘了他的经历。他真诚地摸索着，直到完全明白了真理，于是扬弃了过去的观念，承认自己在许多问题上改变了看法。有勇气如此行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尽管克兰麦经常担负处境微妙的困难职位，但他的声誉完美无损。那个年代，再没有别人能像他那样，出淤泥而不染。

毫无疑问，克兰麦为今日的祷告词和信纲奠定了基础。也许他不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但却是博学之士，也喜爱有学问的人，并且他总想改进周围的一切。一想到他要面对的巨大困难，我往往就要惊叹，他竟然能做成一件又一件这样那样的事。实际上，是因为他的坚持不懈，才为英国国教的各项准则打下了基础。

说上面这番话，是为了开始讲述这一无法否认的事实——他是唯一一个曾坚持真理，又曾一时畏缩，不敢为真理而死的改教家！我承认，他可悲地跌倒了。我不想假惺惺地为他的失足辩解，反而要说这正证明了再好的人也不过是个人。我只希望读者记住，即便是克兰麦犯的错，英格兰其他改教家都没犯过，但他所成就的事也定然是其他改教家没有做成的。

玛丽一登上英格兰王位，克兰麦就进入了死亡黑名单。很

可能，比起克兰麦，再没有哪个英格兰神职人员让这个苦闷的女王如此怨恨憎恶了。她绝对忘不了，是克兰麦的建议让父王决意同母后离婚，若不把克兰麦烧死，她寝食难安。

克兰麦下狱了，像里德利和拉蒂默一样接受审查。他也跟他们一样，在调查委员会面前立场坚定，在所有争论点上给出了绝佳的论据。当然，他也跟里德利和拉蒂默一样，被定为异端，被定罪，遭到威逼，最后判处火刑。

事实让人心痛不已。克兰麦人生的最后一个月里，他丧失了勇气，屈服于威逼利诱，签署了一份放弃更正教观点的声明。敌人用狡猾的甜言蜜语谄媚他、引诱他，火刑是那么可怕令他战栗，魔鬼试探他，拉着他偏离了正道。克兰麦跌倒了，握笔签署了声明，否认、放弃了自己曾为之奋斗良久的宗教改革原则。

所有真正的更正教信徒听到这消息都大大悲伤！所有罗马教皇一党都欢呼雀跃庆祝胜利！要是他们就此止住，给这位高贵的受难者以自由，那么克兰麦的名声很可能就此沉沦，不会再浮出水面了。但罗马教一党自取其败，因为神定意如此。他们极度残忍，还是要烧死克兰麦，尽管他已经屈服。神的护理之工使之成为克兰麦声誉的转折点。借着神丰盛的恩典，他悔改了自己的堕落，得到主的怜悯。借着同样的丰盛恩典，他决定要以信奉宗教改革教义者的身份死去。最后，借着丰盛的恩

典，他在牛津的圣玛丽教堂勇敢地认罪，令敌人惊惶，令友人感恩地赞美神，留给世界为基督的真理殉道之人的得胜号角。

3月21日，像参孙落入非利士人之手那样，不幸的大主教被押解出来，供敌人戏耍，却在牛津圣玛丽教堂成为万众瞩目之人。科尔博士证道完毕后，敌人请他陈明自己的信仰，满心盼望他公开承认自己投入了罗马教会门下。大主教怀着内心的剧痛，长篇大论向众人陈述，结束时却宣布否决自己之前放弃信仰的声明，宣称教皇就是敌基督，弃绝天主教的“圣餐是基督血肉真实临在”的化质说教义。无疑，从创世以来，这样的景象是人闻所未闻的。

克兰麦得胜的时刻到了。他内心的重担已经卸下，良心清洁，在失望的敌人狂怒的叫喊声中，他大步流星走上火刑柱。他勇敢无畏地站熊熊烈火中，坚定地伸出右手说：“这可恶的右手啊。”他指的是自己曾用这只手签署了放弃信仰的声明。然后他又坚定地举起左手指向天空。很奇怪，所有的殉道者中，克兰麦在最后时刻表现出的身体上的勇气最多。简言之，他一生最出色的就是离世之时的表现了。他犯了大罪，但又深切悔改。他像彼得一样跌倒了，又像彼得一样重新站了起来。第一位更正教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就这样走了。

我并不会对这段痛苦而引人关注的历史作出任何评价，我

没有时间。只希望读者相信，这些人的故事一半都还没讲完，另外还有众多职位不那么显赫的男男女女也经历了同样的事，一样地惨痛，也一样地引人注目。但我斗胆说一句，绝不应该忘记这些受火刑的殉道者，不应该轻看他们的观点。“殉道大军”为这些观点而殉亡，因此决不能轻蔑地搁置他们的观点。更正教的英国国教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的忠贞信实，是他们的血为国教奠定了根基。英格兰的自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勇气。他们教会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为思想自由而死是值得的。拥有这样的公民的国家是幸福的！拥有如此多改教家的教会是幸福的！那些在史密斯菲尔德、牛津、格洛斯特、卡马森和哈德利为殉道者建立纪念碑的人十分光荣。

不过现在我要转而论及另一个要点，我认为这是今时今日无比重要的议题之一，即烧死改教家的具体原因。如果我们误以为，改教家受难只是因为拒绝服从教皇，想要维持英国国教的独立，那就大错特错了。原因绝非如此！他们遭遇火刑是因为拒绝罗马教会一项特有的教义。几乎每个殉道事件，殉道者是生是死都取决于对这条教义的态度。如果他们接受，尚可活命；如果否认，就必须死。

这条有问题的教义就是，圣餐时祝圣过的饼和酒就是基督的身体和血的真实临在。他们相不相信神职人员祝圣以后，基

督的身体和血真的以饼和酒的形式存在，即饼和酒就是基督真实的肉体，是同样的物质，真的在盘中杯中了？他们是否相信，司铎念出神秘的话之后，童贞女马利亚所生的基督的肉身就真的临在于所谓的祭坛上了？他们相信还是不相信呢？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他们不相信，不承认，就会烈火焚身而死。

英格兰殉道者在这一点上奇妙而惊人的一致。无疑，有些人因神职人员结婚而遭攻击，有些人因揭露了天主教会的本质而受威胁，有些人因为其他的一些论点而遭逼迫。但他们无一例外，都面对罗马教会特别地要他们承认在圣餐礼中基督身体的真实临在，但每个火刑案子里，罹难者拒绝承认这条教义都是他们被定罪的主要原因之一。

听听罗杰斯怎么说吧：

“他们问我是否相信圣礼中的饼和酒就是救主基督的身体和血，就是童贞女马利亚所生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的身体，是真实的身体并且实质一样。我回答：‘我认为错了。我无法理解除了肉身以外还有什么真实且实质性的东西。但基督的肉身只存在于天上，所以基督不可能以肉身存在于你们的圣礼中。’”

因此，他被定罪，葬身火海。

听听胡珀主教说了些什么吧：

“滕斯托尔问他相不相信圣礼时基督的肉体临在，胡珀长老清楚地回答，没有这样的事，他也不会相信任何这样的事。于是，他们要求公证人写上，他已经结婚了，不会跟妻子分开，而且他不相信圣礼时基督肉体的真实临在；所以他应当被剥夺主教职权。”

因此，他被定罪，处以火刑。

听听罗兰·泰勒的话吧：

“把我当作异端定罪的第二个原因是我否认化质说和伴随发生之说，这是两个欺骗之词，教皇一党相信基督真实的身体是饼做的，神性马上就与之结合，于是祝圣之后，饼和酒就不再是圣餐礼的饼和酒，而实质上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了。”

“因为我否认上述天主教教义（非常明显，这是邪恶的偶像崇拜，亵渎救主的异端），所以被定为异端。”

于是，他被定罪，葬身火海。

看看费拉主教怎么做吧。敌人召他来，要他“承认圣餐礼中，基督以饼和酒的形式真实地临在”，但因为他像其他殉道者一样拒绝认同这条教义，就被定罪。定罪判决最终指控他坚持“祭坛上的圣物不应该在上面献祭，不该高举，不该以任何方式来崇拜”。就这样，他烈火焚身而亡。

看看圣洁的约翰·布拉德福德在狱中写给兰开夏郡和柴郡

的人的话：

“我被定异端罪的首要原因是我否认祭坛上的圣物（不是基督的晚餐，教皇一党现在的使用方法完全是谬解）是基督真实、自然和肉身的身体和血，不管是以饼和酒的形式还是附于其上，即我否认化质说这一魔鬼的宠臣、敌基督信仰的遗传。”

于是，他被定罪，处以火刑。

看看里德利主教的判决书写了些什么吧：

“尼古拉斯·里德利否认祭坛上的圣餐有基督真实的、物质的身体和血存在其中，并断言在祝圣以后饼和酒实质并未改变，就是在肯定、维护与教会接纳的信仰相悖的观点、主张和异端，顽固地为之辩护。”

于是，他被定罪，处以火刑。

看看控诉拉蒂默主教的罪状吧：

“你公开认定，司铎祝圣后基督真实、物质的身体并不存在于祭坛上的圣餐里，祭坛上的圣餐仍然是实质上的饼和酒，你维护这样的论点，为之辩解。”

对此，善良的老人答道：

“罗马教会布置的把戏之后，基督的身体和血并不以饼和酒的形式存在于圣餐之中。”

于是他被定罪，处以火刑。

看看邦纳主教对菲尔波特副主教说的话吧：

“你干犯了祭坛上的圣餐，否认基督的身体和血真的临在，还断言圣餐从物质上看不过是饼和酒，不是基督的身体和血。”

因为这位好人坚持这个观点，于是被定罪烧死了。

最后，听听克兰麦在牛津的圣玛丽教堂几乎拼上最后一口气说的话吧：

“至于圣餐，正如我在那本反对温彻斯特主教的书中所说，在末日我书中教导的真正教义将会在审判台前站立得住，与此相反，教皇一党的教义会羞愧难当。”

如果有人想知道克兰麦在书中说了什么，可以下面的话作为范例：

“他们（教皇一党）说基督的肉体以饼和酒的形式存在。我们却说，不管是以肉体的形式，还是从属灵的角度看，基督不在那里，他的灵在配得吃饼喝杯的人里面，肉体在天上。”

于是他葬身火海。

英格兰改教家在真实临在这个问题上如此坚持，宁折不弯，是否正确呢？这一点真的那么重要，值得他们宁愿死也要坚持？我想，许多未加思考的人而言会有这些问题。我担心这些人在整场关于真实临在的争议中只看得到文字游戏或言语冲突。但我可以大胆地说，所有得到过良好教导的《圣经》读者都会

毫不迟疑地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样的人会立即说，罗马教会真实临在这一教义冲击了福音的根基，是罗马天主教存亡的大本营。可能读者一开始没有这样的认识，但这一点应当小心地谨记在心。由此出发可以清楚而深入地看到改教家们的思路，为何他们能无所畏惧地宁死也要坚持。

不管人要怎么想怎么说，若是考察罗马教会真实临在的教义定然会带来的结果，会发现这一教义会模糊每一条重要的福音教义，损害、妨碍基督的整个真理系统。承认主的晚餐在某一时间成了祭物，而非圣礼；承认每当祝圣的话说出后，基督的身体和血就真的以饼和酒的形式出现在圣餐桌上；承认吃圣餐的人吃饼喝杯时在吃喝主真实的身体和血；只要承认这些东西一分一秒，那么看看会立时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吧。承认了，就是在破坏基督已经成就之工的福音教义，他在十字架上本来已经成就了这项工作。如果献祭还要重复，就是不完全的献祭，这样一来就破坏了基督的祭司身份的教义。如果除了基督还有谁能献上祭，就抢夺了这位至高的大祭司的荣耀，这是在破坏基督徒职分的《圣经》教义，把罪人高举到中保的位置。不合宜地荣耀、尊敬圣餐中的饼和酒，就是在制造信实的基督徒理当厌恶的偶像崇拜。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条——承认这些，就推翻了基督的人性这项教义。如果童贞女马利亚

所生的身体可以在多处地方同时出现，就不是与我们相似的身体，耶稣就不是与我们本质一样的“末后的亚当”。我毫不怀疑，殉道的改教家比我们对这些事的看法和感受要更清楚、深切，他们看到了、感受到了，因此宁愿死也不承认真实临在的教义。他们有此感受，因此一分一秒也不能屈服，心甘情愿地献上生命。愿这一事实深深地刻在我们心里。不管在哪里，只要是地球上讲英语的地方，每个读历史的人都应该清楚地领会殉道者们宁折不弯的原因。英国国教的改教家们不承认基督的身体以饼和酒的形式真实临在的教义，为此甘愿烈火焚身。

现在我必须请读者特别注意，因为我要讲述本章整个主题在今时今日对我们有何意义。

我必须请读者的思路离开死者，转向生者，离开 1555 年的英格兰，看看如今这个已经启蒙的发达时代的英格兰，认真思考改教家遭遇火刑对今日英国国教的启发。

我们生活在专顾眼前的时代。教会放眼四方只看到一片黑暗的低洼地。极端拘泥于仪式的倾向、拘泥于仪式的人已经起来了，斩获颇丰，正在从核心里动摇英国国教。领悟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已经是重中之重。要成功地治疗病人，首先要有正确的诊断。看不到问题所在的医生不可能治好病。

要是以为今时的争议不过是关于服饰和装饰——穿十字裙

还是长袍，教堂装饰多些还是少些，蜡烛和花是多些还是少些，鞠躬、转身和画十字是多是少，各种姿势是多是少，表现形式是多是少——那就大错特错了。要是有人认为整个争论不过是审美、品位的不同，就像对时装和礼帽的品位一样，我就得告诉他，完全错了。他可能坐在岸上，像伊壁鸠鲁派的哲学家那样，对神学风暴微笑以待，自我安慰说只不过是争论鸡毛蒜皮的小事。但要告诉他，他的思想非常浅薄，对当日的争议，看法其实非常肤浅。

我完全承认，我说的事都是小事，但都是致命的小事，因为这些事都是内在教义的外在表现，是表明身体健康出现问题的皮肤疾病。这些事是瘟疫的痕迹，让我们知道里面的流毒；是隐藏的火山冒出的烟尘。要是我认为教会的衣着、焚香和蜡烛背后没有任何意义，那我绝对不会论及。然而我相信这些事意味着存在大量谬误和虚假的教义，所以我公开抗议，宣称所有支持这些做法的人都应受谴责。

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整个礼仪派体系的根基就是这项险恶的教义——圣餐时基督真实的身体和血以祝圣过的饼和酒的形式存在。如果，言语还在表达意义的话，真实临在的教义就是礼仪派原则的根基。礼仪派一党中的极端分子想要把英国国教带回到真实临在这条教义。殉道的改教家宁愿走上火刑柱也

不愿承认真实临在这条教义，我同样坚持认为，为了防止这痛苦的结果来临，应当做出牺牲，进行抗争，而不是让“基督以物质形式存在于圣餐中”这条错误教义以任何形式回到我们的圣餐仪式当中。

为了不加重读者负担，我不会引经据典来证明自己所断言的。其实读者们所知的已经足够了，也许已经太多了。但我必须展示两条精干的论述。

看看蒲赛博士在《你们也要走吗？》那篇讲道中的话吧：

我们已经弃绝了任何认为我们的主在圣餐中以物质形式存在的概念，比如‘主的身体和血以肉身形式临在’等说法，我相信应受谴责。这样说就好比他宝贵的身体和宝血是以什么卑劣、肉欲的方式临在，而非属灵的方式真实临在于圣餐礼中间——我相信在圣餐中，基督的身体和血是以仪式性、超自然、难以言喻的方式，却又真实确实地存在，‘在饼和酒的形式之下’，‘他的身体在哪里，基督就在那里’。

看看李透戴尔博士在《真实临在》那本小册子里的话吧：

基督教会教导，并且一贯如此教导，在圣餐中，祝圣以后，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真实且确实地以饼和酒的形式临在于祭坛上。

教会也教导，这种临在取决于神的旨意，而不是人的信

念，因此圣餐时善人恶人都一同领受，但善人得益，恶人是在定自己的罪。

此外，基督既是神也是人，神人二性永远在他的同一位格中结合在一起，他的身体在哪里，他的神性就一定在那里，因此要敬拜圣餐中的他。

身体和血就是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后来升天的身体，不过临在的方式与基督在地上时不一样。作为人，他的身体自然地居于天上，直到末日，但他也超自然地、真实地临在于圣餐中，其形式我们无法解释，但只能相信。

从以上引文可见，两位作者想要避免遭人指责，说他们支持“卑劣、肉欲的临在”。然而，他们的企图并不成功。很稀奇，三百年前的罗马教卫道士，杰威尔主教的对手哈丁先生说的话差不多一样：

基督的身体并不是以肉体、自然的方式临在，而是不可见、难以言喻、神迹般、超自然、属灵的、神圣的方式临在，这种方式只有他自己才明白。

不难发现他们都采用了殉道者坚决反对的说法——“在饼和酒的形式之下存在”。

对我而言，很显然，如果蒲赛博士和李透戴尔博士 300 年

前被带到加德纳和邦纳面前，一定会在一路彩旗飘扬的欢送中离开，绝对不会被烧死。

读者可以看看国教中身居高位的人出版的关于圣餐的讲道，可以看看一些指导圣餐的礼仪派的手册，可以看看著名的《安立甘宗管理》^①一书。我只是觉得，没有哪个正常人读了极端礼仪派的作品后，会看到他们持守的教义与彻头彻尾的罗马天主教有什么实质区别。有区别的话，就是毫无不同的区别，任何由十二个诚实人组成的陪审团都会立即断定这样的“区别”不存在。

考察完书籍和讲章，再来看教会。请所有勤于思考的人留意一下、思考一下、回顾一下，在那些精心布置的仪式性敬拜的场所可以看到什么。请留意，在那里人们迷信地、偶像崇拜般地尊敬讲坛里的一切、圣餐桌周围和上面的一切。我大胆地请任何由十二个诚实而无偏见的人组成的陪审团看看讲坛和圣餐桌，告诉我这都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整个仪式都是罗马天主教真实临在教义和弥撒献祭的味道？我相信，如果邦纳和加德纳看到今天某些教会的讲坛和圣餐桌，一定会拍手称快；而伦敦主教里德利、格洛斯特主教胡珀会义愤填膺地离开，说：“这

^① “安立甘”意为“英国的”，所以英国国教也称“安立甘宗”，“圣公会”则是中文习惯的说法。——译注

圣餐桌不是为了主的圣餐，而是为了虚伪的罗马教弥撒，是偶像崇拜！”

我一刻也不会否认极端礼仪派的热情和诚挚之心，不过法利赛人和耶稣会会士也一样。我不否认，我们生活在特别自由的国家，今日的英国人除了自杀以外，有自由做任何愚蠢之事。但我绝对不承认任何教士——不管有多么热心认真——有权重新将教皇的一套引入英国国教。最重要的是，我否认人有任何权利维持真实临在的原则，教会的改教家身受火刑就是因为反对这条教义！

真相很显然，极端礼仪派关于圣餐的教义与殉道的改教家誓死捍卫的观点无法调和。这一派的人可能会大声抗议，说自己是正统的教士，但他们肯定不是跟玛丽时代的殉道者持同样观点的教师。显然，胡珀、罗杰斯、里德利、布拉德福德和他们的战友对真实临在持一种观点，而极端礼仪派持另一种观点。要是改教家是正确的，那么礼仪派就错了。二者之间的鸿沟不可抹平，之间的巨大区别不可调和，无法解释得通。如果我们支持一方，就不可能支持另一方。就我而言，可以毫不犹豫地，我对里德利、胡珀和布拉德福德的信心，比起对极端礼仪派的人，要大得多。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危险，程度恐怕超

过大多数人的想象。让英国国教失去更正教特色的阴谋已经实施很久了，罗马天主教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小小的不列颠岛上。他们已经在我们当中削弱、破坏了很久，我们到现在才略有所知。不久，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破坏。照目前的速度下去，如果五十年内有人登上英格兰王位却不是更正教信徒，西敏寺和圣保罗教堂又开始庆祝弥撒，我不会感到奇怪。说白了，危险就是国教失去更正教特色，重回巴比伦和埃及。与罗马教廷重新合一的危险迫在眉睫。

人们可能会认为我用这样的话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但我这么讲是有原因的。英格兰的上层社会普遍都喜好感官上的、做作的、形式性的宗教。下层人民也可悲地通晓了全部做作的仪式，这些仪式都是迈向罗马教的台阶。中产阶级厌烦了英国国教，质疑其存在的价值。知识阶层则想要论证所有宗教要么一样好，要么一样糟。下议院如果没有公共舆论的压力，就什么也不做。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皮姆和汉普登^①那样在议会里立场坚定的人了。礼仪派无时无刻不在生长、蔓延。这条船四面都是巨浪，船首有，船尾也有，左边有，右边也有。得实施行

^①此二人都是17世纪英国革命时期长期议会的领袖。他们在议会中坚持反对国王征税，查理一世因此试图逮捕他们，结果诱发内战。——译注

动了，否则我们都得葬身鱼腹。

英国国教的生命已经绑到火刑柱上了。如果一间教会没有了福音，就不值得存留下去。没有水的井，没有刀的鞘，没有火的蒸汽机，没有罗盘和舵的船，没有发条的表，没有生命的躯壳——这些都是无用之物，但不像没有福音的教会那么没用。我们直面的问题是——英国国教要不要保留福音呢？没有了福音，我们去找大主教和主教都是徒劳的，我们炫耀许多的大教堂和教区的小教堂也是无益的。我们的墙上很快就会写上“以迦博”^①，耶和华的约柜不会与我们同在。确实该做点事了。

然而，有件事我脑子里很清楚。我们不要轻易地放弃英国国教。不要！只要其信纲和守则还未改变、没有废除、没有被替换，就不该弃绝。船还有挽救的希望时，水手跳上救生艇逃命是胆怯可鄙的行径。因为教会现在出现混乱就声言退出的更正教教士是胆小鬼。有船员叛变了，有些人却呼呼大睡，那成什么样子！旧船有漏缝了，工具却不知所终，成何体统！所以我坚持，留在国教还有很多事要做。旧船上还有人呢。伟大的舵手没有弃船。只要我们的信纲和守则没被罗马天主教替换，就让我们坚守这船。《圣经》的罗盘还在甲板上。还有一些忠

^①参见《撒母耳记上》4:21——译注

信且有才华的水手留在船上。既然国教还有基督和《圣经》，就让我们与之肩并肩，把我们的旗帜钉在桅杆上，绝不降下。再次，我希望我们不要受骗、不要被吓破胆、不要恐慌、不要受引诱、也不要发怒，以致弃绝了英国国教。

奉主的名，让我们竖起旌旗。如果我们想在来生无愧地面对里德利、拉蒂默和胡珀，那就为了他们曾誓死捍卫过的真理“热切抗争”。英国国教期待每个更正教教士尽自己的责任。愿我们不要只说不做。而且，不仅要行动，更要祷告。“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

殉道者的血在向我们呼喊。喊什么呢？牛津、史密斯菲尔德和格洛斯特都有大声的呐喊传来：“要誓死反对‘基督的身体以祝圣后的饼和酒的方式在圣餐中真实临在’这一罗马教会的教义！”



约翰·罗杰斯 (约 1500~1555)



《殉道史》中罗杰斯在史密斯菲尔德受难的插图

约翰·罗杰斯

所有英格兰更正教信徒都应向 1555 年在史密斯菲尔德殉难的约翰·罗杰斯致以特别的敬意。原因很简单，他是玛丽治下第一个为了真理而殉道的基督教英雄。他在火刑柱上显现出的勇气和不屈不挠为所有后来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有力地促进了英国的宗教改革。关于这个好人的事很难不吸引所有忠心的教友们的兴趣。高贵的英国殉道者大军中，他是不同凡响的旗手。

罗杰斯 1500 年前后生于迪尼顿，阿斯顿教区的一个小村，

现在属于伯明翰市。他父亲的家族、阶层和地位，还有他早年的经历，他三十岁之前的事，今人知之甚少，只是知道他曾在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堂就读，1525年获得学士学位。要知道，里德利和布拉德福德也曾在彭布罗克学堂就读，罗杰斯极有可能与同时代的这些好人熟识。这样的环境，以及当时拉蒂默扰动整个剑桥的讲道，在后来不可能不对罗杰斯的思想产生可观的影响。

在彭布罗克学堂，罗杰斯似乎很用功，成绩优异。福克斯——在他撰写的史书的一个版本里——仅仅说罗杰斯“刻苦学习，学识渊博”；在另一版中，他说罗杰斯在剑桥待了很久，“殷勤刻苦地获取学问，十分光荣”。不管怎样，显然他声名鹊起，按那时的标准，他已经被视为优秀的学者，饱学之士。他后来翻译了《圣经》，看人从没走眼的里德利主教也很喜欢他，都足以说明他确实是博学之才。然而，最能证明他是优秀学者的证据，是他当选为牛津大学主教学院——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基督教堂学院——教规委员，而这所学院的基础是沃尔西枢机打下的。沃尔西自然而然想要让自己的新学院充满最有才华的人，不管他们来自哪所大学，只要他能劝得动，都让他们加入，而且他还用各种手段引诱人加入该学院。他选中罗杰斯担任首批教规委员，清楚地证明这个年轻的彭布罗克学堂学士已经享有

成熟学者的声誉了。

接下来的二十二年里罗杰斯做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主要原因是这段时间他主要是在欧洲大陆度过的。在外国人中生活，就很难像在本国的同胞和朋友中间生活那样，准确地知晓他的言行。尽管疑云密布，但很可能他经历了下列这些事。

罗杰斯被任命为牛津主教学院教规委员后不久，就得到受命开始担任圣职。但这期间他的事奉似乎没有什么成果，没什么人得救。1532年，他去了伦敦三一教堂。三一教堂负责的教区于伦敦大火之后，被并入圣米迦勒教堂管辖的昆西思教区。罗杰斯去那里两年后，于1534年离职。此后，他短暂地去安特卫普为当地的英国居民当了一阵牧师，离开英格兰十三年。就是在这期间，他结识了著名的威廉·丁道尔，接受了更正教教义，成为丁道尔翻译《圣经》的同工。1537年，丁道尔殉道后不久，罗杰斯与安特卫普的阿德里亚娜·德威登结为夫妻，婚后很快就搬去萨克森的维滕贝格，担任一间德国教会的牧师，时间至少长达十年。极有可能，搬去那里居住对于逃避逼迫来说绝对必要，如果还留在比利时，他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仅仅是与丁道尔这样的人保持友谊，并且身为神职人员却结婚了，就会让他成为天主教会的目标。不过，这些都只是推测。照人之常情来看，在维滕贝格的十年让罗杰斯的属灵

生命受益匪浅。他在宗教改革的原则上根基牢靠了，认识了自己的本相，信心、知识都一并增长，并在成圣上长进不少，已经装备妥当能以担当之后要承担的重任，承受将要面对的火刑。

通常称为“马太《圣经》”的英语《圣经》的翻译工作，罗杰斯究竟参与了多少也许永远无法讲清楚。但有重要理由显示，他的贡献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要大得多，应作为译者与丁道尔和科弗代尔同列。可以确定旁注和“常见地名”表是出自他手。同样可以确定，罗杰斯被判火刑时，敌人称他为“罗杰斯，化名马太”，而这版著名的英译《圣经》在亨利八世时代由当局加入的版权页上写着：“新旧约《圣经》，由多马·马太精准直率地译为英文”。审判罗杰斯的法官是否为了定他的罪而夸大了他在翻译工作中的作用，自然不可能知道，但总的说来，在将《圣经》译为英文的壮举中，罗杰斯极有可能是最早作出贡献的人之一。据我看来，整件事应该是这样的：丁道尔得到了他应有的赞誉，而科弗代尔得到评价的有些夸大，而罗杰斯则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爱德华六世于1547年继位后不久，罗杰斯返回故乡。他有理由期待得到重用，结果也正如此，他很快就被委以重任。有他那样的恩赐、像他那样蒙恩的人正是英格兰改教领袖非常乐意起用的。1550年，他成为圣玛格丽特·摩西教堂和圣体教

堂的教区牧师，这两个教区都在伦敦。1551年，他被任命为圣保罗大教堂下属圣潘克拉斯教堂的受俸牧师，以及埃塞克斯郡奇威尔教区的教区长。1553年，他成为圣保罗大教堂的神学讲师。里德利主教说罗杰斯能优先得到这些职位得感谢他，这话确实不失公允，这位善良的伦敦主教看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老同学。实际上，他在写给塞西尔爵士的信中提到了格林多尔、布拉德福德和罗杰斯，称他们是“有必要在国内四处奔走的人，我不能把任何一个留在身边”。这话很清楚地表明罗杰斯是里德利身边的人。

1553年爱德华六世驾崩，玛丽女王继位，让罗杰斯无法再有效地做工了。1553年年底，他成了囚徒，起先是软禁在家里，1554年1月他进了新门监狱，他在那里度过了最后的日子。他在狱中的情况我们无从得知，只知道当局不允许妻子去看他，而且似乎对他非常严苛。1555年1月，由加德纳主教主持的委员会开始审查罗杰斯，一同受审的还有胡珀和卡德梅克。他被视为顽固的异端，部分原因是他否认真实临在的教义，部分原因是他身为神甫却结婚了。

关于他在狱中还有慷慨赴义那天的举止，约翰·福克斯的记载首屈一指。所以，在此给出这位殉道史专家的原话：

“他有一些看起来预言般的话，但此外还有一条很值得注

意，他在狱中曾对本书的印刷者、同样因为信仰而入狱的难友约翰·达伊说：‘你会活着看到信仰的改变，福音再次可以自由的传讲。因此，我要告诫逃亡在外的弟兄们，要谨慎地从教会中清除教皇一党的人，代之以好牧师，否则他们的结局会比我们更糟。’因为没有足够的好牧师来委派到各个教会，他建议（胡珀也赞同）每十间教会任命一个有学问的好监督，根据条件在他手下配备忠信的讲员；而教皇一派的神甫应当清理出教会。主教每年要监督各教区负责人进步如何。如果牧师没有尽职，没有从书中得益，教众未能得到良好的指导，那就要离职需要接受培训，学习如何造就教众，另派一人接替他。主教对监督也要进行同样的考核。这就是罗杰斯借着那位印刷商给弟兄们的建议和要求，同时也是声明。他说，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就会比他的下场更糟糕。

“关于罗杰斯长老的诸多事情中，有一件不应忘记，即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在主教和教士中爆发的关于圣品服装的争论。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罗杰斯长老是只戴圆帽的一派，他称自己不同意统一着装的法令，除非如果统一帽子、披肩等着装，那么罗马天主教徒也要有相应的着装，以示区别，并要求他们在袖子上绘上圣餐杯图案。如果他们同意，他也就会同意；否则他不会同意穿上跟天主教一样的服装，甚至同样的帽子也不

愿意。其实他也从未穿戴过这样的服饰。

“赴难前的那个主日，他与胡珀长老一起领杯，因为他是胡珀的下属。他让狱卒告诉胡珀‘跟谁一起都比不上跟你一起’，因为他以为他俩会一起受刑。不过事情并未如此，罗杰斯长老是单独上火刑柱的。

“时候到了，他被交给治安官，由他们带他离开新门监狱去史密斯菲尔德刑场。其中有个治安官伍德罗夫大人把罗杰斯长老叫来，问他是否放弃可憎的教义，还有关于圣餐桌上的圣餐的邪恶观点。罗杰斯长老答道：‘愿以吾血见证吾道。’伍德罗夫说：‘那你真是个异端。’罗杰斯说：‘审判日方见分晓。’伍德罗夫说：‘好吧，我绝不会为你祷告的。’‘但我会为你祷告，’罗杰斯说。就在那天，那个星期一，2月4日，治安官们押着他前往史密斯菲尔德，一路上他都在用拉丁文念《诗篇》51篇。众民都因他的不屈不挠而大感欣慰，同时极力感谢赞美神。女王的检察官罗切斯特大人和理查·索斯威尔爵士二人担任行刑官，大群百姓在刑场围观。点火了，火苗烧到腿、肩膀，他却好像没感到疼，在火焰中作洗手状，好像在冷水中洗手一般。后来他向天高举双手，直到火焰完全吞没身体，他都没有动。可以说，这位喜乐的殉道者把灵魂交到天父手中了。在行刑前一小会儿，当局带来了免罪符，只要他撤回自己的观

点，就能使用。但他坚决地拒绝了。他是在玛丽女王时代一班蒙福的受难者中第一个殉道的，第一个经历火刑。去史密斯菲尔德的路上，他的妻子和孩子一行十一人一路跟着他，其中十个人自己走，余下那个吃奶的婴孩抱在母亲怀里。骨血至亲的悲伤也没有动摇他。他坚定愉快地以惊人的忍耐赴死，为了捍卫基督的福音。”

要知道，约翰·罗杰斯是第一个在玛丽女王统治期间遭火刑的人，在他上火刑柱之前，改教后的英国国教还没有哪一个人若不放弃自己的观点就要被处死。罗杰斯是第一个舍身赴义之人，这是他永恒的荣誉，证明信徒即使身处烈焰之中，神的恩典也足以支撑他。罗杰斯就义的那天，法国大使诺阿雷写信给蒙特莫朗西说：“今天，这个国家确认了同教皇之间的联盟，公开隆重地处死了一个讲道的博士，名叫罗杰斯，因为他是路德派，所以被活活烧死。但他至死还坚持自己的观点，群众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因此而欣慰，他们无畏地报以阵阵感叹，增强罗杰斯的勇气。甚至罗杰斯的孩子也在其中，安慰他，似乎他是在去参加婚礼一般。”

像罗兰·泰勒一样，罗杰斯没有留下什么文字作品，除非我们认可他对著名的“马太《圣经》”的贡献。但他的名应受所有更正教教会尊敬，直到世界的末了。



约翰·胡珀 (1495~1555)

约翰·胡珀

在宗教论战的日子里，没有谁对同一世代的贡献超过那位发出一道“光亮”的人。教会内硝烟弥漫的喧嚣争闹中，兴奋的辩论者激起的尘烟当中，正反双方各自的论证激烈碰撞之时，勤于思考的人往往会喊出将死的哲学家之言——“我需要更多灵光，给我更多灵光。”在庄稼只有一穗时，让庄稼长出两穗的人，当然应该称为人类的恩人。就当时的神学问题给出些许新光的人，当然是为教会和整个世界作出了贡献。

当我决定要写“殉道的格洛斯特主教约翰·胡珀：他的时代、

生平和观点”这一篇人物传记时，脑海里就浮现出以上的想法。我写这篇传记是有原因的。我一直感到，在如今这个时代，英国改教家的生平和观点值得深入研究。我认为约翰·胡珀的生平带来的启发极其有益于当代的核心利益。

今日，罗马教会竭力重夺在英格兰失去的权力，而且得到了成千上万英格兰人的帮助。英格兰教士中的个别极端礼仪派对罗马教的帮助更是无人能出其右。他们有意无意地为罗马教铺平了前进的道路，为罗马教的列车铺设了铁轨。他们正在让成千上万的人熟悉罗马教的仪式——天主教的着装、程序、举止、姿势和夸张、重在感官刺激的敬拜形式。他们胆大包天地传讲、宣扬赤裸裸的罗马天主教教义——真实临在、仪式中祭司的角色、向神职人员告解并由他们赦罪。他们高声宣扬重新并入罗马天主教的意愿。简言之，似乎宗教改革的战斗还要重新打响。在倒退回罗马教之前，让我们认真地来看看英国天主教化会带来什么结果。愿我们能照亮众人，不要“在黑暗中随波逐流”。

当今世代，许多教士公开嘲笑宗教改革，奚落改教家。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但这些人却辱骂中伤他们，完全不承认他们的死是殉道。这些教士称克兰麦为“胆小的叛徒”，拉蒂默是“粗鄙无知的蛮子”！他们把宗教改革说成“一场十足的灾难”，“淫贼、杀人犯和盗贼策划阴谋促成的变迁”（参

见《教会时报》，1867年3月14日）。那我们现在就来研究研究一位改教领袖，看看他是怎样的人。他与克兰麦、里德利和拉蒂默都是朋友，是一同为改教大业奋斗的战友。我们来看看他的生活、讲道和思想，以及他怎样死去。我要重申，让我们打开灯，发出光辉。

今时今日，大多数人对英国国教的印象是最奇怪的谬传，而非其真实面貌。全国上下，许许多多的人指责“更正教”这个说法却不以为耻，告诉人们说“福音派”教士并不是真正的教士！他们是加尔文主义者、清教徒、不从国教者、循道主义者、狂热分子，诸如此类，应该离开国教，各走各的路！但我们用一些清楚的事实来检验一下这种说法。

我们来察看一下胡珀流传下来的观点吧。国教的信纲和公祷书都是在这位神学家起草的基础上作出细微的改动后定稿的。看看胡珀主教所写、所思、所教导的。不要匆忙退让，承认礼仪派和高级教士才是英国国教真正的代表。“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但邻舍来到，就察出实情。”我要又一次强调，打开灯照照吧。

首先，我要讲述一下胡珀主教所处的时代。那时的宗教观如何呢？我从福克斯、斯特莱普、博内特、索姆斯和布朗特的记述中整理到一些零星的历史资料。

胡珀生于 1495 年，卒于 1555 年。他在亨利七世在位期间得到光照明白真理，在玛丽女王在位期间殉难于火刑柱上。从亨利八世即位到爱德华六世驾崩，他都经历了，因此见证了这两位国王统治之下的变革。他六十年的人生涵盖了英格兰历史上最富变革的时期之一。1495 年和 1555 年的英格兰差别有多大，怎么夸张都不为过。按照信仰和道德的观点出发，整个国家都颠倒了。胡珀出生时，宗教改革还未开始，统治英格兰的罗马教会还稳如泰山。而他死时，宗教改革已经深深扎根，不管是争论是逼迫都无法使之屈服。

宗教改革前英格兰的信仰有什么主要特点呢？胡珀所见证并亲身推动的巨大变革给了我们的祖先什么样的影响呢？简言之，胡珀参与领导的英格兰天主教的瓦解和更正教的确立是怎样进行的？我试着简要回答这些问题。很遗憾，人们似乎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同胞大众对三百年前的历史一片茫然。尽管各方都在呼吁解决教育问题，但对自己国家历史如此无知，真是悲哀、骇人听闻、令人沮丧。我无法相信，如果英格兰人知道自己欠了宗教改革多少债，那么极端礼仪派还会赢得这样多的拥趸。只要他们知道教皇制度是个什么玩意儿，就一定不会容让罗马教了。

宗教改革前，英格兰宗教信仰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愚昧无

知。所有阶层都显然毫不知晓真正的基督教是什么。厚厚的乌云笼罩了英格兰这片土地，一片黑暗。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对基督福音的认识能达到今天随便一个懂事的主日学小朋友的水平。

无须对此感到惊讶。那时的人既上不了学也没有《圣经》。亨利八世的《圣经》印行之前唯一的英文《圣经》译本——威克里夫的新约——价值两英镑十六先令三便士。教会的祷告用拉丁文进行，当然人们听不懂。人们也很少听到讲道。每季度的证道实际上是讲给教士听的，而且也没有持续下去。拉蒂默说，教会没有哪个主日会忽略弥撒，但二十个主日过去没有一场证道，都不会有人因此受到责难。毕竟，就算有证道，也是完全无益的，后来要是有人讲道，就会被怀疑是异端。

例如，胡珀 1551 年受命担任格洛斯特教区主教时的统计清楚地表明了宗教改革之前的时代是多么无知。整个教区三百一十一名教士中，有一百六十八人背不出十诫，其中有三十一人甚至找不到十诫在《圣经》的哪一部分；有四十人找不到主祷文在哪卷经文里，其中甚至有三十一人不知道主祷文是谁说的！

如果这都不算是无知，不知道怎样才算。如果牧者们都如此，广大民众又会怎样！如果牧师们的知识水平都只是这样子，人民大众的水平可想而知！

然而，这还没完。宗教改革之前，英格兰宗教信仰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迷信到极点，让人羞愧得无地自容。我怀疑少有人对这种迷信的程度有些许的认识。

那时，男男女女的良知往往都不安，想要得到解脱。他们需要面对悲伤、疾病和死亡，与我们一样。那他们能怎么做呢？可以去找谁帮助呢？没人告诉他们神的爱和基督中保的工作，告诉他们得自由的好消息、完全的救恩、因信称义、恩典、信心、盼望和悔改。他们只能去找神甫，而这些人自己也一无所知，没法给他们帮助。“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一句话，胡珀之前，我们祖先的信仰只不过是组织地敬拜童贞女马利亚、圣徒、肖像圣物，朝圣、施舍、恪守形式和仪式、列队游行、屈身、跪拜、划十字、禁食、告解、宣告赦罪、弥撒、苦修以及盲目地顺从神甫。这种信仰通过代理人来事奉未知之神，完全是无知和杂乱无章的偶像崇拜。实际结果只能是让神甫们用民众的钱中饱私囊，而人们给神甫的钱越多，就越是确信自己能去天堂，完全是在自我谄媚。

神甫们欺骗老百姓的荒唐恶劣手段罄竹难书，在此只需给出一点点实例。

格洛斯特郡的黑尔斯修道院，司铎把一个药水瓶给施舍的人看，说里面有基督的血。亨利八世时期，稽查的结果是瓶子

里面放的不过是鸭血，每周更换一次。

肯特郡的贝克斯利，人们对教会竖起的一个耶稣受难像尊敬有加，奉献了许多财物，因为据说展出期间会连续出现神迹。如果有人献上铜币，塑像就面色凝重；如果献上的是银子，就会稍有缓解；如果是金子，就会当众露出笑容。亨利八世时对这个塑像进行了调查，结果是塑像里面有机关，神甫藉此改变塑像的脸，随心所欲地呈现出想要的面容。

在伯克郡的雷丁修道院，人们无比虔诚地敬拜许多圣物，包括一尊有一只翅膀的天使像、刺透过救主肋旁的矛头、两片十字架残骸、圣雅各的手、圣腓利的披肩以及抹大拉的马利亚的一块骨头。

在萨福克郡的圣爱德蒙贝里，神甫摆出了烧死圣劳伦斯的煤块、圣爱德蒙的指甲、托马斯·贝克特的折叠刀和靴子，还有数不清的救主的十字架碎片，要是合在一起，足够一整个大十字架了。

在萨默塞特郡的布拉德利女修道院，敬拜者可以看到童贞女马利亚的衣服、最后的晚餐时所吃的饼，还有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时躺卧的马槽的一小片。

萨默塞特郡的布鲁顿女修道院有一根童贞女马利亚的红色丝绸腰带。当妇女生产时，修女会把这个庄严的圣物送去，保

佑他们生产顺利。在威尔特郡的法利修道院有一根抹大拉的马利亚的白色腰带，也有同样的用途。但可以肯定，这两处地方百姓都需要给僧侣金钱，他们才会把圣物送去^①。

这样的事愚蠢而荒诞，让人哭笑不得。但列出这些事情很有必要，可以让人看到宗教改革前，我们的祖辈持守的是什么样的信仰。这些事听起来挺不可思议，但别忘了那时代的英格兰人就是这个样子。围城和封锁造成的饥荒会让饿汉饥不择食，为了活命连耗子都能吃下去。所以，如果祖辈从事这么奴颜婢膝的迷信活动是在努力寻求安慰，那么不应过多地指责他们因为他们得不到神的话语。

还有一件事要提一下。宗教改革前，英格兰宗教信仰的另一主要特点是无处不在的不圣洁和败德之事。总的来说，神职人员的生活令人不齿，而俗众的道德品味也自然处于最低潮。当然，荆棘里结不出葡萄，蒺藜里结不出无花果。无知与迷信已经遍布整个国家，指望这样的根除了败坏之外还能结出什么好果子，就太荒唐了。然而，全盛时期的罗马天主教腐败得更彻底，让人无法想象，英格兰的教士和僧侣在他们面前也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

^①以上内容得自斯特莱普和博内特的记述。

因为荒宴醉酒、赌博作乐，教区内的神职人员不幸都声名狼藉。

布郎特教授在他出色的宗教改革历史作品中说：“往往，他们都出身底层，拥有这一阶层所有的粗俗恶习。他们出入酒馆、赌场，死记硬背也几乎念不出祷文，往往背不出十诫。大群教士只会读自己的每日祷词，除此之外目不识丁。各人往往都有不懂拉丁语的约翰爵士、咕哝着晨祷的约翰爵士或说话含糊的瞎子约翰爵士等带贬义的绰号。其实，宗教改革前，他们肉欲横流的生活、肥胖的肚腹、圣职人员普遍的世俗态度，众所周知。”

宗教改革前的神职人员以无耻的贪婪著称。只要某人慷慨地把钱捐给像托马斯·贝克特这类圣徒的神龛，教士就会赦免他几乎一切罪。只要某个暴徒或者罪犯给僧侣厚利，就可以将这些僧侣的修道院领地当作避难所，不管他犯了什么罪，法律都无法处置他们。不过，罗拉德派和威克里夫派人士却丝毫得不到怜悯。有些古老的教会建筑上还存留着讲述这类事情的石刻、木刻，为今时今日的人提供了铁证。这些雕刻往往把托钵修士刻画成狐狸在讲道，帽檐后露出一根偷来的鹅颈；或者是狼在进行赦罪礼，而一只羊被包进他们的斗篷里；或者是坐在病床边的猿猴，一手拿着十字架，另一只手则在掏病人的口袋。

人们如此公开地嘲弄神职人员，定然是信仰状况处于低潮。

但是，宗教改革前英格兰神职人员最黑暗的污点让人难以启齿。他们的生活淫乱，对第七条诫命置若罔闻。起誓独身的人听人告解，造成的结果我都不敢讲了。让正值壮年的男男女女关在修道院里结果怎样，我不会详述，免得玷污读者的思维。可以说，亨利八世的调查团发现的许多所谓“宗教”院宇里面的状况，几乎没法用语言来描述。这些逃避罪和世界的表面上的“圣”地里，许许多多“圣”男“圣”女的所作所为，让人想不到还有比之更不“圣洁”之事！如果存在某种貌似有理，实际结果却南辕北辙的理论，那一定就是独身和隐修能提高圣洁程度这套理论了。巴特尔、格拉斯顿伯里、博尔顿、科克斯托尔、弗内斯、克罗伊兰、布里和亨特恩等地修道院的毁灭可能会令浪漫的小伙子和多愁善感的姑娘哀恸。但我敢大胆断言，有太多这样的宗教院宇充满了罪孽，太多修士修女令基督教震惊。

当然，我坦率地承认，并不算是所有修道院都一样糟糕。我承认有一些修道院非常虔诚，比如牛津附近的戈斯托女修道院，就享有无瑕的美誉。但恐怕这些光鲜的都是凤毛麟角，只是证明了修道院普遍的堕落。基于亨利八世调查委员会报告的《修道院解散法案》序文陈述了普遍的事实，不可忽略。文中

说：“僧侣和教士在修道院、修女院和其他一些修道场所里每天在犯明显的罪、行恶事、放纵性欲和生活得十分可憎。尽管两百多年里，诚实宽厚的改革措施不断出现，意图修正此种不洁、性欲的可憎生活，但不管怎样都收效甚微，而罪恶的生活却恬不知耻地愈演愈烈。”

毕竟，要提高败德的程度，没什么比“粮食饱足，大享安逸”更有把握。任意数量的男男女女，不管来自哪个国家、哪一阶层，让他们起誓独身，关在房子里，不愁吃喝，无所事事，最重要的，不让他们读《圣经》，没有真正的信仰，听不到传讲福音，没有人检查，也没有公众的监督，如果这样一来结果不是可憎地大规模违反第七条诫命，那我只能承认自己对人性的洞察错了。

我不会因谈论这些事而道歉。这幅画面令人痛苦蒙羞，但对于那个时代应该小心地看待，而不是抛到一旁。在论及某些当代的教士对宗教改革的恶毒攻击之前，我希望英格兰人了解一下，宗教改革将我们从怎样的状况中解救出来。在我们定意放弃更正教，重拾罗马教和隐修制度之前，让我们弄清楚罗马教掌权时英格兰是什么情况。我相信，对于英格兰，没有那场变迁比得上宗教改革那么迫切，没有哪些人比得上胡珀及其同工改教家们的贡献更大。简言之，除非能证明福克斯、富勒、

斯特莱普、博内特、索姆斯和布朗特记载的这些清楚的历史事实并不存在，否则除了疯子外，谁都必须承认宗教改革之前的时代非常糟糕。英格兰欠更正教改教家的太多了，其他任何群体都比不上。如果我们不感恩，拒绝偿还我们的亏欠，那简直是恬不知耻。

当然，神在宗教改革中使用了许多器皿，要在某些人身上挑刺非常容易。无疑亨利八世——主导了《圣经》的翻译，任命克兰麦和拉蒂默为主教，封禁了修道院——是个粗鲁的坏家伙。我可不想为他辩解。但经常由坏人来达成好事，结果才是我们必须首先关注的。不过，倾向于罗马教的朋友最好还是别过多地批评像亨利八世这么糟糕的人。不管怎样，他的道德水平跟许多教皇比起来还不那么不堪入目，他好歹已经结婚了。

另一方面，要批评胡珀和并肩战斗的改教家们做得不好、支持许多糟糕的做法、还有许多事做得不完全，也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确实有这些问题。但公正地说，人们应该考虑他们面对的巨大困难，他们要清除的垃圾已经堆积如山了。我之所以惊奇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所做的太少，不如说他们做事无往不利。

毕竟，就算能说的都说了，还是会有异议。但众多清楚的事实无法抹去，就让人说去吧，让他们去吹毛求疵吧，不管怎样都没法否认这些史实。宗教改革给了英格兰人一本英语《圣

经》，让每个人都有读《圣经》的自由。宗教改革让他们知晓了与神和好的道路，知道了每个罪人都可以借着信心径直来到基督面前，无须主教、神甫或者牧师来转达。宗教改革让他们知晓了《圣经》的道德标准，《圣经》关于圣洁的标准，这些标准是我们的祖先做梦都想不到的。对于这些无法估量的恩惠，我们当永远心怀感谢！应当永远牢牢持守，决不能淡忘！我坚持认为，要是谁夺走这些权利，把我们拽回宗教改革前无知、迷信、不圣洁的环境，那就是英格兰的敌人，应该坚决反对。

现在来看胡珀本人。虽然花了这么多笔墨来讲述他所处的时代，但我认为很值得。若不了解公共人物所处的时代，就无法正确地评价他。除非我们了解宗教改革之前英格兰的状况，否则就无法充分理解任何一位英格兰改教家。要知道胡珀和战友们需要应对的都是什么样的事情啊！现在我们来看看胡珀本人。

约翰·胡珀 1495 年生于萨默塞特郡乡下，当时是亨利七世在位。他的出生地是在哪个教区已经无从得知，甚至一点线索都没有。就此而言，胡珀和罗兰·泰勒在英格兰殉道者中有些特别。克兰麦、里德利、拉蒂默、罗杰斯、布拉德福德、菲尔波特和费拉的出生地都已经弄清楚了。同样，胡珀的家庭在乡下属于什么阶层也无从得知。不过，有理由认为他父亲不仅

仅是个自耕农，而且还拥有可观的财富。

这位伟大的改教家的早年经历有太多谜团。1514年，时年十九岁的他进入牛津大学墨顿学院，在他一位担任校董的叔父手下受教。1518年他二十三岁时获得学士学位，此后再未攻读更高学位。关于他二十三岁前的事，现在清楚的也就这么多了。1518到1539年间——超过二十一年的时间——他的情况如何，今人也几乎一无所知。不过，这段时间里，他无疑经历了人生的转折，塑造了他在余生的形象。传统的说法是，他在牛津拿到学位后就当了修士，起先是在萨默塞特郡沃切特附近老克里夫的熙笃会修道院，后来又去了格洛斯特郡的一间熙笃会修道院。传统上还认为，他厌倦了僧侣的生活，还俗回到牛津居住，不过具体日期不详。传统的说法证据是，加德纳判他死刑的时候，说他“曾是克里夫修道院的熙笃会修士”。不过得承认，他存世的文字里，从未提到过僧侣生涯。

不过，至少有一件事非常确定。1518年至1539年的二十一年间，胡珀看清了罗马天主教教义虚假，其实践不合《圣经》，尽管具体是什么时候不得而知。在写给瑞士改教家布林格的信中，他说自己“在王宫里当侍臣，过宫廷生活时”，看到了慈运理的一些作品，以及布林格关于保罗书信的一些解经书，研读之后得以从天主教中解脱，灵魂重生得救。这封富

有价值的信收录在帕克协会出版的《苏黎世来鸿原文》一书中。不过很不幸，关于信中提到的“宫廷生活”、“王宫”，这封信里没有任何线索。

另一件胡珀在此期间的事就不那么确定了。1539年，他不得不离开牛津，因为半天天主教的《六条信纲》已经开始实行。就因为这份信纲，拉蒂默辞去了主教职位以示抗议。殉道史家福克斯斩钉截铁地断言，胡珀支持宗教改革原则的态度传开了，引起牛津当局——尤其是神学教授史密斯博士——的注意。结果，胡珀不得不离开牛津大学，好像再也没有回来。

1539年，离开牛津后，胡珀给托马斯·阿朗戴尔爵士当了一阵子管家和家庭教士。在这里，他坚持的更正教原则又一次惹了麻烦。雇主喜欢他，但不喜欢他的观点。结果，雇主送他去了加德纳主教那里，并附上一封私人信件，请加德纳“帮帮他的家庭牧师”。然而，加德纳跟他谈了四五天，也根本没法动摇他的观念。结果，福克斯说：“加德纳将托马斯爵士的仆人送回主人那里去，恰如其分地赞赏了他的学问和智慧，却对胡珀怀恨在心。”不幸，多年后加德纳的恨意没有消解，反而带来了更加苦毒的后果。

此后，胡珀没有在托马斯·阿朗戴尔爵士那里待多久。这个更正教家庭教士感到在英格兰生命安全没有保障，于是像当

时的许多好人那样逃去欧洲大陆，在那里生活了至少九年。起先是在斯特拉斯堡，后来又去了巴塞尔，最后定居在苏黎世。无疑，就是在此期间，他打下了真理的根基，后来在祖国高尚地捍卫这些清楚、明确的真理教义。同样在这期间，他结交了布林格、布塞、拉斯科以及其他欧陆改教家，他们后来都对他怀着深厚的感情。也是在此期间，大约在1546年，他娶了勃艮第女子安娜·德策克拉斯，妻子在各方面都是他的好帮手。

1547年，亨利八世驾崩，爱德华六世继位，开始了他短暂而辉煌的统治。很快，胡珀感到自己有负担为祖国的改教事业出力。于是，深情告别了苏黎世的朋友之后，他启程回英格兰。他的离别赠言令人痛苦，像是预言，却又感人肺腑。朋友们满心期待他能在故乡升到高位，希望他不会忘了老朋友，时常写信给他们。胡珀保证绝不会忘记他们的友善，允诺不时给他们写信，并用下列千古流芳的话来作为临别赠言：“布林格长老，最后的消息将会是我无法再写信了。因为在那里，我会经历极度的痛楚，你会听到我被烧成灰烬。那就是最后的消息，是我没法写信告诉你的。但你会听到这关于我的消息。”

1549年5月，胡珀抵达伦敦。进行宗教改革的朋友们欣喜地接待了他。尽管面临着许多困难，但克兰麦和里德利还是在缓慢推进宗教改革。他像是战斗正酣时加入的生力军，大大

增强了宗教改革事业的力量。他被视为稳固、博学、有能力的人，在他还未归国时，名声就已经传开了。很快，他被任命为护国公萨默赛特公爵的随从教士。他以无比的热情立即投身于教导的工作，一般每天讲道两次，广受欢迎，甚至教堂都坐不下蜂拥而来听他讲道的人群了。即使他的仇敌史密斯博士也承认“百姓倾慕他，视他为先知。不但如此，他们简直把他当成神了。”

殉道史家福克斯显然熟识胡珀，为当时他所得的恩赐、所蒙的恩典作出了如下见证：“他在教义上热情认真，语言雄辩，精通《圣经》，在痛苦中也不屈不挠。他的生活纯洁，行为良好，找不到任何瑕疵可以借以诽谤他。他身体壮实，体魄强健，思维敏捷。他毅力坚强，无论面对怎样的危难逆境，都能忍耐，承受得住。他断定是非绝不朝三暮四。他饮食节俭，言语慎重，珍惜光阴。不过待客他却很大方，有时甚至超出了自己的开支范围。简言之，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信中要求监督应具有的所有美德和优点，他都具备，我不知道有哪一点是他缺乏的。”

具有如此品格的人正是爱德华六世时期担任主教的不二人选。回到英格兰不到一年，苏黎世朋友们的预言就实现了。在国王面前讲了一系列四旬斋节期的讲道之后，1550年，布林格的朋友、苏黎世流亡者、当时最受欢迎的传道人约翰·胡珀

被提名填补格洛斯特主教的空缺。没有比他更好的人选了。英国国教的历史上，像这次提名一样，把正确的人放到正确的位置上，例子实在是太罕见太少有了。

然而，对胡珀的提名让他与克兰麦和里德利之间就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爆发了一场最不愉快的冲突。他坚决拒绝在就职典礼上宣读主教誓言，拒绝穿戴传统的主教服饰。他认为起誓的对象绝对不符合《圣经》，因为是指着圣徒起誓，像指着神起誓一样。至于服饰则是因为他认为那是罗马教会的残留，应该清除干净。

胡珀与两位伟大的同工立即争论起来，令他的就职典礼几乎拖延了一整年，并造成了巨大的损伤。起初争论的原因越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争论双方就越激动、越固执。几经磋商，里德利与这个争辩的弟兄也没能取得一致。爱德华六世与枢密院写信给克兰麦，允诺如果他“省去一些”冒犯主教候选人的“仪式、过场”，也不会给他任何处罚，但没有奏效。外国改教家写来长信，劝双方都各退一步，也没起作用。争论愈演愈烈，以至于枢密院厌烦了胡珀的固执，干脆把他关进了弗利特监狱！最后，大家接受了折中方案。胡珀为了平息争端，对某些事不再坚持。他同意在就职典礼上，在国王面前，在自己的主教堂，这些特定的公共场合，穿上讨厌的道袍。而国王亲自免去了讨

厌的主教誓言。1551年3月8日，监狱门打开了，所有真正的更正教信徒都欢喜雀跃，胡珀就任格洛斯特主教。

胡珀与两位伟大的对手之间可悲的争论让人伤心，正如所有好人之间的争论一样。当然我们无须惊讶。最好的人也不过是人。如果保罗和巴拿巴会争执后分开，彼得和保罗在安提阿会公开冲突，那么就算英格兰改教家之间并不能时时一致，我们也决不能过于严苛地论断他们。但无可否认，这场著名的争论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损害，种下的种子直至今天还在结出有害的果实。

我坦率地承认，时间已经过了三百年，所以我们无法恰当地对整件事作出判断。两边无疑都或多或少有过错，唯一的问题是，哪方错更大。我很清楚，照通常的看法，错在胡珀。然而，说实话，我断不能苟同。仔细权衡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后，我慎重地得出结论——胡珀很可能是对的，克兰麦和里德利很可能错了。

我相信，事实就是胡珀比他的这两位杰出同工眼光要高远得多。他走在了时代前头，看到了英国国教内出现罪恶的可能性，而这是克兰麦和里德利未曾想到的。胡珀先知般地预见到了在我们的疆域中留下未来罗马教的虫卵是多么巨大的危险。他预见，教皇一党会利用锡安的墙上最后一条裂缝，如果所有

裂缝都堵上，他才会安心。他不愿留下一个楔子，让罗马化的教士重新把可憎的弥撒教义挂上去。我肯定他是正确的。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他良心为此不安是对的。我相信，如果克兰麦和里德利静下心来听他的意见，抓住机会彻底按照更正教的方式解决整个“服饰”的问题，那英国国教定会受益匪浅。一句话，如果采纳了胡珀的意见，今日一半的关于仪式的争议就不会出现了。

这个可悲的争议解决后，胡珀立即担负起主教的职责，一刻也没有耽搁。1551年3月8日就任，他就立刻在教区内殷勤讲道，以致健康堪忧。妻子4月给布林格写信说：“我请求您劝胡珀长老做工要适度。他每天讲道四次，最少也有三次。我怕他这么卖力会让他未老先衰。”爱德华时代的所有主教中，唯独他一人在主教的事工上留下了这么充分的证据。克兰麦当然倾力于指定整个改教方案，因为他是首席缔造者。里德利的岗位在伦敦，同宫廷和兰柏宫关系密切，需要时常给国王和重臣当顾问。真的在教区里做工，树立英格兰更正教主教的榜样，只有约翰·胡珀做到了。不奇怪，政府很快又任命他兼任伍斯特主教。马儿愿出力，自然干活儿多；一个人做得越多，要他干的事往往也会更多。

胡珀手下教士的糟糕状况显然带给他巨大的麻烦。前文已

经讲过，格洛斯特教区许多教士甚至不能背出十诫，讲不出主祷文的作者。更有甚者，他们不仅无知，而且普遍敌视宗教改革的教义。然而，只要能过日子，任何东西他们都愿意遵从，愿意支持！因此，胡珀为他们起草了一份精彩的“五十条信纲”大纲，要求每个担任圣职者都要赞同。他也发布了一系列命令，规定了他们的职责。另外，还将他们中比较好的部分人任命为监督，管理其他人。除此之外，他没法再做些什么了，不管状况有多么令人痛苦、令人不满。最好的主教，满怀热情，也没法赐下恩典，没法改变教士的心。

教众的状况也跟教士一样令人头疼。当然，这是自然而然的。“牧者怎样，百姓也怎样。”对他们，胡珀当然做不了什么，只有尽可能地去改善教区的道德水准，并进行检查。关于胡珀既坚决又公正的做法，苏黎世信函中约翰·阿布乌尔米斯的信记下了一个非凡的例子。他说，胡珀主教把格洛斯特的一个头面人物安东尼·金斯顿爵士叫来，严厉地斥责了他，因为他被控通奸。他则恶言相对，甚至忘了自己的身份，要在法庭上施暴。但胡珀不为所动，将案件上报伦敦的枢密院，结果格洛斯特郡的这位爵士受了严厉的处罚，罚金高达五百磅，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因为圣俗人等都状况糟糕，格洛斯特和伍斯特两个主教座

堂对胡珀而言成了巨大的考验。说来奇怪，就是300年前，主教座堂也似乎对英国国教没什么帮助。胡珀就这个问题写信给国王的国务秘书长威廉·塞西尔爵士，说：“哎！秘书长大人，要是主教座堂里有好人的话，神会更得荣耀，人们也会更顺服国王陛下，可怜的百姓也会懂得更多。国家需要最应该显为正的教堂发出亮光来。”然后，他以感人肺腑的话结束了这封信：

“愿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叫我们能明智且有力地担当好我们的职分。没有人是靠脸上流汗来吃饭的，只有在公共职位上的人才如此。秘书长大人，你的工作很出色，但我的很难。现在，我感到在私营领域干活就跟玩儿似的，私营部门的额工作轻松又宁静。神是我们的帮助！”

总之，对胡珀主教任职最棒的记述是福克斯《殉道史》这本众所周知的古老金书。福克斯显然是胡珀的朋友，也是仰慕者，怀着深深的感情写下了胡珀的事迹。但福克斯的书总的看来是准确的，应当信赖。许多仇敌恶毒地中伤他这本伟大的书，但从未成功地推翻其中记述的事实。他们可能挠伤这位君子的脸，但从没能伤到他的骨头。弗劳德是一位完全公正的证人，他主动声明相信福克斯的记述是可信的。汤森德为《行为与丰碑》最出色最完整的一版写了一篇长序，逐一反驳了福克斯仇敌的攻击。简言之，当代那些称福克斯是“骗子”的轻浮写手只不

过在暴露自己的无知，暴露他们对真实的更正教的仇恨，因此我们可以安心。听听福克斯说胡珀在任时是怎样当主教的吧：

“关于华丽衣着的争论令人烦恼，事情过去后，胡珀长老终于进入自己的教区。主所赐予他在爱德华国王治下的时间，他都殷勤地利用起来。对于所有在他之后继任的主教，甚至整个英格兰不管哪个教区的主教而言，他的殷勤都令人叹为观止。他非常仔细地施行拯救灵魂的事工，关于以真实的救恩之道来训练基督的羊群，他既没有留下什么麻烦事没做，也没有留下什么方式没有尝试过，而是一以贯之地辛劳。其他人一般都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渴望主教职位，有些人辛勤追求，甚至有人出钱买，就像人喜欢买爵位一样；他们一旦爬上了主教的位子，就不愿放手，因此不愿犯某些罪，因为世俗法律规定犯了这些罪就会失去主教职位。

“但胡珀长老恰恰跟这类人相反。他厌恶为了高官厚禄而作工，他一直努力做工是为了拯救、保守羊群的灵魂。他身兼两个教区的主教，却在两个教区都同样地管理、带领羊群，好像他只是在管理一个家庭。他去往各城各乡教训百姓，传道给他们听，操持家庭的父亲、园中的园丁、葡萄园里的农夫，没有哪个忙碌得比得上他牧养教区的群羊。

“除了讲道，他还要省下时间，或者听取公众诉讼，或者

用于研读经文、祷告，视察学校。他也根据自己的一贯教导，谨慎适度地施行管教，尤其是对富人更为严厉，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家大业大、富得流油就可以为所欲为。他无疑没有忽略任何一类人，而是对待所有人都不偏不倚，无论贵贱，足以令今日不少人汗颜。因为我们看到有许多人热衷于取悦富贵之人，同时对穷人吝啬无比，但穷人是基督以同样的代价赎回来的。

“言归正传，继续来讲胡珀长老。他纯洁无暇的生活是教会和所有教牧同工的明灯和榜样。对后世之人，他的一生是永远值得学习的功课，是一篇永恒的证道。由此，可想而知他是多么德高望重，就算是那些憎恨他的恶人中最邪恶的，也没法些许地指责他的生活。

“前面已经说了他在教会的公共事务方面的做法，而在家里的生活也无疑是高级教士的表率。尽管他的精力大部分用于照管基督的群羊，基督为之流血舍命的会众，但他对养育自己的子女也毫不疏忽，既认真培养他们学习知识，也认真培养他们良好的教养。无论是居家为父，还是在外身居主教之尊，他的行为举止都足堪表率，让人无法分清他究竟哪一方面更应得赞誉。因为无论在哪里，他持守信仰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因此，如果走进胡珀的官邸，你定然会以为到了哪间教堂里面。他家里各个角落都洋溢着美德，到处都是值得效法的模范，一

家人或真诚地交流，或研读《圣经》。他家里没有人喧闹取乐，无所事事，也听不到浮华之事、不实之词、起誓之言。

“至于他的两份主教俸禄，他从不用来给自己购置什么美物。尽管这两份收入除去基本开支并没有余下太多，但他仍乐善好施。我记得有两次，在伍斯特他家大厅里，看到桌子上摆满了丰盛的食物，桌旁坐满了乞丐和穷人。我问他的仆人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主人每天通常都要请城里一定数量的穷人吃晚餐。饭厅里有四个人服侍他们，给他们足够且健康的食物。饭前，由他或副手检查众人掌握主祷文、信纲和十诫的情况，客人吃完了，他自己才坐下来用餐^①。

“在爱德华国王在位，信仰水平蒸蒸日上的两年多时间里。胡珀长老就是这样行使职权，一直是最为小心警惕的牧者。唯愿其他所有主教都同样殷勤、小心地履行职责。”

1553年，玛丽女王登基，胡珀富有成效的主教事工戛然而止。胡珀的主教事工只有短短两年，在此期间，没有哪个英国国教的主教能像他那样为教会和教区做这么多的事，并给人们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或许这样形容他一点也不为过。

1553年7月，爱德华六世驾崩，他的姐姐玛丽继位，当

^①请注意，那个年代可没有《济贫法》。

这位罗马教徒一登基，胡珀的麻烦便来了。逼迫的刀一出鞘，著名的更正教格洛斯特主教几乎就成了第一个打击对象。邦纳和加德纳跟他也有私怨，他跟这两人都有过冲突。整个英格兰都知道他是最大胆的更正教拥护者、最彻底反对罗马教的人之一。朋友警告他注意危险将至，但他从容地答道：“我曾经逃过，但现在，因为我蒙召到此地担任此职，完全相信应该留下，与羊群共存亡。”威胁的风暴很快就肆虐起来。8月29日，他来到里士满玛丽女王的顾问团面前，9月1日就被打入弗利特监狱。从那日起直到1555年2月9日，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他都处于严密看守之下。最后，临刑的那日，死亡让他自由了，高贵的更正教囚徒自由了。

胡珀人生中这悲惨的十七个月的经历，远远比本书记述的要多得多。读者若想了解详情，必须研读一下《殉道史》。善良的格洛斯特兼伍斯特主教被残忍地囚禁在肮脏的监狱中近一年半，大大损害了他的健康；加德纳、邦纳、达伊、希思及其同党三次审讯他，轮流侮辱、殴打、辱骂他，劝诱他放弃信仰；他则勇敢地持守更正教原则，在基督的真理上毫发不让；最终他因坚持神职人员结婚的权利以及否认化质说而被定罪。这些事，殉道史家福克斯都完整地记录下来。但对于本书来说，这些内容太长，就不赘述了。

最后的时刻到来了。1555年2月4日，星期一，邦纳在新门监狱教堂正式剥夺胡珀的职权，将他交给世俗政权处置。那天晚上，他得知要被送到格洛斯特，在自己主教座堂所在的城市当众处以火刑，因而大感欣慰。周二凌晨4点，六个卫兵押着他上马启程。2月7日，周四下午，他安全抵达格洛斯特，大批群众涌上赛伦塞斯特路迎接他，为他哀哭不已。

在格洛斯特，他被安置在圣尼古拉斯教堂对面的因格拉姆家。这栋房子仍伫立在那里，外观没有太大变化。城市治安官简金斯和邦德本想把他押去北门监狱，但在负责押送他从伦敦回来的卫兵恳求之下，打消了这个念头。自这位圣徒般的囚犯抵达，到对他行刑，仅有一天时间。其间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祷告，不过，也有几次谈话，福克斯都记录下来。

安东尼·金斯顿爵士，就是那位曾因犯罪被他责罚的人，来见他，声泪俱下地恳求他，为了生命发表放弃信仰的声明。爵士说：“想想，生则甜蜜，死却痛苦。活着今后还可以做有益的事。”对此，这位尊贵的基督精兵答出了万古流芳的话：

“将至的永生更甜蜜，将至的永死更痛苦。”看到他不为所动，金斯顿痛苦地流泪，说：“认识您我很感恩，看到天父真的命您召我作他的孩子。借着您的教训，当我还在行淫通奸的时候，他教会了我憎恶、弃绝这些罪行。”胡珀接下来说，他因这次

谈话而流的泪是下监的十七个月里最多的一次。

最后，夜幕降临，格洛斯特市长拉夫代、参议员和治安官都来了，亲切地问候他。他则愉快地同他们交谈，感谢他们的善意，请求在行刑时烧得快一点，并声明他是女王真正的顺民，但“宁愿死也不愿赞同罗马主教邪恶的天主教式宗教仪式”。

谈话结束后，圣徒般的主教开始准备与最后的仇敌——死亡——争战了。他说自己有好多事要记住，于是早早地上床，美美地睡了一觉。晚上其余的时间，他都在祷告。起床后，他要求行刑前一小时任何人都不要进卧室打搅他，他要单独待着。在那可怕的关头，他在默想什么，只有神知道。传统认为，他用煤在卧室墙上写了几句诗——

带着忍耐满足吧，
有基督饮痛苦之杯。
他能、他会补偿给你
千羊之圈，令你欢畅。
愿无一物让你胆丧，
立刻起锚，扬起风帆，
离岸起航。
愿你确知将抵那方
驶入码头，就是存到

永恒之港。
无惧死亡和法官，
维系上主，我心所安；
他将向他们追讨你的血，
一旦你死去，必定明白，
只有为此才值得献身，
让死不再是死，而是永生。
切莫绝望：
任何暴君都不能惊吓你；
指引你的罗盘是神之道，
愿和风晴好。

这几行诗刊载在 1559 年印行的一份改教家写的单张里。
在此因其价值而列出。

胡珀的生命就快走到尽头了。约翰·福克斯对这一幕的描述出色而又简洁，因此我认为应该完整地引述，一字不漏。福克斯说：

“2 月 9 日星期六早晨大约八点，约翰·布里吉斯爵士、钱多斯勋爵带着一大帮人来了，其中有安东尼·金斯顿爵士、爱德蒙·布里吉斯爵士以及其他受命监刑的官员。九点钟，他们让胡珀准备好受刑，因为时间马上到了。很快，手拿命令和

武器的治安官把他押出房间。他看到他们拿着那么多武器，就对他们说：‘治安官先生，我可不是叛国者，何须如此劳师动众带我去受刑之地呢？要是你们让我去，我一个人也会走上火刑柱，不用劳烦你们。’然后，他扫视拥挤的人群（当天是赶集日，很多人也想来看看他面对死亡时的表现，估计在场有七千人），对身旁的人说：‘看呐！为何这些人一起来到这里呢？或者他们想从我这里听到些什么，像从前一样。但是看呐！我已被禁言，而且他们都知道了我的死刑判决。当我受命来此作他们的牧者时，向他们传讲真实恳切的道理，都是出于《圣经》。因为我不愿把这样的真理算为异端、假道，所以才面临这种死刑。’

“于是他向前走去，两名治安官一左一右夹着他（仿佛是羔羊前往宰杀之地）。他身着房东的长袍，头戴帽子，拄着一根拐杖，免得跌跤，因为在狱中他落下了坐骨神经痛，走起路来有点跛脚。一路上，治安官严严地禁止他讲话，所以他一次也没有张口，只是望着一路为他痛苦哀号的百姓。有时他举目望天，有时欣慰地盯着他熟识的人。他脸上洋溢着欢喜，他还在这里牧养众民时，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表情。到了受死之地，他笑看为他预备的火刑柱和柴薪。火刑柱旁边有一棵大榆树，对面是他常去讲道的教士学院。刑场周围、房子里还有树上都

挤满了人。学院的神甫们则站在学院大门上面的厅堂里。然后他跪下来（因为不准他对百姓说话）祷告，并六七次示意一个他熟知的人听祷告，以便告知后人。这人认真倾听，伏在他肩上，怀里泪如泉涌。祷告基于《使徒信经》，持续了半小时。正当他已经祷告得很投入时，当局送来一个盒子，放在他面前的凳子上，里面有女王签署的赦令（至少他可以假装悔罪求得赦免），如果他回心转意，就能使用。然而，他一见到就高喊：‘要是你爱我的灵魂，就拿走！要是你爱我的灵魂，就拿走！’盒子拿走了，钱多斯勋爵说：‘看来已经无可挽回了，快送他上路吧！’胡珀长老说：‘好，大人。我相信你有权让我离去，结束我的祷告。’

“爱德蒙·布里吉斯爵士的儿子应胡珀长老的要求倾听他祷告，钱多斯勋爵对他说：‘爱德蒙，留心些，除了祷告，不要让他做别的。要是他做了，告诉我，我很快就会处置的。’话音还没落，就传来一阵没经允许的声音，胡珀长老说了以下的话：

“主啊，我是地狱，你是天堂。我不过是罪的渣滓，但你是恩典的神，慈悲怜悯的救赎主。求你照你的大怜悯，按你无法估量的良善，可怜我这个悲惨可憎的罪犯吧！你已升上高天，求你收纳我这尘世之子，使我得享你的喜乐，在那里你与父同

享荣耀。主啊，我为何受刑，为何恶人要逼迫你可怜的仆人，你都清楚。不是因为我自己的罪恶过犯，而是因为我不允许他们邪恶的行径玷污你的血，否认你的真理，而这真理是你乐意借着圣灵指教我的。我这蒙召的恶人殷勤传播这真理，奔向你的荣耀。我主我神，看看他们为你所造的人预备了怎样可怕残忍的折磨吧。主啊，没有你的力量，无人能忍受这种折磨。但在人不可能之事，在你却没有不可能。因此，求你以你的良善刚强我，让我在火中也不至于失去忍耐，或者除去可怕的疼痛。求你按最荣耀你的方式成就。

“记下这些话的人被市长看到了，于是他下令驱散他们，所以他们没能听到更多的话。祷告完毕，胡珀开始准备上火刑柱。他脱下房东的长袍，交给治安官，请求他们物归原主。又脱下其余衣服，准备只穿着紧身衣裤受刑。但治安官不允许（他们太贪婪了）^①，于是这个好人乐意地顺从了，脱下了贴身衣裤和马甲。最后他只穿着衬衣走向火刑柱。他要求百姓与他一起念主祷文，为他祷告（百姓们在他受痛苦折磨时，流泪祷告）。他上了火刑柱，刽子手拿来三个铁箍，准备用来把他捆在火刑柱上：一个捆脖子，另一个捆腰，最后一个捆腿。但他拒绝了，

^①治安官似乎可以把火刑犯的衣物当做外快。

说：‘你们无须自找麻烦，因为我毫不怀疑神会给我足够的力量让我忍受住火焰的烧灼。尽管肉体软弱，但我确信神的力量，你们认为怎样好就怎样把，我乐意。’所以刽子手只在他腰上套上铁箍，因为要套脖子和腿时，他坚决拒绝，不要他们套上，说：‘我肯定不会麻烦你们的。’

“准备妥当后，他环顾四围的百姓，这些人都看得到他（他本来就很高大，又站在高脚凳上），注目向他。每个角落，他都看到为他悲伤饮泣的民众。他举目抬手指向天空，为自己祷告。很快，奉命点火的刽子手来了，这人祈求他的宽恕。他问为什么要求宽恕，因为自己不知道对方有任何冒犯之处。那人说：‘哦，阁下，我是奉命来点火的。’胡珀说：‘那么，你丝毫没有冒犯我啊。愿神赦免你的罪孽。请办你的差事吧。’于是那人抛来了芦苇，胡珀用手拿了两捆芦苇，抱在怀里亲吻，然后一手夹一捆，又打手势示意应该如何堆放其余柴火，把需要添柴的地方指给刽子手看。

“点火命令下达了。因为湿柴不少，两匹马都驼不完，所以火并没有立时燃起来，好长时间才烧着柴堆上的芦苇。最后，火苗吞没了他。但风很大（那是个昏暗寒冷的清晨），把火焰吹开了，所以他似乎只被火苗舔了一下而已。

“过了一会儿，行刑者才又拿来一些干柴，另点了一堆火

(芦苇没有了)，烧到了他的下半身，但对上半身没起什么作用，只烧到了头发，稍稍烤焦了一点皮肤，因为风大。就在这次点火时，就跟第一次点火一样，他和善地祷告起来，声音并不大（就像没有任何痛苦的人）：‘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可怜我吧，求你收纳我的灵魂！’第二堆火烧尽了，他双手揉了揉眼睛，望着众民，喊道：‘善良的人们啊，因神的爱，让火烧大一些吧！’这次声音还是比较大的。这时火只烧到了他下半身，因为柴薪太少，火势不熊，没有厉害地烧到他的上半身。

“行刑者很快又点燃了第三堆火，这堆火比上两堆要熊得多，于是起先放好的火药袋炸开了，但并没有让他好受多少，风太大了。他在火中稍微大声地祷告：‘主耶稣，可怜我吧！主耶稣，可怜我吧！主耶稣，收纳我的灵魂吧！’这是他最后让人听到的话。他的嘴烧黑了，舌头肿胀再也说不出话来，但嘴唇直到烧干到牙床上之前一直在动。他双手捶胸，一只手渐渐垂下来，下垂的指尖上滴下脂油、水和血，还有另一只手在捶。火势又大起来，他气力耗尽，手牢牢地被烧结在胸前的铁箍上。很快，他朝前倾倒，献出了生命。

“他在火中烧了三刻多钟，就像羔羊一般坚韧地忍受了极度的痛苦，既没有前扑后倒，也没有左右挣扎。他的下半身在火中烧灼，肠子掉出来了，他像孩子睡在床上一样宁静地死去。

现在，他作为蒙福的殉道者，在天上的喜乐中作王了，这是在创世以先为忠于基督之人预备的，所有基督徒都会为他们的坚忍扬声赞美神。”

前文已经从摇篮到火刑柱追溯了胡珀的生平，现在该结束这位格洛斯特殉道者的故事了。他死了，永垂不朽。他的死与他的生交相辉映。

我不得不说，在玛丽治下，处死胡珀和难友的手段残忍得令人发指，没有任何借口可言。无疑，那是个严刑峻法的时代：死刑司空见惯；不幸，因异端罪处决人也不奇怪。但以此来为无比的罪行辩护太苍白了。英格兰殉道者的血是罗马教会抹不去的污点，是绝对的谋杀罪，无可推诿。

我得说一说，胡珀在受刑时展现出的忍耐和勇气绽放着光彩。直到世界的末了到来以先，对于基督在他百姓需要时能为他们做什么事，胡珀的受难过程都是典型。我们也绝不会忘记，让胡珀刚强的那位绝不改变。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最后，我也得说一说罗马教会让胡珀与难友成为殉道者极为失策。我相信，罗马天主教没有什么其他行为对自身的损害比烧死改教家更大。殉道者的血成了教会的种子。他们慷慨赴义带来的益处甚至胜过他们一生带来的益处。他们的殉道让成

千上万从未听过他们讲道的人开始思考。无数人得出结论，像罗马教那样做出如此残忍可憎之行径的教会不可能是真正的教会，而能够让受难者如此忍耐、无畏的事业必定是基督的事业、真理的事业。

不过，不管这些议题多么有意义，我都要停笔了。我只希望这些事成为思想的种子，有朝一日能在人们心里结出果子。

现在给读者展现的最后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前文已经谈论了胡珀的生平，现在希望读者再投入一些注意力，看看胡珀的观点。我已经告诉你们他的生、他的死，现在要说的是他的思想，他的教导，他所传讲的信息。我已经讲述了这个人，现在要为你们讲述他的教训。

如果只给读者“胡珀是个善良、热心、真挚的人”这样的模糊印象，而不讲述更多的事，那我的任务还没完成。我希望人们明白殉道的格洛斯特主教持有怎样的神学观点。我希望人们清楚地看到，英格兰改教家教导的是什么样的教训。胡珀所言所写所传所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三百年前去教会的人持有怎样的宗教信仰呢？

很幸运，答案不难找。帕克协会出版了胡珀留下的两卷文集，作为宗教改革时期的领导者之一的胡珀，其神学思想在这两卷文集中如正午的阳光清楚地展现出来，读到的人都会明白

无误地理解。从这两卷文集中，我抽取了两份文件，从中选取清楚的范例。

第一份文件是“关于基督宗教的信纲，由基督里的教父、格洛斯特主教约翰·胡珀颁布，格洛斯特教区所有主管牧师、教区长、受俸牧师、教区牧师、助理牧师以及其他基督教神职人员应当一致拥护、持守之，就像遵循神话语的教义以及与神的道协和一致的圣礼。”

这份文件是对胡珀观点的权威声明，不可能伪造^①。

信纲的第一条要求：“除了记述神圣道的书——即旧约和新约——包含的内容外，上述教士不得教导、传讲说任何事是人得救所必需的。他们要提防，不能允许从前迷信的天主教教义以任何方式存在，因为神的道否决了这些虚假教导。”

第四条要求：“教会是忠信之人组成的会众，要真实地传讲真道，恰当地按照基督的典章和他的圣言给我们的教导来执行圣礼；按他的圣言，教会并不是由主教、神甫和其他此类人组成，而是所有聆听并遵行他话语的人组成。对此，所有教士，他们中每一个人，都要殷勤教训、传讲，免得有人自以为承接

^①值得注意的事，里德利也于同一时间向伦敦教区的教士们发布了许多同样的信纲。

了任何主教和神甫的特权，只有他们才能读《圣经》，领受圣餐。”

第七条要求：“他们每一个人都要殷勤教导、传讲唯独因信耶稣基督称义，不能靠任何人的善行，尽管称义之后必定会有善行，但称义之前善行在神面前没有任何价值。”

第九条里，胡珀要求他们记住：“炼狱、宽恕、为死人祷告、敬奉圣人、向圣人祷告、敬拜圣人或画像等教义，背离并有损我们唯一的中保、救主基督的尊荣，也违背了第一条、第二条诫命。”

第十条里，他写道：“圣餐中，饼和酒并未转化成基督的身体和血，基督不会以任何肉体的方式或真实临在的方式以饼和酒的形式出现，或者在饼和酒的形式之下出现，或者存在饼和酒中，基督是借着信心以属灵的方式于圣餐同在。”

第十一条里，他写道：“不配受洗、不配领圣餐的人，并不能从圣餐中获得真实的益处，尽管他们也领受了代表属灵含义的自然物质。”

第二十四条里，他写道：“被迷信地称为‘生产之工’的圣事本身并没有任何内在的作用，只有借着圣灵在施行者和参与者心中运行才会有作用。”

第四十一条中，他要求：“你们不得借着这些行为来伪造

天主教弥撒：祝福主的桌、在福音书旁洗手、故作地领受圣餐、把《圣经》从一处挪到另一处、圣餐后上下晃动圣餐杯、分发圣餐前公开展示，或者从事任何高举饼和酒的行为。不得敲弥撒圣别钟，或者在圣餐桌上点蜡烛。”

第四十三条里，他要求：“鉴于有人在宗教活动场所使用圣餐桌，有些使用祭坛，使没有文化的民众纷争，因此，为了在所有教区内实现敬虔的合一，而圣餐桌的形式更有助于无知民众脱离天主教弥撒的迷信观念，有助于正确地施行圣餐，所以劝你们在最合适的地方使用朴实的圣餐桌，得体地盖起来，要让在场的人都看到、听到并明白牧师和分领圣餐者在做什么。你们一定要除去所有祭坛。此外，牧师在领受圣餐和祷告的时候，要面向群众。”

这些就是宗教改革时期一位主教的命令。另外说一句，过去三百年间，英格兰许多教区如果把胡珀主教的命令分发给教士，要他们注意，那将带来极大的益处。

另一份我要引述的文件是《简明基督教信仰宣言》。这份文件应特别注意，因为是在1550年发布的，那一年胡珀成为格洛斯特主教。我从这份“信仰宣言”摘录一些片段。作出这样的选择很艰难，因为整个宣言都很不错，很难说引述这一段，忽略那一段。所以我只能告诉读者，未引述的内容跟下面引述

的内容一样优秀。

在宣言的第二十六条，胡珀说：“我相信并告白基督受刑罚是为我得赦免；他钉十字架是为了救我；他降到阴间是为了我能升入天堂；他死我才得生；他流血我才得洁净，得以除去所有罪孽。因此我绝不领受、绝不相信任何其他的熬炼方式——不管是在今世还是在来世——能洁净我，我只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能洁净众人，直到永远。”

在第二十八条，胡珀说：“我相信圣餐并非献祭，而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圣洁的献祭。所以不能把圣餐当神一样敬拜，基督也不在圣餐里面。敬拜基督只能借着信心，不可借着任何会朽坏之物。同样，我也相信并告白，罗马天主教弥撒是人的发明、人的规矩，是献祭给敌基督，亵渎了耶稣基督的献祭，即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受难。弥撒是恶臭肮脏的墓穴，遮蔽了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所以，应当禁止弥撒，恢复主的圣餐，要再次强调他已经完成了。”

第五十四条，胡珀说：“我相信《圣经》权威远超教会；他的话语足以教导我们所有关于救恩的事、该做的事和不该做的事。他的话语是真实的典范和完美的守则，所有忠信之人都应照此规范自己的生活，不偏离左右。他的话语不得改动，不得加添，不得删减。要知道他的工作是完美的，尤其是他的话

语。”

第六十四条，胡珀说：“我相信圣餐是象征，本质上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改变，仍与原来的物质是一样的。即，饼并没有改变转化（教皇一党和假教师欺骗民众，教导他们化质说），变成基督的身体，酒也没有转化成他的血。饼仍是饼，酒仍是酒，都保持之前的本质。”

第六十五条，胡珀说：“我相信圣餐使用得当，若不正确地使用，那么饼和酒跟其他普通的饼和酒并无分别。故而，我不相信基督的身体可以包含在饼里、隐藏在饼的形式下或附于饼中，不相信基督的血包含在酒里、隐藏在酒的形式下或附于酒中。相反，我相信并告白，基督真实的身体在天上，在父右边，我们常常按照基督的律例典章来领受饼和酒，就真的是领受了他的身体和血了。”

第六十六条，胡珀说：“我相信这样的领受并非肉体的领受，而是属灵的，借着真实鲜活的信心而实现。即，基督的身体和血并不是为了口腹，滋养我们的身体，而是为了信心，滋养灵魂，帮助里面的人，以致永生。因此，我们无须基督从天上下到我们这里，相反我们应该升到他那里，借着鲜活的信心将心提到高处，去父的右边，基督坐在那里，而我们等待着他从那里施行救赎。我们绝不应当以这些肉体的形式来寻求基督。”

引述到此为止，已经足够清楚地显明胡珀持守的观点，他的神学观念。不知道读者对这些引文做何感想，但我要说说我的印象。

以上引文清楚地表明，更正教福音派信众秉持的观点并非新奇的现代观点，而是宗教改革的标志，三百年前的一位杰出信徒也持守这样的观点。愿他们刚强壮胆，不因反对者的冷嘲热讽而动摇。他们可以大胆地回答说，他们持守的是古旧的道路，他们是英国国教真正的代表。如果福音派信众错了，那么胡珀就是错的。如果胡珀是对的，那么他们也是对的。要是有人胡言说福音派信徒的观点与殉道的格洛斯特主教有何实质的而不同，我只能鄙视他。

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已经尽可能简要地概述了胡珀的时代背景、生平和观点，他是最伟大的英格兰改教家之一。我不能就此结束，我还得给本书的读者两条实用的建议。这是我个人直接对每个读者的建议，恳求你仔细思量一下。

其一，我劝所有忠诚的信众英勇抵挡想让英格兰成为非更正教国家，重新顺服罗马教的行径。不要回到无知、迷信中，不要重新树立祭司制度，重新回到败德之中。我们的祖先多年前就审判了罗马教，义愤填膺地将之丢弃。不要倒退回到埃及。在罗马教摒弃错谬，与基督和好之前，不要休战。

要读《圣经》，用神话语中的论据来武装。一群勤读《圣经》的信众是国家抵挡对错谬最稳固的防线。如果信众尽本分，那我不担心英格兰更正教信仰的处境。

要读历史，看看过去的岁月罗马教都干了些什么。看看他们怎样践踏你祖国的自由，榨干你先祖的钱囊，让整个国家处于无知和败德的境况。读一读福克斯、斯特莱普、博内特、索姆斯和布朗特的书吧。不要忘了，罗马教会从未改变，还为此夸耀以此为荣。要是他们在英格兰有了绝对的权力，很快就会剝掉国家的眼睛，让英格兰像参孙一样沦为奴隶。

要看看世界上的种种事实。偏听所谓的自由主义似是而非的虚伪争辩之前，要三思。帮助恢复罗马天主教统治之前，请三思而后行！

其二，我敦促所有忠诚的教众，所有热爱纯正福音信仰的人在这个纷争的岁月团结一致，不要因琐碎小事分裂。愿那些要修改礼拜仪式的朋友稍稍把你喜爱的万灵药放一放，投身于在英国国教中维护福音的工作。愿喜悦复兴的朋友不要认为帮助反对罗马教是浪费时间。天主教一旦获胜，就不会再有复兴的自由了。我们不想失去朋友，我们的队伍已经人丁稀少了。英国国教需要每一位更正教福音派信众尽自己的本分。

我坦率承认，从各个方面看，局势都在倒退。但没有理由

绝望。这一天还没过去，还有时间打赢一场战斗。不管会遇到何事，我们不要丢弃自己的立场，不要离弃美好的旧船。不要不发一弹就撤离要塞，令亲者痛仇者快。相反，要握紧武器，像善良的胡珀主教那样，靠着从上头来的力量在仇敌面前刚强壮胆。英国国教在过去的日子里带来了一些益处，还值得保护这个教会。如果我们要去争战，挥舞旌旗去吧。要像勇敢的庞贝哨兵一样站稳了，人人都不要离开岗位。我自己已经下定了决心。我认为，英国国教就算毁灭、四分五裂也强过离弃约翰·胡珀的原则，容忍弥撒献祭和忏悔告解。

在格洛斯特残忍地葬身火海前三周，胡珀长老在狱中写给一位朋友的这封信值得一读：

愿恩惠与你同在。阿们。

写这封信确实太晚了，信中要告诉你议会对宗教信仰的结论是多么极端。他们压制真理，提倡虚假之事，意欲让所有人都极端地赌咒发誓。他们让别人作教会的头，但这人不是教会的元首，甚至不是教会成员，而是按照神的话语和所有古代先辈的记载，这人是仇敌。因为没有律法和权威根据，他们会使用强制的极端手段，从该权威颁布时起，这种手法就是他们捍卫教皇及其教义的论据。但现在是试炼的时刻，要看看我们惧怕神还是惧怕人。在王公贵胄和世界都支持基督的时候，支持

基督是件容易的事；但现在世界恨恶他，就试炼得出谁属于他了。为此，奉他圣灵的名，靠着圣灵的美德、力量和权能，你要预备自己在任何逆境下都不屈不挠。当战斗时，就不要逃走。记住，除了勇敢战斗的人，无人能得冠冕；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现在你必须把眼目从眼前的危险挪开，要留心危险之后的福乐。是在这个你仇敌的世界胜利，还是献出生命以便承受永恒的国。当心，今生福兮祸兮不要过多在意，因为对这些事挂虑过多，或爱或恨过于热切，都会让人远离。因此要思量，今生的福乐纵然好，但比起得神的喜悦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追求幸福可以，但要确保追求幸福不会失去神。留在今世的朋友中间固然好，但因逗留让神不悦，来生与鬼魔一起在永火里度过就不好了。在神之下没有任何事可以抓住不放，神在我们拥有的一切之上，决不能失去他。

至于逆境也一样。下监痛苦，但以罪恶为代价获得自由更痛苦。监狱固然臭气熏人，但还比不上缺乏对神的敬畏和真尊敬的温柔乡。他们单独关我禁闭，但有神与我同在，比起跟坏蛋在一起好十万八千里。财物的损失很大，但失去神的恩典和垂怜更可怕……回答那些浮华骄傲的恶人问话总强过在末日赤身露体站在天地之间，在公义的神面前受审。残忍之徒要取我性命了，但离世是福，离开了充满人间悲剧的今生，去到充满

永恒喜乐的来生。离开亲人朋友令人痛苦悲伤，但失去恩典和天国更可怕。所以与来世是福是祸相比，今世不管是福是祸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做不了别的，只能为你祷告。请你也为我祷告。至于我（感谢天父），已经定意遵循天父的旨意；他愿意如何，靠着他的恩典我就会如何。请你给我可怜的妻儿写信，也寄去我的信，就是那封最近写给D的。我听说，自从M.S.去过以后，她还未收到过我的信。信差真不像话，我都写几次了。愿主安慰他们，供应他们，因为在今世之事上，我已经无法做什么了。她是个敬虔的聪明妇人。如果我的意思实现，她会拥有所需要的东西。但我所希望的事，神能做，我把她和你都交到神手中。我现在是珍宝，在讲究地保护，从来没有那么讲究过。不管是我自己的人，还是家里的仆人，都不能来看我，我这里只有狱卒——一个愚蠢粗鲁的人，神知道。但我不在乎了。再见。1555年1月21日。

义不容辞的
约翰·胡珀



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麦（1489~1556）。
泰勒曾是他推进英格兰宗教改革的重要助手。

罗兰·泰勒

萨福克郡哈德利教区长罗兰·泰勒是玛丽女王统治时期最著名的更正教殉道者之一。关于他的情况，我们的教会了解的格外少，只有约翰·福克斯的《殉道史》中记录了一点儿，此外几乎毫不知晓他的生平大事。然而，现有记录已经足以显明，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以鲜血捍卫见证信仰，捍卫基督真理的人之中，罗兰·泰勒不逊于任何人。

相关信息缺失的原因很简单。其一，这位善良的人住在一个乡村小镇，距伦敦五十英里，他在那里劳作，在那里死去。

位置太偏僻了，要想声名远扬实在太难。住在大城市，站在大都市的讲台上的人，倾慕者会记录下他们的事迹，小心地把他们的生平传诸后世，这样的人才会流传后世。其二，泰勒没有写书，不管是解释经文、与人争辩还是实践性的教导，都没有。甚至这位殉道的哈德利教区长没有一篇讲道付印，使他可以虽死犹言。他死时，没有在图书馆里留下任何让人记住他的文字。这两点应当牢记。

福克斯笔下的泰勒形象格外生动鲜活，估计他们是朋友，抑或这位殉道史家亲眼看见了泰勒就义。不过，这种推测没有证据。然而值得注意，福克斯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后，与诺维奇主教帕克赫斯特同住了很久，而哈德利正处于该主教区之内。福克斯似乎也有些朋友和熟人住在离哈德利十英里之遥的伊普斯维奇。所以，很可能他经常去泰勒的教区，很可能从亲眼看见这位尊贵的殉道者就义的百姓那里得到了许多资料，从而能够充分且准确地记述关于泰勒的事奉和殉道。本章将对福克斯的记述加以精炼，用当代的语言呈现给读者，以方便阅读。

据斯特莱普的记载，罗兰·泰勒出生在诺桑波兰的罗思贝里，是里德利的老乡。关于他的出生日期、家庭情况、早年经历以及求学的地方，我们都一无所知，只能从搜集到的零星资料推断出，他曾就读于剑桥，在那里学到了宗教改革的原则。在这

段人生的关键日子里，他受到的各方影响中，拉蒂默主教的讲道尤为重要。我们确知的第一件关于他的事是他跟克兰麦大主教很熟。他似乎在帮这位伟人处理家庭事务，并一起推进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大业。不幸，我们无法知晓他跟克兰麦同住了多久。但有过硬证据表明，他跟克兰麦的密切关系持续了很久，因而成为英格兰改教家中的显要人物。除此之外，无法解释为何玛丽女王统治期间，教皇一党如此仇恨他，竭力搜捕，并将他迫害致死。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这位哈德利的老教区牧师定然 在伦敦享有盛誉。

萨福克郡的哈德利是我们所知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罗兰·泰勒任职的地方。是他的朋友克兰麦大主教任命他前去此地，但具体时间就不得而知了。只有一点可以确认，即他一受命去哈德利，就辞去了在伦敦的全部职位，全新投入教区的事工。

哈德利是萨福克郡西南边界的一个小镇，当时大约有四千居民。福克斯在《行为与丰碑》一书中生动形象地记述了爱德华六世时期罗兰·泰勒在那里的事工以及当地的情况。所以我只需引述他的话：

“哈德利镇是全英格兰第一批领受真道的地方，借着托马斯·比尔尼长老的讲道，基督的福音在那里大获成功，扎下了根。教区中有许多男男女女都对《圣经》有深刻的理解。许多

当地人经常通读《圣经》，可以由衷地讲述保罗书信的许多内容，在任何有争议的事情上都能给出敬虔而有见地的回答。

“小孩和仆人们同样在关于神话语的正确知识中成长，殷勤地接受训练，因此整个镇似乎成了学士云集的大学，而非裁缝、劳工居住的小镇。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在生活中大力遵行神的话语。

“泰勒博士在哈德利镇是个好牧人，住在羊群中间。他全心研究《圣经》，忠信地努力遵行主给彼得的命令——‘彼得，你爱我吗？’‘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基督的这种爱激励着他，没有哪个主日、哪个圣日，或其他可以聚集众人的时间，他白白地浪费掉，不用来向他们传讲神的道、救恩的教义。

“他不仅给百姓讲道，而且他的生活言行都是圣洁基督徒生活的无伪典范。他从不骄傲，而是像孩童般地谦卑温柔，因此，人人都可以大胆地向他求助，就像去求父亲一样。但他的谦卑并不是幼稚，也不是因胆怯，在某些时间、地点和场合，如有需要，他会坚决斥责犯罪行恶的人。作为牧师，不管面对多么有钱有势的人，他都会对其罪过直言不讳，恳切严肃地斥责。他是个温柔的人，从不心怀怨恨恶念，却乐于助人，甘愿饶恕仇敌，从不作恶损人。

“对瞎眼、病弱、瘸腿、卧床的穷人，还有子女多的穷人，他像一位慈父，细心的资助人，殷勤的救济者，甚至让教区的教众慷慨地给这些人提供救济。除了一直救济穷人之外，他自己还每年诚恳地拿出一部分钱投入公用救济金。

“他妻子也是个诚实、朴素且警醒慎守的主妇，孩子们也教养良好，在敬畏神、爱慕学习的氛围中长大。

“圣保罗曾说过拥有哪些美德才能担任监督，这些美德他都具备，因而可以说是模范监督，鲜活的榜样。他是地上的好盐，没有失味，叮咬着恶人的败坏之心。在神的家里，他是灯台上的烛光，所有好人都该效法他。”

泰勒在哈德利侍奉了多久，并没有准确的数字。福克斯只说“最清白的圣王爱德华六世在位的那段蒙福的日子里”，他一直都在那里。不过，可以断言他在那里超过十年。玛丽女王上台后，他下监之时，已经有九个孩子了。他结婚组建自己家庭的时间不大可能是在离开克兰麦家之前，看起来他的孩子都生在哈德利。然而，这些都是推测。他担任哈德利教区长很长一段时间，长得足以让教众爱戴尊敬他，知道这些已经足够了。

玛丽女王登基后，罗兰·泰勒在哈德利的宁静生活很快走到了尽头。像他那样地位崇高享有盛誉的更正教信徒定然会出现在教皇一党的屠杀黑名单上。很快，他们找了个借口把他下狱。

在牧养得最好的教区，沐浴着最信实的福音讲道之地，总会有许多恨恶真信仰的人，他们仍旧心底刚硬、不知悔改、不信。使徒时代如是，当今我们的教区如是，罗兰·泰勒在哈德利担任教区长时也一样。有人恨他，因为他的教导谴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一旦他们有了伤害他的机会，就绝对不会放过。两个这样的家伙，一个叫佛斯特，一个叫克拉克，阴谋让这位可敬的教区长与高层发生冲突，于是雇用了阿德汉教区长约翰·阿弗莱斯，来到哈德利的教堂施行天主教弥撒。结果正和他们想的一样。罗兰·泰勒义愤地在弥撒开始时冲入教堂，激烈声明整场仪式是非法的偶像崇拜。接下来发生了一场不合时宜的争闹——哈德利教区长被赶出自己的教堂，忠信的教众群情激奋，有人朝教堂里扔石头，人群骚动。温彻斯特主教、英格兰大法官斯蒂芬·加德纳很快得知了一切。结果，那两个恶棍如愿以偿，加德纳命令泰勒博士立即去伦敦见他。勇敢的改教家毫不迟疑地遵令而行，离开哈德利，至死都再未回来。

命令送到时，许多朋友劝罗兰·泰勒逃去欧洲大陆保命，但他拒绝了，就像许多其他忠信的更正教信徒一样。当年，使徒保罗的朋友们劝他别去耶路撒冷，但保罗不为所动；现在，泰勒朋友们的劝说对这位老善人起到的作用也一样。他答道：

“你们要我做什么呢？我老了，活得已经够久，见不得这

最为邪恶的可怕日子。你们逃吧，照你们的良心带领而行。我意已决，要靠着主的恩典去见那个主教，让他知道他一无所成。主会再为他的百姓兴起教师，比我更加殷勤地教导他们，结出更多果子。因为主不会离弃他的教会，尽管现在他一时试炼、管教我们，但绝非没有道理。

“至于我个人，我相信在主面前，我能为他做的善工再不会像现在这么美好了，也不会有比这更荣耀的呼召，不会经历神赐予我的更大的怜悯。为何基督徒不甘心情愿地为抵挡教皇及其拥趸而死呢？我知道罗马教就是敌基督的国，满了虚假，他们全部教义都是偶像崇拜、迷信、错谬、虚伪和谎言。

“恳请你，还有我所有其他的朋友，请你们为我祷告，不要怀疑，主会赐我力量，他的圣灵会与我同在，所有敌手都会因自己的行径而羞愧。”

罗兰·泰勒以这样的心志心甘情愿地去了伦敦，他是最勇敢的男子汉，没有食言。福克斯如此描述加德纳第一次聆讯他的场面：

“加德纳见到泰勒博士，就按自己惯常所行的侮辱他，骂他是无赖、叛徒、异端，还说了许多恶毒的非难之辞。泰勒博士忍耐地听着他的辱骂，最后说道：‘大人，我既非叛徒也非异端，而是忠实的顺民，忠信的基督徒。我遵你的命令而来，

想知道大人所为何事。’

“加德纳说：‘来了，你这无赖！你怎敢厚着脸皮当面盯着我？知道老子是什么人吗？’

“‘当然！’泰勒博士说，‘我知道你是谁。斯蒂芬·加德纳博士，温彻斯特主教，大法官，但也不过是凡人。如果我应该怕你的官威，那你为何不怕神，我们所有人的主呢？你既然离弃真理，拒绝我们救主基督和他的道，行事背叛自己的誓言，那你又怎敢厚颜无耻地面对任何一个基督徒呢？将来你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会有何表情，怎样面对先后向国王亨利八世和他儿子爱德华六世起的誓言呢？’”

既然以这样离奇的方式开始，可想而知聆讯很快终止。几番尖锐的争论中，来自萨福克郡的教区长泰勒博士证明温彻斯特主教根本不是对手，于是主教将他投入王座法庭的监狱。听到下狱的命令，泰勒双膝跪下，举起双手说：“良善的主啊，我感谢你。良善的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这个罗马主教的暴政，脱离他一切可憎的谬误、偶像崇拜和恶行。兴起好王爱德华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罗兰·泰勒在狱中度过了两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祷告、读经、写作。他也有机会劝诫众囚犯，给他们讲福音。他在狱中见到了多少同时下监的改教家，我们并不十分清楚。不过肯定他经

常跟著名的约翰·布拉德福德在一起，并告诉朋友神让他入狱，在那里“有神的一个使者来安慰他”。同样，他也很可能跟杰出的改教家胡珀、罗杰斯、费拉和桑德斯偶尔见面交谈，这些人跟他一样，最后都死在火刑柱上。

1555年1月22日，罗兰·泰勒困苦的牢狱生活走到了尽头。他被带到大法官加德纳主教和其他审查者面前，接受了冗长的审查。详细探究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是件苦差事，没有必要。整件事完全缺乏公正，充满偏见——所有针对英格兰改教家的审讯都同样如此——结果当然是好人被定罪。用泰勒自己写给朋友信中的话来说，他因捍卫神职人员结婚的权利，以及拒绝化质说而被定为异端。绝不要忘了，这些日子里，否认圣餐时基督的身体和血以肉体的方式存在于饼和酒之中，是决定殉道改教家命运的关键点。如果他们在这一点上退让，就可以活命；因为他们不承认圣餐中有任何的肉身临在，所以才会死。这些事记载下来，是为了让我们从中学习。

1555年1月的最后一天，泰勒和布拉德福德、桑德斯一起被召去温彻斯特、诺维奇、伦敦、索尔兹伯里和杜伦五地的主教面前。他们被控犯有异端、分裂教会两样罪行。审讯者要他们明确回答是否顺服罗马主教并起誓放弃自己的错误。他们都拒绝，因此被判死刑。福克斯说：“为此，他们感谢神，坚

决地告诉那些主教：‘我们绝不怀疑神，最公义的审判者，会向你们追讨流我们血的罪；追讨你们骄傲的罪，因为你们重新接纳敌基督而不悔改；追讨你们虐待基督的羊群的罪。’”当天晚上，泰勒就被送到康普特监狱，同弟兄们分开了。

2月4日，伦敦主教邦纳来到康普特监狱，举行了一堆荒唐的仪式，正式剥夺泰勒的圣职。对此，福克斯的一番描述令人捧腹。第二天夜里，他妻子和儿子托马斯获准探访他，与他一起用餐，晚餐后就悲痛地流泪分别了。第二天，2月5日，他启程去哈德利，要当着自己教众的面受火刑。福克斯催人泪下地描述了他离开伦敦的情景：

“泰勒博士跟妻子在康普特监狱共进晚餐后的第二天，2月5日，伦敦治安官带着兵丁在凌晨两点来到康普特监狱，带走了泰勒博士，黑灯瞎火地送他去上院议长那儿，住在奥尔德门外的一间小旅馆里。泰勒博士的妻子疑心丈夫那夜会被押走，就在奥尔德门旁边圣博托夫教堂的长廊里整夜守候。她还带着两个孩子，一个是十三岁的伊丽莎白，是个孤儿，三岁那年在救济院里被泰勒博士收养；另一个叫玛丽，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治安官和随从向圣博托夫教堂走来时，伊丽莎白大哭：‘亲爱的爹爹！娘亲，娘亲，爹爹被带走了！’那是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凌晨，所以泰勒博士的妻子哭喊道：‘罗兰，罗兰，

你在哪儿？’泰勒博士答道：‘夫人，我在这儿，’并停了下来。治安官的人想押着他继续走，但治安官说：‘诸位，请稍候片刻，让他跟妻子说说话。’于是他们停下了。

“妻子走上前来，他抱起女儿玛丽，跟妻子和伊丽莎白一起跪下背诵主祷文。此情此景让治安官也落泪，同行的其他人中有好几个人也一样。他们祷告完之后，泰勒博士起身亲吻妻子，握着她的手说：‘别了，爱妻。当感欣慰，因我良心安宁。神会赐给孩子们一位父亲的。’然后他又吻了玛丽，说：‘愿神祝福你，让你成为他的仆人。’又吻了伊丽莎白，说：‘愿神祝福你。愿主使你站得稳当，持定基督和他的道，保守你远避偶像。’然后他妻子说：‘愿主与你同在，亲爱的罗兰。我将靠着他的恩典在哈德利与你见面。’

“就这样，众人押他去了上院议长那里，他妻子一路跟着。一到那儿，就把他关进一间牢房，由四个警卫和治安官的人看管。泰勒博士一进牢房，就跪下全心祷告。治安官看到泰勒博士的妻子也在那里，就再不让她同丈夫说话了，只是友善地邀请她去家里，就当是在自个儿家一样，并允诺她不会缺少什么，还派了两个兵丁护送。不过，她希望回娘家去，于是兵丁带她去了，并叮嘱她母亲看好她，直到他们再来。”

福克斯也详细记述了罗兰·泰勒从伦敦去哈德利的旅程。

泰勒是骑着马去的，这是当时的习惯。其间，分别在布伦特伍德、切姆斯福德和拉文纳姆逗留。“他一路欢欣喜乐，就像是要去参加最快乐的盛宴或婚礼。”但福克斯记述的殉道历史中，关于这段旅途最后的内容，就已经让我们满足了：

“1555年2月9日（胡珀主教也于当日在格洛斯特受刑），治安官一行押着泰勒博士去哈德利。距哈德利不到两英里时，他要求下马。下马后，他跳了一两圈，就像男士们跳舞时通常跳的那样。‘怎么回事啊，博士大人，’治安官说，‘您怎么了？’他回答：‘当赞美神，治安官大人，现在感觉再好不过了。因为我快到家了。再走过两条街，我就要安居在我天父家里了。不过，治安官大人，我们不穿过哈德利吗？’治安官回答：‘要穿过的，您会穿过哈德利。’于是他说：‘良善的主啊，我感谢你！我在死之前将再次见到我的羊群。主啊，你知道我深深地爱着他们，忠实地教导他们。良善的主啊，求你祝福他们，保守他们持定你的话语和真理。’

“要到哈德利，正过桥时，桥下有个带着五个小孩的穷人，一看到泰勒博士，就跟孩子们一起跪下，挥手放声大哭：‘泰勒博士，亲爱的父，好牧人啊，愿神帮助你，就像你多次帮助我和可怜的孩子们一样。’这人一生中有许多此类慷慨施舍的美好见证，所以神此刻让穷人来见证他的好行为，以便让他大

得安慰，并成为他人的榜样，而迫害他和暴虐的敌人却因此困惑不已。治安官和其他带他去刑场的人对此都非常惊讶，治安官恼怒地斥责那位哭喊的穷人。哈德利的街道两边挤满了镇上和周围乡下来的男男女女，都等着要见到泰勒博士。他们看到泰勒博士这样被押往刑场，都痛哭流涕，彼此对说：‘良善的主啊，好牧者要离开我们了，他曾如此信实地教导我们，慈父般地照管我们，敬虔地治理我们。慈爱怜悯的神啊！我们这群可怜的羊被赶散了，该怎么办呢？这个极恶的世界又会发生些什么事呢？良善的主啊，求你刚强他，安慰他。’他们还说了其他很多极为哀恸可怜的话。因此，押送他的治安官和执法队的人恼怒地训斥众民。泰勒博士则始终如此对百姓说：‘我已经向你们传讲了神的道和真理，今天要来用我的血来印证。’

“下监期间有些好心人送钱给他，他攒下了一些，到了他熟悉的救济院时，他把钱抛给善良的百姓们。他一下监，当局就停发他的生活费，因此他坐牢的时候全靠来探访他的好心人慷慨的救济。他把多余的钱放进一只手套，准备同样用来施舍。现在，他把钱抛给站在门口看他的贫民，这些贫民依靠救济生活。走到救济院最后的一间屋子时，因为没有看到住在那里的人像其他人一样在门口守候，就问道：‘住在里面的盲人还活着吗？’有人回答：‘活着，就在里面。’于是他把手套连同

其中的钱都扔进窗子，然后继续骑马前行。

“最后，来到当局指定的行刑地阿德汉广场时，他看到大批群众聚集在那里，就问：‘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是做什么呢？’ ‘阿德汉广场，你要在此受刑，百姓是来看你的。’ 于是他答道：‘感谢神，我就快踏进家门了。’ 就飞身下马，撕裂头上戴的风帽。

“现在他的头发被剪得很糟糕，就像给蠢蛋理的那种极短的头发，这是邦纳主教这个坏家伙在剥夺他圣职时给他的待遇。但百姓一看到他那可敬的苍老面容，长长的白髯，就不禁放声大哭，喊着‘愿神拯救你，善良的泰勒博士！愿耶稣基督使你刚强；愿圣灵安慰你’，还有其他这类敬虔的祝愿。他想向群众讲话，但兵丁严严地看着他，一见他开口，就有人往他嘴里插一根杖，绝不允许他说话。

“泰勒博士意识到不可能获准发言，就坐下了。看到一个叫索伊斯的人，就叫他过来，说：‘索伊斯，请你来脱下我的靴子，可以干活时穿。你已经想要很久了，现在拿去吧。’ 然后，他又起身脱衣服送人，直到只留下衬衣。之后，他大声喊道：‘善良的百姓啊，我教导你们的，没有别的，只有主的道，从主所赐福的《圣经》中得来的教训。今天我来就是要以我的血印证这道。’ 听到这话，一个兵丁狠狠地打他的脑袋，说：

‘你就这样信守承诺吗，异端分子？’此人一路上都凶残地对待他。鉴于他们不许自己讲话，他就跪下祷告，人群中有一个穷妇人也过来跪下一起祷告，但兵丁粗暴地推她走，威胁要用马来践踏她。尽管如此，她却不为所动，坚持跟泰勒博士一起祷告。祷告完后，泰勒博士走向火刑柱，亲吻了一下，就自己站到为他准备的柏油桶里，背靠火刑柱，双手抱拳，举目望天，不住祷告。”

痛苦地耽延了一阵子，一些来帮着行刑的教皇一党卑鄙地羞辱了他一番之后，火点着了。福克斯说：“泰勒博士高举双手，呼求神，说：‘慈悲怜悯的天父，求你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将我的灵魂收归你手。’他就这样站住了，没有哭喊也没有动。最后，有人拿戟戳他的头，脑浆流出来了，于是尸体倒在了火中。”

最出色最勇敢的英格兰殉道者就这样死去了。在他身受火刑之地，曾经的阿德汉广场一角，仍留着一块古老的粗糙石头，石头周围的地都围住了。石头上题写的话古色古香却又简练：

1555年。

泰勒博士，为了捍卫

良善之事，在此

流出鲜血。

1819年，同一地点树立起了另一块更精美的纪念碑，由哈德利教区长题写了长长的韵文。但就算没有石头和纪念碑，这位殉道者的事迹也仍旧铭记在教区百姓心中。“他虽已死，却仍在发声。”

泰勒留给妻子、家人和教众的遗嘱写在了一本书里，这本书是他殉道前五天送给儿子的遗物。读者肯定会对遗嘱的内容感兴趣：

“我要对妻儿说，主把你们赐给我，又让你们失去我，我失去你们。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相信在主里死去的人是蒙福的。神看顾麻雀，看顾我们每一根头发。我明白他比任何父亲、任何丈夫都要信实可亲。所以，借着亲爱救主基督的善功信靠他吧。信他、爱他、敬畏他、顺服他。向他祷告，因他应许帮助你们。不要当我死了，因为我一定会永远活着，不会死。我先走一步，去我们渴慕的家，你们随后会来的。我去见我其余的孩子们——苏珊、乔治、埃伦、罗伯特和扎卡里。我把你们交托给那唯一的全能者。

“哈德利亲爱的朋友们，还有所有听过我讲道的人，我对你们说，就我所传讲的道理而言，我可以良心安宁地离开，希望你们为这些真理跟我一起感谢神。尽管我天分不够，但我从神的书、蒙他赐福的《圣经》中得到的教训，我都传讲给众民

了。所以，不拘是我，是天上来的天使，若给你们传讲的福音与你们领受的不同，就愿神重重地诅咒那传讲的人！

“为了神的缘故，你们要警醒，切莫拒绝他，不要偏离信心的真道，免得他也离开你们，你们就永远地灭亡。为他的缘故，要当心罗马教，表面上他们是为了教会合一，实际上是虚空之事，是敌基督，不符合基督的信仰和真理。

“当心别犯干犯圣灵的罪，现在整个英格兰都已经蒙光照，真理清楚明了、真实彻底地展现在人们眼前了。

“所有真心渴慕与神同在、与天上众民同在的人，主应许借着耶稣基督赐给他们他良善的圣灵，让他们在他的智慧上长进，轻看这邪恶的世界。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中保、庇护者，他是我们的唯一的义，唯一的盼望，我们成圣也只在乎他。阿们！阿们！祷告，祷告！

“罗兰·泰勒离开时带着确实的盼望，毫不怀疑永恒的救恩。我借着耶稣基督感谢神、我的天父。基督是我确实的救主。阿们。公元1555年2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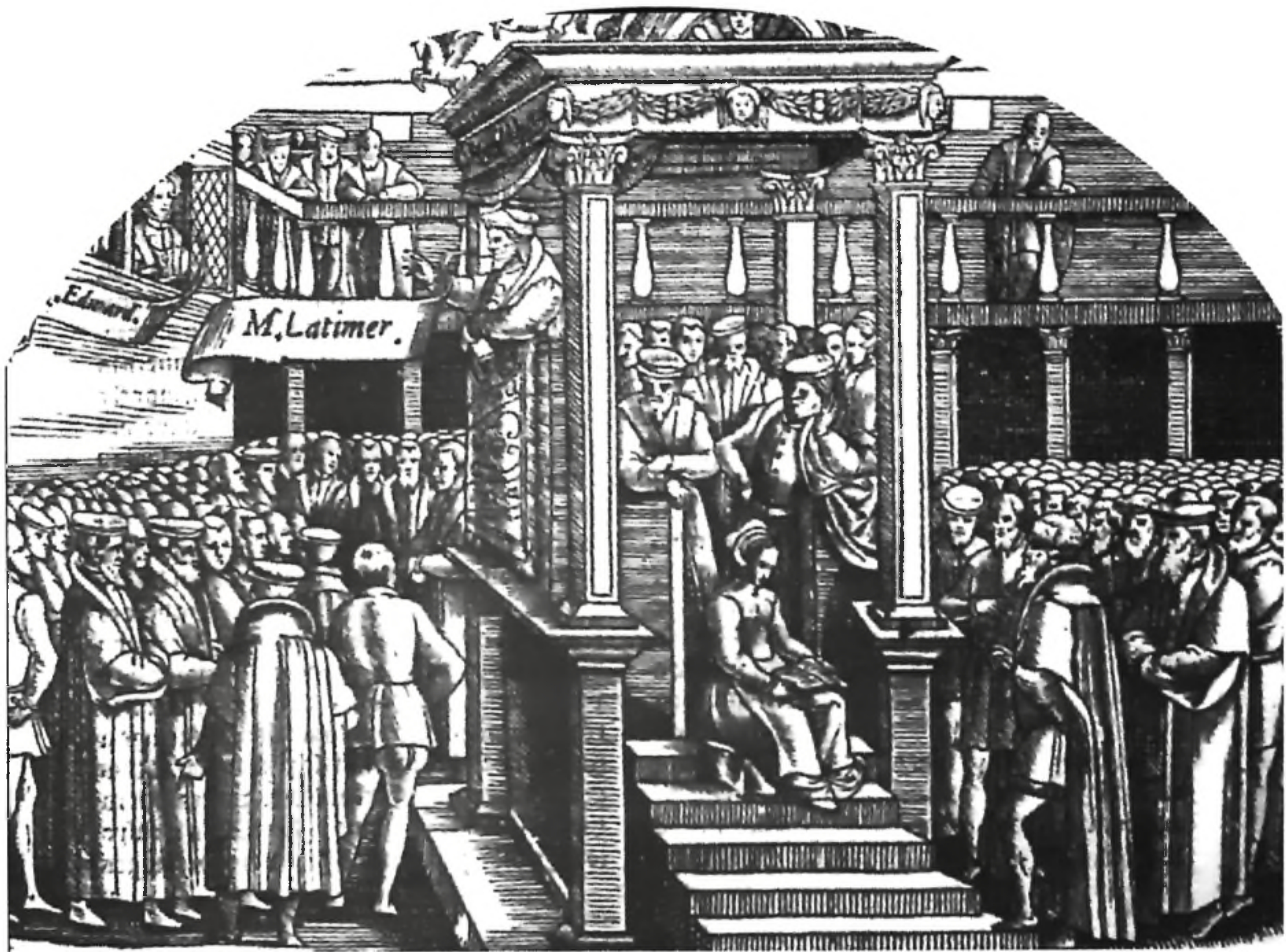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主啊，我倚靠你，求你让我永不羞愧。’”

有谁想知道罗马教会是否绝无错误呢？仔细读读历史上

的像罗兰·泰勒这类的殉道事件。罗马教会犯下的所有愚蠢的、自取灭亡的错误中，没有比烧死改教家严重的了。殉道者的血奠定了宗教改革的事业，让英格兰人成千上万地皈依更正教。当普通英格兰人看到罗马教会如此残忍邪恶，而更正教信徒如此勇敢，他们不再怀疑哪边才拥有真理。主再临之前，愿英格兰人不要忘记殉道的改教家们的事迹！



休·拉蒂默 (约 1487~1555)



拉蒂默在西敏寺讲道，听众包括爱德华六世等。

1563年版《殉道史》插图。

休·拉蒂默

读过英国教会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拉蒂默主教的大名。很可能，几乎无人不知三百年前英格兰有个女王“血腥玛丽”，在她治下有人因为不放弃更正教信仰而被活活烧死，其中之一就是拉蒂默主教。

不过，今日的英国国教会众应该更清楚地了解这些事，应该十分熟悉英格兰改教家的生平、事迹和主张。他们的名字不应只是冠冕堂皇的演说中的陈词滥调，用来招引满堂喝彩的夸张诱饵。他们的原则不应再是模糊、朦胧的阴影，“在远处若

隐若现”，而应是我们眼前清晰、确凿、明确界定的原则。我希望人们能明白，这个国家最核心的利益与更正教密不可分。我盼望人们心里铭记，英格兰的福祉不在于商业，不在于聪慧的政治家、汽轮、军队或舰船，也不在乎黄金、钢铁、煤炭和谷物，而在于维系英格兰宗教改革原则。

当今时代对英国教会史的认识混乱不堪。今日，各种各样令人吃惊的大胆观点令人眼花缭乱，摸不清自己所处何方。关于罗马教和更正教，有一种极其危险的情感正在我们中间滋长。这种状况已经滋生了，正在增长，应该去除。要检查这种情感状况，不可能有什么比得过某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更有效果了。如果要想让某个苏格兰人信服，据说必须给他长长的论证。如果要想让英格兰人信服，就必须给出清楚的事实。本章带给读者最有价值的就是事实。如果有人期待在本章找到个人的臆测，或雄辩的论证，恐怕不会如愿。但要是有人喜欢平白的事实，我想本章可以稍微满足他的心愿。

会不会有读者怀疑谁才是英国国教的真会友呢？那些可笑的所谓“教会观点”层出不穷，读者一定不知所从了吧？现在跟我来，花点时间看看一位英格兰教会的奠基人的事迹，看看这位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最诚实、直言不讳的主教之一的见证，看看老善人拉蒂默的生平和主张。

有没有读者不清楚罗马教会真实的性质呢？是不是因为有些貌似有理的人说圣公会^①和罗马教会之间没有本质区别，你就糊涂了呢？某些误入歧途的教众特别渴望所谓的“大公教会”^②原则，这些东西标榜自己是大公教会的教导、大公教会的仪式、大公教会的灵修书籍、大公教会的建筑，你是否因此而困惑呢？现在跟我来，翻几页英格兰历史，看看罗马教教师指教民众、按自身所好行事之时，英格兰是个什么样子；看看罗马教会拥有完全的权力时都干了些什么；看看他们如何对待拥护自由地读圣经、个人判断和因信称义的人；看看罗马教会怎么对待拉蒂默主教。

探究拉蒂默主教的事迹之前，需要注意他所处的时代。若不知晓一个人所处的环境，面对的困难，就无法公正地评价他的所作所为。如果不熟悉那群尊贵的英格兰改教家开始他们的事工时英格兰的实际状况、他们的事工是在怎样的不利局面之下开展起来的，就没人能意识到我们欠他们的债究竟有多少。

拉蒂默出生时，国王还是亨利七世。他的一生经历了亨利

^① 圣公会 (Anglican Church) 是英国国教的别称，意为“英格兰人的教会”，也音译作“安立甘宗”。——译注

^② “天主教”英文名称本意即“大公教会”。——译注。

八世和爱德华六世两任国王的统治之后，在玛丽女王治下被处死。他出生时，罗马天主教在这个国家拥有无可争议的支配地位。他见证了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的决裂，改革后的宗教信仰在英格兰的确立。他看到了爱德华六世治下更正教的全面发展，公祷书和信纲汇编成册，而这些文件与我们今日只有细微的差别。我必须分别讲讲这三个时期。

拉蒂默人生的第一个时期笼罩着完全的属灵黑暗，那时罗马天主教在英格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我们的祖先沉溺于迷信之中，程度之深足以令人毛骨悚然。当然，有许多罗拉德派和威克里夫的追随者散布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持守真理，是这个国家的盐。但这些好人面临着严重的迫害，无法取得太多进展。他们几乎不能保住自己的阵地。至于广大群众，他们的思想则是一片黑暗。

大多数司铎和宗教教师对自己应当知晓之事也极度无知。他们接受圣职时通常没有在知识或品性方面接受恰当的审查。许多人尽管能读自己的祈祷文，但对《圣经》一无所知。据历史学家斯特莱普记载，有些人几乎背不出主祷文，背不出十诫的人也不在少数。教会的祷告用拉丁语进行，懂的人很少。讲道也非常少，就算有，也很不符合《圣经》，不造就人。

英格兰大地上星罗棋布着神职人员的巨大巢穴，即修道院

及其附属教堂。这些美丽建筑里的居住者却少有非常圣洁克己之人，反而往往过着最不检点、为人不齿的生活。粮食饱足，大享安逸会带来什么样的道德水平，他们就有什么样的道德水平。他们几乎不学习，也不传播真信仰。他们只关心两件事——填满自己的口袋，保持自己的权力。为了第一个目的，他们劝说虚弱将死之人把钱和土地奉献给教会，似是而非地假装说奉献者可以借此免去炼狱的刑罚，藉善行证实自己的信心。为了第二个目的，他们宣称掌握着天国的钥匙。人必须向他们告解罪行。没有他们的赦罪和抹油礼，无人能得救。没有他们的弥撒，没有谁的灵魂能从炼狱中得赎。一句话，他们其实担当了基督和人之间中保的角色，而得罪他们就是最高的罪行。老富勒记下了一个例子：1489年，有个意大利人在英格兰赚了一笔巨款，因为他“蒙教皇赐予权力可以赦免放高利贷、买卖圣职、偷窃、杀人、淫乱、通奸以及其他所有罪行，除了打神职人员和阴谋反对教皇之外”。这就是拉蒂默年轻时，罗马天主教还在英格兰猖獗之时，罗马教神甫的德行。说他们普遍无知、贪婪、淫荡，是统治人灵魂和身体的暴君，只不过是讲出了事实。

拉蒂默年轻时，司铎都是这个德行，所以不必奇怪百姓对真信仰全然无知。其实，要是事情不是这个样子，那真是奇迹，因为人们既听不到纯正的讲道，又读不到圣经。一本《新约》

至少要两磅十六先令三便士，而且购买者还要冒着被视为异端的危险。对于大众而言，基督教只要有名字和形式就够了。安息日是用来休闲消遣的，而非用于郑重的敬拜。如果问要得救应当怎么做，或者关于称义、重生、成圣、基督的职分或圣灵的工作最皮毛的问题，一百个人中也许也没有一个能答得出来。人们只知道去天堂的方法就是照神甫的话去做，并且要从属于“真教会”！这样一来，瞎子领瞎子，一起掉进坑里。

大部分信众实际的宗教活动包括向童贞女马利亚和圣徒祷告、付钱给司铎讲弥撒、去圣地朝圣和崇拜圣像和圣物。他们的迷信活动一一列举的话将会令人震惊。他们在雷雨前赶去教堂拿圣水；瘟疫流行时祈求圣卢克帮助；得了疟疾则向圣珀内尔祷告。年轻的女孩想要出嫁，就求圣尼古拉帮助。厌倦丈夫的妻子会求助于圣昂康布尔。每年有上万人参拜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贝克特墓，目的是帮助自己的灵魂上天堂。在坎特伯雷大教堂，有一年基督的祭坛收到三磅两先令六便士，童贞女马利亚的祭坛是六十三磅五先令六便士，而托马斯·贝克特的祭坛是八百三十二磅十二先令三便士。百姓敬拜的圣像往往跟偶像一样是下劣的骗局，敬拜的圣物跟圣像一样丑陋荒谬。至于圣徒遗骨，已经有一堆一堆的了，信众经年累月向这些遗骨敬礼，人们最终却发现这些遗骨不过是鹿骨头和猪骨头。这些

事很可怕，但应当知道。这些事情罗马教会都知道，是他们谋划的，还为之施行惩戒，捍卫并教导这种做法，强加于其信众身上。这就是16世纪初期改教家兴起时，英格兰的信仰状况；这就是休·拉蒂默童年和青年时代英格兰的基督教！

拉蒂默人生第二阶段是处于罗马教向更正教转变的时期，有许多稀奇的特征。

一方面，宗教改革由国王启动了，不过至少可以说并不是出于属灵的动机。要是谁认为亨利八世这淫荡的暴君与教皇决裂不是因为教皇否决了他的愿望，那真是荒唐。他假装对自己同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感到良心不安，于是同克兰麦和拉蒂默商议。一方面，他听从了这些好人的意见，像希律那样，他做了许多正确的事，大概促进了福音的事工。他任命克兰麦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一直到死都对其青睐有加。他允许用英语印行圣经，在教堂里使用。他命令毁坏偶像，废除了许多粗鄙的迷信。他大胆拒绝了教皇至高无上这条教义，解散了修道院，让其藏污纳垢昭之于众。这一切我们都看到了，并且感恩。但另一方面，他捍卫教皇一党的教条，烧死了殉道者兰伯特这样的人，敌对他们。他推行著名的《六条信纲》，这份文件主张化质说、私人弥撒、教士独身、童贞誓言、告解，不让信众领杯。最糟糕的是，他一生都是个骄傲、自行其是、淫荡的人，完全

缺乏证据证明他的心曾在神眼中看为正。使用这样矛盾的人来做神的事工，是神护理之工的隐秘事。我们明白不了，但我们必须等待。

另一方面，第一批英格兰改教家表现出很强的、富勒称之为“黎明信仰”的特点。他们在亨利八世治下推行的文件尽管已经相比罗马教教导已经有了巨大改进，进步非凡，但仍包含了一些不合圣经的内容。比如《必要的学问》和《基督教信徒守则》。然而，可以看到他们在属灵认识上逐渐长进，特别是对化质说谬误的认识，也许他们自己都不知不觉。他们不断地受阻，部分原因是国王的专横，部分是教会中还有许多教皇一党，跟这些人一道工作自然会有巨大的困难，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基层教士可怕的无知。不管怎样，比较一下亨利八世的统治开始和结束时的状况，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改教家已经夺得了许多阵地。由此我们仰慕神的掌管，他使用亨利八世实现自己的目的，就像使用尼布甲尼撒和西拿基立一样。最后——但并非最次要的——我们知道了倾慕改教家的百折不挠。尽管他们力量很小，却尽力而为；尽管面对的那扇门只开了一小条缝，但他们就挤进去了；尽管他们只有一项才能，却全心献给神，没有埋在地里；尽管只有一丝光亮，他们却全然遵从。如果无法做想做的事，他们就做能做的，而他们所行的也蒙了祝

福。这就是拉蒂默人生的第二个时期。绝不要忘记，当时英国国教的根基已经掘好了，接下来的建造者要走的路上，堆积如山的垃圾已经清理干净。由此看来，这个时期总会让研究教会历史的人兴致盎然。

拉蒂默人生的最后阶段是爱德华六世在位，在诸多方面都与前两个时期截然不同。英格兰更正教改教事业在爱德华掌权短暂时间内取得了巨大进步。胡克关于他的话非常贴切：“如果人生在于行动的话，那么他虽死得年轻，但活得很长。”没有了暴君的干扰造成的束缚，克兰麦和朋友们在宗教改革的事业上大步向前。邦纳和加德纳失去了开倒车的权力，因为这两个天主教高级教士拒绝参与善工，所以被罢免，默默无闻了。像里德利和胡珀这样的忠信之人担当了主教的职分。教会大幅开展了清除罗马天主教仪式的行动，并编纂了《礼拜仪式》，同我们今日的《礼拜仪式》只有细微差别。四十二条关于信仰的纲要起草完毕，构成了今日《三十九条信纲》的基础。第一本讲道书颁布施行，以供传道人的需要。改教家还规范了教义陈述，使之更准确清楚，不过迄今为止我们对此不甚了解。诸如布塞和彼得·马特尔等博学的外国人受邀来英格兰担任牛津和剑桥皇家神学教授。如果多给他们一些时间，改教家会将宗教改革的事工进一步推进多少啊！不过现在来推测没有用了。

如果不是爱德华早逝令他们的工作中止，那么既然他们在短短数年内实现了众多改变，很可能他们几乎会让我们的教会达到有形教会可以达到的完美地步。

然而，有一件事是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的改教家无法实现的。他们无法改变基层教士的心。成千上万的教士继续在英国国教中任职，这些人对克兰麦与同僚推进的事业缺乏共鸣。对此没什么办法奏效，因为他们为了糊口，可以答应任何事、签署任何文件，不管什么样的誓言都可以起。但当他们服从克兰麦的命令之时，还是粗鲁而无知，心里仍旧是半个天主教徒。胡珀主教第一次造访格洛斯特时，认识到有必要让教区内的教士回答一些问题，他收到的答案让我们看到爱德华六世时代英格兰教士的情况十分可悲。

这类事实令人痛苦，令人震惊，但知晓这些事又十分重要，由此可知血腥玛丽登基后要复辟天主教是多么轻松。刚才说过的基层教士不会对她的企图有半点抵抗之心。这些事实对我们了解克兰麦和爱德华六世时代改教家的处境有很大启发。我们很可能对心内心外困扰他们的巨大困难没有什么概念。首先，这样的事实能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即使在拉蒂默人生最光明的日子，英格兰的信仰状况。倘若拉蒂默年老时都还有这样的事，那么他年轻时又会怎样呢！如果爱德华六世时代的教士

都这么无知，那么亨利八世在位期间笼罩着的阴云该有多么厚重啊！

我不会花太多笔墨来讲论拉蒂默所处的时代了，在胡珀那一章里已经讲得够多，在此我可不愿干瘪冗长地重复事实，加重读者负担。但我肯定，了解这些事实对正确理解英格兰宗教改革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我希望上文给出少量事实不至于白费力气。

我相信，读者若认真思考，就会同意我的见解：像今日某些人那样，认为这个国家脱离天主教是失策，这种看法真是荒谬之极。听到有人胡言乱语说什么旧日愉快的英格兰、中世纪的虔诚、信心的年代和我们信奉天主教的祖辈虔诚的习惯，真是十分令人震惊。

瓦尔特·斯科特令人陶醉的文章，普金美丽的建筑设计，在英格兰给罗马教添上了虚假的光环，诱使许多人怀疑本国实行宗教改革到底是赢是输。英格兰的社会状况在斯科特和普金笔下令人着迷，但诗歌和图画中的东西比现实要美丽多了，实际上是“距离产生美”。内特利、格拉斯顿伯里、布里、方廷斯、梅尔罗斯和博尔顿的修道院，现在成为废墟，比在亨利七世的日子更有用，为此我们可以安心了。少数英格兰人很可能对我们从宗教改革获益有多少一无所知。我们得蒙光照，得到

了知识、道德和信仰自由。罗马教这棵树过去在英格兰繁茂之时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子，有少数人不甚了解。这些果子就是无知、迷信、败德和神权专制。这样的果子令神愤怒，让灵魂丧失，使魔鬼喜悦。

再一次，我相信读者会与我有同感——如果说亨利八世治下英格兰改教家的行为和文章可以作为他们的成熟主见，就太不公平了，等于是用孩童时代的言行来评判他成年后的品性。克兰麦和助手们在亨利八世统治之下就正处于属灵的孩童状态。他们透过厚厚的乌云看到了信仰上的许多要点。但直到爱德华六世登基，他们才丢弃幼稚的事。因此必须当心，免得有人故意曲引英格兰宗教改革早期的文章，欺骗我们。若你想要评判改教家，就得用他们在爱德华六世期间的作品，而非亨利八世时期的作品。

最后，我相信读者会同意我的看法——没有深入了解就抨击早期英格兰改教家改革力度不够，很荒唐。抨击他们很容易，但这些抨击的人很少考虑到改教家要克服的巨大障碍，要消除的无数罪恶。要是以为他们要做的只不过是铲除老房子里的青苔，粉刷一新，那就太荒谬了。他们不得不推倒老旧腐烂的房子，从根基上重建。批评他们进展缓慢，似乎他们在风平浪静的大海上沿着清楚的路线航行，也是荒谬的。相反，他们要为

真信仰之船领航，穿过狭窄困难的海峡，克服洋流和风浪。把所有困难放在一起——亨利八世专横放荡，爱德华六世柔弱的年纪；人民大众普遍无知；被遣散的僧侣和修士苦毒的仇恨；许多主教公开反对；大部分教士心里漠不关心——这些事放在一起，掂量一下，我想你定然不会轻看早期改教家的工作。我可绝不认为他们成就很少，反而认为他们做的已经够多了。我为他们的坚定而赞叹，为他们的成功而惊讶。我看到相对软弱的器皿成就了深远的结果，只能说：“神真的跟他们同在。”

我要论述的第二个主题是拉蒂默主教的生平事迹。

休·拉蒂默 1485 年生于莱斯特郡蒙特索雷尔附近的瑟卡斯頓。后来因父亲和家人的缘故，他离开了家乡。在给爱德华六世讲的一篇道中，他说：“我父亲是义勇骑兵队成员，没有自己的土地。他只有一个每年最多三、四磅的农场，为养活一大家子人辛勤劳作。他养了一百只羊，我母亲则要给三十头奶牛挤奶。父亲很能干，当他去领国王的俸禄时，不但自己和马去了，还带去了马具。我记得，他去布莱克希思校场时，我扣上他的马具。他让我上学，否则我现在就无法在国王陛下面前讲道。他给女儿每人 5 磅的嫁妆，并让她们在敬虔敬畏的氛围中长大。他对贫穷的邻舍一直很大方，救济他们。”以上就是这位善良的主教平凡的家境。由此可见，英格兰尽管有这样那

样的毛病，但在这个国家出身寒微的人也能升到高位，拉蒂默是有记载可循的成千上万个例子之一。

十四岁时，拉蒂默去了剑桥，并于1509年当选为克莱尔学堂研究员。对他早年的事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这项显著的事实，即直到三十岁他都是个狂热顽固的罗马天主教徒，这是他自己说的。正如圣保罗不耻于告诉人们他曾经是“褻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更正教老主教拉蒂默也常常告诉人们他曾经是罗马教奴隶的事。在一篇讲道中，他说：“我是英格兰最顽固的罗马天主教徒，甚至当我要获得神学学士学位时，我整篇演说都是在反对菲利普·墨兰顿^①及其主张。”在另一篇讲道中，他说：“所有罗马天主教徒都认为自己靠着律法得救了，而我自己就持有这种危险的可憎观念，直到三十岁为止。我在黑暗和死荫的幽谷中走了很久。”他在写给爱德华·贝恩顿爵士的信中说：“我过去曾认为，如果我成为修士，穿上斗篷，就不会被定罪，不会怕死。出于同样的理由，我多次想出家修道，就是在我生病的时候。现在我憎恶这些迷信的愚昧想法。”

其他人也证实了拉蒂默关于自己的话。据记载，他曾对改

^①墨兰顿是马丁·路德的助手和继承人。——译注

教家持有深深的敌意，宣称最后的时刻、审判日、世界的末日一定就要到了。他说：“不敬的一方正在快速夺取阵地，要是他们甚至开始质疑教皇无误，那还有什么不敢做的事吗？”贝肯提到，神学讲师斯塔福德在剑桥开设关于《圣经》的讲座时，拉蒂默必定参加了，目的是恐吓并赶走学生。实际上，拉蒂默对罗马天主教的狂热臭名昭著，甚至当选为在大学宗教游行时背十字架的人，又因守七年严肃生活而放弃这一职分。神就是用这样的陶土来制作合乎他事工使用的器皿！这就是英格兰宗教改革期间最杰出、作用最大的人之一拉蒂默的早年岁月。

神所使用，让这位狂怒的教皇拥趸认识基督真理的器皿，是一个学生，名叫比尔尼。比尔尼跟拉蒂默同时在剑桥就读，已经接受宗教改革教义一段时间了，最后在诺维奇殉道。他发现拉蒂默是个真挚诚实的人，因而友善地认为其对天主教的狂热是出于缺乏认识。因此，在拉蒂默公开抨击墨兰顿后，比尔尼大胆地去找他，谦和地请他私下听自己的信仰见证。这勇敢的一步成功了。拉蒂默年老时说：“听他一席话胜读多年书啊。从那时起，我开始领略神的话语，放弃了攻读神学博士及此类愚蠢的行为。”比尔尼这次的举动看来值得大力表扬，可以鼓励每个人为邻舍的益处作出行动。这件事耀眼地证明了《箴言》里的这一真理：“话合其时，何等美好！”

教家持有深深的敌意，宣称最后的时刻、审判日、世界的末日一定就要到了。他说：“不敬的一方正在快速夺取阵地，要是他们甚至开始质疑教皇无误，那还有什么不敢做的事吗？”贝肯提到，神学讲师斯塔福德在剑桥开设关于《圣经》的讲座时，拉蒂默必定参加了，目的是恐吓并赶走学生。实际上，拉蒂默对罗马天主教的狂热臭名昭著，甚至当选为在大学宗教游行时背十字架的人，又因守七年严肃生活而放弃这一职分。神就是用这样的陶土来制作合乎他事工使用的器皿！这就是英格兰宗教改革期间最杰出、作用最大的人之一拉蒂默的早年岁月。

神所使用，让这位狂怒的教皇拥趸认识基督真理的器皿，是一个学生，名叫比尔尼。比尔尼跟拉蒂默同时在剑桥就读，已经接受宗教改革教义一段时间了，最后在诺维奇殉道。他发现拉蒂默是个真挚诚实的人，因而友善地认为其对天主教的狂热是出于缺乏认识。因此，在拉蒂默公开抨击墨兰顿后，比尔尼大胆地去找他，谦和地请他私下听自己的信仰见证。这勇敢的一步成功了。拉蒂默年老时说：“听他一席话胜读多年书啊。从那时起，我开始领略神的话语，放弃了攻读神学博士及此类愚蠢的行为。”比尔尼这次的举动看来值得大力表扬，可以鼓励每个人为邻舍的益处作出行动。这件事耀眼地证明了《箴言》里的这一真理：“话合其时，何等美好！”

休·拉蒂默做事从不三心二意。他一旦不再对天主教狂热，就立即成为火热的更正教人士，献上自己的身体、灵魂和思想，用于做善工。他与比尔尼一起探访病人和囚犯，开始在大学讲坛以剑桥前所未有的方式讲道，很快成为当时最引人注目、最有力的传道人之一，声名鹊起。他鼓舞了千百听众研究《圣经》，寻求救恩之道。后来成为克兰麦随扈教士的贝肯，还有后来成为里德利随扈教士的布拉德福德，都因他的讲道而重生得救。贝肯精彩地描述了他讲道的效果：“除了硬着颈项，心未受割礼的人之外，没人离开时会不感动得深深地厌恶罪、渴慕敬虔和美德。”

我们凭各种经验可想而知，这样的忠信事工会遇到什么样的结果。拉蒂默遭遇了疯狂的迫害。当拉蒂默还是罗马天主教徒，背十字架时，有许多修士和博士倾慕他，当他像圣保罗那样传讲十字架的福音时，这些人群起而攻之。伊利主教禁止他再在剑桥大学的任何讲台讲道。如不是因为巴恩斯博士允许他在奥古斯丁修会的教堂里讲道，因这里主教管不到，他也只能沉默了。但敌人的怨恨并未就此止步。对他的抗议递交到了沃尔西枢机面前，他不止一次站在沃尔西和伦敦主教佟斯托面前面对异端罪的指控。其实，考虑到当时的形势，拉蒂默在这一时期没有遭遇比尔尼那样的命运，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可以说

非常的奇妙。

但我们的时间是掌管在主的手里，他还要让拉蒂默做更多的事工，所以在高层给他兴起了意想不到的朋友。他对亨利八世同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案的决定性意见使得他同国王的医生巴茨博士有了交往，并最终使他取得国王本人的青睐。1530年，他成为王室教士，多次给国王讲道。1531年，王室的青睐使他在威尔特郡奇彭纳姆附近的西京顿获得了一个职位，尽管巴茨博士挽留他，他还是立即离开宫廷，前去任职。

在西京顿，拉蒂默也跟在剑桥后期一样行事，而魔鬼在威尔特郡也像在大学里那样卖力地反对他。他做了大量牧养的工作，无论得时不得时都坚持讲道，既在教区内也在教区外。凭借剑桥大学的文凭，他有完全的权威讲道。但他做得越多，西京顿一带闲散的天主教教士就越是恼火，竭力阻止他的事工。确实，人性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样。粗野的牧师总的说来都尸位素餐，自己不做什么有益的事，也不喜欢别人替自己做。法利赛人如此：“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法利赛人的时候怎么样，拉蒂默的时代也同样。

布里斯托的市长和法官对他很友好，有次让他在复活节给他们讲道。这事引起了公众注意，人人都愉快地期待着这场讲

道，因为拉蒂默在布里斯托很受欢迎。突然，主教下令任何人未经他同意不得在布里斯托讲道。当地的教士知道拉蒂默没有得到许可，等着他，告诉了他主教的命令，然后说“他们非常遗憾，无法因他精彩的演讲而得享快乐”。不幸，他们虚伪的歉意和遗憾生不逢时。拉蒂默听了整件事的缘由，明白就是这些口蜜腹剑的家伙写信让主教下令阻止他讲道。

担任西京顿教区牧师的四年时间里，拉蒂默不断遭到卑鄙的攻击，试图阻止他做善工。他被召去伦敦面见坎特伯雷大主教瓦汉，逗留了好几个月。教会也曾召集会议审查他，将他革除教籍，下监了一阵。但神的看顾保护总是伴随着他。敌人似乎不可思议地受限，无法将他们的怨毒付诸极端行动。最后，1535年，国王任命他为伍斯特主教，仇敌的迫害就猛然停止了。这样的人竟然作出如此任命，实在太奇妙了。有些人将此归因于克伦威尔大人的影响，有人则认为是王后安妮·博林的主意，有人归功于巴茨博士，还有人说是老朋友克兰麦发挥了作用。说实话，这些推断没有价值。“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坵沟的水随意流转。”若神要让好人身居高位，他一定能兴起一个大流士来实现。

拉蒂默的主教经历短暂简单，只持续了四年。不管是在主教官邸，在乡村牧师住宅，还是在剑桥的讲台上，他都始终

如一。升职并未能腐化他。主教法冠无法熄灭他对福音的热心。他一直信实，一心一意，关心他父的事，为造就灵魂而劳累。历史学家福克斯给予他高度评价，说“他辛劳、钻研，时刻准备着教导、讲道、劝勉、探访、纠正人的错误、进行改革，一直小心翼翼，既尽了自己的能力，又兼顾了时代的承受能力”。但福克斯又说：“那是非常危险、变化无常的年代，他不可能什么事都按自己的意愿来。不过，只要他能做的，都竭力去做，因此，尽管他不能完全熄灭旧时迷信残留的火花，却仍努力做工，即使无法除去这些残留，但他以损害最小，益处最大的方式来使用之。”

1536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麦任命拉蒂默主教在教士大会上讲道。无疑这一任命经过了深思熟虑。克兰麦很清楚拉蒂默正是这一场合的不二人选。他的讲稿存留下来了，完全证明大主教的主意是正确的。有两份信实且触动良心的讲章很可能从未交给全体神职人员过目。这两份讲章应该细读。拉蒂默在其中一处地方说：“弟兄和神甫们好，鉴于我们在此聚集，那么为了神的爱，让我们做些什么，以便显出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已经被视为世界之子了，所以得做些什么，免得人以为我们仍旧如是。人都称我们为高级教士，那么既然一起开会，就让我们约束自己，让我们的作为与高级教士的荣誉和尊严相称，

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圣洁、仁慈、殷勤和诚心上也像高级教士。”

“抬起头来，弟兄们，用心观察，看看英国国教还有哪些需要改革的地方。你们已经看到教士和信众都有许多恶习，那么这是不是一件极为艰巨又极其重要的事呢？”随后他提及了一些显眼的恶事：宗教法庭和主教法院的状况、迷信的仪式和假日之多、崇拜塑像和朝拜圣物和圣徒、虚假的神迹和销售弥撒，呼吁到会的众人考虑如何修正。他严肃地警告，如果主教们忽略那些臭名昭著的恶事会造成何种结果，以此作为结束——

“神会来，神会来。他不会耽延。我们不寻求他的那天，他会来；他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会来把我们撕碎，会来报应我们这些伪君子。他会让我们哀哭切齿，弟兄们！这就是给世界所爱的儿女预备的份，就是给世俗的高级教士提供的圣饼和甜点——哀哭切齿。”“弟兄们，你们看，如果你们是俗人，会面临怎样的悲哀和刑罚啊！如果你们不想苦恼，那就不要做今世之子。如果你们不想做今世之子，不想因爱慕世俗之物而受责打，就不要倚靠世俗之物。如果你们不想永死，就不要世俗地生活。来吧，去吧，不要再爱慕财利，为基督的荣耀，为他的益处而学习吧。要在会议中寻求与基督有关的事，实行讨基督喜悦的事。要温柔地殷勤喂养基督的羊群，真实地传讲神的道。要爱光，行在光明中，在今世要作光明之子，那样你们就

会在来世与父、子、圣灵一同发光，明亮如星辰。”这就是拉蒂默在大会上的证道。

1537年，拉蒂默任职于神学委员会，着手出版一本展示真理的书，取得的成果就是《基督教信徒守则》。同年，他向伍斯特女修道院的院长下达了几道命令——这个修道院当时还没解散——首先就是要求院长放一整本英语《圣经》在教堂里。他还命令女修道院的每个成员都要有一本英文《新约》。他也指示，修道院里每天都要读一篇《圣经》讲座，午饭和晚饭时都要读《圣经》。不久，他又向主教区内的教士发布命令，要求每个人都要有一本《圣经》，或者至少有一本《新约》，每天都至少研读一章。他也禁止教士们用任何方式的仪式或游行来取代讲道，并劝他们在各自的教区里教导孩童。这些琐碎的事实都具有深深的指导意义，显明了亨利八世时代一个英格兰主教区是怎么样一个肮脏的畜栏，一名进行改革的主教要克服怎样巨大的困难。

1538年，拉蒂默请求克伦威尔大人不要完全关闭大马尔吴恩修道院。他建议保留，“不是为了修行，断乎不是”，而是“为了教导、讲道、研经和祷告”。他认为在每个郡都保留了两三个从前的修道院建筑用于上述目的，或许是个不错的政策。这是个睿智的主意，对国家的需要大有远见。如果实行的话，

杜伦、圣比斯、圣艾旦、兰彼得、伦敦国王学院和伦敦神学院等院校就没有必要设立了。但亨利八世的侍臣非常贪婪，想占有封禁的修道院的财富，所以拉蒂默的建议没有实行。

1539年，拉蒂默的主教生涯结束，因为前面提到过的《六条信纲》颁布，强令推行一些罗马教核心教条。他奋力反对通过这一法案，站到了国王和议会的对立面。结果，他被迫放弃主教职位。据说，那一天，他从上院回到住处，脱下道袍，欢喜雀跃地告诉旁边的人，他发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轻松。

接下来的八年里，拉蒂默似乎不得不沉默，处于退休状态。关于他这段时间的作为，几乎没有记载，不知道这段日子他在哪儿度过，有没有回到西京顿的旧居。有可能，他被视为危险的可疑分子，谋生都挺困难。只有一件事我们很清楚，即最后他被当做异端下狱，在伦敦塔中度过了亨利八世在位的最后一年。

1547年，爱德华六世登基，拉蒂默立即获释，备受尊重。他可以回到伍斯特主教的老位置，并且下院还致信护国公萨默赛特，热切请求让拉蒂默出山。但他年纪老迈，身体日渐虚弱，所以拒绝了这份尊荣，接下来的六年里无官一身轻。但显然他不会无所事事。这六年里，他主要跟老战友克兰麦大主教在一起，住在兰柏宫。在这里，他参与制定了所有推进更正教宗教

改革的措施，协助克兰麦编纂了第一部讲道集。他也是受命改革《教会法》的神学家之一，不过这项工作未能完成。这段时间，通常他每个主日都讲道两次。在爱德华六世在位的前半段，他一直给国王讲道；后半段，他在英格兰内陆，尤其是林肯郡，四处奔走，哪里最需要他服侍，他就在那里讲道。也许这段日子是他一生最有益的阶段。没有哪个改教家像拉蒂默那样，可能在中产阶级和底层群众中广泛且有效地撒下纯正更正教教义的种子。小骚塞先生对此见证道：“拉蒂默的讲道对宗教改革的促进作用甚于其他任何人。”

1553年，爱德华六世的早夭，玛丽女王的继位让拉蒂默积极的福音事工走到了尽头。此后，他奉召要以受难，而非做工，来荣耀基督。他的受难，他忍受折磨时的崇高勇气，都精彩地记在福克斯的《殉道史》里面——今时所有教友都应该学习这本书。

玛丽女王一上台，首批行动之一就是逮捕英格兰改教领袖，第一道逮捕令中就有拉蒂默的名字。女王的使者到来时，他正在沃里克郡传道，但已经做好了下监的准备。使者抵达前六个小时，就有个叫凯尔里斯的好心人报信给他，所以他可以轻易地逃脱。但他没有逃，而是说：“既然我王召我去陈明我信奉的教义，那么我甘愿去伦敦，就像从前我去世界上任何地方一

样。神既让我在两位尊贵的王面前传讲他的道，那么我不怀疑他能让我向第三位见证同样的真道。”心怀这样的想法，他快乐地骑马去伦敦，经过烧死异端的史密斯菲尔德时，他说：“史密斯菲尔德已经为我呻吟很久了。”

拉蒂默立即与克兰麦、里德利和布拉德福德一起被投入伦敦塔，因为房间不够，四个人挤在一间囚室里。用拉蒂默的话来说，这四位殉道者在这里“一起通读了《新约》，潜心研究”，一致同意里面找不到丝毫化质说的迹象。1554年，三位主教被解去牛津，1555年，拉蒂默和里德利被当作顽固的异端活活烧死在那里。

老主教拉蒂默在狱中的表现配得上他此前的人生。两年之久，他从未失魂落魄，从未失去信心和忍耐，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圣经》。他自己说：“在狱中我读了七遍《新约》。”他还花了很多时间来祷告。他忠诚的仆人奥古斯丁·伯讷说，他常常跪着祷告太久，以至于没有别人帮助就起不来。当时他特别为三件事祷告。其一，既然神命他传讲、教导神的道，就求神赐他恩典，让他能够持守真理一直到死。其二，求神怜悯，再次在这个国家复兴基督的福音，他常常重复“再次”两字。其三，求神保守伊丽莎白公主，让她成为英格兰的安慰者。结果很显然，他求告的这三件事都完全成就了。

面对罗马天主教加害者的审讯，拉蒂默的做法在某些方面比其他殉道者要更加明智。他知道自己难免一死，也知道自己完全正确。教皇一党的温彻斯特主教加德纳已经公开放话，他会用斧子从树根开始砍——主教和最有力的传道人一定要死。教皇一党的伦敦主教邦纳说：“要是我放过一个异端，愿神让我下场跟他们一样，甚至更甚。”有鉴于此，拉蒂默在审判前告诉里德利，自己什么都不会说：“他们说自由辩论，但他们的论据与他们的祖先一样：‘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有鉴于此，在多次审判中，他只是简单地陈述自己的信仰，其他什么都没有做。他拒绝像克兰麦和里德利那样，就教父的观点进行长长的辩论。他直白地告诉审判者，教父在一些论点上也可能受蒙蔽，他只在他们说得对，有《圣经》根据时才相信他们！关于教父，没有什么别的评价他的这句话更睿智更正确。

福克斯出色地描述了老人拉蒂默的死，我没法做得更好，只有近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他的话。我肯定不会加上自己的话，不过必须进行相当多的精简。

“行刑的地方（福克斯说）位于牛津北侧，正对着巴利奥尔学院的沟里。因为害怕出现骚乱阻碍点火行刑，女王下旨让威廉姆斯勋爵和城里的官吏全副武装前去协助。预备就绪后，

1555年10月16日，犯人一起被押了出来。

“里德利走在前面，穿着黑色皮袍，就像他当主教时惯常的那样。他身后是拉蒂默，穿着寒酸的布里斯托粗呢长袍，十分破旧，头上戴着束带帽，包着头巾，紧身裤外包着长长的新寿衣，一直到脚。

“里德利扭头向后，看到拉蒂默跟着，就说：‘啊，你也在这里？’‘是的！’拉蒂默长老说，‘我就紧跟着你。’最后，他们相继走向火刑柱。里德利先进刑场，热切地紧握双手，举目望天。少顷，看到拉蒂默来了，就跑去拥抱亲吻他，说：

‘弟兄，应该带着好心情，因为神要么会减轻火焰的暴虐，要么会刚强我们，叫我们能经受得住。’

“他一边说一边走向火刑柱，跪下亲吻，并祷告。他身后的拉蒂默也跪下，恳切地呼求。他们起身后，相互说了几句，但他们说了什么，福克斯没有找到听到的人。

“然后，他们被迫听一个叛徒神甫史密斯的讲道，经文是‘我若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他们想要反驳这糟糕的讲演中的错谬，但没有得到允许。里德利说：

‘好吧，那就把我的案件呈交给全能的神，他会不偏不倚地判断万事。’拉蒂默补充道：‘在他面前没有什么隐藏得住，都要显出来。’并说：‘如果他容许的话，他会充分地回答史密

斯。’

“之后，刽子手命令他们准备立即受刑，他们温和地遵从了。里德利把随身衣物送给站在旁边的人，就是只拿到他身上一片破布的人都很幸福。拉蒂默没有给出什么，只是静静地任凭卫兵脱下他的紧身裤和其他衣物，他穿得太寒碜了。现在脱到寿衣了，旁边的人却觉得他十分悦目。尽管穿着衣服时，他看起来像个憔悴的驼背老人，现在却站得笔直。

“铁匠拿一根铁链把里德利和拉蒂默拦腰捆在同一根火刑柱上。钉钉子时，里德利拿起铁链，对铁匠说：‘好朋友，用力钉，因为肉体将要走向终结了。’两人脖子上都绑上了一袋火药，周围堆着柴薪，行刑准备完毕了。

“刽子手拿来一根点着的柴，放到里德利脚下，于是拉蒂默对他说：‘当大得安慰，里德利弟兄，借着神的恩典，我们今天将在英格兰点燃一支蜡烛，我相信永远不会熄灭。’

“火烧起来了，里德利看到火苗向他蹿来，就大声呼喊：‘主啊，我把灵魂交在你手里，求主收纳我的灵魂！’并一再重复后半句。拉蒂默在火刑柱另一边激烈地喊道：‘天父，收纳我的灵魂吧！’他任凭火焰烧来，好像在拥抱火苗一样。然后，他以双手抹脸，好像是在用一点儿火洗脸。很快，他就死了，似乎没有什么痛苦。”

福克斯说：“拉蒂默主教这位蒙福的老神仆一生就此结束了。因他辛劳的侍奉、果实累累的人生和坚定的受难，整个国家都应该向全能的神献上极大的感谢。”

拉蒂默一辈子没有结婚，我没听说今天有哪家哪户自称与他有关。但他留下的名比儿女更美，所有真正的英格兰更正教信徒都应该以他为荣，直到世界的末了。

富勒说：“所有玛丽时代的殉道者中，菲尔波特是出身最好的绅士，里德利主教是知识最渊博的学者，布拉德福德是最圣洁虔诚的人，克兰麦大主教最温柔、脾气最好，胡珀主教性格最严厉，泰勒博士最风趣，但拉蒂默拥有最朴实无华的心。”

现在我要开始论述拉蒂默的观点。上文已经简略地论述了他的生平，读者肯定觉察到了，有好些事我落下了，并没有讲述。

我会集中讲论这位好人的讲道。很可能绝少有人向讲英语的会众讲道的效果超过他。无疑，他留下的证道不适合当代的口味，有太多离奇古怪的粗鄙之事，过于随便、凌乱无章、东拉西扯，经常充满了闲杂的故事。但毕竟，今日的我们可不好评判证道应当是什么样子。当代的证道往往是中规中矩、不得要领的宗教散文，充满了斟酌再三的圆滑句子、庄重的英语、单调的老生常谈、畏首畏脚的观点，精心地把奶和水混在一起。这样的剑太钝，既没有剑尖也没有剑刃。是件沉重的武器，不

太可能发挥作用。但如果讲道意味着把纯正的福音教义、平实的撒克逊语言、勇敢、生动、直截了当和简单明了这些特点结合在一起，那么我想，绝少有人能比肩拉蒂默。

我可以提供许多证据证明他作为牧师勇敢又忠贞。他不会吝于指责任何人的罪，就算他是国王也一样。亨利八世阻止《圣经》传播时，拉蒂默写了一封开门见山的信给他。那是他当上主教以前很久。在信里，他抗议国王的这一举动。他只敬畏神，此外一无所惧。在一篇证道中，他这样开场：“拉蒂默，拉蒂默，你要在高贵强大的亨利八世国王面前讲话了，要是他想，就能取你性命。当心你口中的话。但拉蒂默，拉蒂默，也要记住，你是要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面前讲话。当心，不要令他不悦。”

我要说说他不爱世界的品格。他为了良心的缘故，放弃了收入丰厚的主教职位，退下来过平民生活，毫无怨言。后来，当他又可以重任原职，本应该接受时，他拒绝了，因为认为自己太老，无法尽职。我要说说他发自内心的真友善。他一直是穷人和伤心人的朋友。在兰柏宫时，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审查求他帮助的人递交的案件。我也要说说他的勤勉。在他人生的结尾，他仍每天凌晨两点起床，研读《圣经》。要是我进一步深入，还能讲述更多他的美德。

不过，我相信，以上事实已经足以让人清楚他的为人。我相信读者会赞同我的观点，他是这个国家出现过的最好的主教之一，如果英国国教有更多的主教像拉蒂默一样，那该有多好啊！

考察他的生平时，不要忘了，关于神的恩典能产生怎样的神迹，他就是一个光辉的实例。圣灵能让一个偏执狂热的教皇拥趸降服，成为忠信的更正教信徒。主的手在哪里作工，那里就没有难成的事。绝不要以为哪个朋友、亲戚或同伴太敌对福音，无法成为真基督徒。绝不要这么想！在福音面前，没有毫无盼望的情形。想想拉蒂默，不要绝望。

不管以上话题多么有趣，我也要转而论及一个今日倍加重要的话题，即拉蒂默的神学观。我认为值得花时间在上面，因为现今我们生活的形势使得这一主题更显重要。

当今时代，对英国国教的教义，有时出现了一些非常古怪的论调。不断有关于信仰的原则、称义、重生、成圣和讲道的半天主教观点出来抢夺会众的注意力，而拥护、教导这些观点的人厚颜无耻地妄称只有他们才是正统教士。

拒绝这些半天主教观点的人质问其拥护者，要他们拿出《圣经》根据时，却没有结果。他们立刻就会拿出预备好的回答，即，不管这些观点有没有《圣经》根据，也无疑是“教会观点”。

即便我们反驳说，老老实实、前后一贯地看的话，英国国教的《信纲》、《礼拜仪式》和《讲道文》中并没有这样的观点，也不起作用。他们平静地说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愚蠢！我们愚钝！我们瞎眼！我们无知！我们不懂平白的英语！他们才是真君子！他们的观点才是“教会观点”。如果我们不同意，就一定错了！简言之，我们只能得出结论，如果我们诚实且言行一致，就该离开亲爱的老教会，将其放弃，留给极端的礼仪派。所有眼光明亮，注意到今时这些征兆的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事。因此我想读者会清楚，我所说的正发生在这片土地的各个角落。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那我们就看看，追溯三百年前的事，是否能就这个问题启发我们。我们来看看立下英国国教根基的人看法如何，是这些名声不佳的先辈制定了信纲、讲道文和祈祷词。我们让拉蒂默来见证，看看他对今日的争端持何种看法。他是英国国教的教义最初成形之时，教会引以为荣的会友；是克兰麦大主教亲近的朋友和智囊；他协助编纂了第一本讲道文；同时代的人一刻也没有质疑过他作为主教的正统性，没有质疑他的纯正；倘若有哪个人知晓真正的教士应该持守些什么，那么拉蒂默主教绝对就是这个人。如果他的观点都不是真正的“教会”观点，那我不知道谁的才算得上。

请读者容我花上一点时间，摘录一些拉蒂默的文稿。我明

白引用古人的话很令人厌倦，少有人会去看。但我希望英格兰的国教信徒知晓今日的重要问题，即谁是真正的国教成员，谁不是。

首先，拉蒂默主教对《圣经》看法如何呢？这个问题关系到真信仰能否存在。今天，有些教士说，尽管有《六条信纲》支持，但“唯独《圣经》”并不是信仰的原则，不能使人明白真理以致得救。不！必须说是《圣经》和教父，或《圣经》与大公教会传统，或《圣经》与教会，或《礼拜仪式》对《圣经》的解读，或由神职人员对《圣经》的解读，但不是唯独《圣经》。现在来听听拉蒂默主教怎么说。

在给爱德华六世的一篇讲道中，他说：“我得告诉您本国的一位主教曾对我讲过的话。他请我去，并惊讶我竟不满足于业已立定的传统。我回答他说，我只受神的书管辖，宁愿五马分尸也不愿偏离其中的一丁点内容。我冒险在同他的交通中提到主的晚餐。‘住嘴！’主教说，‘你把主的晚餐叫做什么？这是什么新词？’他旁边站着的达伯博士也不时插嘴，说博士们很少使用这个词。我则答道，就算所有博士都站在他们一边，我也宁愿遵循保罗的用词，而不是他们的传统。”

他在同里德利的谈话中也说：“敬畏神的平信徒比任何傲慢自大的神甫更适合明白《圣经》，甚至比主教本人也更适合，

尽管他在天主教层级中地位尊贵。教父怎么说呢？如何看待他们呢？圣奥古斯丁答出了这条原则——我们不能因为他们这么说了，就认为是对的，他们在个人的圣洁和学识上绝没有过人之处；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的说法有《圣经》正典的根据，或者有正当的理由。什么是正当理由呢？我认为就是恰当有序地收集汇总起来的《圣经》教导。

“任凭教皇一党跟从自己的悠长信仰吧。你们满足于简短的圣徒信仰即可，这信仰是神的话语启示给我们的。同所有罗马天主教的幻想说再见吧。阿们！因为人若有了《圣经》和正确的理性，凭他一人，就比成千上万集结在一起、前赴后继的教皇一党，更值得尊重。教父们留下的有香花，有毒草，而罗马天主教通常只要毒草，抛弃鲜花。”

我无须对以上援引的话作出评述，这些话本身已经够清楚了。

其次，来看看拉蒂默主教对因信称义看法如何。路德恰如其分地称这条教义是衡量一间教会是站稳还是跌倒堕落的标准。尽管这条教义在英国国教的信纲第十一条写得清清楚楚，但很多人却试图将其同洗礼、圣餐、我们自己的行为还有其他我不知道的一些东西搅在一起，模糊这条教义。现在来听听拉蒂默主教的话吧。

在林肯郡格里姆斯托普的一场讲道中，他说：“基督称所有信他，把倚靠、盼望和信赖都寄托在他那里的人为义，认为他们在神面前是圣洁的，可蒙接纳。他借着受难，让凡信靠他的人，都被他称为义，就好像他们从未犯过罪，好像他们遵守了全部律法。因为我们若没有他，就处在律法的诅咒之下，律法定我们的罪，不能帮助我们。是我们自己不完全而非律法。律法本是圣洁美好的，我们却无法遵从，因此被定罪。但基督以自己的死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诅咒。他使我们得自由，应许信他的人就不灭亡，律法不再定我们的罪。因此，我们要寻求相信基督。让我们把盼望、倚靠和信赖都只放在他身上。让我们不要替他加添什么，因为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们的德行不配得永生。对人来说，永生太宝贵，只能是他的作为。神把他赐给我们作救赎主，给我们永远的生命。”

他又在另一场证道中说：“记住，要憎恶教皇一党最可憎最危险的毒药，这毒药想要剥夺基督的职分。要学会离开罗马教，只抓住神的话语，他教导我们，基督不仅会施行审判，也会让人称义，而且还会赐下救恩，除去罪。他痛苦地死去，藉此买赎了我们的救恩，我们相信他就可以领受这救恩，正如圣保罗教导我们的：‘就白白地称义。’圣保罗的这话表明，在称义这件事上，所有的德行和行为都没有作用。因为假使称义

是出于我们行为的缘故，那么就不是白白的，但圣保罗说是白白的啊。你们是要相信圣保罗还是教皇一党呢？”

还有一场证道中，他再次说：“唯独基督，除他以外再无别人，能为凡信的人带来赦罪、称义和永恒的福乐。不信的，就得不到。因为只要信就得着，再无他法。”

我再说一次，以上内容无须我评述，本身已经足够了。

再次，拉蒂默主教对重生怎么看呢？你们都知道，这是近日一个极富争议的题目。尽管信纲第十七条和普通主日讲道文写得很清楚，但大批教士仍坚持所有受洗之人都必定重生了，在受洗的一刹那就受了恩典和圣灵。简言之，他们说，不管男、女、孩童，只要受洗了，就是得到重生了，因而英国国教的每一群会众都可以算作重生之人。但我们听听拉蒂默主教的看法。

他在林肯郡的一场证道中说：“有两种人，一种没被称义，没有重生，并没有得救，即他们没有得到圣灵的更新，或者重生。他们没有来就基督。”一次给爱德华六世讲道时，他说：“基督说，人若不从上头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必须重生。那么重生是什么呢？不是像某些煽动家的解释那样，在水里受洗就成了基督徒，这毫无价值。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呢？圣彼得表明，一处经文可以澄清另一处。联系语境，查考多处经文，才能弄清《圣经》。彼得说，我们要重生，怎样重生呢？”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什么是不能坏的种子呢？借着那位活神的道——借着公开传讲出来的神的话语。由此我们的新生才会到来。”另一场在林肯郡的证道中，他说：“讲道是神的方式，藉此他在我们心里生发信心。我们的救主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但重生如何到来呢？圣彼得说，要借着聆听并信从神的话语。”

我得再次说明，这些话已经很清楚，无须我评述。

另外，拉蒂默主教对圣餐有什么看法呢？关于这个题目，我必须严厉地说，今日经常教导的教义极其不符合更正教信仰。我们周围有些人面对着信纲第二十八条，却把关于这项圣礼的教义说得跟天主教化质说或者弥撒献祭没什么区别了。看看拉蒂默主教的意见吧。

在牛津的辩论中，他说：“在圣礼中，基督只有属灵的临在，此外没有以其他方式临在。如果我们坚守在真福音里的话，属灵的临在已经足以让基督徒得到永生，借着属灵的临在，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这种临在可以说是真实的临在，因为对忠信的信徒而言，基督真实、属灵的身体临到现场了。”在这场辩论中，他还说：“基督从没说过关于献祭、弥撒的话，也没有应许参与者任何奖赏，这些人若不快快悔改，就只能是与魔鬼及其使者一路的偶像崇拜者。因此，司铎献祭应当永远

停止，因为现在所有人都应该献上身体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圣餐是为了提醒我们感恩，借着传讲福音激发我们纪念他的死，直等到他来。”最后，他说：“饼和酒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只有无处不在的神能成就，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饼就尊贵地代表了基督的身体。但饼仍是饼，酒仍是酒。因为改变的并不是本质而是尊贵。”他在林肯郡的一篇证道中说：

“无论何人，只要按照基督的典章合宜地吃了奥秘的饼，喝了奥秘的杯，从属灵上看就诚然领受了基督真实的身体和血，这是最能安慰这人灵魂的事。他用灵魂的口吃了基督的身体并用灵魂的胃消化了。简言之，任何相信基督，把盼望、倚靠和信赖都放在他身上的人，就吃喝他的身体了。因为吃下去得永生，是属灵的吃，不是肉体的吃。”

我得再次说明，这些话已经很清楚，无须我评述。

类似的话拉蒂默讲过很多，愿意的话可以无休无止地引述。几乎没有哪项今日的争议话题，从拉蒂默主教那里找不到清楚、符合圣经、明智又纯正的意见。

读者想知道他对于讲道怎么看吗？他是否像今日的某些人一样，轻看讲道，视之为次于圣礼和聚会的蒙恩方式呢？不，他没有这样想！他称讲道为“带来救恩的职分，带来重生的职分”。他说：“没有讲道，就没有救恩。”“讲道的职分是神

命定用以拯救我们的唯一普通途径。坚持讲道吧，因为我不知道还有别的方法。”他又澄清：“魔鬼对讲道的抵挡是最激烈的，绞尽脑汁想要诋毁这一职分，竭尽全力地卖力攻击。它已经制造了不讲道的高级教士，并激动他们成群结队以异端的罪名迫害这一职分。”

读者想听听他对教堂里华丽的仪式和蜡烛怎么看吗？他直白地说这些东西来自那恶者。“魔鬼住在哪里，在哪里耕作，哪里就挪走书籍，摆上蜡烛；拿走圣经，摆上珠子；没了福音之光，有了蜡烛之光，没错，甚至在正午。魔鬼住在哪儿，要想得胜，就要弄来所有的迷信和偶像崇拜，烧香、画像、烛台、棕榈枝、白蜡树、圣水以及人发明的新敬拜方法。”

读者想知道他对外国改教家怎么看吗？他是否像今日的某些人那样，因为他们不保留主教制，就轻看他们？不，他绝对不是这样！他说：“我听说伟大的教士墨兰顿要来了，真希望能给他每年两百磅。国王从不愿意花这钱。我们中间已经有两位大学问家彼得·马特尔和伯纳德·奥金了，只花了一百马克。真希望国王在这类事上花一千磅。”

读者想知道他对合一的看法吗？他是不是像现在的某些人那样，认为这是唯一的需要，为此可以牺牲一切？不，绝不！他说：“合一必须与神的话语相称，否则争战比和睦还要好些。

绝不能把合一看得太高，以至于为此离弃真道。”

读者想知道他对召集会议怎么看吗？我们周围有人哭喊着：“快点召集宗教会议，要不我们就会死掉。”他是否像这些人一样，把开会当成万能灵药来解决所有教会的罪恶？他对里德利说：“至于大小会议，请你按自己的经验想想我们国家的议会和大会。我花了多少时间来使《六条信纲》获得通过，后来就花了多少时间来撤销之。现在这份信纲又要复辟了。哎，真是变幻不定啊！”在另一地方，他也说：“一个领受了神圣洁话语的人，相比一万没有神话语的人，更值得信赖。与神的话语一致，就该接受；不一致，就算开会决定了，也不能接受。”

读者想知道对于“更正教讲道需精益求精”这一看法，他持何种态度吗？他是否像现在某些人那样，认为如果一场证道包含了许多真理，就可以容许在教义上稍微出一点错呢？不，他绝不这样认为！他说：“许多人传讲神的话语，能传讲非常优秀敬虔的证道，但最后他们却为了自己的名利和荣誉，留下了一块漂白过的褐斑，加入了一小块罗马天主教的补丁。他们把神的方法与人的方法混在一起了，成了大杂烩，就好比我们国家喂猪的人。”

我不会再多引述什么了，尽管要引述的话很容易。从没有研究过帕克协会出版的《拉蒂默全集》的人，意识不到自己损

失有多大。这里面的财富多得惊人，都是锐利的更正教真理。我只有请读者牢记上文引述的话，以及这些话是在什么时候讲的。

这些话不是去年才说的，不是出自现代的福音派教士或非国教人士之口，不是出自切尔西的帕克教堂、波特曼教堂、洛克教堂或贝尔格拉夫教堂的牧师，或者埃克赛特会堂的讲员。不，我所引述的这些话是三百年前的，出自英国国教曾经拥有的最出色的主教之一。他曾帮助制定了第一本讲道文，是克兰麦大主教的朋友和顾问。国王和议会都乐意尊敬他。

为何说这些话的人没被逐出英国国教？为何他没遭斥责？为何没人辱骂他的观点下劣，不像教士？为何他没有因为自己的观点遭到攻击和迫害？怎么迫害他的只有教皇一党，更正教信徒却一直尊敬他呢？怎么邦纳、加德纳和血腥玛丽迫害他，但克兰麦、里德利和爱德华六世却尊敬他？

答案很明显。三百年前，没人会怀疑拉蒂默的观点是英国国教的真实观点。我还可以进一步肯定，今日英国国教最真诚的优秀会友都同好主教拉蒂默观点一致。我要说，要深情地告诉热爱英国国教的人，仅仅因为某些人赞同拉蒂默，不赞同劳德，就说他们并非正统国教信徒，那么这样的指控极不公平，毫无道理。

现在，我要以两条实践的建议结束拉蒂默的传记。

其一，我要热切地劝读者，作为个体，绝不要因为在国教里秉持被称为是福音派的那些观点而羞赧。一方面，不要听从那些目空一切的人，他们想让你相信，如果你不是像他们那样的高级教士，就根本算不上教友。另一方面，别从听那些极度友好的朋友，他们想劝服你，说国教持守罗马教教义，应当立即离开。这些都是古老的伎俩，要当心这两条诡计。

不要因高级教士宣称你们只是被容忍的一派，与他们无关，就被迫离开国教。无疑，你所处的环境允许大幅度的思想自由。但声称持守福音派观点的人是被别人容忍的人，就是在直接侮辱改教家。要如此回应那些人：要是他们忘了拉蒂默和三百年前的事，我们没有忘。让我们说出来，我们并未准备抛弃拉蒂默的教会，以取悦那些想要骑在神的遗产头上作威作福，随心所欲的人。我肯定，如果权力总能胜过正义，拥护拉蒂默的人就会被强力逐出教会，而下院就会疯狂得批准这一行径。要是这样，我肯定被逐出的教友比留下的更好。

也不要因外人哄骗而离开国教，这些人只要能看到实质，很可能也愿意留在国教。有个古老的寓言，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而另一个寓言里，狐狸尾巴被机关夹断了，就试图劝服朋友们说，狐狸没了尾巴更有益处，建议他们也咬掉尾

巴。不要忘了这个寓言的内涵，不要受骗咬掉自己的尾巴。要安心，尽管英国国教有许多错误和缺陷，但成为其会友仍极具殊荣。要思想这些殊荣，别总是盯着那些缺陷。下定决心，不要轻易地丢弃这些殊荣。

首先，绝不要忘了福音派观点不仅是正统的神学，受改教家拥护，而且对于英国国教的存亡至关重要。福音派观点缺失，几乎被人遗忘之时，我们心爱的教会在这个国家里处于最卑贱的状态。而拉蒂默和改教家的观点畅通无阻地传讲出来的时候，教会是那么崇高。绝不要以福音派观点为耻，是否持守这样的观点是关乎你自己生死的问题，你当为此而满意。如果教会清除了拉蒂默的观点，我肯定整个教会面临外部压力时便会轰然倒地。

其二，请读本篇传记的所有英格兰读者当心，不要支持本国任何回归罗马教会的运动，要尽一切可能抵制这样的运动，不管是从哪儿发起的。

我肯定这样的警告正是当今时代急需的。过去几年里，罗马教会又在我们中间重新得力，站起来了。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盼望，即让英格兰，还有地球上其他地方，很快重新回到他们所谓的大公教会势力范围之内，再次盲目顺从梵蒂冈。他们已经成功地使无知的人瞎了眼睛看不到他们的真实特点，成功

地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得到受蒙蔽之人意想不到的支持。环顾四周，已经有数以百计的细微迹象表明危险是多么真实。众人吹捧劳德和不肯宣誓效忠的人，却把拉蒂默和改教家赶下台。历史又在重演，人们赞美血腥玛丽，谴责更正教信徒伊丽莎白。人们渐渐对罗马教徒友好得可怕，对不从国教者恶毒憎恨。对所谓的中世纪品味反常地青睐有加。成千上万的传单在全国上下到处散发，总的说来最突出的三个不详之词就是“神甫”“大公”和“教会”。有人有意地推荐英格兰教会成员使用玫瑰经，进行告解，为死人祷告，说“万福马利亚”。我害怕英格兰人对罗马天主教的尖锐反感会一点一点地钝下来。我当然有足够理由让读者当心罗马教会。

记住当罗马教拥有至上权力之时，让英格兰处在怎样的黑暗之中。记住，在拉蒂默主教年轻时代的英格兰，令人厌恶的无知和可耻的迷信靡然成风。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是古代的事情，不要认为罗马教改变了。特里尔的圣衣^①、里米尼会眨眼的画像、天主教国家的那种思想奴役、迄今仍在圣城上演的臭名昭著的行为，都见证了罗马教相比其掌权时丝毫没有改变。记住，并要当心。

^①特里尔大教堂内藏有一件据称耶稣穿过的长袍。——译注

记住罗马教不受限制地在这个国家横行之时，对真信仰骇人的迫害。记住那些让血腥玛丽的时代蒙羞的恶行，拉蒂默主教遭遇的火刑。一刻也不要以为罗马教改变了。在马德拉，读《圣经》的人仍遭到迫害；在马蒂埃，仍有人被囚。这些都是无误的证据，表明三百年后，罗马教的迫害者精神仍像从前一样强烈。也要记住，并要小心。

面对如许事实，我们还要回到祖先遭受的奴役中吗？我们是不是要放弃《圣经》，或是为了确保神职人员资质的需要才读经？我们要不要卑贱地服从意大利的神甫？要不要把忏悔室和偶像崇拜的弥撒献祭弄回来？断乎不可！那是神禁止的！再说一遍——断乎不可！狗才会把吐出来的又吃掉。任凭被洗涂的母猪回到它的泥潭里吧，任凭傻子般的囚徒回到捆锁中吧。但神禁止以色列人回到埃及！神禁止英格兰重回罗马教的怀抱！神禁止熄灭老拉蒂默点燃的灯！

只要有能力，就让我们每一位都行动起来，阻止这场悲剧。我们要努力在国内国外传播纯正、符合《圣经》、福音派的信仰。要努力在犹太人、罗马天主教徒、外邦人中传扬福音。要尽力在我们的教会里利用所有合法手段保持福音信仰。

如果我们想阻止罗马教的猖獗，就让我们每个人都珍惜所有正统更正教信徒之间的兄弟情谊，不管这些弟兄来自哪个派

别。认为英国国教处于不从国教者和罗马教之间的中庸位置，是二者之间的纽带，这是条古老的垃圾观点。丢掉，因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可以说怀特岛位于英格兰和法国之间。但我们跟罗马教之间是一条鸿沟，又宽又深，而跟正统的更正教不从国教者之间只有一堵薄薄的隔离墙。我们跟罗马教的不同在于基础教义，以及要想得救不可缺少的事，而跟不从国教者之间的分歧只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一个人就算在这些事情上犯了错，仍然可以得救。罗马教是明摆着的敌人，攻击我们信仰的根基。不从国教者应当是盟友，尽管没有穿着我们的制服，我们认为他们并未像我们一样装备齐全，但仍是盟军，在统一战线上并肩战斗。绝不要对此视而不见！愿我们对所有跟我们一样热爱同一位救主，相信同样的教义，尊重同一本《圣经》的人保持友好的兄弟感情。

最后，若我们想阻止罗马教的蔓延，就让我们每个人都祷告。我们要昼夜祷告，祈求神保守这个国家不落入教皇一党的魔爪，不要照这个国家的罪施行惩罚。事实很震撼，好国王爱德华六世临死前在病床上的祷告几乎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我主我神啊，保卫这个国家不受罗马教辖制，持守你真正的信仰。”1549年，祷告文中有一篇启应祷文，许多人从不认为应当删除。“良善的主啊，救我们脱离所有的叛乱和阴谋诡计，

脱离罗马主教的专制，脱离他可憎的恶行，脱离所有虚假的教义和异端，让我们不要心存刚硬，轻视你的话语和诫命！”对这篇祷文，我们一样可以坚定地说：阿们！阿们！



约翰·布拉德福德 (1510~1555)

约翰·布拉德福德

著名的英格兰改教家约翰·布拉德福德作为殉道者的名声要远比他留下的作品要大得多。他在玛丽女王统治时期为了基督的真理而在史密斯菲尔德烈火焚身而亡。他死得十分壮烈，掩盖了他作品的光芒。很少人意识到他留下的作品中蕴藏着的英格兰神学的珍宝有何等丰富。

事情本来不该如此。帕克协会出版的许多优秀文集中，恐怕有好些躺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灰都沾满了还没人打开看过。这些书就像古代的武器一样，对今人的口味而言太沉闷了，就

像伍尔维奇军械库的枪炮一样，只在有需要的特殊场合使用。然而，其中的一些文集，即使是十九世纪的人去精读的话，也会受益匪浅。绝不要忽视拉蒂默、胡珀和杰威尔的作品。我也倾向把布拉德福德的两卷文集与上述三人的作品并列，本章结尾将从中引述部分内容。

介绍一些布拉德福德的生平资料，对于我将要从他作品中提炼出的内容来说，是一份合适的前言。许多人都熟知他的故事了。但在现今这样的日子，唤起人们纪念英格兰宗教改革的捍卫者，可以激发他们去思考。下面我所给出的布拉德福德生平介绍，大部分内容来自奥布雷·汤森德牧师写的布拉德福德传记，帕克协会出版的布拉德福德文集将其作为前言。

约翰·布拉德福德是圣保罗教堂的神职人员，里德利主教的随扈教士。他 1520 年生于曼彻斯特附近的布莱克利，在曼彻斯特文法学校发蒙。福克斯说他“从小就在德行和学识两方面接受了优良的教育，他获得的良好教育赋予他的才华中，最出色的是文笔，对他不仅属于锦上添花的能力，也有助于他谋取必要的生活开支”。兰开斯特郡历史学家贝恩斯也注意到，在曼彻斯特开办的文法学校接受发蒙教育后，布拉德福德精通拉丁文和算术。这所学校是奥尔德汉姆主教创办的，他死于 1519 年。

对这段早年经历，布拉德福德在玛丽时代下监后满怀感情地写道：

“‘我得说，我最应该为父母、老师和其他事情感谢你，是你让我接受了他们的培养。没有谁的笔能描绘我襁褓到如今得到的这些益处。……我估计在我之后会有无数的人受到跟我一样的造就和垂怜，但在我之前真的少有。’

“福克斯说布拉德福德后来‘在拉特兰郡埃克斯顿做了骑士约翰·哈林顿爵士的仆人。此人在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代很有权势，多次出任国王在布伦的兵营和房产的财务官，见识过布拉德福德的文笔和审计才能，同样也知道他忠诚可靠，所以不但派他打理这些事务，而且还把自己的私人营生交给他，重用他超过别人’。尤其是1544年诺福克公爵率领英格兰军队围困蒙特勒伊期间，布拉德福德在约翰·哈林顿爵士手下担任发放军饷的官员。

“三年后，爱德华六世登基之前不久，1547年4月8日，布拉德福德进入内殿律师学院学习普通法。在这里他的性情完全改变。辛普森是他的朋友，律师学院的同学，而且据说神正是借着这人实现了这一转变。二十七年后，辛普森在布拉德福德文集的序言中写道：‘我知道是在何时，并且部分地知道是怎么样，神喜悦借着有效恩召使他的心转向真知识，顺服我们

救主基督至圣的福音。神借着福音让他有了属天的信仰，有了鲜活的体验，所以他后来知道自己的许多罪都赦免了，以行动明确地表明他的爱多。’之前他怎样因天赋与欲望而在世俗之事上得心应手，之后就怎样因对基督的爱和对促进他荣耀福音的热情而改变了人生的方向，像那个妇人一样（《路加福音》第7章），甚至改变了之前的专业，就像保罗改变了自己从前的职业和专业那样。

“‘第一，圣洁有效的恩召感动他的心之后，他卖掉了之前经常穿戴的金手链、戒指、胸针和珠宝，把从前虚空之物的价银用来救济基督里的穷困肢体，就是那些他听说或者知道正贫病交加的人。第二，他以极大的热心和爱心来荣耀主耶稣，他尝过了这位救主的良善和得救之后的美好。’ ‘他无比喜爱借着传讲神的话语扩张神的国，所以全心研读《圣经》。为了更好地实现目的，他离开伦敦的律师学院，去了剑桥大学，学习怎样借着神的律法建造主的殿。’

“在伦敦时，发生了一场意外，让他深感焦虑。他听了著名传道人拉蒂默长老给爱德华六世讲的一场证道，其中恳切地说欺骗来的东西要物归原主。这些话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因为他的主人约翰·哈林顿爵士制造了一场骗局，要欺骗国王，而布拉德福德似乎帮他隐瞒了，‘他不得安宁，直到听从拉蒂默

长老的意见作出补救为止。’ 1555年1月30日，他对加德纳主教说的话表明，在这场骗局中，他不是利益方：‘大人，我保证没有人能正当地说我骗过主人。您是英格兰首席法官，希望您对如此诽谤我的人秉公执法，因为他们没法证实自己的话。’ 如果他骗了政府，就不大可能有胆这么质问。其实，正是因为他的坚决态度，约翰·哈林顿爵士才不得不为骗取的全部财产，在后来的1449~1450年两年里向国王补偿。”

1548年，布拉德福德成为剑桥研究员，先是在凯瑟琳学堂，后来又进了彭布罗克学堂。他描述研究员生涯的信很有趣：“我现在是彭布罗克学堂的研究员了，没人为我做制服。卡凯瑟琳学堂的院长（桑兹）和兼任彭布罗克学堂院长的罗彻斯特主教之间发生了争论，两边都想要我……我的薪资是七磅一年，因此我每星期花十八便士，每年花三十三先令四便士，除了房租、洗衣、理发等以外；我什么都不缺乏，只是每年有一两次遇到问题。你看，我主我神对我多么好。”

“辛普森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时期布拉德福德与神同行的圣洁生活：‘他的做法是，自己列一个清单，写上自己无知的时候犯下的最显而易见、最大的罪，个人祷告的时候就放在眼前，借此激发自己向神悔改，寻求因信在基督里得救的确据，感谢召他脱离邪路，祈求得到恩典能过圣洁生活蒙悦纳。他在私下

的祷告中持续操练良心，如果没有心里感到为罪而哀恸，并因信得到一定的医治，感受到蒙基督拯救后的健全状况，心意改变而恨恶罪，喜爱遵行神良善的旨意……就不认为自己的祷告已经足够。没有这样内在操练的祷告，布拉德福德就不会满足。他往往参加本学堂早晨的公祷，然后与学生在自己的房间里祷告。但他还不满足，结束后还要自己独自操练祷告，就好像这之前的祷告还没有进入自己的心一般。因为他不愿对亲友说：

“我已经跟学生一起祷告过了，但还没有自己祷告。”

“他的另一项操练是做了一份日历，在上边把自己每日所见所闻的显著的事记录下来。但不管有什么见闻，他所写的都反映出自己内心受击打。因为，如果他看到听到任何好人好事，就会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缺乏，然后简短地祷告，渴求得到怜悯和恩典以作出改进。如果他见到听到了什么灾祸和不幸的事，就当作自己的罪造成的而记下，写上‘求主怜恤’。他也在日历中记下自己的恶念，比如嫉妒他人的财物，不感恩的念头，在工作中没有考虑到神，看到他人感动时自己心里刚硬无动于衷。他这样来操练每日悔改。”

在剑桥，布拉德福德与布塞、桑兹和里德利熟悉起来，还担任了后来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惠特吉夫特的导师。1550年，里德利授予他圣职，并向爱德华六世大力引荐，因为他天赋出

众又特别虔诚。不久，国王听了里德利的建议，派往英格兰各地巡回传讲宗教改革教义的六位随扈教士中，就出现了布拉德福德的名字。布拉德福德的任务是在兰开夏郡和柴郡巡回讲道。他似乎以非凡的才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他一直在曼彻斯特、利物浦、博尔顿、伯里、维冈、阿什顿、斯托克波特、米尔顿和切斯特讲道，大大推进了更正教的事工，大大影响了人的灵魂。

“1552 年底，布拉德福德在曼彻斯特讲解挪亚洪水，常常向人们事先警告将要来的那些灾祸。12 月 26 日，圣司提反日，他最后一次与他们在一起，他根据《马太福音》第 23 章讲了一篇非凡的证道。所讲的经文是最后六节，那日的福音。无疑，他选这段经文与他后来郑重传讲的预言般的警告非常契合。当地甚至流传着他在布莱克利的事，乡下人说布拉德福德最后一次到曼彻斯特时，跪下郑重地恳求全能的神。他在施恩宝座前的祈求是让得到属天教导的牧师以智慧和知识喂养群羊，以便使永恒的福音在布莱克利传开，直到末日。他的祷告得到了应允，不断有忠信的人在那里传道，少有间断。

“桑普森告诉我们，‘布拉德福德经常讲道的地方除了伦敦、圣保罗十字架讲坛以及各种各样的乡村场所，特别是兰开夏郡的乡下之外，在爱德华六世在位的最后一年，他还在四旬斋期间基于《诗篇》第二篇给国王讲了一篇道。他在这篇证道

中表明神审判的征兆已经显在轻视福音之人身上：有一些人在安息日坐着一条舢板去巴黎公园玩逗熊，结果都淹死了；有条狗在拉得门叼着一块童尸。他以有力的先知精神说：我召唤你们，尤其是每个孩童，思想神的审判，因为已经迫在眉睫了。结果一语成谶，爱德华国王不久就驾崩了。’也许，约翰·诺克斯在1554年的《敬虔书信》中所说的就是这一场合：‘布拉德福德长老……没有饶过最骄傲的人，大胆地宣布，神的报应很快就要击打当时掌权的人，因为他们憎恶永生神的真道。他希望他们以小萨默赛特公爵为鉴戒，这人对听神的道十分冷淡，被拘捕前一年，他去看自己的石匠，却不愿走过走廊去听一墙之隔的一场证道。“突然之间，神惩罚了他”，这位敬虔的传道人说，你们比他还要邪恶一倍，神会饶过你们吗？不，他不会的。你们愿意与否，都要饮下主的烈怒，审判，审判！主的审判！主的审判！他悲哀地以哀恸的声音，流着眼泪喊道。’

“玛丽在位时，里德利主教在狱中的信说起了布拉德福德、拉蒂默、列维和诺克斯，强有力地见证了他们在给爱德华的廷臣讲话时的勇气和信实：‘他们的口气非常锐利，深深地刺透听众的心肠肺腑，无疑是要将这些人心中心中溃烂发臭的肮脏事清除掉，包括无法满足的贪欲、肮脏下流的淫欲、无法容忍的野心和骄傲、不愿听穷人诉冤且不愿听神话语的不敬虔之心，当

地人及地方长官都无法承受得住。’

“桑普森也着重描述了布拉德福德私生活中的习惯：

“‘与他熟识的人都知道，他跟大伙儿在一起时，经常突然陷入沉思，表情凝重地坐下，内心感动，然后好长时间一言不发。有时，静静地坐着，面颊上就会挂上一串串泪珠。有时他坐下时哭，后来却面带微笑。艾尔兴长老家有许多传道人和主耶稣的仆人敬虔的避难所，我经常在那里跟他坐在一起吃午饭和晚饭，不管是谈话需要，还是说到关于神赐给的益处的观点，抑或是他自己心里想到，他都会陷入这种深深的默想。最后他会告诉我默想的过程，我有时真的看到他热泪盈眶，有时是因喜乐，有时是因悲伤。他不仅自己悔改，还提醒他人悔改，不仅是在公开的讲道中，私下谈话里也一样。人群里只要有他在，不管任何人有什么罪或不端的举动，他都会毫无顾忌地训斥、责备，尤其是针对起誓、污秽的言语和罗马天主教那种唠叨。这样的人绝不会未受责备就离开。他这么做的时候，有属天的恩典和基督徒的威严，甚至能让争强好胜的人闭嘴。因为他说话带着能力，却又亲切悦耳，让人看到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会伤害自己，并明白他努力引他们向神是件好事。’”

爱德华六世驾崩后，布拉德福德传播宗教改革教义的热情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可想而知。玛丽女王登基不到一个月，他

就进了监狱，至死未能出来，一同入狱的还有克兰麦、里德利、拉蒂默和胡珀。他年轻、特别圣洁，是闻名遐迩的传道人，因此在入狱期间，敌人对他极有兴趣，努力想劝他脱离更正教，加入罗马教会。但他们白费心机。他活着时怎样，死的时候也未改变。

1555年1月31日，定罪的判决通过了。起先，当局打算立即把他交给德比伯爵，押去兰开夏郡，在他的出生地曼彻斯特烧死。但当局后来放弃了。罗马教的主教可能因为害怕布拉德福德的朋友（因为他在自己的乡亲那里备受喜爱），也可能是自以为可以压服他的观点，所以把他留在伦敦几个月，频繁地跟他辩论，攻击他。在根据他受审情况编纂的旧版全集里，有一段内容说德比伯爵对他的案子非常感兴趣，（据说）从女王那里讨到了特许，获准拿到他的书，并有充足的时间研究。

行刑的那天，1555年7月1日，早上九点布拉德福德被提出新门监狱，解往史密斯菲尔德，围观的人群多得空前绝后。后来活到九十六岁、1620年才过世的杭尼伍德夫人经常对朋友说，她记得去看布拉德福德受火刑时，她的鞋子都被人群踩掉了，不得不光脚去拉得门山。

福克斯记录的布拉德福德殉道的事迹非常感人，因此在此引述他的原话。

“（6月30日下午）突然，守卫的妻子来了，魂不守舍，似乎非常担忧，气喘吁吁地说：布拉德福德长老啊，有个沉重的消息。‘什么消息？’他问。‘哎呀，’她说，‘明天你肯定就要被烧死了，有人在收购捆绑你的铁链。很快你就得去新门监狱了。’听罢，布拉德福德长老摘下帽子，举目望天，说：‘我为此感谢神。我期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所以现在我并不吃惊，这是我时刻等待的事。主让我配得这事了。’他也感谢了看守的妻子的善意，然后叫朋友一起进入自己的囚室祷告，这朋友在他一来到这里，就悄悄地单独到此很长一段时间了。事毕，他又走向囚室中的那位朋友，交给他一些手稿，交代他这些手稿要怎么处理。整个下午，一直到晚上，他们都在商讨众多各式各样的这类事情，最后又有六位朋友来了，他们整夜都在一起祷告，并有许多有益的操练，非常奇妙。听到看到他所做之事，真是令人惊叹。

“离开康普特前，他为自己的离开作了一场值得注意的祷告，祷告时泪流满面，心灵大受感动，也令听者情不自禁。当他穿上为受刑准备的干净衬衣时（瓦尔特·马拉长老的妻子给他做的，她很照顾他，也是他的好友），为新婚礼服而祷告，令在场的部分人赞赏不已，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侧耳听他祷告。他离开囚室时，也作了类似的祷告，并把钱分给这栋房子里每

个仆人和官员，劝他们敬畏神、事奉神，不断逃避所有形式的罪。然后，他转向墙，热切祷告，祈求主因基督的缘故在这些人里面成就他们对他们所说的话，不要让这些话归于徒然。下面的院子里，所有囚犯都放声大哭，向他道别，其他人则掩面而泣。

“当局在十一点或十二点押他去了新门，因为这时候外面没人，不会出现骚动；但结果与预期的设想相反，齐普赛街，以及其他康普特和新门之间的地方，聚集了大批群众，都来看布拉德福德，特地跟他道别，悲伤流泪为他祷告。他也礼貌地跟他们道别，热烈地为他们及其福祉祷告。押他去新门的命令是来自女王及其臣僚，还是邦纳一伙，抑或只是伦敦市长、参事和治安官的意思，已经无从得知。但夜里城中喧嚣了好几次，人们嚷着，说布拉德福德第二天凌晨四点就要在史密斯菲尔德被烧死了，本来没人会这么早知道的……但……人们阻止了当局可能的企图，因为第二天，7月1日，星期一，就在众口传说的时间凌晨四点，史密斯菲尔德聚集了大批男女群众，许多人赞叹不已，认为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通知如此多的人布拉德福德要受刑的消息，除非是出于全能的神。

“但事情并未如群众所想，直到九点，布拉德福德长老才被押到史密斯菲尔德。在从新门走向刑场的路上，有位他所爱的朋友站在通往守卫家的路旁。布拉德福德长老拉住他的手，

把丝绒晚礼帽、围巾还有其他东西交给他……悄悄谈了一会儿后，就分别了。然后他的姐夫罗杰·贝斯维克来了，刚拉住他的手，伦敦治安官之一伍卓夫就带着人过来，打罗杰的脑袋，血都流到肩膀上了。布拉德福德见状，痛苦地跟姐夫道别，希望他得到母亲和其余的朋友照料，并及时就医。于是他们分开了，没有谈什么话。然后，一大群全副武装的兵丁押着他去了史密斯菲尔德，没有哪个火刑犯享受如此劳师动众的待遇，因为除了火刑柱旁边以外，史密斯菲尔德的每个角落都站满了人。布拉德福德进入刑场，就俯伏在地，悄悄地向全能的神祷告。他俯伏在火刑柱一侧，跟他一起受刑的一位年轻的学徒工约翰·里夫在另一侧，他们卧倒在地，祷告了一分钟。然后一个治安官对布拉德福德长老说：‘起来，结束祷告吧，因为人潮汹涌。’

“听了这话，他们起身，布拉德福德长老拿起一根柴来亲吻，也吻了火刑柱。然后，他请求治安官允许他把衣服留给仆人。因为，他说，我没什么可以给他了，而他家穷。治安官说他的仆人理应得到他的衣服。于是布拉德福德长老脱下衣服，走向火刑柱，举起双手，举目望天，说：‘英格兰，英格兰，为你的罪悔改吧！为你的罪悔改吧！要当心偶像崇拜，当心敌基督者的虚假！小心，别让他们欺骗了你！’说这些话时，治安官下令，如果他不闭嘴，就捆住他的手。‘治安官大人，’布拉

德福德长老说，‘我不说了，愿神赦免你这罪，治安官大人。’有个点火的官员听到布拉德福德长老这样对治安官说话，就说：‘如果你连这都不知道，你那就是个愚昧人，最好闭嘴。’布拉德福德长老没有作答，只是祈求全世界都能得到赦免，他也赦免了全世界，并请众民为他祷告，然后对跟他一同受刑的年轻人说：‘弟兄，应该大感安慰，因为今晚我们就能与主同享欢乐的晚宴了。’后来他再没说什么其他人听得到的话，除了拥抱芦苇捆时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布拉德福德似乎具有某些特别美好、惹人喜爱的品性，超过其他任何改教家。

“富勒评价道：‘显然他脾气很好，因为连绝少对更正教信徒说什么好话的帕森斯都说：他似乎比许多自己的追随者更为温柔。其实他是个至为圣洁、极其克制的人，私下里会为自己的罪饮泣，认为自己再也不会笑了；然后，出现在公众场合，又会非常愉悦，让人认为他此前从未哭泣过。’”

“大家都知道，当他看到作恶者被送去刑场，总会惊叹，而‘因神恩典的缘故，约翰·布拉德福德去了’成了一以贯之的传统，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改变。文宁 1653 年的作品里，热切地表明，看到他人犯罪，人会为自己的罪恶和内心的败坏

而哀哭，布拉德福德就是如此，当他看见任何人酗酒，或听到任何人赌咒发誓，等等，就会伤痛欲绝地说道：主啊，我脑子里在酗酒；主啊，我心里在赌咒发誓。

“福克斯也生动地记述了他的外貌和日常习惯。‘他身材高大精瘦，面色红润，留着红褐色胡子。他每晚睡眠基本不超过四小时，睡着时也手不离书……他勤勉地阅读、祷告，几乎持续了一生。他一天只吃一餐，这一餐分量也不多。他经常跪下祷告，在吃饭时也时常用帽子遮住眼睛默想，经常留下串串泪珠，坠入饭碗里。他对大人小孩都很温和……他主要的休闲不是游戏或其他娱乐，而是与诚实人快乐地交谈，吃完饭后在餐桌上他就会花一点时间来交谈，然后又去祷告、读书。如果他沒有做写作、研读或劝诫他人等有益之事，就会认为没有利用好时间。’”

汤森德先生写的精彩传记结尾的话真实又漂亮，所以我全文摘录如下：

“可以说，他在短短的时间里活出了长长的一生。从他接受圣职到殉道只有短短五年时间，而且其中两年还是在狱中度过的。在那大日，所有人心的秘密显露之前，无法知晓这位虔诚人的劳苦和祷告为英格兰带来了多么大的益处。在英国国教的奠基人之中，显然，他不是能力最小的，也不是学问最小的。

他具有学识、口才、好脾气，对神极其虔诚崇敬，因此能恰当地判断是非。教皇一党非常在意他的价值，为了让他放弃信仰而花的工夫超过其他人。要是爱德华能当英格兰国王久一些，布拉德福德肯定会当上主教。他已经得到众灵魂的伟大主教的提拔。借着他的圣洁生活，他作品中的见证，他仍在说话。借着殉道的火焰，布拉德福德和拉蒂默、克兰麦和里德利，改教后的英国国教四支柱，借着神的恩典在这个国家点亮了一盏永不熄灭的蜡烛。”

布拉德福德留下的文字约有 1100 页，帕克协会出版了两卷 8 开本文集，包括主要的证道、短文、默想、祷告、申辩、劝诫和信件，都非常好，值得一读。要是非让我挑出他作品中特别有益的，我得推荐他的辩论短文集《驳斥几条罗马教义》和《望弥撒的危害》，他关于悔改和圣餐的讲道，他的《论怕死》短论集，他在伦敦、剑桥、兰开夏郡、柴郡等地的道别词。我尤其要推荐他写给朋友的 100 封信。如有人要是读了上文所说的哪部作品，灵里却没有火热起来，他的状况一定不理想。就我而言，布拉德福德的作品不仅符合《圣经》，而且尤为火热、津津有味、温暖人心并且直截了当，在基督徒作品中属于上乘之作。要是他活得更久，写出更多作品，一定会成为对教会的巨大祝福。

我要摘录的第一段布拉德福德作品出自《论怕死》：

“有人会说，先生，如果我确知自己会离开痛苦的今生，进入极大的福乐中，那我才会喜乐，像你希望的那样欢欣，视死亡为益事。但我是个罪人，因此我怕自己会落入永恒的灾祸、毁灭和痛苦。

“弟兄，你承认自己是罪人，应受永死，这很好。无疑，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在神眼中，生在黑暗中的是不洁净的。我们生在罪中，本为可怒之子，为地狱准备的柴火，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是罪人。主耶和華若究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是的，我们都得哭喊：主啊，求你不要开始审判，因为在你眼中，凡有血气的都不能得救。就此而言，承认你是个罪人是件好事。

“但是，你若怀疑罪得赦免，惧怕刑罚，亲爱的弟兄，那么请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想不想得赦免，有没有悔改，如果你能活下去，要不要诚心地改正？如果你甚至也有这样的目标，这样渴慕他的怜悯，那么听着，好弟兄，主对你说：

“惟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記念你的罪恶。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因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你们活着，重生得救。我爱世人，甚至不惜舍了亲爱的儿子、我本体的真相和荣耀所发的光辉。他不仅成为一个

人，也取了你的样式，要洁净你脱离死亡、罪和一切败坏。他不仅自己有不朽坏的生命，永恒的荣耀，也把这些赐给你。因此，现在借着信心，我可以向你保证，你最终会感受到，会喜乐到永远。我赐下这位儿子，为了满足我的公义，他受死，极为羞辱地死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毁灭死亡。因此，只要信，照着你的信心，成了吧。

“听听我的儿子自己怎么对你说吧：‘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得救。’‘我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我不但为我的使徒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他为这些人祷告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就是同你所有的荣耀。’他说：‘我自己分别为圣，为他们献上。’听听，这就是子为你们献上的祷告。

“听听我的使徒保罗怎么说吧：‘我们知道，’他说，‘我们救主基督的祷告蒙了应允’，还有‘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听听他对禁卒说的话吧：‘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他献上自己为我们洗清了罪。彼得说：

‘众先知也为他作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相信他’。祈求说‘主啊，帮助我的不信’，‘主啊，

加添我的信心。’ ‘祈求，就得着。’ 听听使徒约翰的话：‘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所以，‘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 听听基督的名是什么意思吧，天使说：‘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因此‘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

“所以，‘谁能控告我呢？有神赦我无罪了。谁能定我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祈求。’ 因此，要确信你们的罪得赦免，确信永生。不要心里说：‘谁要下到阴间去呢？’ 也就是说不要怀疑你的罪能得到赦免，否则就是干犯基督。也不要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 就是说不要怀疑永远的福乐，否则就是把基督从天堂赶出去。留心主对你们说的话：‘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如果你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能够有这样的确信，那么主说：‘与基督同死的人，我要让他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因此，亲爱的弟兄们，我认为应当奉主的名写信给你们，就是因罪而惧怕死亡的人，叫你们确知罪得赦免。因此，像拥

抱密友一样拥抱死亡吧，让我们羞辱它的恐怖、毒钩和权势，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地狱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没有什么比怀疑主的怜悯更令他不悦了。有两三个人作见证，我们就该满足，那么，你们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那些渴慕主的怜悯的人，没有空手而回的，那么相信他，并像善良的童贞女马利亚那样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我引述的第二段布拉德福德的话出自《别了，兰开夏郡和柴郡》。

“思考自己被定罪的理由，我只能哀叹，不能喜乐。这项判决不仅是对布拉德福德的定罪，也是在定罪基督和他的真理。布拉德福德不过是器皿，他们通过审判我来定罪基督和他的教导。因此，亲爱的，同我一起为我欢欣，欢欣，献上感谢。神允诺赐给我们国家如此大的益处，拣选最不配的人（我）来受苦，承受这种恶毒的刑罚，讨他喜悦。你我遭此刑罚是为他的缘故。阿们！”

“不过，恐怕你们会对我说：‘你为什么会被定罪呢？我们听说你否认圣餐中有基督的临在，认为那只是象征，是普通的饼，没什么特别的。’我所亲爱的啊，人怎么说我，将会怎么说我，我不知道。听说盆德尔顿长老去给你们讲道了，并不

是像他以前声明放弃旧信仰后那样（你们都知道，他传讲的与我来之前他习惯传讲的完全相反），而是声明放弃了已有的信仰。我来之前，我来之时和我被烧死后，他会怎么说我，我不想说太多；因为他那么反复无常，自相矛盾，所以我不认为他会说我的好话，除非能有助于实现他的目的，让他获利。

“其实，我被定为异端，主要原因是因为拒绝祭坛上的圣体，那不是基督的晚餐，完全是谬解（罗马教一党现在将其作为基督的身体和血以饼和酒的形式真实、自然、肉体的临在）。也就是说，因为我否认化质说。这本是魔鬼的宠臣，敌基督信仰的女儿和继承者，藉此弥撒得以维系，基督的晚餐却遭谬解，没有事奉，没有悔改，弃绝了一切真正的敬虔。

“关于主的晚餐，或者说基督的身体和血的圣餐，我承认并相信，就领受者的信心而言，确实有基督全人，真实的临在（但旁观者并非如此），同样饼和酒对领受者而言的确存在。这一信仰，这一教义，也有基督的教会——正遭到教皇的教会迫害——真实的见证，我不会否认。因此我被定为异端，要被烧死。

“但是我所亲爱的啊，我盼望这条真理（我教导过你们，你们也领受了，我相信，确实相信此真理，因而献上生命）永远不会被烧毁，不会受束缚，也不会被压服，而是会得胜，奏

响凯歌，完全自由，不管所有敌手如何想。因为没有什么敌对主的计谋，也没有任何人的诡计能击败人心中的真相，除了那些不信之子，他们不爱真理，因而甘愿信从谎言。我在主里心爱的啊，愿主的慈悲救你们和整个国家脱离这灾，我谦卑地求主怜悯。阿们！”

我引述的第三段话来自 1551 年布拉德福德给贝德福德伯爵法兰西斯·罗素的信：

“大人，你有理由感恩。请你看看自己的使命，告诉我英格兰王国有多少贵族、伯爵子弟、领主、骑士和尊贵人，能从神那里得到这等待遇。我肯定你不会以为自己配得。这只是神在基督里的怜悯在你身上运行，就像耶利米时代的以伯米勒、亚哈时代的俄巴底、基督时代的亚利马太人约瑟、使徒时代的示求保罗和干大基女王的管家。现在只要心存感谢，继续、继续、继续，我的大人，要继续认信基督。不要在人前以他为可耻的，免得他也以你为可耻的。现在他要试验你，要紧拉住他，他也会紧拉住你。在患难中，他会与你同在，救拔你。不过那时你必须向他呼求，如此才能成就：‘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

“要回想罗得的妻子，她转头看了；回想法兰西斯·司丕拉^①；想想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要记住，你所有的一切

都在于基督的命令，记住，他为你失去的远比你能够为他失去的要多得多。记住，你为他失去的不算什么，因为这里那里还可以得到更多。记住，你会死，不知何时何地，以怎样的方式死去。记住，罪人之死可怕至极，而圣徒之死在他眼中看为宝贵。记住，宽路引向灭亡，走的人多，引向荣耀的窄门，进的人少，基督却让你努力进窄门。记住，信靠主的人会得到力量，得以抵挡仇敌的一切攻击。

“放心，你的头发主都数过了。要确信，你良善的父已经定好界限，这界限魔鬼连看都不敢。将你自己交托给他吧，他过去、现在、将来都会保护你；将你的顾虑交给他吧，他会照顾你。愿你定睛在基督身上，以他为倚靠，作工的典范，效法的对象。将你的心你的手、你所想所言、你的信心你的脚步，都献给他。让他的话成为你一切信仰之事的明灯。

“不在罗马教会的祷告上有份，不与他们站在一边，不与他们同坐的人是有福的。身体灵魂都要荣耀神。不靠基督而收聚的人必被赶散。你要祷告，祈求神的帮助，祈求并确信盼望能成就的人，就会得到所求的。我真心希望你纪念我们，我们

①司丕拉（? ~1548）是意大利律师，本是更正教信徒，后来变节皈依罗马教。他死的时候绝望地认为自己是个恶棍。约翰·加尔文、汤姆·华森、约翰·班扬、司布真等人都援引过他的例子。——译注

与你同行之时很喜乐，神当受颂赞，我们先你而去。若合神心意，也盼望你能跟随我们而行。”

我想读者会同意，评述以上引文没有必要，这些内容本身就很清楚了。如果篇幅允许，类似的片段很容易列出很多。但这些已经足够，如同丰盛的宴席。也许，这些内容已经足以证明布拉德福德留下的文字值得一读。

改教后的英国国教的根基由约翰·布拉德福德这样的人立定了，当为此感谢神。我们要清楚地知道殉道的改教家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持守什么样的教义，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让我们祈求主，使教众永不轻视或低估他们为英国国教所做之工。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要祈求主，让英国教士的传承不要在我们中间断绝，这些教士要保护殉道者明亮的灯台，将宗教改革的真正原则传给子子孙孙。



尼古拉斯·里德利 (1500~1555)

尼古拉斯·里德利

殉道的主教尼古拉斯·里德利的名字在所有真心的英格兰教友中应该家喻户晓。高贵的众英格兰改教家之中，无人能享有比里德利更高的地位。推动英格兰荣耀的宗教改革的众先贤中，他跟克兰麦、拉蒂默和胡珀一起位居前列，至于真实的美德，无人能出其右。里德利 1500 年生于诺森伯兰郡的维利蒙茨维克，离苏格兰边境不远。他最早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一所学校就读，1518 年去了剑桥彭布罗克学院。作为既勤奋又有能力的学生，不久他就惹人注意了，很快在大学里位居要职。

1524年，他成为彭布罗克学院的研究员，1533年晋升为高级管事，1534年成为大学牧师和公共讲员，1540年担任彭布罗克学院院长。

里德利怎样开始归向更正教还不是特别清楚。像克兰麦一样，他似乎是逐渐才得到《圣经》真理完全的光照，并不是一下子就有了完全成熟的纯正信仰。1534年，他签署了反对教皇至高无上权力的法令。1537年，他成为克兰麦大主教的随扈教士，次年后者派他去东肯特郡的西姆任牧师。他在此地隐居于一所宁静的乡村牧师住宅，第一次读了著名的喇川或博川的论文，讲的是主的晚餐，他因此而开始研究《圣经》，比从前更加仔细地研读教父作品。结果，他开始对罗马教关于圣餐的教义大为怀疑。他把这些疑惑反映给了朋友兼保护人克兰麦大主教。最后，他们两人都确信，化质说的教义不符合《圣经》，是人的新发明，是荒谬的。然而，直到1545年，里德利才完全宣布弃绝基督的身体和血真实临在于圣餐中这项教义。那时，福瑞思、兰伯特和其他一些人的论据以及他们遭受的苦难证实了他在西姆的领受，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当今的英国国教持守的圣餐教义，至死也未动摇。

1540年，里德利成为亨利八世的随扈教士，就此平步青云。1541年他成为坎特伯雷的高等教士，1545年成为威斯敏斯特

高级教士。1547年，他出任索厄姆副主教，同年被亨利八世指定为罗彻斯特主教。1550年，爱德华六世任命他为伦敦主教，1553年他又被提名为杜伦主教。不过，他并未就任最后一项职位。年幼的爱德华国王令人遗憾的驾崩，令里德利的尘世尊荣戛然而止。1553年，他被排除在血腥玛丽女王的大赦名单之外，投入伦敦塔囚禁，因为女王极为憎恶他。

爱德华六世驾崩之前，里德利所处的环境令他与玛丽女王直接冲突。福克斯对此有生动的描绘，因此我认为最好引述他的原话：

“大约1552年9月8日，伦敦主教里德利博士住在赫特福德郡的哈德姆，玛丽女士当时在两英里之遥的杭斯登，因此里德利去拜访她。托马斯·沃顿爵士和她的其他官员热情地款待他，一直到几乎十一点，玛丽才来到房中。里德利主教向她问安，说自己是尽自己的责任来拜访她的。于是玛丽对他的不辞辛劳表示感谢，他们愉快地谈了一刻钟。玛丽说，当他做父亲的随扈教士时，自己就认识他了，还清楚地记得当克林顿女士同安东尼·布朗爵士结婚时，他在父亲亨利国王面前的一场讲道等等，并邀请他同自己的官员一起进餐。饭后，玛丽女士把他叫去，他再次请求蒙她恩准与她谈话。里德利主教的开场白如下：‘殿下，我来此不仅是为了尽自己的职责觐见您，也

是想在下一个主日为您讲道，如果您乐意听的话。’

“听到这话，她脸色变了，沉默一阵之后，她答道：‘大人，最后这件事，请你自己回答吧。’

“里德利：‘殿下，鉴于我肩负的职任和呼召，我有责任请您恩准让我给您讲道。’

“玛丽：‘好吧，我刚才请你自己回答这件事，因为你很清楚该怎样回答。如果非得让我回答，那么答案是——附近的教区教堂都向你敞开大门，你若来了，要在哪里讲道都可以，但我和我手下的人都不会听你讲的。’

“里德利：‘殿下，我相信您不会拒绝神的道。’

“玛丽：‘你所说的神的道，我并不认可——那现在不是神的道了，只在我父亲的时代才是。’

“里德利：‘神的道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只是在某些时代得到更好的理解和遵行。’

“玛丽：‘你已经听到了，那是我父亲时代神的道，别指望现在你还能讲。至于你新写的书，感谢神，我一本都没有读，过去不会，将来也不会读。’

“接下来，她说了很多苦毒的话来抨击业已确立的信仰形式、王国政府以及他弟弟幼年时确立的法律，说自己在弟弟成年之前并不受这些法律的约束，只有在他成年后自己才会遵守。

她问主教是否是政务会成员？他答道：“不是。”她说：“但你跟现在的政务会一样。”最后，她以这样的话结束了谈话：

“大人，感谢你好意来看我。至于给我讲道的请求，我丝毫不会感谢。”

“然后，托马斯·沃顿爵士把里德利主教带到先前吃饭的地方。有人请他喝酒，他喝了后，看起来非常伤心，稍事停顿，突然说：“我定是做错了。”“为什么？”托马斯·沃顿爵士问。

“因为我在拒绝神圣道的地方饮酒，然而我若记得自己的职责，就应该立即离开，跺下脚上的尘土，见证这家人的罪。”说这些话时，他很激愤，听到的人后来说他们当时都毛骨悚然。于是，主教离开，回家去了。”

1554年，当局把里德利从伦敦塔解去牛津，要进行一场虚假的辩论来羞辱他。最终，经历两年监禁之后，1555年10月16日，他跟年老的拉蒂默一起被烧死在牛津。非常奇怪，他似乎预见到了自己会这样死去。汉弗莱在《宝贵的生命》一书中记下了这样一件事：“大风暴把里德利摇来摇去，他却劝勉惊恐的同伴：“应当高兴，拿起桨来，这条船上的主教不是被淹死的，而是被烧死的。””

从里德利成为主教的那天起，他就全心致力于协助克兰麦大主教实行并巩固英国国教的宗教改革。他知识渊博，尤为适

宜担任这项庞大的工作。也许，没有哪个改教家对我们绝妙的《信纲》和《礼拜仪式》的贡献超过里德利。尽管这两份文件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经过了修正、改进，但绝不能忘记这些文件是在爱德华时代的改教家手下成形的，而在爱德华时代的改教家之中，可能无人对这项工作的贡献比里德利更多。实际上，他的工作在英格兰宗教改革中的重要性从他最著名的敌手口中可见一斑：“拉蒂默倾向克兰麦，克兰麦倾向里德利，里德利则倾向于倚靠自己非凡的才智。”的确，似乎没有什么人对爱德华六世的影响超过里德利。正是因他的建议，高尚的年轻国王建立了至少十六所文法学校，包括基督公学，还计划建立十二所培养年轻人的学院。此外，史密斯菲尔德的圣巴多罗买医院一开始也是因里德利给国王的建议而获资建立的。

克里斯特马斯先生写了里德利的传记，作为里德利文集的序言，他在其中讲述了爱德华六世建立圣巴多罗买医院的背景，很有趣，因此我将原文摘录如下：

“关于里德利的建议带来的益处，有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爱德华六世在位时建立的三个机构，可以称之为宗教改革的第一批果实。这位卓越的高级教士在政务会和讲坛上都抵制当时的褻渎风气。尽管年轻的国王只能部分地抵挡腐败之风，却也听从里德利的建议，建立了至少十六所文法学校，要是他能

活得更久的话，还计划建立十二所培养年轻人的学院。他死前不久，派人请里德利来，为一场证道而感谢他。在那场证道中，里德利大力强调资助贫穷无知的同胞之责任。国王说：‘我被你的讲道深深打动，一方面神给了我能力，另一方面他也要我作出榜样。鉴于在这个国家我仅居于神之下，所以必须以良善和怜悯亲近他；鉴于我们的悲惨处境极其需要他的帮助，所以我们负债是最多的——我们欠所有处境悲惨之人的债，应当作出最大的补偿。因此，大人，我感谢你给我的劝勉，（请你）指教我该做出什么具体的行动，以最好地履行我的职责。’里德利主教对这一要求根本没有准备，因此请求国王给他一些时间考虑，请教一下对穷人情况更了解的人。听取了伦敦市长和参事的意见后，他很快去见国王，表明有三种不同的穷人。一些是因为天然的缺陷，比如幼年丧父之人、年迈体衰之人、白痴、瘸子等类，他们需要教育和供养。国王把新门市场附近的方济会教堂拿出来给他们，就是现在的基督公学。另一类穷人是能力不够而致贫的人，比如伤残军人、需要医治康复的病人，国王拿出史密斯菲尔德附近的圣巴多罗买教堂用于帮助他们。第三类是懒惰或浪费致贫的人，比如流浪汉、混混等，他们该受惩罚，强制他们遵守秩序。国王把布莱德威尔的宫殿，也就是许多古代英格兰国王的旧居，拿出来用于对付这类人。”

福克斯在《行为与丰碑》中精彩地记述了里德利在短短的主教任期内的生活：

“在自己的岗位上，他勤勉工作，全心投入讲道和教导基督真实健全教义的工作，没有哪个孩子从父母得到的爱能够超过他对羊群和教区的爱。每个假日和主日，若无重要事务缠身，他都会在各处讲道。人们渴望从他的讲道获益，像蜜蜂渴慕甜美的花蜜和健康的果汁一样，渴慕纯正教义的硕果。他不仅传讲纯正教义，还以身作则，过着纯洁有序的生活（逃避恶念和色欲），像闪烁的明灯一样照亮瞎子的眼，即使是他的死对头也没法指责他有半点瑕疵。

“此外，他还抓紧时间学习。他的记忆力很强，又读了很多书，当然可以比肩今时顶级的学者，这一点，他精彩的作品、精练的证道以及在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里各种各样的辩论，还有他对手的身份，都可以证明。

“此外，他给人的建议聪敏而富有智慧，所做的一切又谨慎周全。他以莫大的怜悯心肠小心翼翼地帮助顽固的教皇拥趸离弃谬见，温柔地赢得他们的心，让他们归向真理。他怎样温柔谦恭地对待后来出任约克大主教的希思博士就是明证，希思曾于爱德华国王当政时被软禁在里德利家里一年。他就是这样一位高级教士，各方面都很优秀、敬虔、属灵，英格兰应该后

悔失去他这样宝贵的财富。到目前为止，谈的都是公共领域的事。

“现在我要进一步谈谈他个人的情况。他英俊匀称，面色和体型都不错。他看任何事都存着善心，心里从不怀着恶毒冤仇，一切伤害他、干犯他的事，他都忘得一干二净。他对亲人非常体贴，不给他们任何负担，不过他不允许他们有什么不义，即他总会给他们一条普遍的原则（对自己兄弟姐妹）——要是他们作恶了，就别想从他这儿得到什么，只会被他视为陌生人；而诚实敬虔度日之人，则被他视为兄弟姐妹。

“他用各种方法来攻克己身，花了许多时间祷告默想。每天早晨，一穿上衣服，他都立即进入卧房，跪下祷告半小时，然后立即开始研读（要是没有别的事打扰他的话），直到十点。然后他开始每天家中的共同祷告。祷告完，他就开始午餐，吃饭时很少说话，除非是要服侍某人。谈话时，根据情势的不同，他可能谨守持重，又聪敏，有时也很打趣。

“他很快就会吃完午饭，然后习惯坐一小时，聊天或下棋。之后又去研读经文。如果没有人求见或者偶尔有公事需要处理，读经会一直持续到晚上五点。然后，他又会同家人一起祷告，跟上午一样。祷告完后就用晚餐，用餐的情形跟午餐一样。饭后，他会下棋一小时作为娱乐。下完棋后又会继续研读圣经，直到晚上十一点，就就寝了。睡前，他会跪下祷告，就像早晨

起床时一样。在富勒姆的庄园中，每天在一起祷告时，他会多次给家人讲解，内容涵盖《使徒行传》和全部保罗书信。每个识字的人都会拿到一本《新约》，用除了金钱外的手段鼓励他们用心学习一些重要章节，尤其是《使徒行传》第13章。他也经常给一家人读《诗篇》101篇。他对家人极其小心，以便叫他们表现出一切美德和诚实，给他人做榜样。总而言之，他既敬虔又品德高尚，家里也充满了美德和敬虔的气氛，一家人都得到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灵粮的滋养。”

“还得提一下他怎样以高尚品质和友善的同情心对待一位老妇人，即邦纳夫人。后来的伦敦主教邦纳博士的母亲。我认为应该对比一下，里德利博士世间少有的仁慈之心和邦纳博士忘恩负义的卑鄙品性。里德利主教住在富勒姆庄园时，总是会派人请住在毗邻的邦纳夫人和邦纳博士的姐姐蒙盖夫人共进午饭和晚饭，说：‘去请我母亲邦纳过来。’他总让邦纳夫人坐在上座，对她体贴备至，就像亲儿子一样。邦纳夫人的位置总会留着，就算国王的政务会在此召开（他们经常会来），也不例外。如果有哪位政务会成员要坐那个位置，他会说：‘请阁下赏脸，这位置按惯例是留给我母亲邦纳的。’但邦纳博士却怎样回报他的友善慈心呢？就算刚会走路的小孩都可以评判。后来，还有谁敌对里德利超过邦纳一伙呢？谁比邦纳更想置里

德利于死地，以极度的残忍回报他的恩慈？邦纳还不时苛待里德利的姐姐及其丈夫乔治·西普赛德。里德利让邦纳的母亲和姐姐和其他亲属不仅能安然享用邦纳供给的一切，还天天在自己家里礼貌友善地款待他们。相反，邦纳一恢复主教权力，就不仅不让里德利主教的兄弟姊妹和朋友得到他的供给，还恶毒地不顾法律和诚实，利用权力剥夺了他们的生计。

“就是这样，邦纳还不满足，用尽一切办法想要害死西普赛德，说要让十二位神父去对付他。若不是神借着时任伍斯特主教的希思博士之手解救他，他被囚于牛津时，邦纳的打算就实现了。

“由此，所有中立的读者都可以明白，这两类人的品质是多么的不同。一方满有慈爱怜悯，另一方却满了忘恩负义和可耻的卑鄙行径。话就到此为止吧。”

福克斯动人而又质朴地描述了1555年10月16日，里德利人生的结尾，他广为人知的殉道场景，因此我认为最好引述他的原话：

“行刑的地方位于牛津北侧，正对着巴利奥尔学院的沟壕。因为害怕出现骚乱阻碍点火行刑，女王下旨让威廉姆斯勋爵和城里的官吏全副武装前去协助。预备就绪后，市长和执法官押着犯人出来了。

“里德利长老身着漂亮的黑色皮袍，脸上蒙着网，就像他当主教时惯常的那样，颈项上搭着皮制丝绒披肩，头戴丝绒睡帽，上面盖着角帽，脚上穿着一双拖鞋，向火刑柱走去。市长和一位参事在他两旁。

“他身后是拉蒂默长老，穿着寒酸的布里斯托粗呢长袍，十分破旧，头上戴着束带帽，包着头巾，都是为火刑准备的，他的紧身裤外包着长长的新寿衣，一直到脚。想到他们往日的尊荣，现在却落入如此灾祸，见到这场景的人心里都悲叹不已。

“里德利扭头向后，看到拉蒂默跟着，就说：‘啊，你也在这里？’‘是的！’拉蒂默长老说，‘我就紧跟着你。’最后，他们鱼贯走向火刑柱。里德利先进刑场，热切地双手紧握，举目望天。少顷，看到拉蒂默来了，就跑去拥抱亲吻他。据当时站得近的人讲，里德利安慰拉蒂默说：‘弟兄，应该带着好心情，因为神要么会减轻火焰的暴虐，要么会刚强我们，叫我们能经受得住。’

“他一边说一边走向火刑柱，跪下亲吻，并全心祷告。他身后的拉蒂默也跪下，恳切地呼求神。他们起身后，相互说了几句，这时，奉命来监刑的人躲进了阴凉处。两人说了什么，我没有找到听到的人。

“变节的传道人史密斯来给他们证道，却不允许他们回应，

然后行刑者就下令他们准备好受死，他们温和地遵从了。里德利长老脱下皮袍和披肩，交给姐夫西普赛德长老。在他下狱期间，尽管姐夫无法获准去看他，却自己出钱供应他的所需，不时地让看守转交给他。其他不值钱的衣物他都丢在一旁，其余的则被执法官拿去了。

“还有些零碎物品，他给了站在旁边的人，这些人都为他饮泣。他送给亨利·利爵士一枚四便士的新硬币；给了威廉姆斯大人的手下一些餐巾、肉豆蔻和姜；表和其余随身物品，他都分给了站在旁边的各人。有人甚至摘下他紧身裤上的纽扣。就是只拿到他身上一片破布的人都很幸福。

“拉蒂默长老没有给出什么，只是静静地任凭卫兵脱下他的紧身裤和其他衣物，他穿得太寒碜了。现在脱到寿衣了，旁边的人却觉得他看起来赏心悦目。尽管穿着衣服时，他看起来像个憔悴的驼背老人，现在却站得笔直，就像一位慈祥和蔼的父亲。

“里德利长老站在柴捆中对他的兄弟说：‘静静地在自己的柴火中离开再好不过了。’但他兄弟答道：‘不，这会让你更痛苦。柴火只对穷人有好处。’里德利长老说：‘奉神之名，希望如此。’于是解开自己。他穿着衬衣，站在石头上，举起手说：‘天父啊，我衷心感谢你，因为你召我成为至死不渝承

认你名的人。我主我神，求你怜悯英格兰这个国家，救她脱离一切仇敌之手。’

“铁匠拿一根铁链把里德利和拉蒂默拦腰捆在同一根火刑柱上。钉钉子时，里德利拿起缠在肚子上的铁链摇晃，望着旁边的铁匠说：‘好朋友，用力钉，因为肉体将要走向终结了。’然后他兄弟给他一袋火药，要绑在他颈项上。里德利长老问这是什么，兄弟回答：‘火药。’里德利长老说：‘这是神送来的，我乐意接受他送来的东西。你还有吗，给我弟兄一些？’他指的是拉蒂默长老。他兄弟说：‘对，我还有。’‘那就给他一些吧，’他说，‘得快点，免得来不及。’于是他兄弟就拿了一些火药给拉蒂默长老。

“刽子手拿来一根点着的柴，放到里德利脚下，于是拉蒂默对他说：‘当大得安慰，里德利弟兄，当作大丈夫。借着神的恩典，我们今天将在英格兰点燃一支蜡烛，我相信永远不会熄灭。’

“火烧起来了，里德利博士看到火苗向他蹿来，就大声用拉丁语呼喊：‘主啊，我把灵魂交在你手里，求主收纳我的灵魂！’并一再用英语重复后半句。‘主啊，主啊，收纳我的灵魂！’拉蒂默在火刑柱另一边激烈地喊道，‘天父，收纳我的灵魂吧！’他任凭火焰烧来，好像在拥抱火苗一样。

“然后，他以双手抹脸，好像是在用一点儿火洗脸。很快，他就死了，似乎没有什么痛苦。神蒙福的老仆人拉蒂默长老就这样走了。拉蒂默主教这位蒙福的老神仆一生就此结束了。因他辛劳的侍奉、果实累累的人生和坚定的受难，整个国家都应该向全能的神献上极大的感谢。

“但里德利长老这边，魔鬼让烧向他的火不那么顺畅。因为木柴都堆在金雀花上，堆得过高，一开始点在下面的火被木柴压住了。他觉察到后，就要求他们为着基督的缘故把火引向他。他姐夫听到了，却不知道什么意思，他来这本来打算除去里德利长老的痛苦，此时却好像一个悲伤得不知所措的人，反而把木柴堆在他身上，把他盖住了，这样一来，下面的火烧得很猛，把他下半身烧尽了，却碰不到上半身，令他在柴捆下跳跃挣扎，请他们让火烧到他：‘我还没烧着。’确实如此，他痛苦挣扎，他无法解脱，双腿都烧掉了，上半身却没动静，衬衣和其他衣物都没着火。但即使在痛苦折磨中，他也不忘呼求神，口中不住念着：‘主啊，可怜可怜我吧。’又夹杂着这样的呼喊声：‘让火烧向我吧，我还没烧着。’他就这样承受着剧痛，直到有个站在旁边的人用铁锄把堆在上面的柴拨开，他看到火烧上来，就挣扎着倾向那边。火焰烧到火药了，他才完全不动，上半身也烧着，倒在拉蒂默长老脚下。有人说，这是

因为链子松了；也有人说，他从链子中滑下来是因为身体的姿势，双腿虚弱无力。

“有人说，在他将要从火刑柱上倒下之前，他请求他们用铁锄把他撑住。不管怎样，这一场面令众多目击者涕泪涔涔。我想，见到烈火肆虐地吞噬他们的身体，没有哪个人性未泯之人不会悲伤哀哭。在场一片悲哀之气。有些人与他们非常亲密，看到他们死伤痛欲绝；有些人同情他们，认为他们的灵魂此后再无缺乏了。里德利的兄弟感动了许多人，他看到里德利痛苦的情形，看到他不得不承受如此不幸，就尽力想早些结束他的痛苦。看到他兄弟（非常爱他，想帮他解脱）费尽力气却给他造成了更大的痛苦，有人为事与愿违而哭号。想到他们过去受到的爱戴，在这国家所处的尊荣地位，在大学里秉持的学术观点，任何人看到他们曾如此尊贵体面、不可或缺，拥有那么多敬虔的美德，多年研究，学富五车，却在此时烈火焚身，都只有悲伤流泪。他们死了，他们在今生享有的赏赐也终结了。我相信，当主同他众圣徒一同在荣耀中降临的那日，在天上存留给他们的赏赐很快就会显明出来。”

现在还需要介绍一下里德利的作品。他留下的作品不多，帕克协会只出版了一卷，主要是反驳化质说和偶像崇拜的短文、与拉蒂默和伯恩的会谈、1549年关于圣餐的辩论、殉道之前

不久在牛津受审查时的辩论、在伦敦主教区的教令以及主要是下狱期间写的三十五封信。尽管这位属灵的人留下的文字较少，却字字千金，我们真希望他写下更多的作品。不过，这位可敬的主教无疑少有时间写作。他受命要做的，是作工、讲道、劝勉、见证、受苦、为神的真理而死。谁敢说他的短暂的生命和光荣的就义在英格兰为基督的真理成就之事比不上五十卷书？

我想以下的里德利作品片段值得一读。

第一段出自里德利与拉蒂默的会谈：

“我出生的泰恩河谷离苏格兰边境不远，在那里乡亲们全副武装日夜守望，即穿着夹衣手持长矛（可以称他们是北方流浪者），尤其是他们暗中听到警报说苏格兰人要来了的时候。尽管这样的纷争让某些人付出了性命，但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保卫了国家。而我认为，那些在神面前也这样死去的人，也是死于一场有益的争论，整个国家都会因他们的缘故更爱他们的子孙后代。

“在基督我们救主的这场争论中，为了捍卫他的属天典章（他正是藉此赐予我们永生），在关于信仰和基督教的争辩中（这关乎我们永恒的救恩），我们难道不该守望吗？我们难道不该时时披挂整齐，谨防敌人（像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趁我们懈怠来攻击？的确，如果它可以出其不意地压迫我

们，我们就该哀哭。要是它发现我们睡着了，肯定就会这么做的。因此我们要警醒，如果家主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肯定会警醒，不容房子被挖透。我们要警醒，不容我们的房子被挖透了。‘务要抵挡魔鬼，’圣雅各说，‘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我们都要英勇地抵挡它，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从我们的统帅基督，他以自己的血扫平了通向天父的道路，这道路通向无人可见的光明——永远的喜乐之源。他呼召、吸引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跟随他。他借这些痛苦试验我们，好像熬炼金子，但这只不过是一小会儿，最终我们会在天父的荣耀里与他一同作王、得胜到永远。愿尊贵荣耀都借着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归给父、子、圣灵，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

第二段出自里德利 1550 年在伦敦主教区的教令：

“牧师不得借着以下行为让罗马教弥撒改头换面登场：亲吻圣餐台；在讲福音后洗手，或者在领圣餐时洗手；把书从一处挪到另一处；圣餐后跪下舔酒杯；领受圣餐后，拿法衣、圣餐碟给眼睛祝圣，或用这些东西在头上交叉，双手食指和拇指指向太阳穴；在饼和杯上吸气；圣餐前说羔羊祝圣语言；分圣餐前公开展示，或者有任何高举圣餐之举：摇铃，在圣餐桌上点灯。最后，牧师在圣餐时，只能采用《公祷书》中规定的仪式和姿势，不得有别的，这样圣餐礼中不会出现任何罗马教弥

撒的伪装。

“鉴于在许多地方，有人用桌子来当圣餐桌，有人用祭坛，令没有学问的人之间产生纷争，因此，为了主教区内敬虔的合一，由于桌子的形式更有助无知者弃绝罗马教弥撒的迷信观念，正确地领受主的晚餐，因此我们提倡助理牧师、教会委员和发言人都要用普通的桌子来做圣餐桌，并得体地盖起来，放置的地方需由众人审慎地决定，并取得一致，以便让牧师和领圣餐者与其余的人分开；要废止所有其他祭坛或桌子。”

第三段摘自里德利给胡珀主教的信，那时他们都在狱中，等着赴义。若我们想起这两位人人皆知的改教家曾经在衣着上产生许多分歧，就能明白这封信非同凡响。

“亲爱的弟兄、同作长老的，你是我在主里尊敬的人，请原谅我。从你我下狱时起，我没有写信给你问安。我已经收到你的两封信（你总是彬彬有礼），但却没法再给你写信；就算我写了，也疑虑重重，怕信不能安全地送到你手上。但现在，亲爱的弟兄，尽管我只是看到了些皮毛，但已经理解你的工作，我们在关于信仰的根基和实质性的要点上完全一致，而如今世界却因我们的信仰狂怒不已。过去，在无足轻重的小事上，你的智慧和我的无知（我承认）发生过冲突，现在我要说，请你确信，就我们里面持守的真理而言、为了真理的缘故，我全心

地（神可以为证）以基督的心肠爱你，（我相信）借着神的恩典，我们会坚守这真理直到永远。我觉察到，世界不会停止其虚假，他们忙着谋划以所有可能的力量敌对我们的救主基督，以自高之事抗拒认识神，所以让我们在基督里携手共进。如果我们的力量无法颠覆这些事，那也让我们撼动它们，不是以肉体的力量，乃是用属灵的兵器。此外，弟兄啊，让我们预备自己迎接得赎的那天吧。短暂的身体痛苦之后，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将同他一道在永恒的荣耀里奏响凯歌。”

第四段来自里德利给为基督的缘故下监的人的告别信：

“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怕死？基督是我们的安慰、喜乐和生命之所在，死能夺走他吗？的确不会。相反，死亡让我们脱离这必朽坏的身体，这身体目前承载我们灵魂，却不能很好地领受属天之事，只要我们还住在身体里，就没法与神同在。

“所以，要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在地上所居之必朽坏之肉体若是终结，我们在天上却有非人手所造之永恒居所。因此当欢欣，要知道我们还活在肉体里时，无法与神同在；因为我们尽管凭信心行路，却不甚清晰。不管怎样，我们都勇敢无畏，宁愿脱离身体与神同住。所以我们努力，不管是在天家还是在尘世，都总要讨他喜悦。

“凡在我们救主基督里有真信心之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认

识我们救主基督是怎样的，他是神永远的子、是生命、是光、是父的智慧，一切良善、一切的义并一切人心所能向往之美善都在于他。是的，这一切超乎人心所能明白、想象的（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同样，他也是父赐给我们的，‘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说）凡相信的人，有谁不乐意与自己的夫子基督同在呢？保罗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所以渴慕脱离肉体与基督同在，认为这对他再好不过了，他宁愿离世不愿活着。所以，当十字架上的强盗求基督怜悯，基督对他讲的话就充满了安慰：‘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为捍卫基督而死是我们对他和邻舍义不容辞的责任。基督为我们死了，又复活了，为要作死人并活人的主。他为我们舍命，（圣约翰说）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如此的失其实是得，因为凡为此丧掉生命的，必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如果他们是为主的缘故而死，那就是最幸福的人。

“不要惧怕死亡，死不能给我们什么伤害，只不过让肉体痛苦一小会儿而已。我们的信心扎根在神的话语之上，我们相信平安地死去不久后，就会在神的手里得享喜乐和安慰，死会直接让我们得生命。因为《约翰福音》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基督徒之死与其说是死亡，

不如说是进入永生的大门或入口。保罗称这只不过是同肉体分离而已。彼得和保罗说脱下帐幕，指的是必朽坏的肉体，在今生灵魂只不过住在其中一小会儿。是的，对基督徒而言，这死亡可以说终结了一切的不幸。只要我们还活在今生，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如今，死亡已经箭在弦上，所有基督徒的仇敌已经尽其所能，黔驴技穷。有什么能伤害可怜的拉撒路，被人放在财主门口？他从前的贫乏、悲惨的乞讨生涯、可怕的脓疮和疾病？他一死，就很快有天使来把他接去亚伯拉罕的怀里。他脱离了不幸和痛苦，天使把他带去喜乐安慰之地，那么死带给他什么损失呢？

“别了，亲爱的弟兄们，别了！在全部患难中，在死亡之际，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得安慰。天地都要废去，但神的话语却存到永远。”



撒母耳·沃德 (1577~1639)

撒母耳·沃德

撒母耳·沃德是杰出的萨福克郡神学家，17世纪最著名的清教徒之一，但对于研习英格兰神学的读者来说，他的名字相对陌生。原因很简单。他的作品很少，而且直到最近才重印。欧文、巴克斯特、葛诺尔、查诺克、古德文、亚当斯、布鲁克斯、华森、格林希尔、西布斯、简金、曼顿、博罗夫斯、博尔顿以及其他人的作品都全部或者部分重印了。但据我所知，从过去两百年直到前不久，撒母耳·沃德还没有一篇作品重印。

如此忽视撒母耳·沃德的证道是否公平，让读到他证道的神学学者评判吧。但我的看法是，对于再版旧时神学作品的出版人来说，这反映出他们的鉴别力太差，竟然长时间忽视像撒母耳·沃德这样的作者。不过，他的情况并非特例。诸如斯温诺克的作品、阿罗史密斯的《约翰福音》第1章注释、高吉的《希伯来书》注释、埃雷的《腓立比书》注释、约翰·罗杰斯的《彼得前书》注释、哈代的《约翰一书》注释、但以理·罗杰斯对亚兰人乃幔那段经文的解读（更不用说曼顿和布鲁克斯的一些最出色的作品了）等作品，人们都只是在最近才认为有价值再版，所以对沃德作品所获待遇，不要感到奇怪。

沃德在萨福克郡做了三十七年牧师，秉持彻底的清教徒神学，所以我得为他写一章传记。要是我有能力写一篇文章完整地纪念此人及其事工，将不胜欣喜。然而，很遗憾，我不得不说可以编纂的关于他的资料非常少，我们对他所知也不多。并且，很不幸，困难还不止这一项。在17世纪上半叶至少有三位叫做“S. 沃德”的神职人员，都曾就读于剑桥的悉尼学院，很是稀奇。这三位分别是：悉尼学院院长撒母耳·沃德博士，他曾作为英格兰代表团成员参加多特会议^①，也是乌舍尔大主教的

^① 1618年，荷兰改革宗教会召集代表在多特召开会议商讨教义争议，并邀请了其他一些国家的更正教代表参加。此次会议确定了加尔文主义五要义，定阿民念派为异端。——译注

支持者；先后担任埃克赛特和索尔兹伯里主教的赛思·沃德；伊普斯维奇的撒母耳·沃德，他的证道最近重印了。这三位中，两位“撒母耳”无疑是最显著的人，但他们重名，因而撰写传记时难免产生诸多混淆。我只能尽力而为，在重重困难之下解开这团乱麻，给读者提供准确的信息。

下面将讲述撒母耳·沃德的生平。1577年，他生于萨福克郡的哈沃希尔，是镇上的传道人约翰·沃德牧师的长子。撒母耳·沃德的父亲约翰·沃德似乎是个相当卓越的传道人。福勒（在他的《萨福克名人传》中）说，三个儿子加在一起，能力都比不上父亲。他的墓在哈沃希尔教堂，墓志铭值得一读：

JOHANNES WARDS.

Quo si quia scivit scitius,

Aut si quis docuit doctius,

At rarus vixit sanctius,

Et nullus tonuit fortius.

雷子，你纯洁之子，

满了火热，满了真爱，

要传讲真理，按正道而活——

是一盏点燃的灯，发光的明灯。

在这里点亮 此后光华闪
约翰·沃德，在萨福克郡的哈沃希尔和布里
以你圣灵的明证和大能
传讲福音，硕果累累。

二十五年后，他获准归到他祖那里。

他的遗孀苏珊，嫁给了
维瑟斯菲尔德杰出的牧师罗杰斯。
他留下了三个儿子撒母耳、拿但业和约翰，
都成了传道人，为了自己和家人，
他们盼望的最大福分就是继续信奉
并传讲同样的福音，直到基督你来。

主耶稣啊，愿你快来。

死是通向生命的入口。

1594年11月6日，经伯利勋爵提名，本章的主人翁撒母耳·沃德获得剑桥圣约翰学院的奖学金，此前他已经在玛格丽特夫人学堂深造过了。1596年，他获得文学士学位。1599年被任命为悉尼·萨塞克斯学院的首批研究员之一，并于1600年获得文硕士学位。1604年他因结婚离开研究员岗位，后来又于

1607 年开始攻读博士。

我们对沃德的童年和青年一无所知。他怎样开始事奉、是哪位主教按立他的、他在何处开始担任传道人为基督作工，都没有相关记录。他第一次作为公众人物出现是在家乡哈沃希尔担任讲员。对于他在哈沃希尔的成功，撒母耳·克拉克在讲述萨福克郡科丁顿的知名牧师撒母耳·费尔克拉夫生平时，给出了如下有趣的例子：

“神喜悦在很早的时候就在撒母耳·费尔克拉夫心中开始恩典之工，让他因惧怕律法而良心苏醒，诚挚地向神悔改，并在他里面生发有效的信心，而这些都是借着时任哈沃希尔讲员的撒母耳·沃德先生所传讲的圣道而成就的。沃德先生为他解答洗礼的问题，并一直对他怀着火热的爱心。一天，在传讲撒该的重生得救时，谈到了撒该对自己的讹诈作出四倍的补偿，沃德先生就此使用了常见的说法，即若有可能，必须充分地补偿受损之人，否则不要指望从神那里得赦免。这就是神射向年轻的费尔克拉夫心中的箭，他跟后来成为伦敦名医的约翰·垂格就在那个星期偷窃了镇上的古德曼·裘德的果园，他们摘下一棵树上成熟的梨子，不但吃得饱饱的，还拿走了许多。

“听道之后，年幼的费尔克拉夫哀恸不已，夜不能寐。周一清晨一起床，就去找垂格，告诉他说自己要去古德曼·裘德

那里，赔十二便士，因为偷了三便士的梨。垂格害怕裘德知道后，就会告诉他们的师傅罗伯塔姆，他们免不了受罚，因此竭力阻止这个可怜的孩子，不要他去赔偿。但费尔克拉夫回答说，若不补偿，神就不会赦免他。垂格答道：‘你说话像个傻瓜，萨姆；神原谅我们十次比裘德原谅我们一次还要快。’但撒母耳另有一个心志，因此还是去了裘德家，告诉他来意，并给了他1先令，不过裘德拒绝了收钱（却原谅了他）。于是这个年轻人感到伤口刺痛，不得安宁直到去见自己属灵的父亲沃德先生，对他倾诉自己灵魂的处境，一五一十地讲了这次的罪和许多其他罪，尤其是罪中之罪，他的原罪、本性的堕落。沃德先生慈爱又温柔地接待了他，给他讲好撒玛利亚人的事，给他的伤口敷上油和酒，回答了他所有疑问，消除了他的恐惧，并充分、有效地向他传讲耶稣，于是他成了真实诚挚的重生得救的人，此後一生都献身给自己的救赎主。^①”

1603年，二十六岁的撒母耳·沃德离开哈沃希尔，担任当

^①我认为克拉克很可能搞错了日期。他说费尔克拉夫生于1594年，而这件事发生在他十三岁时。但1607年，沃德已经不再担任哈沃希尔的讲员了。不过没有必要探讨这里事实有误的原因究竟是费尔克拉夫生于1594年之前，还是他偷梨时只有九岁，还是1607年沃德正造访哈沃希尔并讲道，还是费尔克拉夫已经在伊普斯维奇上学，不在哈沃希尔了。

时的一份要职。他被伊普斯维奇当局任命为该镇的传道人，在镇上的圣玛丽塔教堂讲道。他在那里任职三十年之久，少有间断。请注意，两百年前伊普斯维奇和诺维奇的地位远比今日重要，是英格兰最富裕、人口最稠密的两个郡的郡治所在地。特别是在萨福克郡，更正教和宗教改革的福音原则已经深深地扎根了。有些最卓越的清教徒就在萨福克郡服事。二百五十年前，被伊普斯维奇这样的城镇选中担任该城传道人是极大的荣誉，表明撒母耳·沃德的牧养水平得到高度评价，尽管他年纪轻轻，只有二十六岁。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继任他职位的马太·劳伦斯 and 司提反·马歇尔都是十七世纪神职人员中的佼佼者。

沃德在伊普斯维奇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福勒说：“他受命担任伊普斯维奇的牧师，牧养这一人口稠密地区的所有教区，也得到了教众的爱戴。其实，他拥有引人爱戴的美德（仿佛他学会了磁铁的本事，很明白怎么吸引人）。^①”若是用心去发掘，无疑会发现他在伊普斯维奇的30年侍奉充满了令人感兴趣的事。不幸，我只能给读者下列干瘪的事实，出自一本有价值的

^①我猜测福勒关于磁铁的评价指的是《磁铁般的复原教神学》一书，据称作者是伊普斯维奇的撒母耳·沃德。但更有可能作者是上文已经提到过的悉尼学院院长撒母耳·沃德博士。

地方志《沃氏伊普斯维奇方志》。这本书显然是根据前代记载编纂的，有助于我们一窥沃德的部分生平事迹。书中记载：

“1603年万圣节，撒母耳·沃德先生被立为传道人，他相当杰出。市府似乎对他极为慷慨，给他一百马克薪俸，外加每季度六英镑十三先令四便士房租补贴。

“市政当局（很可能因为得到如此有能力的神职人员）详细地宣布了聘请沃德先生的条款。因病不能履职期间，他要出钱每周三次请牧师在惯常的场所侍奉，照一贯的做法而行。‘一年之中，他不得未告假就离开本城超过四十天。如果他要收取牧养费用，那他留在市府的押金就作废了。应承给他的津贴不能用基金或慈善事业用地来充抵。’

“詹姆士一世七年，市府为传道人沃德先生买了一栋房屋。购屋款本城奉献了一百二十磅，其余来自自愿的捐赠，但沃德先生终止担任传道人时，房屋就要出售，所得款项归还给捐赠者，市府额外给他的款项也同归一例。

“詹姆士一世八年，市府把沃德先生的薪俸增加到每年九十磅，‘考虑到他在此地肩负的职责。’

“詹姆士一世十四年，撒母耳·沃德先生的津贴从每年九十磅涨到一百磅。

“这位神职人员的传讲如此富有自由精神和清教徒品味，

无法长久逃脱宫里搬弄是非者的注意。经过一番短暂的交涉，沃德先生被停职了。本地方志记载，1623年8月6日，国王写信给本城议会，禁止沃德先生讲道。”

至于沃德生平的其余部分，这本书没有涉及。所知的少量信息是从其他渠道获得的。

哈克特撰写的国玺尚书威廉姆斯主教传记中写得很清楚，尽管1623年因为不从国教而遭受哈斯内特主教的迫害，但沃德只是暂时停职传道人的职任。布鲁克的说法与哈克特一致：

“因为遭受诺维奇宗教法庭的迫害，他没有理会主教，转而向国王上诉，国王把控告他的文件交给国玺尚书威廉姆斯审查。”国玺尚书向国王报告说，沃德先生“并非无可指摘，但公正处理的话就很容易争取他。应该劝哈斯内特主教让他顺从，而非把他从伊普斯维奇赶走。事实是，国玺尚书看到沃德先生非常直率且一直为教会的利益着想，所以试图为这位博学刻苦的神职人员平息事端。因此，沃德不再遭受逼迫，很可能自由自在地继续了他的事工一段时间，未受滋扰”。布鲁克应该可以加上哈克特记下的一条，即沃德是英国国教不错的朋友，通过他，几位对不从国教的做法摇摆不定的人得以留在国教之内。

宁静地度过了十一年后，沃德再次因劳德大主教的煽动，被控不从国教而遭逼迫。普林记述了审判沃德的过程，其中

说 1635 年，沃德在国教最高法庭受审，罪名是反对向耶稣的名鞠躬、反对《消遣书》^①、宣称“英国国教要修改信仰了”以及“福音虽已小心翼翼，但还是要消失了”。法庭判他有罪，命令他以法庭制定的方式公开宣布改变主张，并承担诉讼费用。由于他拒绝改变主张，所以在牢里待了很久。

布鲁克记录了这桩可耻的判决，似乎是从《拉什沃思选集》和沃顿的《劳德的烦恼》两书收集的资料。布鲁克提到了沃德在这一人生关键时刻的一项卓越表现，正是这件事表明他在伊普斯维奇很受尊重。好像是在他停职之后，诺维奇主教向他的教众允诺派另一个牧师来接替他，但“他们只要沃德先生，不要其他任何人！”

沃德人生的最后四年情况如何很难知晓。布鲁克说，他获释后，退職去往荷兰，成为著名的雅茅斯独立教会牧师、定居鹿特丹的威廉·布里吉的同工。布鲁克也说他跟布里吉声明弃绝他们的国教圣职，重新接受按立：“布里吉先生按立沃德先生，沃德先生又按立布里吉先生。”布鲁克又说，沃德在鹿特丹蒙冤失去牧职，但很快又复职了。

^① 《消遣书》是英王詹姆士一世 1617 年颁布的法令，规定了主日以及其他圣日可以进行哪些消遣活动。

不过，我猜想这条记述存在诸多疑点。不管怎样，我怀疑我们恐怕没有获得布鲁克对这一事件的全部记录。沃德获释后退职去了荷兰可能性极高。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许多人为了良心的平安和自由，都不得不远走荷兰。他在鹿特丹的一间教会与布里吉同工、跟同工之间起了争议、暂时去职后又复任，我认为可能性也很大。但他重新受按立，我认为可疑。其一，在我看来沃德这样年纪和身份的人先受比他小二十三岁的布里吉按立，然后再按立布里吉，不太可能。其二，1639年，他在伊普斯维奇一间教堂里隆重下葬，如果他是一个声明弃绝国教圣职的人，那就太奇怪了。只有一件事很清楚，即沃德并没有在鹿特丹待太久。他1635年就出狱，1639年下葬。根据普林的记述，他“在牢里待了很久”。无论怎样，他在狱中的时间甚至足以写出拉丁文作品《大喜乐》，这本书中明确说是在他下狱期间“在门房里”写出的。1638年，他在伊普斯维奇买了一栋房屋。显然，他在荷兰的时间不可能太长。然而，沃德在鹿特丹的情况不为人知。17世纪，人们很容易伪造关于知名清教徒的故事，并广为接受。布鲁克说沃德1640年死在荷兰，完全缺乏根据，反而使得他关于沃德最后岁月的记述价值大减。

不过，尽管沃德出狱后退居荷兰，但有理由相信1638年他就回到了伊普斯维奇。伊普斯维奇方志（据沃氏记载）记

录，1638年4月，他买下了该城之前提供给他房屋，购屋款一百四十镑补偿给了起初的奉献者。1639年3月，沃德去世，终年六十二岁。3月8日，他下葬在伊普斯维奇圣玛丽塔教堂。教区登记有经过认证的参加他葬礼之人的名单，我手中有一份复本。他在世时，教堂长廊中间立了一块石头，上面的话（根据克拉克的伊普斯维奇方志）还在：

沃德，要警醒！稍候片刻，

那将要来的，就要来了。

据推测，这位善良的清教徒传道人的骸骨就埋在这块石头下面。今日，伊普斯维奇那些知道“守望者沃德”的人仍在传颂他的事迹。

还要说一下，1604年沃德在剑桥娶了一位艾尔汉姆的寡妇底波拉·博尔顿，组建了家庭^①。伊普斯维奇地方志上记载了一件趣事——沃德死后，为了表示尊重，市府让他的遗孀和长子撒母耳享受了他每年一百磅的薪俸。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两位兄弟约翰和拿但业也是牧师。约翰·沃德曾在伊普斯维奇圣克莱门特教堂任教区长，死于任上，有墓碑和简短的墓志

^①这件事，以及沃德在剑桥的学业，要归功于一位知名作者在《备忘和查询》1861年10月号发表的文章。

铭记录他的服侍。拿但业·沃德任赫特福德郡的斯坦顿的牧师，1634年去了美洲，1646年返回英格兰，1653年在埃塞克斯郡的沈菲尔德去世。

伊普斯维奇仍存有一幅沃德的画像，画得很好。画中，他右手执一卷打开的书，颈项上围着环领，留着修剪过的胡须。一边是一座灯塔，写着：

守望者沃德。阿塔迪斯·苏，43。1620年。

下文的素材来自《墓碑：勉力纪念萨福克郡布拉姆福德和贝尔斯代德可敬的牧师约翰·卡特先生》（1653年）一书，虽说是件偶然的事，却证明沃德在伊普斯维奇毗邻地区很受尊重，所以也值得在此一书。这本书是卡特先生的儿子写的，而下面这件事是在他父亲葬礼上发生的。他说（该书第26、27页）：

“1634年2月4日下午，父亲下葬时，附近各地的人都汇聚在一起，牧师们和其他人都开始读以色列王约阿施的话：‘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著名的神学家、伊普斯维奇引以为荣的撒母耳·沃德老先生也来参加葬礼，穿着丧服，看到那么多人聚集在这样的场合，他恭敬地请求传讲葬礼证道。但姐姐和我不敢答应，因为家父在世时常常叮嘱我们，他葬礼上不要举行任何讲道活动，说：‘因为这样以来恐怕就会有某些我本不应有的美事归到我身上，讲台上会出现虚假之辞。’”

沃德先生对这个回答很满意，便不再坚持。但下周五，他在伊普斯维奇的讲道完全是给我父亲的葬礼证道，他哀悼并赞美我父亲，而听众都大为满意。”

到此，我已经把能找到的所有关于撒母耳·沃德的记载都一起呈现给读者了。我由衷地遗憾，收集到的内容太少了，关于他的记载太少了。但绝不要忘记，沃德一生最辉煌的阶段是在萨福克郡，此期间他绝少离开伊普斯维奇圣玛丽塔教堂他心爱的讲台。无疑他的名声并不局限于本郡，1616年他被选中担任圣保罗十字架教堂传道人就是明证。不过，一生都住在偏远乡镇的传道人不管有多杰出，他的名声都不会在身后流传太久。要成为传记作家的题目，让自己的生平事迹连续地记录下来，那就必须住在大城市。但沃德并没有住大城市，所以多年之后，我们对他知之甚少。

还剩沃德的证道和短论没有讲了。最近，他的证道和短论首次重印，现代研读神学的人都可以读到了。必须要清楚，这些重印的作品并未涵盖他的所有作品。除了这些证道和短论之外，他还同雅茨一道写了一篇文章回应蒙太古著名的《上诉于凯撒》。有理由认为，除了目前重印的证道之外，他还出版了一两本证道集。不过，我认为尼哥先生最近再版的这九篇证道和短论无疑是撒母耳·沃德作品中唯一值得重印的，很可能也

是沃德自己希望再版的。

关于这些证道的优点，读过的人可以自己判断。过去的岁月里，这些证道获得高度评价，并受到众多伟人的推崇。福勒说沃德“有圣洁的想象力，善于构思传神的画面，用小例子就能表达大事”。陶德瑞说沃德的“作品值得一读。他的语言得体、优雅而有力。他的思路精雕细琢，并合宜地阐明出来。他有许多非凡的智慧之花。他的作品中有许多最为大胆的象征，超越了任何英语作者，尤其善于省略、假定、演绎和寓言”。这样的赞誉乍看起来不免夸张。但是，如果读沃德作品的人不认为自己受益颇丰的话，我会很失望。

请注意，至少重印的九篇撒母耳·沃德的证道和短论本来不是打算出版的。《坛上的炭》、《基列的乳香让良心复苏》和《叶忒罗的建议》这几篇讲章似乎是由他的亲友拿去出版的。这些证道具有讲给人听的讲稿特征，而非给人阅读的文章。但我要说，根据三篇证道，沃德的恩赐和力量可见一斑。尤其是关于良心的那篇，是我读过的英语讲章中最有力量、结论给人印象最深的证道之一。

沃德证道中的教义是彻头彻尾的福音派神学。有些清教徒作品过分夸大悔改，令其失色不少，但沃德从未这样。他也不用超出圣经的系统性神学陈述，虽然有些人的作品正是因此而

黯然失色。他总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却又与经文牢固契合。尽可能高举主耶稣基督、打碎人的骄傲、揭露罪的丑陋、将福音完备的救恩广为传扬、唤醒并警告未得救的罪人、造就并安慰真基督徒，这些就是沃德每篇证道的目标。他难道不对吗？要是有更多像他那样的传道人，教会将多么蒙福啊！

沃德的证道方式也非常简洁。他的许多话都富有启发性：他总会涉及日常生活；在讲道中糅合进人类的各种知识；从所有被造物中选取象征和比喻；毫不介意采用所有人都能明白的通俗语言；遣词造句连没有学问的人都能理解；他说话大胆、直接、尖锐且激动人心，仿佛只怕神不怕人；他总能吸引人的注意力，让人深省，想要再听他讲。无疑，他的许多话古色古香。但那个时代所有人都很古色古香，没人会因此注意到他。无疑，他的品位有问题。但没有哪个受欢迎的传道人不会遭受这种批评。与他众多的优点相比，他的缺点微不足道。我再说，要是我们有更多像他那样的传道人，众教会定会受益匪浅。

沃德证道的语言也不应忽略。很少有17世纪的作品像沃德的证道那样，能在其中看到那么多奇妙、古老、强有力的话。很不幸，有些这类语言已经不再使用，所以大多数人无法明白，这是英语文献可悲的损失。

最后，我要摘录一些沃德的证道，从中可一窥这位著名的

神学家作为传道人的样子。

第一段来自《基督是万有之主》这篇证道：

“愿所有人都让他充满我们的思想和言语。要是我们眼里、脑中总是有他，我们的灵魂以他方向，紧紧地绑在他身上，就像向日葵向太阳、铁被磁铁吸引、磁铁指向北方，那该有多幸福啊。他难道不是为此而把自己比作这些我们熟悉的、很明显的事物吗？光，我们一睁眼就能看到他；粮、水和酒，我们吃饭时就在吃喝他；门，我们进进出出都会记得他？如果我们的舌头时常提起他的名，那该有多幸福啊！他的名在口中甜如蜜，在耳中是动人的旋律，在心里是欢乐的节日。让水手盼风，商人盼利，农夫盼牛去吧，但你们向世界要做毕达哥拉斯学派，向基督则要做逍遥学派^①；对一切虚空之事三缄其口，只对于基督有说不完的话。屈梭多模首先注意到，保罗在十节经文里喜乐地记录基督的名十一次之多（《哥林多前书》1:1-10）。可敬的福克斯悲伤地预见到，我们听到、看到的会成为现实，人们的讲话会拾掇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仿佛所有的宗教信仰都在追求同样的主张；他全心全意地祈祷，强烈希望人们能离

^①毕达哥拉斯学派有许多禁忌，带有神秘主义；而亚里士多德创立的逍遥学派则讲究认识真理。——译注

弃仪式，只谈论那位真实的基督——有学问的人可以写他，没学问的可以寻求认识他，传道人所有讲道都讲论他、以他为主题。其实，我们的职责不是像罗马教神甫那样，举起一块饼，而是在教导中高举基督；要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一个人心里，要描绘他被钉十字架，讲述他的死和受难。圣克里斯托弗的标志很不错，表现的是一名传道人在今世之海中跋涉，信心坚定，高举基督叫众人都看见。是什么让约翰获得属天的称呼，保罗称自己为‘聪明的工头’呢？因为他们不像今日的风潮那样，高谈自己读到的、记住的，依靠口才，而是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了熟练地建立教会，把根基建在磐石上。如果我们闭口不言这磐石的话，石头都要呼喊了。这就是我们任务的总归——借着基督的帮助传讲基督的福音，让他受颂赞。没有他的证道不叫证道，没有他的传讲不算传讲。

“重中之重，每个人的全部职责都是将自己全然献给基督，不是只献上一条腿、一条胳膊或其他肢体，而是魂、灵和身体，我们里面的一切；献上脂油、内脏、头和蹄，并祭牲身上的一切给他，都表明我们有生之年要把自己全然献上侍奉他，我们的年日都是他的。我们如此行，就定会知道自己献给他的远远少于他应得的。我们不过是虫，邪恶的罪人，怎能跟神的儿子相比？他没有犯过丝毫的罪。因此，让我们为他而活，为他而

死。让我们活在他面前，以便可以在他里面死，心甘情愿地把灵魂交在他手里，跟亚历山大里亚的约翰有同一种情感。约翰又称为赈济者，据称，他慷慨大方，把所有一切都分给穷人，甚至自己的收入来源都献出来了，这些都是他身体健康时挣来的，然后他感谢神，说自己现在一无所有，只有自己的主、夫子基督。他渴望与基督同在，现在会有不受限制和缠累的翅膀飞向基督。用古时彼得的话、后来兰伯特的话来说，就是：‘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

第二段出自关于良心的证道，题目是《基列的乳香》：

“良心，请听！听听主的话。我要你们记住这个日子，你们的职责是再次传讲我们的证道，否则我们所有的证道和劳苦都归于徒然了。你们是灵魂的胃，要咀嚼消化。你们能找什么借口抗拒心中的责备，抗拒内心隐藏的忠实的劝诫？你们的乳香宝贵，你们遭击打不会头破血流，也不会颜面无存。神给了你们在私底下、隐秘处行作奇事的能力。所以回家后请遵行，在他们身边、耳旁疾呼，把现在以及往日听到的讲给他们听。

“良心啊，你安居在人身上。如果那人是当得平安的人，愿你的平安与你主的平安住在他里面；这平安世界无法知晓，无法给予，也无法夺去。愿你温柔安宁，言说美善之事，珍惜恩典发出的最细微火花。如果你在一切事上都渴慕真理，就让

他们不要惧怕，不要怀疑自己所蒙的选召。渴望诚实而行之人，你就安心地与他们同行。温和甜蜜地帮助他们的温柔敬畏之心，不要严苛地对待他们。请安抚破碎心灵，对他们讲：‘为何要如此忧虑悲伤？’当你看到他们为损失和背十字架忧伤，就请像以利加拿对哈拿一样，温柔地告诉他们：‘你还要什么呢？有我不比一千个朋友、妻子、儿女还好吗？’

“在身后为他们鼓掌，鼓励他们行善，激励他们勇往直前。鼓舞他们将美德发挥到极致，然后为他们喝彩。让地上的美事令你欢畅。

“光照瞎眼之人和良心不安之人。

“刺痛麻木之人。

“向沉睡之人吹响审判的号角，警告他们。

“对假冒为善之辈，让他心中苦楚，如芒刺在背。让他明白你是神在他里面安插的探子，秘密的情报员，只忠实于神。

“在‘一切事上’都要敲打假冒为善之辈。

“让公民有了慈善之举又要加上虔诚之心。

“让摇摆不定、变化无常、肆意放荡之人‘行得坚定’。

“让冷淡的更正教信徒知耻而后勇，热心起来，‘诚实而行’。

“但对那些彼列之子，褻渎的讥诮者，请固执地缠着他们，昼夜滋扰，不得安宁，直到他们悔改，要令他们苦不堪言。若

他们醉酒宴饮，就请像押沙龙的仆人对暗嫩那样，刺透他们的心。记住，只要有一丝希望，你都要尽忠职守，作基督任命的敲钟人，刺伤他们，击打他们，唯一的目的是引他们向基督，让他们可以在基督里得活，而不是为了恐吓他们。为此，不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一以贯之，以便他们可以信而悔改。

“但如果他们掩耳不听，硬要犯罪跟你作对，跟圣灵作对，那就跺下脚上的尘土，或者在他们的时候到来前折磨他们，令他们绝望，或者暂时让他们安宁，却告诉他们，你在那日将不得不说，他们不得不听。

“良心，你有责任去贵胄的内室和政要的会议桌上，做他们信实的策士。这样，他们在所有基督教国家的朝堂上制定政策时都遵从你，以你为他们政务会议的议长，听你的声音，而不会成为夸夸其谈的耶稣会会士、马屁精和撒谎的人。你要对他们说，为你的缘故，下属必须为他们祷告，顺服他们，在主里尊敬顺从他们。

“要告诫廷臣，不要倚靠君王变幻莫测的嗜好，而要像尼希米、但以理、约瑟一样忠实可靠。让他们读这些人的历史，并效法而行，将其摆在马基雅维利^①的权谋之上。

^①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政治学家，提倡为达政治目的不择手段。——译注

“告诉那些老狐狸和政治家，就是那些颠覆伦常之人，就是患病的良心令亚希多弗上吊，推翻了哈曼、舍伯那等人。告诉他们，最好的策略——也是所罗门采取的，他是最有见识的人——是让你保持喜悦的状态，巩固你，你就会巩固他们，成为他们的盾牌，让他们为了正义的事，在患难之日也像狮子那样勇敢，无惧森林里所有野兽的妒忌，也不怕狮子的吼叫。

“良心，你是判官中的判官，有朝一日会审判他们。他们若不怕神也不怕人，就要像那个难缠的寡妇那样，敦促他们秉公而行。你在一切殿堂上都坐在高位，尤其是在你统辖范围内、从你得名的那些殿堂里。不要让你遭到放逐，反要让腓力斯颤抖，要向他们讲述审判的事。

“对公正的法官，要让他们讨神喜悦，讨你喜悦，除此之外，别无惧怕。要让他们确信，不管他们做了什么偏袒、偏心之事，你都会让他们跌倒。但若他们行得正，你就记下，给他们大大的赏赐。

“若是你在这些殿堂内看到什么陈情者是顺从你的人，就请令他们自由，帮助他们。如果他们信赖你，就告诉他们，丢下主日的工作，不要贿赂双方，屈枉正直，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如果他们只为正直的事申冤，那么你左手有财富，右手有荣誉，都要赐给他们。

“至于利未支派，你在那里要更为勇敢，因为他们是神的人，他们的职业必须符合良心。要热心催促他们，把‘良’加在‘心’上，作为解读困局的密码，是件值得的事。让他们渴望讲道，不是为了肮脏的财利或虚无的名誉，而是为你的缘故。愿他们保持你的纯洁，在你里面持守信心的奥秘。要让他们知道，你是承载正统信仰唯一的船，如果他们因懒惰贪婪而损害了正统信仰，就会落到罗马教和阿民念派的手中，失去信心，写出离道反教的书，信仰混杂。而且绝不会有好的良心，尽管他们中有些醉鬼曾经似乎拥有过。”

对于以上摘录的内容，我无须评论了。这些文字自己就闪烁着光华。无疑，证道的品位和主张因人而异。但我要郑重地讲，像沃德这样讲道的人永远不会缺乏听众。



威廉·劳德 (1573~1645)

劳德和他的时代

1645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在伦敦塔山被斩首。他是历史上五位遭遇横身之祸的大主教之一。阿尔菲奇在1009年埃塞烈德在位时期被丹麦人杀死。托马斯·贝克特于亨利二世统治期间在坎特伯雷主教座堂突遭谋杀。西蒙·苏保利于理查二世在位期间被瓦特·泰勒斩首。克兰麦在玛丽女王在位时期被教皇一党的人烧死在牛津。只有劳德死于更正教徒之手，时值查理一世在位，长期议会刚刚开始。

那么，现今的时代，劳德大主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

想许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劳德已经死去两个世纪了。蒸汽机、电力、铁路、自由贸易、改革、教育、科学改变了英格兰的方方面面。为什么还要重提关于半野蛮时代的野蛮行径的悲伤往事？劳德跟我们，我们跟劳德，有什么相干，需要费力去研究他的故事？

我敢说，这样的问题太短视，考虑欠周。俗话说得好，历史是“案例讲授的哲学”，而没有什么历史比得上英国国教的历史更符合这句话了。还有句话讲，历史“奇怪地喜欢重演”，而仔细研究过去的历史将大大帮助我们推测将来要发生的事。我坚信，劳德的事很值得我们研究，认识劳德所处的时代对于今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还要进一步讲，我相信，就今日英国国教的立场而言，劳德的生平给了我们全面且清楚的启发。

在本章开头，我必须请读者再次忍耐，仔细思量。本章的主角是一位历史人物。除了弗劳德和麦考利外，很少有人写的历史不干瘪枯燥。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时，就让人念历史，就是他那个时代的记载，给他听。此外，写本章的主角尤其困难。再没有谁像劳德那样，得到的评价众说纷纭了。有些人说，他是罗马教徒，邪恶的妖怪；另一些人说他是蒙福的殉道者，光明的天使。一方面，普林对他恶语相加，另一方面海林、沃顿、罗森甚至勒巴却对他一反常理地钦佩有加，因此不容易找出真

相。简言之，本章要处理的题目是团乱麻，相隔那么久，已经不容易理清了。但是，我还是要大胆地尝试给读者“还原真相”。小心仔细地调查之后，我完全有了自己的判断。我坚持认为，劳德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对英国国教的损害超过任何教士。他留下的伤口再没法愈合，他造成的损害再也无法修复。

劳德生于1573年，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中期，那时宗教改革已经开始三十五年了。大约在1603年詹姆士一世继位时，他成为公职人员。请特别注意日期。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他出现在英国教会历史最危险的时期，即灿烂的英格兰宗教改革开始后的前七十五年里。

只有七十五年！看起来真短暂啊！但这期间发生了多少与我们深切相关的事情啊！这七十五年中：亨利八世首先撒下更正教的种子，尽管我完全承认是出于低劣、肉欲、世俗的动机；然后是爱德华六世短暂却灿烂的统治，在克兰麦、里德利、拉蒂默和胡珀的照料下，娇弱的幼苗急速成长；此后，玛丽的血腥统治到来了，邦纳和加德纳残忍地将树苗砍倒；伊丽莎白登基后，这棵树却幸福地活过来，英国国教重新在现今的根基上建立起来。

很遗憾，甚至伊丽莎白在位时期，对英国国教而言也非完全的美好时代。对此，必须讲出真相。我们感谢好女王伊丽莎白，

因而倾向于忽视她在位时造成的损害——该做的事没做，不该做的事却做了。部分原因是女王的性格中有都铎王室一贯对权力的热爱、嫉妒主教们，部分原因是她想安抚天主教徒，赢得他们的拥戴，所以宗教改革的工作并没能像理想中的那样大刀阔斧。对此，从帕克协会出版的《苏黎世来鸿》的部分内容中就可见一斑。如果杰威尔和同工们没有遭遇王室连续不断的干扰和阻挠，我们教会的敬拜和组织很可能比现在再要好得多。如果在传道这件事上，格林多尔未遭冷落和中断，英国国教的教士整体情况将比现在要好得多。他在这痛苦关头写给女王的信当受钦佩。因为各方对信仰自由都普遍无知，认真负责的人往往因为无关紧要的冒犯行为而遭迫害，从而为后来的不从国教者预备了丰收的土壤。历史学家福勒记述了塞西尔同其他枢密院成员和惠特吉夫特大主教之间就这个问题的通信。很遗憾，我恐怕要贬低伊丽莎白。但事实就是事实，应该为人所知。如果我们不了解劳德之前的时代，就不能恰当地看待他。

然而，评价伊丽莎白的统治时，有一个闪光点决不能忘记。英国国教的教义标准纯正、清晰、合乎《圣经》且不会被误解。不管是否公正，那时讲道的人若非彻底的更正教信徒且完全赞同所有《三十九条信纲》，就不可能出现在讲台上。若有哪个教士传讲圣餐时基督身体和血以饼和酒的形式真实临在，提倡

个人向神职人员告解，支持向童贞女马利亚祷告，在圣餐时将圣物举到头上并加以崇拜，教导洗礼就重生这种“因功生效”的观点，公开否认预定论、归算到人身上的义或因信称义，辱骂克兰麦、里德利和拉蒂默留下的记忆，称爱德华六世为“年幼的虎崽”，嗤笑信纲是“四十鞭减去一下”，提倡与罗马教会重新联合，对称教皇为敌基督有所顾虑，那么我大胆地说，除非他是个无足轻重的人，否则将会在蒙福的好女王治下过一段苦日子，“当然的权力”会雷鸣般地临到他头上。这些事不容争议；你必须对这些事持坚定的更正教观点，否则就得保持沉默。简言之，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国教尽管在许多事情上存在纰漏，但神学上完全是更正教和福音派的观点。尽管因为伊丽莎白时代的教会因不成熟而有许多弱点，但其普遍的教义标准符合《圣经》的程度、符合更正教信仰的程度空前绝后。那时，有些人曾见到过罗杰斯和布拉德福德在史密斯菲尔德受火刑，听到拉蒂默在火刑柱上对里德利说“当刚强壮胆，今日我们点亮的火把绝不会熄灭”，见过英勇的胡珀在格洛斯特主教座堂的阴影下忍耐烈火折磨三刻钟。英格兰的男男女女还没忘记这些事。人们普遍认为罗马教是虚假的信仰，更正教是神的真理。人们认为任何形式的罗马教教义都可憎，但宗教改革教义绝不应放弃。所有阶层的人，从会议厅的政治家至店里的学

徒，都持这种观点，少有例外。简言之，在伊丽莎白时代，尽管也有诸多纰漏，却是更正教的时代。国家宣告自己是更正教国家，以此为荣。这一点决不应忘记。如果伊丽莎白时代的更正教跟表面上看起来一样真实深刻，我们的国家就会很不错。

就是在这样的关键时代，神允许劳德出现，在英格兰掌权。他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对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他怎样有意反对当时的神学；怎样“任意而行，无不顺利”四十年之久，像斯特拉福德勋爵驾车奔向目标那样“不厌其烦”地日夜工作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怎样在阿民念派的亚杜兰洞^①中藏起所有不同意宗教改革教义的教士引为盟友，逐渐在教会里放入不喜悦真正更正教信仰的酵，还放入另一种酵令人不喜悦那种他称之为“加尔文主义”的信仰；甚至在自己的政策毁掉教会和国家后，他怎样留下一班对教会造成巨大损害的教士——这些都是史实，要是一一细说，可以写出厚厚一本。但在本章中，只能用寥寥数语指出来。我竭力要做的是赤裸裸地展现出劳德的生平，简要评价这个人，展示他的政策以及实现的方法，造成的后果。我将得出几条具有实践意义的教训，作为本章合宜的结论。

① 大卫躲避扫罗追杀时藏身亚杜兰洞。参见《撒母耳记上》第22章。——译注

威廉·劳德 1573 年生于雷丁，父母都是体面的中产阶级。他在家乡的文法学校发蒙，1589 年进入牛津圣约翰学院。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不为人知，只知道他身体弱，是小个子，但却聪敏、精力旺盛，勤勉不倦。他在雷丁学校的老师深信他定会升到高位，常常说：“到你成为小个子大人物的时候，别忘了雷丁学校。”

在牛津，他渐渐崭露头角，尽管比较慢。1593 年，他获选为所在学院的研究员，因病休养两年后，1598 年获得文科硕士学位。1600 年，劳德被罗彻斯特主教杨按立为会吏，1601 年成为牧师。

我们对他在牛津的头十年知之甚少，只有一件真假莫辨的事——巴克里吉，一个臭名昭著的不纯正神学家，是他的导师。显然，他对时代的观察很仔细，有自己的想法。甚至在刚刚被按立时，他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神学思路。据说，杨主教发现他的研究并不局限于通常的日内瓦体系，他的神学建立“在教父、大公会议、教会史家的高贵根基上”。像这样的溢美之词是可疑的。要是有人把教父和大公会议当作偶像，轻视宗教改革的神学，那他的神学一定存在一种扭曲的散漫之气。《牛津的雅典》作者伍德说，即使在牛津的前十年，劳德都被视为“早熟、自信、热心的人”。把杨主教和伍德的评价综合起来，就会看

到一个非常危险的教士所具备的初步条件成形了。我猜想，在牛津圣约翰学院的这平静的十一年里，劳德后来造成的一切危害的种子已经种下，他整个职业生涯里可悲的偏见在此期间根深蒂固。

1602年，他受命在圣约翰学院宣读一篇神学讲演，第一次作为更正教的对手登上舞台，公开宣称支持一种新式神学，而当时更正教是普遍的观点。他提出的观点本质究竟如何，并没有记载，但根据海林的说法，他的这些观点类似于“基督的教会永远是有形的，从使徒传承至罗马教会，继续存在于该教会中直到宗教改革”。他原话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很清楚，他关于罗马教会的立场与讲道文的观点、杰威尔和改教家的观点针锋相对，是大学里彻底的更正教信徒极其憎恶的。结果，他立即与乔治·阿伯特博士发生冲突，后者当时是牛津副校长，大学学院院长，后来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是位大有能力、品格高尚的人。结果，从那天起，阿伯特就认为劳德是个危险分子，而劳德则被视为非常冷淡的更正教徒——即便算不得罗马教的朋友——公开敌对基督纯正福音的人。

履行完1603年的管事的职分之后，1604年劳德获得神学学士学位。他在攻读学位的作业中捍卫的论点补充了关于他神学倾向的额外证据，增加了他的嫌疑。从他的传记可见，他坚

持“洗礼的必要性”和“没有教区主教就没有真教会”。他的原话本质如何不得而知，但根据他的作业所造成的影响来看，显然被更正教教士们视为不合圣经、不纯正。很可能，就像提倡《时论册集》之人那样^①，他坚持使徒传承和洗礼就重生。不管他说的是是什么，事实是他遭到埃克赛特教区长、时任王室神学教授的荷兰博士的猛烈抨击。照例，抨击并没有什么结果，劳德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要看一个人神学是否纯正，其道德表现与有效的证据并不是一回事。

1605年，劳德支持埃塞克斯伯爵与里奇女士结婚，并为之庆贺，但这场婚姻极不光彩，劳德自食其果严重受挫。此后，1606年，劳德在牛津卷入了另一场神学非议。他在圣玛丽教堂讲了一篇道，具有罗马教倾向，所以被王后学院教务长、时任副校长的埃雷博士召去问话。关于他这篇证道的实质，我们也一无所知，只知道劳德照旧设法逃过了公开指责。但是，像其他许多处于类似立场的人一样，尽管没有被法律定罪，却让许多人对他印象深刻，认为他是完全不纯正的神职人员，深

^① 19世纪30年代，英国有一批人掀起了回归天主教的牛津运动，《时论册集》即他们写出的一系列小册子，篇幅不等，有长篇大论也有寥寥数页的传单。——译注

受罗马教主张的污染。一句话，这件丑事令著名的约瑟·何尔，后来的诺维奇主教，写了一封非凡的信规劝他。此后我将作出对劳德此人的评价，这封信是证据之一，所以摘录如下：

“但愿我知道在哪儿找到你，告诉你如何直取目标。我必须详察、推测。今日你站在了罗马教徒阵营里了，明天会在我们的阵营，又一日你站在两者中间，两边都反对。对手认为你是我们的人，我们认为你是他们的人。你的良心知道，你不属于任一边。我不是在捧你。当然，吹捧是最糟糕的性情。或冷或热都有用处。冷淡对任何事都没有好处，只会让人腹痛。灵里火热的人会受到接纳，僵冷的人就被考虑得少些。而二者之间更糟，因为接近善却未及。你这样不在乎还要多久呢？只有一条解决办法，你最后要知道自己持守的是什么，本应持守什么。丢掉你的羽翼和牙齿吧，丢掉这些蝙蝠般的性情，要么做鸟，要么做兽。在摇摆不定中死去，你定会恐惧。如果你必须安定下来，那何时开始呢？如果你必须开始，为何不现在开始呢？迫在眉睫却拖拖拉拉的人危险啊，他是否还有机会值得怀疑。神借着耶户喊道：‘谁顺从我？’最后，从你的窗户里仰望他吧，鼓起坚定的勇气丢掉迷惑你的耶洗别。有什么妨碍，靠着拖延能够消除呢？有什么是一个正确的回答所不能去除的呢？如果你宁可摇摆不定，那谁能令你安定下来呢？但如果你不喜

爱反复无常，就告诉我们为何你犹豫不决？坦白直言吧，否则你绝不会站立得稳。”

1607年，三十四岁的劳德终于得到在教会内朝上爬的机会。像他那样反对更正教和福音派神学的人，当然不乏支持者。这些人“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其实从那时起，直到当上主教，几乎找不到有哪三年里，劳德没有得到升迁。1607年，他当上了北安普顿郡斯塔姆福德教区牧师；1608年，成为莱斯特郡北基布沃思教区长，并担任罗彻斯特主教尼尔的随扈教士；1609年，当上了埃塞克斯郡西提尔贝里教区长；1610年，担任肯特郡卡克斯通教区长，后来又任该郡诺顿教区长；1611年，担任牛津圣约翰学院院长，国王的随扈教士；1614年，成为林肯主教区巴克登的受俸教士；1615年，当上亨廷顿会吏长；1616年担任格洛斯特主任牧师；1618年当上莱斯特郡伊布斯托克教区长；1620年当上西敏寺法政牧师；1622年担任北安普顿郡克里克教区长^①。同时代没有哪个人像他那样连续得到这么多升迁！我无法确定有多少升迁是一起进行的。他在这些地方都做了什么事，住得久不久，讲道多不多，是否留下任何美善的属灵标记，都无从得知。除了在每个教区他通常

^① 当上圣大卫教堂主教后，劳德似乎继续享受克里克的俸禄。参见他的“日记”。

都会分发一份年金给十二位穷人，把收入的五分之一用于慈善事业，修缮农舍，监督教会是否有足够的家具、用品，我找不到任何其他记录了。至于传福音，在人灵魂里结出果子的事工，不管是斯塔姆福德、北基布沃思、西提尔贝里、卡克斯通、诺顿、伊布斯托克还是克里克，我们都一无所知。其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劳德在任何时间把此类工作列入计划。

劳德在 1607 年至 1620 年的十三年间有两件事值得留意。一件有助于启发我们估计，他在自己最为人知的牛津大学形成了什么样的品性；另一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表明他不顾众人反对，推行自己在英国国教除去更正教色彩的计划时，是怎样地强硬。

第一件事是，他因为 1614 年忏悔星期二在大学的讲道令他在牛津受到公开指责。他证道的内容大大触怒了更正教教士，于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兄弟、副校长罗伯特·阿伯特，后来的索尔兹伯里主教，一位非常虔诚、博学的人，认为应该在接下来的复活节在圣玛丽教堂公开回应。

下列几段从阿伯特证道中摘录的话非常重要，表明了劳德真实的神学观点：

“有些人部分是罗马教徒，部分是英格兰人，因时而异，所以人会问他们：‘你是敌是友？’他们假装持守真理，在讲

道中反对清教徒，向我们中间业已确立的信仰的心脏和根基发起攻击。像这样讲道攻击清教徒，是耶稣会会士的仆从来到英格兰勾引年轻学生时才会干的。说白了，他们中有许多人害怕失去自己的位置，所以给出的计策就是，要随意攻击清教徒，认为这就足够了。这些人不能辩解说自己被视作罗马教徒只是因为攻击清教徒，而没有攻击罗马教徒。如果他们在什么时候抨击罗马教徒，也不过是在击打枝叶而已，而且动作非常轻，生怕惊醒了其中藏身的鸟儿。他们所说的话，连罗马天主教徒之间都会说出来，或者他们只是说模棱两可的话，反对教皇的世俗权威，诸如此类。也许他们还会攻击教皇一党的某些褻渎观点。但在自由意志、称义、洗礼后犯罪、自有之义和救恩的确定性等问题上，海对岸的教皇一党也可以说自己的观点跟他们完全一致，国内放弃信仰的人也会以他们为傲。他们在一切事上都是在边缘状态，在任何场合都可能走到对面去。”

这段话无须我多言，已经很清楚。读者很可能会同意我的意见，如果牛津副校长总是像罗伯特·阿伯特一样直白信实地讲话，那么局面应该会不错，而且劳德不是唯一需要公开指责的人。我只希望读者仔细留意这段引文中对劳德的指责。牛津的评价如何，劳德神学的真实本质如何，已经清楚无误地显明了。

另一件事是 1616 年，他在格洛斯特刚刚担任主任牧师后，与格洛斯特主教发生了冲突。他在主教座堂中履职后，第一个举动就是把圣餐桌从从前的位置，诗班中间，挪到东墙边，在原处设立祭坛。今日的许多人已经习惯了圣餐桌在这个位置，两百多年了，所以可能觉得这件事微不足道。但从前圣餐桌摆放的位置对于理解“在北面”这句名言大有启发。1616 年，劳德此举对于所有健全的更正教徒而言非常严重，是要重新引入天主教关于祭坛的观念，鼓励在圣餐中由祭司献祭，望弥撒。若是要丝毫地偏向罗马教，格洛斯特民众是英格兰公民中最不愿意同意的，他们没有忘记善良的胡珀主教，以及他殉道前时常传讲的关于圣餐的教义。格洛斯特主教迈尔斯·史密斯是个圣洁、博学的人，是标准版《圣经》的主要译者之一，此举触怒他超过众人，所以他宣称，要是劳德的方式实行，他就再也不会踏入主教座堂。但劳德面对这一切不为所动。尽管有主教和百姓的反对，圣餐桌还是移动了。主任牧师自行其是，公开忽视主教的话，所以主教再也没有踏入自己的主教座堂，直到 1624 年过世，尽管他的住处离主教座堂只有五十英尺。格洛斯特的更正教民众深受伤害，后果惊人，值得注意——后来内战开始后，格洛斯特的百姓坚决抵抗保王党，为议会顽强战斗，其他任何城市都没法比肩。

这件不幸的事无须我作任何评价。然而，就像阿伯特的讲道，这件事有助于我们洞察劳德的性格，表明他决心按自己的观点而行，不顾这些做法会对更正教教士带来何种感受，表明他就像现在的许多人，一旦主教的意愿和主张同自己相反，就完全忽视。这就是那个在牛津传讲使徒传承的人，当着可敬的主教的面，轻蔑地践踏自己良心的顾虑！尤其，他开始担任公共职位时，在圣餐礼这件事上掀起轩然大波，令圣餐桌的准确位置蒙上了不祥之兆。要不要我提醒诸多读者，牛津运动的第一步也是同样的套路？高举圣餐，迷信地把圣餐桌和周围的一切称为圣，而《圣经》、信纲，更不用说公祷书，都未许可如此行。这就是该学派给我们上的第一课，这个学派已经有许多学者皈依罗马教了。“我是对明白事理的人说的，我所说的你们要自己判断。”

1621年，担任格洛斯特主任牧师五年后，劳德升任圣大卫教堂主教，他的野心再次得到满足，作恶的能力大大增加。一个曾经遭到三位副校长和一位王室神学教授公开反对的人，要坐上拉蒂默和杰威尔曾经的位置，当然需要不小的力量，付出不少努力来推动，才能实现。劳德的朋友此时有了用武之地。他得到这个职位主要的功劳属于白金汉侯爵和著名的林肯主教威廉姆斯。至少，詹姆士国王同意对他的提名时似乎很不情愿。

无疑，部分原因是劳德已经被人们视为冷淡的更正教徒，恶名在外；部分是坎特伯雷大主教阿伯特公开表示不信任他；部分是出于对纯正教义的分辩力，国王严肃地反对任命劳德为主教。国王与威廉姆斯主教之间就此问题的谈话记录在哈克特撰写的威廉姆斯传记中，这段对话很稀奇，清楚地表明不列颠的所罗门（人们如此称詹姆士）并非通常所认为的蠢货。“国王说：‘我不让劳德担任任何有权力的职位，因为我发现他灵里焦躁不安，事情好的时候他看不出来；他喜欢摇摆不定，脑子里想到什么就立即实行，这可能让运转良好之事动摇起来，神是应当称颂的。我不是随口一说，而是他自己让我知道他是怎样的人。’”对此，威廉姆斯只能回答说劳德‘很有智慧，很听话，不久就会找到改正错误的方法。’最后，威廉姆斯的强求让国王厌烦了，说：‘再没别的办法，你非要这么做吗？那你让他去吧。但对我的灵魂，你要忏悔。’于是怒气冲冲地走了，并说了其他重要的话，预言劳德会带来恶果，态度十分激烈。”詹姆士国王多么有先见之明，后来劳德卑鄙的忘恩负义多么令威廉姆斯苦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但1621年，四十八岁的劳德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爬上了主教的位置。

教会和国家的每个地方都强烈地感受到了劳德可悲的影响力。1621年之后的二十年里，他卷入了每一场重大的运动，

过多深入这些事超出了本章的范围，会让人物传记变成史书。我可不想这么干，最多只能给出最主要的事件及其时间。

1622年，他成为白金汉公爵的“告解人”。1626年，他成为巴斯和韦尔斯主教，兼任王室教堂主任牧师。1628年，他成为伦敦主教。1630年，当上牛津校长。1633年，他升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和都柏林大学校长。1640年，他最终从高位跌落，1641年被打入伦敦塔囚禁。

他在这最后二十年如何行事，如何像众多平信徒那样以旺盛的精力卷入政治，如何成为白金汉、斯特拉福德、温德班克这样的人以及其他可疑角色的朋友，如何插手教会和政府的一切事务，如何令自己成为英格兰——从怀特岛到特韦德河畔伯立克、从兰兹角到北佛兰——最不受欢迎的人，最后没有哪件不管政治上的还是教会事务上的错误，人们不会惊呼：“劳德不是插手了吗？”当时的历史学家及时地记录下了这些事。这些事太多了，细说的话太费时间。

他这二十年的生涯有一个显著特点。他总不改变，一直都是一个样，总在搞破坏，总在玩同样的把戏，总是达到同样的目的，总是提倡同样的神学原则，就是因为这些原则，令他在牛津声名狼藉。1622年，在他成为主教不到一年，他协助发布了王室对教士的六条禁令，其中有一条是：“任何主教或主

任牧师职位之下的人，都不得传讲预定论、拣选、救恩的普世性、有效恩召、不可抗拒的恩典等艰深论题。”1621年，他设法压制了一个想要购买报告、任命好教士的协会，这个协会主要发起人是著名的高吉博士。协会被拆散了，筹集的钱被充公。1631年，他给伦敦的圣凯瑟琳·克里教堂祝圣时，施行了非常迷信的仪式，拜偶像般地向圣餐桌并饼和酒敬礼，人人都猜测他渴望重新引入罗马教。1632年，他逼迫索尔兹伯里书记官谢尔菲尔德，因为后者打破了圣埃德蒙教堂的一扇有绘画的窗，而这扇窗本来是这个教堂已经要拆除的。劳德的惩罚十分严苛，可怜的谢尔菲尔德被星室法庭处以一千镑罚金。1633年，劳德再版《消遣书》，罔顾国民对安息日的感情，并忘恩负义地践踏林肯主教威廉姆斯的感情，以大主教身份巡视他的教区，反对他关于圣餐桌的公开观点。1634年，劳德迫害伦敦的法国人和瓦龙人的教会，并压逼爱尔兰教会放弃了他们优秀的信纲。1636年，他准备了臭名昭著的《苏格兰礼拜仪式》，并送去苏格兰。这份文件直白地教导真实临在，令天主教徒额手称庆。他试图让苏格兰人敬拜中使用这份文件，结果令苏格兰全地怒火中烧。1637年，他禁止包括名震天下的奥利弗·克伦威尔在内的一大群清教徒移居美洲，强迫本想离开的一些重要人物留在英格兰，结果这些人后来扰乱教会和国

家。同年，他逼迫普林、伯顿和巴斯特威克，说他们出版暴力作品，对他们处以每人五千镑的高额罚金、终身监禁和骇人听闻的割耳刑。1640年，他触犯了宪法的首要原则之一，竟未经议会同意就召开特别会议通过法政牧师人选。他的丑陋恶行还可以轻松地列出更多。当然，在此不可能详细探究。二十年之久，他伙同党羽一道进行了一场丑恶的战争，在主教的权位上攻击这片土地上某些最圣洁、最优秀的牧师。劳德掌权期间，许多知名人物遭受迫害，他们被迫沉默、被处罚金、下监或不得不逃亡欧洲大陆，他们的名册列出来的话会令人悲伤，看看就知道了：约翰·罗杰斯、但以理·罗杰斯、多马·胡克、多德、希尔德夏姆、沃德、科顿、布里吉、阿穆斯、谢帕德、巴罗夫斯、格林希尔、卡拉米、瓦特利、威尔金森、古德文，这些人的小拇指都比劳德的整个身体更属灵。但他们每个人都令劳德不悦，劳德采用这样那样可耻的方式来对待他们。简言之，劳德一党认为清教主义是比公开的败德行为更大的罪，不从国教这微不足道的行为比违反十诫更坏！当时事情真的发展到这个地步了：人会说你可以撒谎、赌咒发誓、酗酒，不会有人理会的；但成为清教徒，或不从国教者，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

我认为，没有哪一个人像劳德那样不知疲倦地推进自己那套特有的神学观念，也没有谁像他那样如此无视自己的行动造

成的恶果。如果他用于抵制加尔文主义者、迫害清教徒、提拔阿民念派和向罗马教靠拢的热情——格林多尔、惠特吉夫特和阿伯特已经揭露过——能有一半用来宣传福音信仰，英国国教定会大大蒙福。不幸，在他身上我们看到——就像在许多其他人身上一样——“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此外，谬误的人往往远比正确的人更加不知疲倦。不管哪个时代，法利赛人、耶稣会会士、异端分子为了达到目的，都会走遍洋海陆地，翻遍每一块石头，而此时号称更正教战士的人却正在呼呼大睡。劳德的时代也是如此，而恐怕今日尤甚。

结局最终还是来临了。英格兰人民的忍耐最终完全到了极限。不幸的君主查理一世想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统治这个国家，经过一番不得体的长久努力，他还是不得不于1640年召集鼎鼎有名的长期议会。从下院第一次会议开始，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命数就定格了。何李斯、皮姆、德令和盟友们立即抨击斯特拉福德和劳德，不给他们喘息之机，直到把他们送上断头台。这两位高官受到狠狠的攻击，而议会罕见地一致同意；各派的人，甚至像福克兰大人那样安静的人，说起英国国教时都语气强烈。这些有趣的史实在《拉什沃思选集》、梅写的《长期议会史》或《斯托顿论内战中的教会》等书中都有记载，表明劳德的政策长期以来在公众心里造成的不满有多深，人们有多么

厌恶他。英格兰人动作慢是出了名的，说来古怪，他们也怯于反抗既有权威。因此，英格兰人竟如此狂暴起来，以至于在下院这样对待劳德，可想而知他们委曲求全多么久了。

1640年12月18日，劳德下狱，直到1645年1月10日。此间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伦敦塔中度过的。对他的起诉共有十四条，实质内容如下（在此照搬勒巴的话）：

1. 背信弃义地努力颠覆国家的基要法律，努力劝服国王说不经议会同意也可以征税。
2. 支持鼓吹建立专制权力的证道，支持这类书籍的出版。
3. 在威斯敏斯特大厅阻挠公正的事业。
4. 背信弃义、腐败地出卖了公义，竟建议国王出售法官官位和其他公职。
5. 在没有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偷偷摸摸地发布了一本教士名录，不合法地收取对这份文件的捐款。
6. 在教会和世俗的事务上都自以为拥有教皇般的专制权力。
7. 竭力破坏神的真信仰并引入罗马教般的迷信和偶像崇拜。
8. 篡夺许多教会职位的提名权，提拔有罗马教思想的人、教义不纯正的人或者败坏的人充任。
9. 将书籍的出版权颁布给出了名的对改革后的宗教不满的教士。

10. 努力让英国国教与罗马教会和解，给神甫和教皇提供情报，允许在这个国家建立罗马教式的等级制度。

11. 禁止许多敬虔的牧师发声，阻碍传播神的道，却对亵渎和无知之事呵护有加，让国王的许多臣民逃离这个国家。

12. 竭力在英国国教和其他改教教会之间制造龃龉，逼迫在英格兰的荷兰和法国教会。

13. 竭力在苏格兰王国的宗教和政府领域引入人为的新花样，挑起两国战争。

14. 为让自己免遭对这些叛逆之举的质询，劳德竭力阻挠召开议会的传统，激怒国王反对所有议会。

以上即是不幸的大主教遭受的指控。1644年，劳德终于接受审判，罪名在此基础上，又加上其他十项较小的指控。对比一下日期，就知道他在牢里苟延残喘了四年。对这个跌落的高级教士来说，真是痛苦的日子啊！他的朋友斯特拉福德被处死、内战的诸多战斗、国王的失败以及被罚款两万磅，无疑都让他痛苦不已。1643年，下院提出动议，应该不经审判和聆讯就把劳德送去美洲的新英格兰；他的一些仇人显然很希望用这种方式来驱逐他。但动议未能执行，最终，1644年秋，他被审判。

至于审判本身，我能说的不多。也许并不公平，是英格兰

历史上蒙羞的一页，就像史书中记载的许多由国家施行的审判一样。起诉人是普林，他对劳德恨得咬牙切齿。检方拿走了劳德私人的书稿和日记，无休止地使用，而他不得不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为自己辩护。随着审讯的进行，许多项指控显然证据不足，无法满足任何真正公正、不偏不倚的法庭。想要研究这个案件，可以研究《坎特伯雷的命运》这本对开文件里，普林自己对这次审讯的记述。但显然，法官们已经早就有结论，要定劳德的罪了。尽管劳德进行了辩护，甚至普林都承认他的辩护“充分、堂而皇之、简明扼要”，尽管明显缺少合法证据能证明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最终，迁延日久后，法庭宣告坎特伯雷大主教有罪，判处死刑。

1645年，劳德在伦敦塔中被处死。给予他的唯一照顾是行刑方式用了斩首，而非绞刑。他上断头台时的举动勇敢、体面而镇定，值得尊敬。他死前的话也十分凛然。其实，可以像对其他人那样，说他“死时的表现是一生中最出色的”。他遭处决只不过是司法谋杀，跟托马斯·莫尔和克兰麦的遭遇一样，对此我毫不怀疑。但我决不能承认他配称“殉道者”。成为殉道者是因为正义的事业，而非因受刑的轻重。我承认劳德死得英勇体面，但我决不能承认他没做什么激怒人反对他的事，或者在一切对他的指控上都全然无辜，又或者是为正义事业而死

的。

至此，我们已经考察了劳德从摇篮到坟墓的生平。剩下的，就是要指出他的一生给我们上的深深一课，对今日的英国国教广泛而清晰的启发。但首先，我希望讲讲三件有争议的事，即劳德真正的品格，他的方针和目的，以及他的方针导致的后果。我很清楚，围绕这几个问题引发了诸多争议，所以不指望所有人都同意我的看法。但我将坦率地给出自己的观点，请读者自行评判。

他真实的品格如何呢？该怎样评价他呢？我的答案恰恰在两个极端中间。劳德既不是一些人认为的大好人，也不是另一些人认为的大坏蛋。一方面，称他是圣徒，殉道者，英格兰的居普良，显然太荒谬。这种夸张的溢美之词没有任何根据。另一方面，把他刻画成邪恶的妖魔，魔鬼之子，也同样荒谬，没有证据。来看他的本来面目吧。他不是个败德贪婪之人。很少有哪个大主教在自己身上的花费如此之少，却把财富慷慨地用于促进学业，增强英国国教的物质设施。他是个热情真挚的教士。没人能否认，对于他全心全意投身于发扬自己认为纯正的“教会观点”，也为此搭上了自己的一切。他认为自己是在做正义的事。但只有热情，却没有正确的方向，就十分可悲了。过去的经历已经充分证明，在教会的各个时代，心存好意、办事认

真的人，如果心胸狭窄、短视、对人性无知、固执，就会成为最会制造麻烦的人。劳德正好完完全全是这样的人。

我相信，他并非耶稣会会士或罗马教徒。他同费希尔的谈话，以及成功地应付奇令沃思，完全推翻了这种推测。但称他为纯正的更正教教士就简直太荒谬了。他从未掩饰自己对纯正更正教神学的厌恶，终其一生都在阻碍这种神学。在他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后，教皇两次给他枢机的头衔，仅仅这件事，就足以说明他在做什么了。这表明他留给外国人怎样的印象。

认为他是个属灵的人，心中真的领受了神恩典的福音，这种看法缺乏证据。其实这个问题很微妙。我们断不可论断他！不过，否认他留下的文字中缺乏完全的福音、实践的信仰，是徒劳的。他的作品中，缺乏任何真的有益于人心、有益于灵魂的内容。他的七篇证道空洞贫乏，甚至比不上他自己一派的人的讲演，比如安德鲁斯。他的私人“日记”包含许多迷信和弱点。他的信件并不属灵，也不引人注目。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同时代的阿谢尔、戴弗南、何尔和西布斯等人的作品取十页来，其中有益的神学内容就比劳德全部作品中的还要多。必须要讲出真相。劳德更多地是个政治教士，是教会里的亚希多弗，狂热捍卫自己那一党、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秩序，而非基督的仆人，传讲福音，牧养灵魂。他为了前者献出了全部，日夜操劳。至

于后者，他毫无使命感，所以根本没投入什么时间，这不在他的计划之内。他本人究竟如何，内心深处有何种感受，我不会装模作样地去解答，只有在末日才会显明出来。我还抱着希望和怜悯，所以停笔不谈了吧。

下面我们来看劳德的方针。他的方针是什么？是什么驱使着他一生的行为？他想干什么？目标何在？我不相信某些人说的，他真的想让英国国教倒退成罗马教的样子，或者若有可能，打算与罗马教会重新合并。我认为这么说的人太过头了，没有充足的根据。但我坚决认为，不管是否有意，他的努力带来了危险的结果，迟早会倒退回罗马教。我相信，劳德的想法是让英国国教比起他看到时不那么像更正教，不那么加尔文主义，不那么像福音派。我相信，他认为我们那些出色的改教家做得太过头，时针应当往后拨一大截。我相信他钟爱的理论是，应当在宗教改革和罗马教之间占据中庸位置，可以既维持台伯河畔的圣彼得大教堂^①的仪式主义和圣礼主义，又能让泰晤士河畔的圣保罗教堂免遭腐蚀，保持独立。一句话，他并不想重归梵蒂冈，但希望借用他们的部分原则，根植到兰伯特宫^②。在

^① 台伯河位于意大利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是罗马教廷的象征。——译注

^② 兰伯特宫是英国国教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官邸，在此指代英国国教。——译注

这样就能解释他的所有方针政策。从牛津圣约翰学院开始，直到被打入伦敦塔，他的目标不是要让国教罗马化，而是要除去更正教色彩。有人认为这个区别太细致，太微妙。我不那么看。

“罗马化”是一回事，“去更正教化”是另一回事。

这就是为何他一直反对自己所称的“加尔文主义”。要是能让当时流行的更正教神学令人厌恶，就会令他高兴，因为该神学描绘的恩典教义与反律主义以及拣选和弃绝的极端看法不可分割。他很清楚，精心挑选的绰号对一项神学事业的损害超过一切。

这就是为何他对圣餐桌的位置那么用心良苦。他不仅是为了阻止人以不敬、褻渎的方式使用圣餐桌，还要高举圣餐中的圣体，稍微向弥撒献祭靠拢一点。

这就是为何他支持关于教会职位的夸大观点，似乎对于一个教会，这是必不可少的。英国国教在长老会的日内瓦教会与罗马教会之间占据中庸位置，正符合他的口味。顺便提一句，这种观念在今日也经常出现，但非常荒谬，就好比说怀特岛在英格兰跟法国之间一样！

这就是为何他不断迫害、取笑讲员们，在英格兰大地上阻碍教义性的讲道。他希望人们认为圣餐是基督教最重要的部分，而非传讲神的道。

这就是为何他尽可能引入那些历史上的仪式，比如他在给圣凯瑟琳·克里教堂祝圣时那些震惊整个伦敦的做法。他希望向公众表明，英国国教应该跟罗马教一样注重感官，华丽得引人注目。如果我们没有弥撒，那么执行公祷书中的圣餐礼时也要出色地模仿弥撒。

这就是为何他阻挠利用讲道和文章抨击罗马教，并就此进行审查，下令删除当时许多优秀书籍中的大段内容，禁止发表。他希望削弱国家对罗马教本质的口气，让人们对其滔天罪行不那么敏感，对他的事业不那么警醒。

最后，但不是最次要的，这就是为何他一直在向教会里引入并提拔阿民念派，还有他自己一派的半更正教神学家。乌伦、蒙塔古、梅恩瓦令就是他中意的那类人的典型。他从未放弃任何此类机会。他知道支持朋友、为己方确保一切与地位、权力和影响力相关的好东西非常重要。他始终在执行一个计划，即尽可能多地安排自己人坐上高层教士的位子。

我坚信，这些就是劳德所采取的方针真实的原因。他总有一个目标，一天都没有忽视。我们承认他一以贯之、顽固不移地追求实现目标，但决不要忘了他的目标真实的本质是什么。他是要除去英国国教的更正教色彩。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讲几句。劳德的方针政策带来了什么

后果？我可以说的不多。我相信，某些认为他遭到谣言中伤、尊他为所谓的大公教会原则复兴者的人，会说他做了许多好事。但对此，我完全不认同。我坚持认为，他对改革后的英国国教的损害空前绝后——加德纳、邦纳、博勒枢机和玛丽女王造成的损害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我已经说了，他的本意很可能是好的，也凭良心去做了。我确信，他认为自己的政策是为神和英国国教做好事。但他的政策直接和间接的结果都是灾难性的，造成的损害、制造的恶果到了极处。看看都是些什么后果吧。

劳德的政策造成的一项直接后果是教士对纯正更正教的感情普遍下滑，再也未能复原。劳德实际上得到了许多支持，也是个办起事来大步向前的大主教，因此许多人贪婪地吞咽下他的原则和观念。从那时起，教会的界限之内就迅速聚集起一派团结一致的神职人员，严重削弱了教会。这种下滑有多深有多广呢？劳德时代罗马教廷派往英格兰的使者潘扎尼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个国家当时的状况。他尤其提到，1636年劳德的挚友蒙塔古主教悄悄告诉他：“他和弟兄们已经准备好遵从高卢教会^①的方法和原则。”“只有三位主教会激烈反对罗马教会，

^①高卢主义是法国17世纪盛行的一项运动，承认教皇的属灵权威，但主张教会有权管辖教皇，国王与主教能限制教皇在法国的权力。——译注

即莫顿、戴弗南和何尔。”“至于在讲道和书籍中对天主教的憎恶，”蒙塔古说，“只不过是形式，为了迎合潮流，无须太关心。”看这位英格兰主教的话多漂亮啊！从中可见劳德的神学传播有多迅速！

劳德政策的另一项结果很不一样。整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对英国国教产生了一种疏离感。英格兰大众逐渐开始厌恶国教，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宗教团体主要是在迫害清教徒、禁言传道人、积极地进行审查、高举形式、神化圣礼并恭维罗马教制度。大众很少能进行良好的区分，在评价各种组织机构时，主要是看他们做了什么，绝少关心理论和大原则。渐渐地，全国民众开始将主教制同专制联系在一起，将《礼拜仪式》同形式主义联系在一起，将英国国教与罚款、监禁和惩罚联系在一起。巴克斯特的自传为当时普遍的看法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因此，当长期议会召开，几乎一致对可怜的古英国国教持厌恶态度，真令人心痛。英格兰各郡和各个市镇的代表都完全厌恶教会当权派，少有例外。攻击国教的人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影响力上，都排山倒海般地完全吞没了为国教辩护的人。这都是劳德的作为！他让大部分平信徒心生厌恶，失去了中产阶级的民心，让国教的朋友变成敌人。

最后，劳德的政策最糟糕的直接结果是英国国教暂时灭亡

了。教会革命发生，最终膨胀为一种恐怖统治。中产阶级遭压抑的感情一旦释放，就爆发成一场飓风，把英国国教框架内的一切吹得一干二净。主教、主任牧师和教士，还有《礼拜仪式》，都被当作垃圾清除。不管好东西还是坏东西都一样毁灭。血腥的内战爆发了，查理一世也跟着斯特拉福德和劳德上了断头台。教会和国教的一切都颠倒了。最后，只能靠军事独裁者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铁腕来维持秩序。王权和主教法权都一同废除，逐出教会，零落尘埃。这些都是劳德的作为！他播下风种，收获了龙卷风。

这些就是劳德政策的直接后果。我真希望他造成的损害就只有这些，但很不幸，还有间接的后果，直到今日我们还感受得到其恶劣影响。英格兰对英国国教的感情因劳德的事业而完全混乱，失去平衡。而平衡再未恢复。

劳德有害的愚行启动的钟摆已经剧烈摆动了两百多年。一开始，当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对国教的钟爱强烈反弹，什么都忘了，没有学到教训，节制与宽容被当作了耳旁风。可恶的《统一令》通过了，两千名当时最优秀的教士被排除在国教之外，永远失去了在国教中的地位。接下来是很长一段阴郁的时间，英国国教停滞不前，像一只冬眠的树懒，虽然存在，依附在国家这棵大树上，但却几乎没有生命活力、一动不动、没有

呼吸。一世纪之后，在光荣的教士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主导下，真正的更正教复兴到来了。但主教们既不理解、不欣赏这场复兴，也不进行引导、管理、利用、鼓励，没有留住这场复兴。于是循道会永久地建立起来，不从国教的教会数量猛增。最后，就是我们眼前的这番景象——纯粹属于更正教的英国国教允许半数人口游离在羊栏之外，从指间流走；广大不从国教者既不喜，也不信任，更不重视国教！这一切的首要原因是什么？我再次用一句话回答，就是因为劳德大主教的致命方针！他撒种，我们收获结果。他让整整一代的英格兰人憎恨英国国教，毫不信任她。这种感情流传至今。

现在我要指出劳德的历史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我已经尽力给读者展现他是个怎样的人，他的品格，他的方针政策及其结果。其实您定会相信，在每个题目上，可以谈的还有很多。但我必须跳过事情的表面，留给读者自己去补充。如果我能让人思考和阅读，令他们对马斯登的《清教徒史》和斯托顿的《教会史》这样的书产生兴趣，那么本章篇幅虽短，却不会归于徒然。现在来看看，从劳德的历史学到了哪些有实践意义的教训：

从本章学到的第一项功课是这样的：劳德的历史表明，任何去除英国国教更正教色彩的企图都会让教会组织自讨苦吃。

任何人，不管他地位有多高——大主教、主教、主任牧师还是会吏长，不管他品性多么好——诚挚、热心、认真负责、博学、虔诚、慈悲、克己，只要他想重新把罗马教教义和罗马教仪式引入英国国教，那就是教会的敌人，损害了教会的根本利益。

我也不会绝对无误，在这一点上不会比教皇更好。我没法比其他人取得更多独家信息。但我坚决、清楚地确信，今日大部分国教教友不希望罗马教重回教会。也许，有些贵族和上层人物可能喜欢感性、做作的宗教，看不到接近罗马教的道路有什么害处。但大多数中产阶级还有最睿智的底层人民，不会喜欢任何形式的罗马教，不愿为之付出任何代价。如果你想硬塞到他们嘴里，他们就会离开教会各走各路。不再会有恐怖的统治，也不会有教会的地震。不会再有国家操纵的审判。我们周围的劳德和蒙塔古，如果有的话，不会被带去塔山斩首。但中产阶级会离开主教、主任牧师和教士，离弃教会组织。他们会高喊：

“这不是我们的安歇之处，因为已经被罗马教污染了。我们必须立即离开。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

那将会怎样呢？教会定然会因缺乏信众而灭亡。只有将军和军官没法组成军队，而只有主教、主任牧师、诗班和教士也无法组成教会。当然，政教分离必然到来。圣乔治海峡这边跟

对岸一样^①，少数人的教会不会幸存太久。自由党的政治家也许不会再垂怜可怜的老教会及其主教座堂、教区教堂，还有可能不再捐款。如果“人民大众”不仅是君王的荣耀，也是教会的荣耀，那么英国国教的荣耀会永远褪去。空空如也的教堂大厅和唱诗班座位都会写上“以迦博^②”。教会组织会分裂，或变成众多教派之一，就像苏格兰圣公会一样。而史书上会记下，英国国教因为自杀式地试图从更正教褪变回罗马教，从而失去了所有崇高品格。

不！对于中产阶级和底层人民中的睿智者，我只知道他们希望国教教会组织是更正教的，否则宁可没有国教教会组织。他们可能不是思想深刻的人，但他们知道三百五十年前罗马教是什么样子，不想再让罗马教回来。他们知道宗教改革前神甫的专制、弥撒献祭、可憎的告解是什么样子。就算有最轻微的回旧事的征兆，他们都会本能地厌恶，这种厌恶是合宜的。他们没法作出细致的区分，但他们黑白分明，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如果他们看到教会里有任何模仿罗马教、复制罗马教仪式的企图，他们就会立刻起疑心。我敢放胆直言，那些激起他

^① 圣乔治海峡是爱尔兰和威尔士之间的海峡。在这里，这边指英格兰（可能也包括威尔士），对岸指爱尔兰，是天主教国家。——译注

^② 意为“没有荣光”，参见《撒母耳记上》4:21。——译注

们的这种疑惑的教士，尽管热心、认真负责、本意良好、慷慨好施，但也不是英国国教的朋友，是在做损害极大的事。

第二项功课是：劳德的历史表明，一小群人也可以对一个教会造成何等大的损害。一小群人团结起来一起行动，力量也是巨大的。一小撮心意坚决的人为了作恶而聚集在一起，清楚地看到了目标，不断且不择手段地朝着目标前进，那么他们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最初劳德在牛津圣约翰学院的行动只是小小的一步，但后来的结果却巨大无比。

我斗胆明言，这一点太容易遭人忽视了。过去三十年里，许多人低估、轻视牛津运动，这对英国国教造成的伤害之多无人能及。纽曼、蒲赛、基布尔和理查德·弗劳德刚开始发起这项运动时，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好像不过是比巴掌还小的一片云而已。但现在，相比而言，他们发展到了怎样一种可怕的比例。半边天都乌云密布了。

我记得很清楚，有位尊敬的牛津的朋友，现在已经过世了，他五十年前在一次私下的谈话里呼吁切斯特主教萨姆内尔和校长雷克斯注意这件事。我也清楚地记得，这些贵人听了，露出怀疑的微笑，显然认为我们太年轻，目光短浅，大惊小怪。“这只不过是暂时的谬见，很快就会消散。”这片云很快就会过去。但那时我认为他们并没有正确地估计危险有多大。我怀疑他们

两位有生之年都改变了主意。

所以，我们别低估了礼仪派的力量，尽管其支持者看起来很少，他们用来搞罗马教的教堂数量也相对较少。这派人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少，在全国上下都有不少同情者，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相机而动，不能因为规模小就轻视。在持久战中，少数人往往笑到最后。

不是吗？要想想威灵顿公爵的座右铭，轻敌是战争中最大的错误，会带来大灾。必须认识到，今日的礼仪运动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纯正的教友需要尽最大努力阻止他们毁坏英国国教。如果我们轻看火药库中的一火星，海堤上的一条小缝，船上一点点的渗漏，电缆上的一点点裂纹，要塞中的一小撮叛徒，那么就可以轻看礼仪派，因其支持者就像起初劳德一党一样，似乎相对较少。

最后一项功课是：劳德的历史表明，平信徒也要及时关心英国国教的处境，这极为重要。很清楚，两百年前，阻止英国国教全部回到罗马教的唯一原因是平信徒的反对。更不用说劳德时代如果没有平信徒的反对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不认为他想让兰伯特宫的教皇服从梵蒂冈的教皇，但我坚信，如果再有二十年，他可以不受反对地、系统性地坚持除去国教的更正教色彩，就会把一代人“教育”成半罗马教徒，为倒退回罗马教

铺平道路。由此可见，当时不是主教和教士在保护国教，而是下院中认真对待此事的平信徒。我承认，他们的措施是暴力的，手法粗鄙野蛮。他们虽然在某些方面做了好事，但他们毫不顾惜人命，在某些方面也造成了巨大损害。但是，我坚持认为何李斯、德令、皮姆、汉普登等人的作为实现了一件事，即阻止国家倒退回巴比伦。那时他们把罗马教踢出了英国国教。就算打内战也比重回罗马教要好。

我希望，今日的平信徒决不要忘记这一点。他们是英国国教真正的希望。我们的未来大大取决于他们行为和路线。如果他们干坐着什么都不管，那等着我们的只有祸事。如果他们像祖辈那样兴起，要求教会中不得有罗马教式的新事物，圣餐中不得有除去更正教色彩的行为，那么我们还有希望。要打赢这场战斗还不算太晚。一旦平信徒兴起，喊出古老的口号：“我们不会改变英格兰的制度^①；我们要更正教的教会制度，否则宁可不要教会制度。”那么，我就不会对英国国教绝望。

有一条结论非常清楚。我们不管怎么看待劳德，英国国教现在都处于关键的时刻，每个人只要反思一下就会承认这一点。这条船上划桨的人已经把船划到漩涡里了。冲突的各方已经撕

^①这一句原文为拉丁文。——译注

裂了国教，她已经处在险境。没有哪个教会像她那样，里面有那么多完全针锋相对的神学学派。这种状态不能持续下去。许多人会问：“结果会怎样？不能这样下去了。这个病人会活下去，还是死掉？”

通常在这种病情下，意见纷纭，医生众多，处方各式各样——有顺势而行的疗法，也有对抗性疗法。每人都有自己的“万灵药”和“和平提议”，说：“只要用这种办法，教会就会康复。”我们注意到，人们严肃地提出了许多补救措施，热切地希望引人注目，包括——更宽泛的圣餐条件、更宽松的信条和信纲、修改礼拜仪式、教会分区、增加主教数量、与西方教会联合等等。每种方法都有支持者，都保证会有效果。对于这些措施，我毫无信心。有两三种完全是破坏性的。其中最好的也不是现时病症所需要的。我认为这些措施都完全打错了目标，没有触及疾病的症结。

我的心意完全立定了。我知道只有一种办法能治疗我们心爱的教会，就是在我们中间复兴彻底的更正教原则和神学——灿烂的宗教改革的原则，拉蒂默、胡珀、杰威尔的神学。我不敢说神会不会给我们这样的复兴，也许我们已经时日无多。没有这样的复兴，我对未来毫无希望。我们只会越来越堕落，最终像以弗所教会一样，灯台被挪去。有了这样的复兴，一切就

都有盼望。平信徒会再次成为盟军，神的灵会浇灌给会众。神，我们父辈的耶和華神，会赐下祝福。

我说平信徒会成为盟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下，许多平信徒中的佼佼者采取骑墙态度，英国国教只跟他们有非常松散的联系。他们厌烦、憎恶教会里半罗马教毫无约束地增长。他们看到，如果容让罗马教坐在神的殿中，那么更正教的主教和信纲都毫无用处。他们可能不是思想深刻的神学家，对大公教会原则和古人也不怎么熟悉，但满足他们并不难。他们知道，并且也感受得到，什么能给他们益处。他们需要平白清楚的更正教敬拜，平白清楚的更正教讲道。如果在教会里得不到，很快他们就会离开，去往别的教会。教会里的大部分中产阶级和受过教育的底层人民不需要各种各样的圣服、旗帜、列队行进、焚香、牧师权杖、受难像、不停地鞠躬磕头以及任何徒有其表的东西。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华而不实的玩具，只能取悦孩童，满足年轻的闲人懒汉，无知、不动脑筋、迷信的人。但不能满足中下层人民中人到中年、慎于思考、工作努力的人。他们需要粮食，心灵的粮食，良心的粮食。如果在现有的英国国教里找不到，他们就会去别处找。要给他们平实清楚、简明、忠于《圣经》的敬拜，平实清楚、简明、忠于《圣经》的讲道；给他们讲基督钉十字架的古老往事，让他们里面的人感受到圣灵真实

的工作；给他们关于悔改、信心、圣洁的宝贵功课。有了这些，他们就不会离弃国教。我再强调，重拾彻底的更正教原则和更正教神学是教会今日需要的，是治愈教会疾病唯一的良药。

现在，我要用一位伟人的话来结束本章，这段短短的话值得特别注意，部分是因为他的声名和品性，部分是因为这是他临终受刑前写的。这个人就是威廉·罗素大人。詹姆士二世统治期间，1683年，他蒙冤被控谋反，在林肯旅馆草地被斩首。记载我要引用的这段话的书是1820年小罗素伯爵为罗素大人写的传记。下面这段话出自这位高贵的受难者在受刑前不久写给朋友的信：

“我过去相信，现在也仍相信，罗马教正在渗入这个国家，没有什么能阻止其推崇者停止实施他们的计划……我真是痛心，竟有那么多更正教信徒帮助他们。但我希望神会保守更正教信仰和这个国家，尽管这种信仰恐怕要遭受非常巨大的试炼和苦难。”

这些严肃的话是多么痛苦的预言！如果英格兰的贵胄和高级教士、议会成员和教士在17世纪像这位受死的爱国者罗素大人那样，清楚地看到罗马教“正深入这个国家”的危险，那么这个国家的状况在19世纪将会好得多。



理查德·巴克斯特 (1615~1691)

理查德·巴克斯特

有些事值得回顾，了解这些事将让我们学到对现在和将来都有用的教训。信仰的历史就是如此。蒸汽机、电力、铁路和燃气让今人的条件同过往两个世纪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圣经》和人心并没有改变。两百年前，人们在信仰的事情上怎么想怎么做，现今的人也一样。十七世纪的英格兰人怎么想怎么做呢？应当去了解。

正如有些事值得回顾一样，有些很久以前的时代也值得特别留意。有一些时代中，仅仅一代人身上发生的事就给一个国

家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在那个时代，一群民众最珍视的权利出现了，并在内战和宗教争议的苦恼中变得生机勃勃。本章将要谈论的时代就是如此。

英格兰人应当为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深深地感激巴克斯特生活的年代。我们对巴克斯特领衔的那群高贵的大军应该给予的感激实在是太多了，任何人都无法与他们相比。他们就是清教徒。而热爱宗教自由的人对理查德·巴克斯特应有的感激超过清教徒中的其他众人。

我完全清楚写这个人的传记有多困难。很少有历史学家把这个题目处理得公正合宜，原因仅仅是他们不了解属灵的信仰。没得救的人肯定会觉得清教徒时代的宗教争议很愚蠢。这样的人没资格对这个问题说三道四，就好像瞎子不能谈论画作一样。没有哪个英国国教的教士讲论这个题目后，会免于公开的误解。如果他赞扬反对主教的人，人们就会怀疑他对自己的教会不满。但对于英格兰人而言，对这个题目上有清楚的见解是最重要的，我必须请读者要有充足的耐心来听我细细道来。如果我能纠正某些错误的印象，能够在这些危险的时代提供一点引导人的大原则，那么我觉得读者就可以从本篇传记中获益了。如果“巴克斯特和他的时代”不能吸引读者的兴趣，肯定责任不在这个题目，而是在我。

巴克斯特生活的时代包含了海量有趣的事，因此我不可避免地会略过部分历史事件。

我说的是什么时候很清楚——他生于1615年，死于1691年。他的一生几乎都在同一个朝代的统治之下，该家族统治英格兰既没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益处，也没给他们自己什么益处。这个朝代就是斯图亚特王朝。巴克斯特经历了詹姆士一世、查理一世、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的统治，最后在威廉三世在位时去世。在共和国和内战期间，巴克斯特都是最杰出、最聪慧的人。他见证了君主制和英国国教的倾覆，以及这两者后来的复辟。他与克伦威尔、劳德、斯特拉福德、汉普登、皮姆、蒙克、克拉伦登、弥尔顿、黑尔、杰弗雷斯和布雷克同时代。在他生活的时代，英格兰君主查理一世、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爱尔兰总督斯特拉福德被公开处决。他生活的年代经历了瘟疫、伦敦大火、威斯敏斯特会议、长期议会、萨沃伊会议，以及《统一令》导致两千名最优秀的牧师被逐出英国国教。这就是巴克斯特生活的多事之秋。当然，这些事我无法一一细说。这些事的历史构成了一幅巨大的图画，就像密西西比移动全景画一般，没法一目了然。我只想定睛于这幅画中的几处首要的场景，因为我认为这些要点最有可能对现今的世代有所启发。

巴克斯特时代的历史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倒退远离更正教

宗教改革原则，这发生在他年轻时。英国国教中的传道人和作家开始引入一些拉蒂默和杰威尔绝不会赞同的教义和实践。纯正的福音教导遭到公开谴责和诽谤，被冠以“加尔文主义”这似是而非的名号。像戴弗南这样的好主教遭到冷落和非难，而蒙塔古和伦这样的坏主教却备受吹捧，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教会当局贬低讲道，高举仪式，离谱地夸大主教制的好处。灯台和十字架，一切罗马天主教的装饰，都出现在了一些教堂里。可憎的《消遣书》侵犯了主日的圣洁，鼓励英格兰普通百姓像法国人那样度过主日。此前一直矗立在讲台正中的圣餐桌被挪到了教堂东面，围上了栏杆，亵渎地称之为“祭坛”。无疑，有人大声抗议这些削弱、破坏教会的行为，但搞这些动作的人不为所动。

整场行动的主导者是劳德大主教。这个不幸的人是不是真的打算让英国国教跟罗马教会重新联合，恐怕在末日之前永远不会有答案。但有一件事很确定，没有谁像他那样彻底地搬弄罗马教那一套。

就像古往今来的许多作恶者一样，劳德把自己住的屋子弄塌了，砸在自己的头上。他最终掀起了一场风暴，令教会、王权和主教都一同崩塌，他自己也受审丧命。但英国国教再没能从劳德时代受到的损害中完全复原。

从他的时代起，教会里一直不乏牧师秉持劳德的大部分原则，偶尔还大胆地迈出脚步施行出来。莎士比亚的话真是字字珠玑：

“人的恶行贻害后世。”

玛丽女王对英国国教的损害完全没法跟劳德相比。

决不要低估了一个胆大的坏人能够带来的危害，尤其是在信仰上。谬误的种子就像蒲公英，风吹走一朵，就能播撒一整块地。一个汤姆·潘恩^①就能在全世界培养出不信者，一个劳德就能给数代人难以言述的损害。绝不要以为极端的礼仪派是英国国教合法的子嗣。他们不是。在斯图亚特时代之前绝少听到这样的论调。也不要以为，所谓的牛津运动或礼仪派是最近的新发明。不是这样的。这种思想两百年前就已经有了。极端礼仪派的祖宗就是劳德大主教。记住这些事，就能从巴克斯特的时代学到一些功课。

巴克斯特时代的历史中，另一项吸引眼球的事件是查理一世和自己的议会之间的内战。

所有的战争都是罪恶的，有时是有必要的恶行，但仍然是

① 潘恩是英裔美国政治活动家，曾为美国独立战争摇旗呐喊，后来又参加法国大革命，作品广为流传。他主张自然神论，反对基督教。——译注

恶行。而所有战争中，最令人痛苦的是内战。这是一种大家庭内的争端，得胜者并不光彩，因为是同自己的弟兄打仗。边山、纽堡、马斯顿荒原、纳西比和伍斯特这些地名^①唤起的只是痛苦的回忆。

每场战斗中的获胜者流的都是本国同胞的血，削弱了整体国力。

但关于查理一世与议会之间的内战，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尤为令人痛苦。保王党完全漠视信仰、道德败坏，这对他们的损害超过了议会召集的所有军队。一开始，成千上万坚定、安静的人保持中立。但当他们发现，一个人给家人读圣经、一起祷告，就会被当作圆颅党而遭迫害，他们就不得不为了自卫加入议会军。简单地讲，许多保王党的邪恶和放荡驱使敬虔的人成为他们的敌人。当然，议会一方也有许多虚伪、狂热之徒，保王党中也有一些好人，比如福克兰大人。但是，我毫不怀疑，为议会而战的人之中拥有真信仰的人远远超过为国王而战的一方。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知晓人性的人都不会对内战的结果感到吃惊。鲁珀特亲王、威尔莫特、葛令率领的酗酒、赌咒发誓、喧嚣作乐的部队，面对克伦威尔、费尔法克斯、埃雷顿、哈里森、

^①英国内战中，这些地方均发生过激烈的战役。——译注

弗利特伍德和德斯博罗夫带入战场的祷告、唱诗、读经的战士，完全不是对手。坚定的人日久就会成为最出色的战士。如果一方的支持者有强烈的信仰原则，这样的一方很难失败。“尊重神的，神必重看他。藐视神的，他必被轻视。”

在结束讲论内战之时，我要给出一项综合的评价，以及一个提醒。综合的评价是，虽然我们对内战极为惋惜，但另一方面必须记住，这个国家拥有的自由、卓越的宪法很可能要归功于这场内战。神能让恶事带来善果。查理一世与下院翻脸之后，英格兰在专制和混乱，混乱和专制之间动荡了许多年，非常暴力。但我们仍必须承认，很可能就是在那段日子里，英格兰人脑中学会了伟大的政治功课，直至今日仍在造福我们。君主们明白了，他们必须满足于在一定的轨道上行动，就像天上的行星一样，没有得到自由的议会下院同意，就不能统治已经启蒙的百姓，无法向他们征税。列国都明白了，拆毁比建造要容易得多，推翻古老的君主政体比建立令人满意的政府取而代之要容易得多。我们国家许多殊荣的根基都是在共和国时期打下的。对此，我们应当牢记。这个国家应当对布鲁克、汉普登、艾略特、怀特洛克和皮姆大为感激。

我要就查理一世的死刑提醒一下读者。要清楚，大部分清教徒并未参与审判、处死国王。许多人以为整个议会一方都要

对这一邪恶、不当的政治行动负责，这种看法大错特错！大部分长老派强烈抗议处死国王。巴克斯特在自传里明确说明，他跟其他许多牧师一道表达了对这一做法的憎恶，用尽一切办法阻止其实施。这件事是克伦威尔和军队里直接支持他的人干的，罪孽应该归到他们头上。的确，大部分清教徒拥护议会一方。但他们完全没有反对王权，也没有支持处死查理国王，这些清教徒是完全无辜的。铭记这一点，就能从巴克斯特时代的历史中学到一些教训。

巴克斯特时代历史的又一项特色是强人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崛起和他的行为。

很少有人像奥利弗·克伦威尔这样遭受那么多的谩骂指责。有些人把他描绘成邪恶、虚伪的妖魔。没有什么恶语不能加在他身上。但这种评价显然荒谬，反而颠覆了作出这种评价的人的目的。他们忘了，英格兰居然容忍这样的妖魔统治那么久，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这个亨廷顿酿酒师的儿子能一跃成为那个时代最成功的将领，在这个国家当了许多年说一不二的独裁者，那么仅仅从这些事实表面看来，他就必定是个极不平凡的人。

坦率地讲，我认为卡莱尔和多比内对克伦威尔的评价比较符合实情。我不能像后者那样彻底，断言克伦威尔是个诚挚的基督徒。这个问题我不回答。我不会冒险以任何方式作出评述，

因为我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料来判定。如果我只看他的私人信件，无疑会称他为得救的人。但当我留心他的一些公共事务，就觉得他如果是基督徒就太不可思议了。看到他同时代的巴克斯特和其他好人怎样怀疑他，我对他属灵状况的怀疑就愈发加增了。简言之，我对这个问题心存疑虑，但不打算继续探究了。

我并不怀疑奥利弗·克伦威尔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格兰人之一。也许，没有谁用剑获取了无上的权力后，会像他那样克制地使用权力。他担任护国公这段短短的时间里，恐怕欧洲各国对英格兰的惧怕和尊重空前绝后。他的名号就让人战栗。他宣称会让英格兰人的名声像罗马人那样大。他确实成功了。他公开宣布，不会容忍更正教信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受到侮辱。他持守了诺言。当萨伏伊公爵开始迫害瓦勒度派时，克伦威尔立即干预，直到公爵的军队撤出他们的村庄，归还这些可怜人的财产和房屋。当法国尼姆的一些更正教信徒遭到法国政府迫害性政策的威胁时，克伦威尔下令驻巴黎大使紧急抗议，要求停止这种行为，若遭拒绝就立即离开巴黎。实际上，据说法国宰相马萨林枢机一听到克伦威尔的名字就会大惊失色。这位枢机主教惧怕克伦威尔甚于魔鬼，在法国已经众所周知了。至于教皇，当克伦威尔派遣布雷克指挥一支舰队进入地中海，去同托斯卡纳公爵一起解决一些事的时候，他就下令

在罗马游行，主持人要露面四十小时，以避免神的审判，拯救教会。简言之，英格兰更正教在欧洲的影响在克伦威尔时代达到顶峰。

我也要提醒读者注意，除了以上事实之外，克伦威尔的政府也非常宽容，而在那个年代人们普遍不理解为什么要宽容。克伦威尔的私生活无可指摘，在全国上下强化了道德标准，而在斯图亚特家族掌权时，人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标准，十分可悲。这些事都要记在心头，我想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轻率地盲从普遍的观点，认为克伦威尔是个邪恶虚伪的人。要确信，这个人得到的评价应该比通常的看法要高得多。尽管他有缺点，但他为国家做了大事。不要因这些缺点而无视他的伟大之处。让我们把他列在伟人之中。如此一来，就能从巴克斯特的时代学到功课。

巴克斯特时代还有一个特征，我认为绝不应当忽略，即斯图亚特王室治下的英国国教无知轻率得像是在自杀。

我不太情愿涉及这个话题。我是这个教会的牧师，诚心实意地爱着她。但我发现自己的教会并非没犯过错，我必须承认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她犯下了一些巨大错误。但我决不能说，所有成员都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阿伯特、卡尔顿、戴弗南、何尔、普利多、乌舍尔、雷诺兹和威尔金斯等主教不管是在教

义上还是实践中都没有参与这些错误。但很不幸，这些好人往往在教会里是少数派。我希望读者注意的是多数人管理教会事务的方式。应该了解这个问题，因为这样才能清晰地看待这个国家不幸的宗教分歧的历史，因为这是同巴克斯特的人生密切相关的事。

我说教会无知轻率得像是在自杀，指的是她长久以来试图倚靠痛苦和刑罚来强迫不从国教者就范，禁止私人宗教活动。教会经常讨伐每个违反其总则或者做了任何与其习惯相悖之事的人。多年以来，成百上千的人被召去执法官那里，罚款、下监，经常有人遇害。原因却并非他们干犯了福音或者十诫，不是因为他们公开攻击教会，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违反了一些卑劣的次要教会法条——违反这些法条比遵守更光荣——或者因为他们悄悄地聚会以获得教会的公共聚会无法给予的属灵造就。一方面，有好人因为写了反对主教的话，就被割耳切鼻！雷顿大主教的父亲就遭受了这样的刑罚！另一方面，有条法令规定，五人以上的聚会如果采用了英国国教《礼拜仪式》之外的宗教活动，那么参加者就要被罚款，或者初犯坐牢三个月，再犯坐牢六个月，第三次就要坐牢七年！许多人在有超过四个熟人在场的时候，就不敢进行家庭祷告！有些家庭在有五个外人在的时候，都不敢进行谢饭祷告！这就是 17 世纪斯图亚特王朝统治

之下英格兰的状况。

这一可悲政策的结果可想而知。被迫害一方愤愤不平，对自己受洗的教会大为不满，他们深信结出这样果子的组织，原则上必然是低劣的。人们听到《礼拜仪式》这个词就会恶心，因为他们的记忆中这是跟罚款、监禁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看到主教往往威胁到善工，而非恶行，于是厌恶主教制。巴克斯特就此在自传中写下的话非常引人注目：“主教们越是想用惩罚来制止分裂，就越加认为自己是在逼迫信仰的敌人，亵渎者的领袖。”

明白人性的人，谁想尝尝这样一种感受？大部分人会评判一个机构是根据其管理层的表现，而不是其理论上的优点。当普通英格兰民众看到，一个人只要不违反教会的教规就可以为所欲为；看到人们可以赌博、赌咒发誓、酗酒却不会有什么令他们害怕，但在聚会结束后聚在一起唱诗祷告却会受到严惩；看到不虔不敬、无知、放荡、道德败坏、挥霍无度的人只要遵从教令，参加自己教区教堂的礼拜，就能平平安安地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而谦卑、圣洁、本着良心、读经的人，有时去了教区之外的教会，就被重罚；看到查理二世及其一党的人自由自在地喧嚣着挥霍国家的财富，而该国像巴克斯特、简金那样的圣徒却被下在监里；当普通英格兰人看到这些

事，他们就很难去爱做了这些事的教会了。而在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之下，英格兰许多郡都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如果这都不是无知轻率得像在自杀，那我不知道什么才算是。教会把好人赶出团契，是在帮助魔鬼，的确是在放自己的血。

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国教多数人犯下的最愚蠢的错误是1662年的《统一令》。时值查理二世上任伊始，君主制和教会刚刚重建后不久。

这项声名狼藉的法令将给所有英国国教牧师设置了任职的条款和前提，而这样的条件自从宗教改革以来从未有过。清教徒的良心无法容忍这项臭名昭著的法令，因而他们被迫离开教会。如果是为了这个目的，那么该法令完全成功了。一年之内，至少两千名教士宁可失去饭碗也不接受该法令中的条款。这两千名教士中的许多人都是当时最优秀、最有才华、最圣洁的牧师。许多人曾经过主教的按立，不受干扰地在国教中侍奉了二、三十年，现在却突然命令他们接受新的升迁条件，因为他们拒绝，就丢了饭碗。伦敦的六十个重要教区当即失去了牧师，留下的会众就像没有牧人的羊。再没有比这不可取的可耻行径更能让一个更正教教会的历史蒙羞了。

这一行径很不光彩，因为完全违反了查理二世回国前在布雷达的承诺。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英国国教应在广泛而自由的

基础上重建，以满足清教徒不安的良心，查理二世作出了这样的承诺，所以才被迎接回国。如果没有清教徒的帮助，他永远不可能回国。但一旦国王权力稳固，就悍然违背了自己的承诺。

这一行径很不光彩，因为一些小小的退让就能轻松地让大多数遭驱逐的牧师留在教会中。他们并没有死硬地反对主教制，也没有反对礼拜仪式。根据巴克斯特的估计，稍微改动一下祷告，允许敬拜时有适当的自由，就能令两千名牧师中的一千六百名满意。但掌权者决心毫不退让。他们不希望清教徒留在国教。当有人对主导这一行径的谢尔顿大主教说，他认为许多清教徒会服从、接受《统一令》时，他答道：“恐怕他们会。”为了展示教会当权派的精神，他们还增加了祷告文日程中的可疑事项的数量。他们竟把赶出清教徒，引入彼勒^①和恶龙当作可喜可贺的事！

这一行径很不光彩，因为被驱逐的牧师有许多都是大有能力、成绩斐然的人，本来为了把这些人留在教会里，应当作出重大让步。巴克斯特、珀尔、曼顿、贝茨、卡拉米、布鲁克斯、华森、查诺克、卡里尔、豪、芙莱维尔、布里吉、杰金、欧文、古德文，这些人的名字直至今日仍为众教会所称道。把他们赶

^①彼勒是巴比伦敬拜的偶像，参见《以赛亚书》46:1——译注

出教会的人根本没法与他们比肩。多数派的名字鲜为人知，但他们拥有权力，并诉诸权力。

这一行径很不光彩，因为全世界都看到，英国国教的领袖就像现在的波旁王室一样，在流亡期间根本没有吸取任何教训。他们忘了劳德的糟糕政策让英格兰经历惨痛。他们没有明白，调解和让步是教会治理者最优秀的风度，而长远看来，迫害的政策必然失败。

我不敢在这个问题上停留太久。我可以轻松地讲述巴克斯特时代更多糟糕的事。我可以提起 1665 年的《牛津法案》，该法案禁止不幸的遭驱逐的牧师生活在任何集镇方圆五英里之内，以及他们讲过道的地方方圆五里之内。但我所讲的已经足以证明，我之所以说英国国教无知轻率得像是在自杀，并非没有理由。无知轻率之举的结果，任何知道英格兰的人都已经明白了。这个国家更正教四分五裂的现实就是证据。

我一直在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之下英国国教掌权一派的政策。我并没有感受到巴克斯特和他遭驱逐的弟兄对《统一令》的那种良心不安。尽管我很尊敬他们，却认为他们的判断错了，误入歧途。但是我认为谢尔顿大主教和那些拒绝让步满足他们要求的人，比他们错得更离谱，误入歧途更远。我相信这些人撒下了无尽分裂的种子，伤害了英格兰真信仰的事业，也许再

也不能修复。他们埋下了英格兰不从国教者的根基。我相信，他们满不在乎地丢掉了行善的黄金机会。他们本可以明智、适时地让步，轻松地令我心爱的教会比现在更加有效、有用得多。但他们拒绝如此行，非但不采取调和措施，反而推行可悲的《统一令》。对他们的行动，我没有丝毫共鸣，一想到就深感遗憾。

讲论巴克斯特的时代，就不能不给读者一条忠告——请不要尽信讲论斯图亚特王朝时代的作品。也许，没有哪个时代像斯图亚特王朝时期那样，让偏见和党派之争扭曲了历史学家的眼光。如果有人想得到关于那个时代真实公正无偏的历史，我强烈推荐马斯登的《清教徒史》，我认为他的这两卷书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宗教史籍。

现在我们来查看巴克斯特本人。不了解他的时代，就很难理解他的品格和他的为人处世。关于巴克斯特，有一些清楚的事实比其他事情更能让我们谨记那个时代。

理查德·巴克斯特是什罗普郡一个小地主的儿子，1615年生于该郡的罗顿，他外祖父阿德尼住在那里。

他很早的时候，就受到了宗教熏陶，为此，他要感谢神给他一位虔诚的父亲，从小就训练他。那时，什罗普郡是一个非常黑暗、不敬虔的地区。牧师普遍无知、没有恩赐、不会讲道，可想而知，人民放荡败德，轻视美善之事。在伊顿·康斯坦丁，

郊区居民在主日有大部分时间是在围着老巴克斯特先生家附近的五朔节花柱跳舞，令他悲伤厌烦。但即使在这样的地方，在他儿子身上，恩典也胜过了世界，理查德成为“从幼时就侍奉主”的高贵大军中的一员。

神喜悦用来引人认识他的信仰书籍的书名总是十分有趣。在巴克斯特身上作用最大的书是邦尼的《决断》、珀金斯的《论悔改、生与死以及管住舌头》、考沃威尔的《论信心》和西布斯的《压伤的芦苇》。疾病和面临死亡更加促进了他里面的属灵之工。他在自传中说：“疾病和痛苦帮助我研究怎样死去。这又令我研究怎样活着，研究那些我必须从中获得目的和安慰的教义。”

二十二岁时，他被伍斯特主教索恩博罗夫按立为教士。他从未上过大学，先是在罗克赛特上了一所免费学校，后来又在勒德洛受教于一位家庭教师，相比起来，他如饥似渴的求学之心对于他的学识贡献更多。很可能，在他开始教会侍奉时，他的神学装备比当时大部分年轻人都要强。他获得牧职显然并不仅仅是懂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他获得牧职开始事奉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他是个重生得救的人。他这样说自己：“我知道，缺少学历可能让我受大多数人轻视，但想到来生很快就到来，我里面对悲惨灵魂的关心就胜过了一切障碍。我意识到自己渴望

人们良心觉醒，得到拯救，所以认为如果赢得一两个灵魂归向神，就足以弥补我因为没有学历而从人那里遭受的全部羞辱。”

从受按立一直到死，巴克斯特一生总在经历着大起大落，身体和心理的巨大折磨。有时一帆风顺，有时步履维艰；有时受人赞扬，有时遭受逼迫；一时在基德敏斯特的小路上进行问答式讲授，又一时在萨沃伊会议上与主教们争辩；有一年面临死亡的关头，在宁静的乡间宅院里写下《圣徒的安息》，又一年在克伦威尔军中担任随军牧师；有一日查理二世给他担任主教的机会，又一日却因《统一令》被逐出教会；有一年同克伦威尔就君主制争辩，告诉他君主制是一种福气，另一年却又在杰弗雷斯面前被控写作煽动性的作品；一时宁静地在阿克顿黑尔法官的社团中生活，另一时却因穷凶极恶的教会迫害而在监狱里饱受折磨；一日在比尤德利教堂跟通布斯先生公开讨论婴儿洗，另一日在阿莫夏姆教堂从早到晚反驳反律法主义者的神学论据；有时候传讲最浅显的教义，有时却处理最深奥的抽象问题；有时撰写论文给有学问的人看，有时却写作给贫苦大众阅读的小册子。也许再没有哪个基督教牧师像他这样扮演这么多不同角色，当然，也没有哪位牧师拥有他那样无可指摘的名声。他一直饱受不治之症的折磨，绝少能长时间免于病痛；他的头脑一直在工作，从未闲懒一天；表面上看起来他事情很多

无暇分心，但却从不拒绝新的工作；他生活的时代有最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但他却坚持每日与神相交；他并不完全属于任何派别，各派却都畏惧、尊敬他；他有太多保王派的特点，难以取悦议会派，却又跟议会过从紧密，而且太圣洁，难以受保王党欢迎；他太像主教制的支持者，难以令清教徒中的激进派满意，但又太过于像清教徒，不受主教们信任。很可能，没有哪个基督徒像理查德·巴克斯特那样，尽管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却如此难享安息。

1638年，他开始事奉，在达德利的阿珀尔教会讲道。他在那里讲了一年，就搬去布里吉诺思，在那里待了一年零九个月。然后他去了基德敏斯特。两年后共和国动乱开始，他退隐考文垂，坐观内战进程。纳西比战役后，他离开考文垂加入议会军担任随军牧师，空想着能在士兵中间做些好事，抵消克伦威尔及其友人野心勃勃的企图。1646年，他因病不得不放弃随军牧师的职任，在生死之间挣扎了数月，此间他住在德比郡墨尔本的约翰·寇克爵士家和伍斯特郡罗斯棱奇的托马斯·罗塔斯爵士家，他们都热情款待他。1646年底，他回到基德敏斯特，继续担任教区牧师达14年之久。1660年，他离开基德敏斯特去往伦敦，为查理二世复辟出力不少，成为国王的随扈教士。在伦敦，他接连在圣顿斯坦教堂、黑修士教堂、圣布莱

德教堂讲道。稍后，国王给他赫里福德主教的职位，但他拒绝了。1662年，他成为因《统一令》而被逐出教会的两千名牧师之一。被逐出教会后，他立即娶妻，妻子在各方面都与他般配，与他携手同行十九年，举案齐眉。这位妇人就是什罗普郡阿普利堡的玛格丽特·查尔顿。婚后，他住过伦敦及附近的多处地方——阿克顿、托特里吉、布卢姆斯伯里，最后是切特豪斯广场。仇敌对待他的可耻行径令他几乎居无定所。这段日子里，又一次他获得去苏格兰任主教，还有担任一所苏格兰大学校长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他在人生的最后二十九年不断遭受迫害、被罚款、入狱、面对挑衅般的论战，苦毒不堪。有机会他就会讲道，不能讲道就写书，反正一直在做工。光荣革命后，威廉三世继位，他不再受逼迫，可以稍稍喘一口气了。但不久，1691年，死亡令这位善良的老人去了安息之地，在那里“不再有恶人搅扰，劳苦的人可以安息”，享年七十六岁。

以上就是巴克斯特的一生的概要。他是斯图亚特王朝最杰出的清教徒之一，也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忠心的福音工人之一。当然，相信这份概要还可以无尽地扩充。但我只能把注意力放到几件首要的事情上。如果我讲得不够，那并不是因为没话可讲。如果有人想知道为何巴克斯特的名字在英格兰伟人中占据如此高的地位，就请花一点时间，让我来讲原因。

其一，巴克斯特个人极其圣洁。少有人像他那样活在公众眼目下五六十年，却誉满天下，毫无瑕疵。许多人恶毒残忍地仇视他，却没法找到他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他看起来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所处的各种环境下都圣洁：身为儿子、丈夫、牧师、朋友都保持圣洁。顺境中圣洁，逆境中也圣洁；病痛中圣洁，健康时也圣洁；年轻时圣洁，年老时也圣洁。俄姆在巴克斯特的传记中说得好，他是极其“不属世”的人。他与神、与基督同行，天堂、死亡、审判和永恒都一直浮现在他眼前。他不关心今世的美事，主教的职位报酬丰厚、备受尊荣，却没能打动他。他也不顾及世界的敌意，绝不会因怕人不悦就偏离自己的道路一分一毫。他对人的赞美和责备都无动于衷。他不管是在克伦威尔还是查理二世及其众主教面前都勇敢得像一头狮子。对寻求如何得救的穷苦百姓，他却温柔得像只羊羔。为了良心，他会像十字军战士一样狂热，而对于所有诚心爱耶稣基督的人，他又以包容的心来对待。“不管他从不从国教，”他会说，“我高兴的是基督传开了。”他是个真正的谦卑人。有人写信给他，表达对他的仰慕，他回复道：“你是在倾慕自己所不认识的人。要是认识的话就不会犯这样的错了。”考虑到巴克斯特忍耐了惊人的试炼，这个国家绝少有他这样的基督使者了。请记住巴克斯特的这一优良品性。

对世界而言，没有什么论据比圣洁、一以贯之的生活更有恒久的说服力了。记住，达到这样圣洁水平的人也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愿巴克斯特的榜样能鼓励我们。愿我们记住巴克斯特的主、他的神并未改变。

其二，巴克斯特是英格兰教会历史上最有力的传道人之一。他似乎拥有成为完美的“大众导师”应有的全部恩赐。他有惊人的口才，海量的记忆，清楚明白的叙述方式，强有力的命令，简明扼要、强调式的表达真理的方式，特有的动人嗓音，像急流般席卷一切的热忱。他常常说：“要让人认真听、认真遵守，讲道就必须认真。”他有一句名言，表现了他的品格：

“我讲道时就好像再也没有机会讲道一般，就像将死之人讲给将死之人听。”

同时代的贝茨博士说：“他讲话妙语连珠，很健谈。他的风格中有一种高贵的省略。他不屈就煽情的雄辩之语，鄙视浮华的演讲术。但他自己的表达方式清晰有力，令人信服，能够刺入人心，让人感动，遇见这样聪敏的人都不能令你喜悦的话，那你就如同蝥蛇一般聋。”

他的讲道产生的效果就是福音的效果，福音一直有效，将来也会有效。拉蒂默和怀特菲尔德的讲道发挥了什么作用，巴克斯特的讲道就发挥了什么作用。在达德利，贫穷的制钉工人

挤满了教堂，甚至有人爬到窗子上，外面的屋檐下也都是人。在基德敏斯特，为了容纳会众，不得不修建五个新的楼座。在伦敦，他讲道时人山人海，有时去听讲道甚至会有危险，经常挤不进去。

当他要在杰里的圣劳伦斯教堂讲道时，写信给该教堂牧师瓦因斯，说萨福克伯爵和布罗格希尔大人要一起来，希望能给他们留座。但当他与这两位贵宾一同到达时，人群并没有表达对这两位贵宾的尊重，他们甚至没法挤进去听道，只得回家了。瓦因斯自己也不得到讲台上，坐到巴克斯特身后，因为没有立足之地了。而巴克斯特讲道时，其实就站在瓦因斯两脚之间。

有一次，他去舰队街的正统斯坦教堂给一大群听众讲道。证道期间发生了事故，于是他就借着这件事进行了引人注目的讲解。教堂尖顶上掉下来一块砖，于是有人发出警告，说老朽的教堂就要塌了。几乎就在警告发出的同时，一根长凳承受不了上面站的人的重量，断了，于是现场更加混乱。许多人涌向门口逃命，慌乱不堪。有个老妇人大声祈求神赦免她又来到教堂的罪，并许愿说，如果平安出去，就再也不来教堂了。所有人都慌了神，但巴克斯特从容镇定，不为所动。秩序恢复之后，他起身说道：“我们是在聚会敬拜神，以预备我们自己，而这个世界将要毁灭，那时天都要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

所以应当对这世界的大喧嚣无所畏惧。”这就是巴克斯特，这就是他不仅有神的恩典，而且有恩赐和勇气去做的事。他说话的口气总是像一个看到神、感到死亡就在背后的人。

这样的人不可能讲不好。这样的人不会缺少听众。凡是有谁想知道神会借着他的灵为一个亚当的后代行作怎样的事，就应该把这样的人存记在心里。这样的人当受颂扬。

其三，巴克斯特是有史以来牧养教区和会众最成功的牧者之一。他来到基德敏斯特时，那是个黑暗、无知、败德、不敬虔的地方，也许有三千居民。十四年后他离开时，成功地把该教区的情况颠倒了过来。“他来之前，”贝茨博士说，“这里就像一块干旱贫瘠的土地；但他的劳苦得到了属天的祝福，使得这里有了乐园的风貌。坏人变好，好人更好。”定期领圣餐的人平均有六百人，巴克斯特说：“这些人中，我不能对其真挚抱有美好盼望的人，不超过十二个。”教区居民完全尊重并遵守主日。据说，“穿过街道时可以听到一百户人唱诗，复述证道内容。”当他来到这里时，一条街上大概只有一户人在家里敬拜神；当他离开时，有些街道上，不在家敬拜神的家庭不会超过一户；甚至在旅馆和酒馆里，人们都敬拜神。即使最不虔诚的家庭，也往往都有得救的亲戚。“有些穷苦人精通神学，居然理解了整个系统神学，能就困难的争议作出判断。有些人

的祷告有序、丰满、表达合宜、语言圣洁、充满热情，少有牧师能与之比肩。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脾性和生活的纯洁比他们的恩赐更值得称道。”

巴克斯特用来达至此等惊人的成功的手段是入户探访和定期的个体牧养。这种方法无疑带来了巨大益处，尤其是在当时，这是件新鲜事。不管怎样，比起巴克斯特在基德敏斯特所采用的方法，现代最精细的教区组织也没能产生同样的效果。我相信，真正的原因在于，没有哪个教区有巴克斯特那样的中流砥柱。有些神职人员还在为主教制和长老制争论不休，或者为遗弃和自由意志咬牙切齿之际，巴克斯特却总在挨家挨户走访、劝诫。当别人涉足政治，在今生的瓦砾中“埋葬他们的死人”之时，巴克斯特却在过十字架的生活，每天传讲福音。我怀疑他是英格兰曾出现过的最好、最聪颖的教区牧者，是许多当代的教区长和教区牧师应当效法的对象。我再说，难道我没有权利呼吁大家不要让这么闪光的器皿生锈暗淡，遭人遗忘吗？这样的人当受颂扬。

其四，巴克斯特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勤恳的属灵作家之一。很少人对巴克斯特在自己活跃的五十年里写下的海量神学作品有些许的了解。据估算，他的作品加起来足有六十卷八开本的书，至少有三万五千页，而且字还很紧密。当然，这些作品并

不都有同样价值，许多并不值得精读，就像他施来的船只不仅有金银和象牙，也有许多猿猴和孔雀。然而，不管怎样剔除次品，巴克斯特的作品总的来说包含海量的坚固真理，而且经常以一种出众、精妙的方式来讲述这些真理。巴罗博士的话可谓中肯：“他实践性的作品从不需要修正，他的辩论作品绝少能被驳倒。”威尔金斯主教也说：“他在所讲论的每个题目上都造诣匪浅，要是他活在古代，定能成为教父。一个时代有一位巴克斯特那样的人就足够了。”伟人威廉·威伯福斯^①说：“他的实践性作品是基督徒智慧的珍宝，”“我必须恳求将这位伟人列入英国国教最闪光的人物之中，而他却在1662年被无耻地逐出国教。”

巴克斯特写下了三部大师级作品，没有谁能说其他人的哪部作品一定优于这三部：《圣徒的安息》、《改革宗牧者》和《呼吁未得救者》。我相信这些书已经造福了成千上万人的灵魂，仅此就足以令其作者位列顶级属灵作家的行列。《呼吁未得救者》一年印了两万册，有六兄弟读了这本书同时得救。宣教士艾略特非常看重这本书，将其译为印度语言，是他在《圣

^①威伯福斯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废奴运动的领袖，在他和战友的努力下，英国废除了奴隶制度，并派军舰去非洲阻止贩奴。——译注

经》之后翻译的第一本书。的确，要是我们考虑到巴克斯特的所有作品都是在繁重的工作、严重的逼迫和缠累的病痛下完成的，就不仅会惊叹他竟然如此多产，而且作品竟然如此优异。像他这般殷勤、珍惜光阴，真是世间罕有。我再说，难道这样的人不应受颂扬吗？

其五，巴克斯特是英格兰有史以来为了良心的缘故最能忍耐的殉道士之一。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像我国的更正教改教家那样以鲜血见证自己的信仰。但他也曾受逼迫、下监，这跟流圣徒的血一样是“折磨至高者的圣民”。他也“终日被杀”，在某种意义上比死在火刑柱上还要糟。如果有什么事能试炼信心和忍耐，我相信一定就是像巴克斯特人生最后二十九年里不断遭遇的那种迫害。他没有抢夺任何人，没有谋杀任何人，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信奉异端。他相信《信纲》的全部内容。然而，今日没有哪个盗贼和重刑犯像这个好人那样遭受无耻地对待。要列举他被传唤、罚款、禁言、下监、驱逐有多少次，恐怕难以穷尽。要描述加诸他身上骇人听闻的屈枉正直，既令人痛苦，又没有益处。我只会举一个例子，即他在首席大法官杰弗雷斯面前受审。

1685年，杰弗雷斯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审判巴克斯特，罪名是发表煽动性文章，说他最近的《新约》讲解在影射攻击主

教。没有什么指控比这条罪名更缺乏根据。这本书流传下来了，任何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被指控煽动的段落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福克斯写的詹姆士二世在位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审判他真实的动机是想要惩罚不从国教教师中的重要人物，他在自己一派信众中享有盛誉，而据信这样的人会支持辉格党的政治观念。”

一位旁观者用了很长的篇幅形象地记录下了那场审判，生动地显明了巴克斯特时代的司法机构是怎么断案的。

审判一开始，当局想作出怎样的判决就已经一目了然。英格兰首席大法官的举动就好像他是检察官，而非法官。他屈尊俯就，竟然同辩方争吵，用的是谩骂的语言，似乎是在伦敦的鱼市场骂街，而不是在法庭上。他一次又一次地威逼辩方律师，不准他发言，甚至用猛烈抨击巴克斯特的话来打断他。

有一次，大法官宣称：“这是个老流氓，用他在基德敏斯特的教义毒害世界。他鼓励所有大姑娘小媳妇用缝衣针和顶针来同蒙福的国王打仗。这是个搞分裂的老恶棍！虚伪的罪犯！”

不久，他又骂巴克斯特，“老笨蛋，不知感恩的恶棍，自负顽固的疯狗。吊死他！”他说，“这个老家伙羞辱我们教会的制度和原则已经够多了，一百年都擦不掉。但我要为此教训教训他，因为他该受鞭打，在城里示众。”

一会儿后，当巴克斯特开始为自己辩护时，说了两句话，

杰弗雷斯就打断他，喊道：“理查德，理查德，你以为我会任你毒害法庭？理查德，你这个老家伙，老坏蛋。你写的书可以装满一辆马车，就像鸡蛋里满了肉，每本都充满了煽动性、甚至可以说叛国的言论。要是四十年前就鞭打你，让你停笔，那该多好啊。你假装是在传讲平安的福音，已经一只脚踏入坟墓——现在是时候想想，你打算怎么样来为自己交账。要让你自己决定的话，我看你仍会死不回头。但靠着神的恩典，我要照顾一下你。我知道你的同党很有能力，犄角旮旯里到处都藏着你的同伙，等着看你这有能的鸽子会有什么下场。但借着全能神的恩典，我会把你们都碾得粉碎！来啊，你要辩解些什么，老坏蛋？来，说啊！”

这场审判中，还有许多类似的，甚至更糟糕的话。上述提炼的内容只不过是整场审判小小的一部分。无须多言，巴克斯特在这样的法庭上肯定会被判罪名成立。法庭判决罚款五百马克，显然他无力支付；在付清罚金之前，他不能出狱，而且还要签字保证在七年里行为良好。结果，这位可怜的年老病弱、无儿无女的鳏夫，七十岁了还在南华克监狱待了两年！

这样的审判是英格兰司法的耻辱，对那些制造这起冤案的人——即那些侦探和推事——来说更是耻辱，对此，我想在本世纪已经无须再说什么了。感谢神！不管怎样，我相信英格兰

已经跟这样的审判说再见很久了，尽管在其他地方还有这样的事。鼓励下贱的告密者的国家，用法律来威慑圣洁之事、合乎圣经的信仰、思想自由，而非威慑罪恶败德之事的国家，用司法来实现政治目的或者为教会卑鄙地泄愤的国家，其实很可悲！

但要知道，面对如此不公的检察和司法程序，巴克斯特仍不失慈悲，恒久忍耐。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他说：“有一天，人们定会明白这些事，一些更正教信徒逼迫其他更正教信徒，真是愚蠢！”他遭辱骂时，并不还口。他对诅咒还以祝福，以祷告应对折磨。殉道者以烈火焚身来荣耀神只不过是一天，而巴克斯特却被所谓的更正教信徒虐待了二十年！我再说，难道我不该告诉你们应该纪念这样的人吗？这样的人当受颂扬。

我想现在我要说的话已经讲明了。我相信，有一些很久以前的人，研究他们将对对我们大有裨益，巴克斯特就是其中之一，一位真人，真正的属灵英雄。

我不是让人把他当作完美无缺的人，比克兰麦、加尔文、诺克斯、卫斯理更强。我一点也不想为巴克斯特的某些教义观点辩护。他试图将不可能系统化的东西系统化，没有成功。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像欧文、布里吉和特雷尔那样清晰全备的福音。我也不认为他的判断一直都正确。他拒绝出任主教就是

个大错误，是弃绝了行善的大好机会。要是巴克斯特当上主教，进入上院，我相信《统一令》就不会通过了。

但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必须以他们为真基督徒的榜样，为他们感恩。必死的凡人不可能毫无瑕疵。就巴克斯特而言，恐怕没有哪位英格兰福音传道人高过他。总有人在这样、那样恩赐上比他更优秀，但绝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同时拥有那么多恩赐——卓越的圣洁生活，传道时惊人的力量，无与伦比的牧养技巧，不知疲倦地殷勤写作，遭受逼迫时温柔忍耐，这一切都属于同一个人。让我们将他列在伟人名单的前列，给他应有的尊重。能成为理查德·巴克斯特同国的人是我们的荣幸。

我要提醒一下，今日自由宗教团体的成员更应该感谢巴克斯特和他的战友们。

我们可以为了信仰的目的，在福音传道原则的基础上同工协作，没人会阻碍我们。我们可以大群人集会，相互劝勉，携手侍奉基督，没人会来阻止。我们可以为了信仰的目的集会，读神的话语，彼此鼓励坚守信仰，没人敢禁止。这些权利多么可贵！对于在罪恶世界的风浪中航行，想要行善的基督徒来说，结社、集会、同心协力彼此鼓励的益处难以数算。劳苦挂虑，把基督徒组织在一起的人，他们所做之工当受颂扬。他们播种的工作会有艰难坎坷，但他们可以确信，所撒的种日后必然结

实百倍。

绝不要忘了我们享有的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应该归功于哪些人。不要忘了，曾经，情报人员会跟踪我们，警察和士兵会粗暴地冲散埃克赛特会堂的集会，我们一旦行动就会经受痛苦、刑罚、罚款、下监。绝不要忘了，我们现在享有的幸福有益的自由是长期不懈斗争的结果，是一群高尚的人流血受苦换来的，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绝不要忘了，为我们赢来这些自由的人就是饱受苛责的清教徒。

是的！我们所有人都应当感谢清教徒。我们生活的那时代，有人费尽苦心想要诋毁他们。在生活中，常常听到人贬损他们，说他们在凯撒的事上是桀骜难驯的悖逆之人，在神的事上是无知、狂热、伪善的人。在大学里，有些骄傲自大的年轻人被所谓的“使徒传承”这一刚刚羽翼丰满的新观念煽动起来，以一点点官方权威为傲，蔑视、嘲笑清教徒，好像他们不学无术，没有真信仰，然而这样的年轻人根本不配坐在他们脚前给他们搬书。我相信，我们决不应随从这样的诽谤和不实之言。

让我们静下心来想想，如果把纯正的教义、灵性和学识结合在一起来看，清教徒是英格兰神学家中的佼佼者。尽管他们也有错误、弱点和不足，但在斯图亚特王朝，英格兰只有他们持守了纯正福音信仰的灯台，只有他们阻止了劳德的罗马教倾

向，避免了把英格兰带回罗马的怀抱。是他们为信仰自由而斗争，我们收获的自由正是他们的果子。是他们挫败了误入歧途的教会高层引入这片土地的宗教迫害之气。应给他们当得的荣誉，不要容忍任何人在我们面前轻忽他们，记住我们欠他们的债，纪念他们，为他们的声誉大胆地站出来，绝不要惧怕为他们的事业申辩。他们的事业是纯正福音信仰的事业，是为了争取自由聚会、读经、一起祷告，是为了良心的自由。这些事都与巴克斯特和清教徒密不可分。愿我们谨记在心，给他们当得的尊敬。

巴克斯特最后的岁月与他人生其他的日子同样可歌可泣。他如同夏季的落日余晖一般安详、平静地故去。他临终的举动荣光四射。

我喜欢了解伟人如何去世。只了解某些人在对待财富和荣誉上是伟大的基督徒并不能令我满足，我想知道他们在看待死亡这个问题上也是否伟大。我不仅想知道人怎样面对国王、主教和议会，也想知道他们怎样面对可怕之王，他们对于将要站在万王之王面前有何感受。我怀疑有人在最后关头表现得并不伟大。我想知道伟人如何去世，所以必须要花点时间来讲述巴克斯特之死。

也许，这位善良的老清教徒的临终给人的启发，少有人能

比肩。他的朋友贝茨博士详细描述了他去世的过程，下面将据此还原一些现实片段，我想以此作为本章的结尾再好不过了。

巴克斯特宁静地生活在切特豪斯广场，靠近友人西尔维斯特博士的礼拜堂，在这里他病倒了。他在这里度过了最后四年，得以大享安宁。传讲主耶稣基督的事的自由终于获得当局承认，没人禁止他讲道了。卡拉米博士说：“他在这里可以自由传讲来生，好像他经历过，又回来报信一般。”逼迫的风暴最终消散了，在他头上咆哮的狂风巨浪最终平息了。圣徒般的老清教徒蒙主怜悯，可以非常平静地去到约旦河边了。

尽管他身体虚弱，却仍然继续讲道，每次都讲很久，最后一次几乎死在讲台上。当他因病不得不放弃心爱的的工作，卧病在床濒死之际，他仍与五十年来并无两样。他最后的时间都用来预备他人和自己见神。他对来访的朋友说：“你来是学习怎样死亡。要走这条路的不只我一个。要当心这个虚空、诡诈的世界和肉体的情欲。要确信你已选择神做你的份，天堂做你的家，神的荣耀做你的归宿，神的话语为你的准则，那样你就绝不会惧怕，而是会满怀安慰与我再会。”没有哪个悔改的罪人比他更谦卑，没有哪个真诚的信徒比他更轻松镇定。他说：“我尽过的最好的职分，神也会为之公正地责备我；而我所有的盼望都来自神在基督里白白的怜悯。”他以前也常常说：“与其

相信自己会原谅自己，我更乐意相信神会赦免我。”

睡了一小会儿后，他醒过来，说：“我要脱离劳苦，安息了。”一位在场的牧师说：“你的事工会伴随着你。”他答道：“不会再作工了。若神应许给我另外的事，我将不再工作了。”一位朋友安慰说，许许多多的人因他的作品受益，都会纪念他，他答道：“我不过是神手中的笔，笔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

当他痛苦难堪渴望早死时，他会自省，说：“这不该由我来制定，什么时候死、因何而死、怎样死，都是你的旨意！”在极大的痛苦中，他说：“他的道路何其难测！”然后对朋友们说：“不要因为看到我受苦而贬低信仰。”

朋友常常问他里面的人情况如何，他的回答是：“因为确信将得到永恒的幸福，我里面大有平安，大得安慰。但因为太痛苦，我没法得意洋洋地表达出来，令我烦恼。”并说：“肉体必然毁灭，我们必须感受到毁灭的过程，尽管我的理智顺服了，但肉体却让我呻吟。”

有个贵族问他，是否因相信自己领会的未见之事而大大喜乐，他答道：“除此之外，你认为基督教还能为了别的什么吗？”然后又说：“要知道神，他的荣耀和伟大，超乎我们的想象。但想到神的儿子取了我们的样式，想到在天上我们认识的、亲爱的众圣徒，就令天国非常甜蜜、熟悉了。”《希伯来

书》第12章描述了天堂，开头说“千万的天使”，结尾说“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对他很是安慰。他说：“应该反反复复地思想这段经文！”又说：“这应许多么令人安慰啊！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又一次，他说：“重复主祷文的话语令他大感安慰，非常甜蜜，有些好人竟然对使用主祷文有成见，真是遗憾，因为所有灵魂和身体必需的祈求都包含在里面了。”

对来到病床前探望他的年轻牧师，他的劝告可谓绝妙。他常常恳切祷告，祈求“祝福他们付出的劳苦，让他们大大成功地让许多灵魂归向基督”。他盼望他们成为好器皿，做许多美善的事，他们会有节制、和平的灵，因此他说自己非常喜乐。

他没有忘记自己即将离开的这个世界，常常祈求“怜悯这个悲惨、纷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保守他的教会和利益。”

他建议朋友“当心自负的罪，这罪可能毁掉国家。”此时有人问他是否改变了在争议问题上的看法，他答道：“愿意的话，可以读我的书，都写在里面了。我所做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名誉，而是为了神的荣耀。”

死前的一天，贝茨博士来看他。博士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他答道：“我真的难受，感觉没法否认。但我有平安，我有平

安！”贝茨告诉他说，他将去到渴望已久的家。他回答说：“我信，我相信。”他说自己很愿意死去。卧病期间，若有人问他怎么样，他总是回答：“还不错！”或者“比我应得的要好，但还不及我所盼望的。”他最后的话是对西尔维斯特博士说的：“愿主教教导你如何去死！”

1691年12月8日，星期二，巴克斯特的仗打完了。最终，他进入了“圣徒永恒的安息”——他用这样绝妙的话来描述基督徒永恒的归宿。

他葬在基督城。世界和当时的教会当局并不认识他的价值，但许多知道他价值的人前来送葬，为他哀哭。葬礼最大的特点是显明了他真实的荣誉：“有虔诚的人，把他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

他没有留下后代，但却留下了成百上千的属灵子女。他离开了神的事工，而神仍在世界各地保守着他曾从事的事工，唤醒并造就永生的灵魂。我不怀疑，成千上万的人会在复活的那日站起来，为神加给这位什罗普郡老清教徒的恩典和恩赐而感谢他。每个热爱圣洁、拥护信仰自由的人，都必须敬重巴克斯特的身后名。就此而言，也许没有哪个英格兰人可以举出这人或那人的例子，说他们比理查德·巴克斯特的贡献更大。

威廉·葛诺尔

威廉·葛诺尔是萨福克郡拉文汉教区长，《装备齐整的基督徒》的作者。我们对他知之甚少。也许没有哪个作者像他那样，名头在所有清教徒神学的研读者中如雷贯耳，个人的生平信息却鲜为人知。我们只知道三件事，他是17世纪的清教徒神学家，拉文汉的牧师，写的一本实践神学作品广为人知，除此之外，大部分人对他一无所知。

这样优秀的人，第一眼看过去却发现没什么资料留下，似乎很意外，难以理解。他出生在重要的港口，父母在该地地位

显赫；他就读于当时剑桥最赫赫有名的学院，且与共和国时期的顶级神学家是同时代的人，并在西萨福克最大的教会担任牧师三十五年，从未间断；他写的一本书甫一问世就大受欢迎。我们自然会感到葛诺尔是个重要人物，应该为人所知。但为何关于他，已知的信息少，未知的却那样多呢？今日怎能没有人为他写传记呢？

我相信，这些问题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1662年，当可悲的《统一令》通过时，葛诺尔的所作所为。他竟然没有退出英国国教！他并不是在圣巴多罗买日作出选择，成为不从国教者的两千名牧师之一。他留在岗位上，继续担任拉文汉教区长。无疑，他在教义和实践上都是清教徒，却没有像他的许多弟兄那样做。当巴克斯特、曼顿、欧文、古德文和一众神学上的巨人退出英国国教时，葛诺尔原地不动，拒绝一起行动。他通常都与他们一同进退，但这次却没有，留在了后面。

他这么做，结果可想而知。当时英格兰在信仰上分成了两大派，不管我们对葛诺尔的服从怎么看，也必须承认，他选择的道路不太可能让他受任意一派的青睐。在纷争论战的时节，中立不会受欢迎。两边都不信任他。两派都因为他没有全身心归顺己方而恼怒。我猜想，这就是葛诺尔的立场。他在教义上是清教徒，却又坚定地支持英国国教。他是英国国教的牧师，

但讲道和行为都像完完全全的清教徒。实际上，双方都不喜欢他，鄙视他。

不过，作出这一设想时，我并不自信。这只不过是推测而已。但是，研究葛诺尔时代历史的传记作家将好些远不如他重要的人写入史册，对《装备齐整的基督徒》的作者却只字不提。卡拉米、克拉克、尼尔和布鲁克为许多现已不受关注的人写了数百页厚厚的传记，但一页也没有给葛诺尔写！对此，留待他人给出更好的解释吧，如果他们做得到的话。我必须保留自己的定论，即如果葛诺尔不是顺从了1662年的《统一令》，继续留在拉文汉教区教堂的讲台上，那么我们对他的了解应当会多得多。

本章传记的目标是给这位好人及其时代补充正确的历史记录。自从我读了《装备齐整的基督徒》后，我就感到这样一本书的作者，其生平应当为人所知。从我调任东部郡县，成为萨福克郡教区牧师之日起，我就立志要研究萨福克郡杰出神职人员的生平。他们之中，无人像葛诺尔，不该被遗忘，却遭遗忘，应该将他的事迹发掘出来。

我手上关于葛诺尔的信息几乎全部来自一本1830年出版的小书《原萨福克郡拉文汉教区长、〈装备齐整的基督徒〉作者威廉·葛诺尔牧师出生地、家庭、生平和作品考》，作者叫

姆基翁。这本书出版印刷的地方是萨福克郡伍德布里吉，而不是伦敦。也许，正因如此才没有人注意，很少有人知道。

姆基翁先生是拉文汉居民，比其他人更容易获得关于葛诺尔的资料。他无疑殚精竭虑，进行了相当多的考证。他作品的准确性值得赞赏。他书中没有哪一时间、哪条事实我没有花力气去调查核实，但我不得不说，我从未发现他搞错过。但不能说他的“考证”是以一种受欢迎、有吸引力的方式编写的。在搜集素材方面，他非常成功，至于合理地编排素材，将之展现给大众，我确信他并不成功。

然而，不管姆基翁先生的书有什么缺陷，无疑都是唯一一份关于葛诺尔的记述。可以确知，葛诺尔的朋友兼邻居、知名解经家博济特在他葬礼上证道，但证道包含的信息相对较少。因此，我必须坦率承认，我要为本章将要呈现给读者的大部分内容感谢姆基翁先生的工作。我尝试重新编排他的素材，以比较吸引人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从葛诺尔时代的历史中启发给他们一些亮光。我还加上了一些姆基翁先生无法获知的史实。但我要声明，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葛诺尔传记首要的资料来源是姆基翁先生的书。即便我加上了什么有趣的事，也总是根据他书中提供的线索才找到的。

威廉·葛诺尔 1616 年生于诺福克郡的林镇，并于 11 月 17

日在该镇圣玛格丽特教堂受洗。他父母于 1615 年 12 月 31 日在圣玛格丽特教堂结婚，本章的主角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伟人的母亲，尤其是伟大神职人员的母亲，往往都有坚强的心志和出色的智力。母亲对孩子性格的影响往往远超过父亲，这是普遍的定律。不幸，在葛诺尔身上，我们没法判定这条定律是否生效，只知道他母亲的使女名叫凯瑟琳·德雷希特，很可能是林镇本地人。

威廉·葛诺尔的父亲格雷戈里应该是林镇的头面人物。不管怎样，儿子出生那年，他就是本镇的参事，八年后，1624 年，他成为该镇镇长。他的职业和职位无从知晓。当他儿子死时，在离林镇不远的乡村教区沃尔剖尔拥有大量地产，表明格雷戈里·葛诺尔极有可能是地主。不过并不能完全确定。

葛诺尔年仅十五岁就不幸丧父。林镇圣玛格丽特教堂的登记簿上记录了他父亲死于 1631 年 10 月 14 日。格雷戈里就埋在圣玛格丽特教堂，有一块墓碑，碑文很稀奇。墓碑已经不存在了，因为 1741 年一场飓风吹倒了圣玛格丽特教堂的尖塔，倒在教堂主体建筑上，毁掉了该教堂的大部分。但飓风前四年出版的麦克雷尔写的林镇历史记下了碑文。如果墓志铭有价值的话，那么根据格雷戈里·葛诺尔的墓志铭可知他是个敬虔的人。但不幸，众所周知墓志铭写的话并不总是值得信赖。

他父亲死后，母亲活了多少久不得而知。姆基翁推测她再婚了。解经家博济特在葛诺尔葬礼上的证道中说了以下的话，无疑令人稀奇：“一直以来，他对头发花白的年迈父母是多么地恭敬有加啊！”鉴于他父亲在他十五岁时就去世了，那么这句话说的不可能是格雷戈里·葛诺尔。因此，除非博济特的证道中“父母”这个词是印刷错误，印成了复数，那么很可能母亲再婚了，于是他有了慈爱的继父。但继父是谁，他母亲活了多少久，我们并不知晓。

葛诺尔十五岁以前好像都是在家乡林镇度过的。他在当地的免费文法学校上学，直到他后来去剑桥。这事记在学校的校志上。

十五岁前的人生在一个人性格的形成中占了相当大的分量，所以了解威廉·葛诺尔少年时代是处于什么样的影响之下，就非常有益了。不幸，我们没有任何相关资料。1626年，安布罗斯·费什受命接替已故的罗宾森先生担任林镇文法学校校长，1627年，罗伯特·伍德曼西又接替了费什的位置。但对于这些人，我们一无所知。只有两件事，我认为值得注意。

其一，葛诺尔的清教徒取向和观念应该可以追溯到林镇。林镇是17世纪英格兰最彻底的更正教行政区的主要城镇之一。在玛丽女王和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诺福克郡和萨福克郡的居民

以深深信奉宗教改革教义而闻名。斯图亚特王朝和共和国时期，他们坚定支持清教原则的盛名也毫不逊色。英格兰没有哪个地区像诺维奇主教区，在这里高派教会的主张完全没有市场；也没有哪个主教区的教众像这里的人民那样，一直对加诸不从国教者身上的迫害心存愤怒。林镇这样的大型集镇的宗教氛围无疑是彻底的清教思想，年幼的葛诺尔就在这里长大。如果名垂青史的约翰·阿罗史密斯和撒母耳·费尔克拉夫^①在葛诺尔上学期间在林镇担任牧师——比较一下日期的话，不是没有可能——他教义观念的来源就更清楚了。每周日听阿罗史密斯和

^①约翰·阿罗史密斯 1602 年生于盖茨黑德。他曾就读剑桥圣约翰学院，并被选定为凯瑟琳学堂研究员。曾当选为大学传道人之一，并享受林镇的圣俸，后来又担任伦敦打铁巷圣玛格丽特教堂传道人。他是威斯敏斯特会议的重要成员。1644 年，当选为圣约翰学院院长，1647 年担任剑桥副校长。1651 年，被任命为王室神学教授和萨莫夏姆教区长。1653 年，被选定为三一学院院长。他死于 1659 年，葬在三一学院教堂。他的《约翰福音》1:1-17 注释《神人》给人留下了良好印象。

撒母耳·费尔克拉夫 1594 年生于哈沃希尔，在剑桥皇后学院接受了大学教育。1619 年，林镇镇长和参事任命他为林镇神学讲师。在诺维奇主教哈斯内特的反对和逼迫至下，他不得不辞职。后来，在萨福克郡克莱尔担任讲师，又被巴拿蒂斯顿爵士任命为克丁顿教区长。1662 年，他因为《统一令》而辞职。1677 年，他在退隐生活中去世，享年 84 岁。他是极有恩赐和魅力的人。

费尔克拉夫这样的人讲道，也许还在公共场合定期参加阿罗史密斯的要理问答学习和测验，在葛诺尔这样的人心中很可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其二，葛诺尔对大海、水手和航行非常熟悉，应归功于早年在林镇的生活。我曾对他的作品中为何频频用航海的事来进行举例困惑不已。像葛诺尔这样的作者乐意将镇上和乡下的一切事都糅合进自己的论述中，并不令我奇怪。我能理解，在萨福克郡的城镇当了三十五年教区长的人会用店铺、农场、街道、田地、马匹、牛、谷物、草场和花朵来打比方，也能理解经历了共和国时期血腥战争的牧师会经常使用士兵的习惯和战场的景象来进行形象化的描述。但我没法明白，葛诺尔竟这么通晓大海和航行，直到我得知他生长在林镇，熟悉海员的生活。他见过林镇沿岸贸易中古老的技艺，无疑也听过许多水手讲述“水流”的危险、林肯郡的海岸、诺福克郡的沙滩和到汉堡的远航。于是，他在拉文汉的讲台才会用航海的事来进行说明。所有知识对于基督的工人都有用，这真是至理名言啊！属神的人可以用自己看到的一切来为主的事工效力。

另外，我们还知道，葛诺尔是剑桥以马内利学院的自费生。林镇似乎出资设立了两个以马内利学院的奖学金名额，从该镇文法学校学生中选拔。1631年，葛诺尔父亲死后不久，镇政

府就授予他其中一个名额。姆基翁在林镇采访的一个人说：“翻阅镇政府文录时，我看到1631年12月，不久前去世的参事格雷戈里·葛诺尔的儿子威廉·葛诺尔被提名为剑桥以马内利学院奖学金获得者之一。该奖学金称为林镇奖学金，或提特利奖学金。1632年6月11日，这项3月29日通过的提名盖上了镇政府的大印。”

葛诺尔在剑桥的岁月未见文字记载，只知道一些干瘪的事实。院志上记载，威廉·葛诺尔，自费生，来自诺福克郡，1632年3月29日入学，1635年获文学士学位，1639年获文硕士学位。可以确定，他并未当选为所在学院的研究员，而林镇的奖学金只够七年的学费，所以很可能1639年获得硕士学位后，他就离开剑桥了，没有继续接受奖学金的资助。

要是我们知道些葛诺尔七年大学生涯中的事，无疑会很有趣。年轻人的性格通常在十六岁到二十三岁这段人生中定型，《装备齐整的基督徒》一书的作者很可能也不例外。他与哪些人为友为伴呢？谁是他的导师和讲师呢？他是个勤于阅读的人吗？他跟什么人走在一起，跟什么人谈话？他在大学里听了哪些伟大的传道人讲道？他是怎样安排时间的呢？在当时的大论战中，他站在哪一边？这些问题都很吸引人，对于我们看待他此后的人生和作品，能提供极大的启发。但不幸，答案不得而

知。能够让我们一窥葛诺尔大学生涯的，只有 1632~1639 年间关于他所在学院以及英格兰整体环境的些许事实。

葛诺尔就读的学院在 17 世纪一直因其神学取向而闻名，该学院显然弥漫着浓厚的清教思想。

埃塞克斯郡切姆斯福德的瓦尔特·米尔德梅爵士是以马内利学院的创始人。从建院开始，该学院就以清教原则而闻名。福勒在其剑桥历史中说，“建立学院后不久，瓦尔特·米尔德梅爵士来到宫中，伊丽莎白女王对他说：‘瓦尔特爵士，听说你建立了一处清教徒的地基。’他回答：‘不，陛下。我绝不敢支持任何与您设立的法律相悖的事。我只是撒下了一颗橡子，当它长成橡树后，只有神知道会结出什么果子。’我确信（福勒补充说，写于 1650 年），今日这棵树已经荫庇了整所大学，现在半数以上的学院院长曾在那得到喂养。”

17 世纪位居前列的神职人员中，就读于剑桥以马内利学院的人数惊人。除了何尔主教和贝代尔主教，还包括司提反·马歇尔、耶利米·巴罗夫斯、多马·谢帕德、多马·胡克、以西结·考沃威尔、拉尔夫·卡德沃思、撒母耳·克鲁克、约翰·科顿、约翰·斯托顿、安东尼·伯吉斯、劳伦斯·查德顿、约翰·普雷斯顿、安东尼·塔克尼、拉撒路·希曼、马太·珀尔、撒母耳·克拉克、拉尔夫·文宁、汤姆·华森、司提反·查诺克、

威廉·布里吉、彼得·斯特里、撒母耳·克拉多克。任何熟悉清教徒神学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名单里包含一些最杰出的清教徒神学家。其中有些人无疑是葛诺尔的同龄人和同学。

通过调查，我发现了一些以马内利学院 1632~1639 年间的资料，我想所有仰慕葛诺尔的人都不会不感兴趣。好歹，这些资料表明了葛诺尔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求学于斯之时，哪些人是他的同学，都持有何种思想。

葛诺尔在以马内利学院就读时，校长分别是：威廉·桑克罗夫特，1628~1637 年在任，他的侄子后来曾任大主教；侯兹沃思，1637~1645 年在任，后来被曼彻斯特伯爵驱逐。此人是狂热的保王党，后来与国王一同被囚于怀特岛。据尼尔的说法，不久他就悲伤而死。

我冒险推测，葛诺尔没能当选该学院研究员的原因很可能是他的竞争者太过于优秀、成就太高。根据以马内利学院院志，1639 年拉尔夫·卡德沃思当选研究员；1641 年，沃兴顿（后来担任过耶稣学院院长）当选；1642 年，桑克罗夫特（后来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当选。

1632~1639 年间以马内利学院的研究员名单如下：瓦尔特·佛斯特、理查德·克拉克、约翰·沃德、多马·波尔、以西结·莱特、多马·希尔、尼古拉斯·何尔、威廉·布里吉、撒母耳·

鲍尔斯、亨利·索尔蒙、大卫·恩赛恩、安东尼·博格斯、多马·霍尔贝克、多马·霍顿、玛拉基·哈里斯、R. 索斯比、便雅悯·维奇科特、约翰·亨德森、约翰·阿蒙德、R. 魏勒尔、彼得·斯特里、劳伦斯·萨森、约翰·萨德勒、拉尔夫·卡德沃思。

一位以马内利学院成员说：“这些研究员都在那个时代担任导师，不过其中有一些拥有更多学生。浏览院志，就能看到希尔、何尔、博格斯、霍尔贝克、恩赛恩、索尔蒙、维奇科特这些人都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导师。谁是葛诺尔的导师，我们并没有相关的记录。”

此外，天文学家霍罗克斯也在1632年入学，与葛诺尔同年；著名的不肯宣誓效忠者桑克罗夫特大主教在1633年入学。至此，我已经穷尽所有能搜集到的关于葛诺尔大学生活及其同代人的资料。

在以马内利学院的七年不会不对葛诺尔的思想造成影响。在孩提时代，他在林镇学会了尊敬清教徒，将他们视为地上最出色的人；后来在大学里，更是弥漫着浓浓的清教氛围。葛诺尔成熟后，要是不坚定地信奉清教观念才怪。

葛诺尔大学时代的七年里，英格兰的状况非常特别。当时正值宗教改革后、共和国之前的混乱时期。查理一世自杀般的盲目恶政迅速为王权的毁灭铺平了道路。劳德大主教及其同伙

毫不掩饰自己的罗马教倾向，苦毒地施行迫害，也是在为英国国教的覆灭铺路。全国上下都遍布着不满情绪，人们抱怨、争吵，心存苦毒，党同伐异。不管是教会还是政权，不管从哪方面看，处处都是崩溃的征兆。

无须怀疑，剑桥在这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也完全处于混乱之中。下文摘录的福勒所写的剑桥历史就记录了 1632 年发生的事。葛诺尔正是这一年入学的，无疑目睹耳闻了这些事：

“当年，一位严肃的神职人员在大学的圣玛丽教堂讲道，包含这样的话：‘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让车轮最接近目标，却又奔跑如常，没有停住不动的人就是胜者。同样，谁能够在证道中传讲接近罗马教，却不是罗马教的信息，定是你们的人。’其实，大部分温和的人在那时也开始抱怨，因为大学里许多人在学校和讲台上传讲比以往更加接近罗马教会的观念。

“伦敦圣体教堂讲师伯纳德先生 5 月 6 日下午在圣玛丽教堂讲道，经文是《撒母耳记上》4:21：‘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讲解时，他用了一些让大学里占优势的一派不悦的经文，说：神的律例如果掺杂了人的发明，就不再是神的律例，神也不再承认这些律例了。信奉天特会议所命定之罗马教教义的人，活着的时候若不悔改，就不可能得救。叛国罪并不局限于背叛血缘的王室，而且在一国中剔除神的律例之人就是背叛了这个国

家。有些人跟罗马教会一样无耻地采用伯拉纠派的谬误和迷信仪式。要祷告让他们在这些事上要么得救，要么毁灭，等等。

“副校长康博博士很快通知了伦敦主教劳德博士，尽管他早就知道了（他在大学的眼线很管用）。因此，教会当局召开高级专员会议传讯伯纳德先生，给他一份改变主张的声明，但他拒绝签字，反而写了一封陈情信给主教，为证道中的疏漏和不妥的言语表达自己诚挚的悲痛忏悔。因此，他被打入新监狱，死在那里。如果他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被禁卒虐待，因而早早丧命，那么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已经，或者将要，为他复仇。”

请注意，这件应受谴责的恶事发生在1632年，正是葛诺尔进入以马内利学院的那年。可想而知，这件事在一所彻头彻尾的清教学院的本科生中会引起怎样的激愤。任何对英格兰大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本科生作为一个整体，有多么同情受迫害和受压迫者，多么倾向于与势单力薄的人站在一起。

在葛诺尔求学剑桥期间，英国国教参加多特会议的代表沃德博士1634年在一封写给乌舍尔大主教的信中，表达了对大学现状的不满。他说：“也许你愿意听听我们大学里的事。说实话，从我成为学校一员开始，已经四十六年了，从没见过比现在更糟糕的局面。”

葛诺尔在剑桥期间，皇室法庭对普林、巴斯特威克和伯顿

作出了臭名昭著的判决。法庭声称他们发表诽谤英国国教的文章，判处他们割耳刑并戴枷示众。1637年6月30日，判决在雅德宫广场执行了。巴斯特威克是医生，也曾就读以马内利学院。可想而知，对他的刑罚在母校会产生怎样的轩然大波。

葛诺尔就读剑桥期间，因为劳德大主教想在苏格兰推行他那套礼拜仪式，把罗马教式的圣餐引入爱丁堡各教会，举世闻名的苏格兰骚乱爆发了。圣盖尔教堂那场名噪一时的骚乱发生在1637年7月23日，主日，当时据说有个狂热的妇人珍妮·格德斯扔了一把椅子砸到爱丁堡主教的头上。

葛诺尔在剑桥期间，约翰·汉普登开始悲惨地同国王抗争，拒绝缴纳船舶税。1637年6月9日，首席大法官作出了对他的判决。

提及这些事件和日期是为了让读者了解葛诺尔读大学时的时代背景。不可怀疑，他的性格和观念已受到这些事件的强烈影响。在1632~1639年待在剑桥的人，不可能不见到、听到让他终身铭记的事，不可能不经历至死都忘不了的激烈思想冲突。无疑，葛诺尔非常熟悉一些清教徒神职人员中的佼佼者。无疑，他在一所清教学院的见闻也足以让他感觉到所有清教徒都不是完人。我大胆推测，他此后人生的每一步都受到在剑桥以马内利学院回忆的强烈影响。

葛诺尔 1639 年离开剑桥后的头五年里经历了什么，也无从知晓。我必须诚实地承认，没法给读者写些什么，只能猜想、推测。1639 年他离开以马内利学院后就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 1644 年担任拉文汉教区长。但这五年里，他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担任了什么职位，都没有确切记载。

英格兰历史中，没有哪五年像 1639~1644 这五年，有那么多重大事件发生。这五年中，赫赫有名的长期议会开始运作，同样名扬天下的威斯敏斯特会议也召开了，斯特拉福德勋爵被斩首，劳德大主教入狱，高级专员会议法庭和星室法庭被废除。这五年里，国王和议会之间爆发内战，诺丁汉升起王旗，双方在边山、纽堡、马斯顿荒原激战，汉普登、皮姆、和福克兰都死了。最后，但并非最次要的，议会支持者签署了《国民盟约》，其中有一项是宣誓“努力根除罗马教与高级教士，即由大主教、主教、他们的使节和代表、主任牧师和座堂教士、会吏长，以及所有其他按此等级制度委派的教会官员组成的教会管理机构”。

这五年葛诺尔都做了些什么？我们没法知道。也许他同友人平静地待在林镇。也许他在伦敦求学。也许他开始凭着大学文凭给一些贵族或有钱人当家庭教师，像当时许多年轻的神学生一样。毕竟，这些都是无意义的推测。我们所知的只有两件事，

其一，他必定在 1639 到 1644 年间的某一时间接受按立，获得圣职；其二，这期间他必定曾在萨德贝里讲道。最后一点在他自己所说的话清楚地表明了，他在给西蒙德·德威斯爵士的信中提及，萨德贝里百姓阻止他去拉文汉。

葛诺尔怎样开始传道事工的，完全不清楚。这是关于他个人的历史中，所知信息最少的。他何时受按立，在哪里受按立，接受的是什么职分，是谁按立他的，他第一次受按立是主教的按立，还是长老派的按立，都无从知晓。进行了一番劳形费神的研究之后，我必须老实承认，我一无所获。只是蒙现任诺维奇主教和已故伊利主教的帮助，查到诺维奇和伊利两个主教区 1639~1644 年的按立登记中没有葛诺尔的名字。当然，可能是其他主教按立了他，尽管这样的话他肯定只是被按立为会吏。不过很可能，他没有接受国教圣职就开始侍奉了。很可能他是经过“众长老接手”而分别出来担任长老会牧师。

我不想浪费读者的时间来比较主教制和长老制孰优孰劣，当然我自己本着良心是支持主教制的。我只能说，我们无权根据葛诺尔没有主教制品级，就揣测他对主教制的观点。必须记住他开始侍奉的时代很特别。可能他没有别的选择。他要么就接受了长老制的按立，要么就没有受过按立。

可以清楚的是，葛诺尔开始侍奉时，正值混乱动荡的日子，

是个转型时期。教会和国家业已确立的一切都崩塌成了一堆瓦砾。那是很奇怪的时期，发生了奇怪的事。可以想象，当时关于按立有各种各样不规则的做法。

何尔主教在自传《他的严格标准》中的下列记述应受重视，因为他是诺维奇主教，而拉文汉属于他的主教区。他说：

“确认要实施《盟约》（1643年9月26日）之后，我按立的权力受到了暴力限制，因为教士和平信徒都普遍接受《盟约》。因为当我要继续一贯的做法时，尽管并没有法律规章限制我这么做，城中却有些人自愿结伙煽动（诺维奇的）市长、参事和治安官，叫我去解释为什么公开违反他们的《盟约》。

“为此，有不同的人在很不合宜的时间来我这里猛烈地敲门，要求跟主教谈话。派人去问他们来干什么，他们却只要主教出来。最后，我去见他们，问怎么回事，他们说开了门就告诉我。我回答说，我要先知道他们的意图，如果他们有话要说，我很愿意倾听。他们说，有市长和一些治安官给我的信。信中控控我按立牧师，违反了《盟约》，并要我交出《盟约》通过后，接受按立者的名单。我回答说，那些误导市长，从他那里拿到这封信的人是在滥用市长的权力。我第二天会给完满的答复。他们要求我必须亲自前往市政厅。我问他们，何时听过诺维奇主教去接受市长聆讯？我知道自己该在什么地方，会按我

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回答。我就这样回绝了他们。要是那天，他们在我执行按立之前知道了，定会拉着我和接受按立者的耳朵，把我们拽出教堂。”

在这一古怪的证词之外，我还要加上名声在外的清教徒历史学家尼尔的话。他说：“从通过《盟约》开始（1643年9月28日），我们就可以为等级制度的完全瓦解定下日子了，尽管议会还没有通过下令废止等级制度的法令。不会有教会法庭、教会的探访、穿法衣，对教士和仪式甚至公祷都将不再尊重了。”此后他接着说：“所有教会的敬拜都取决于神职人员的会议。教区选举出牧师，会议审查并通过，最后议会批准他们领取圣俸，无须通过大主教或他的教区牧师同意。曼彻斯特伯爵照此在相关的郡县里安排了空缺职位的人选。”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诺维奇和伊利的登记中没有葛诺尔被按立为会吏的相关记录了。他在诺维奇主教区开始侍奉，居住地是七个“相关郡县”里最彻底的清教徒地区之一。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希望接受主教的按立，尽管后来，在他侍奉很长时间后，他接受了雷诺兹主教的按立。不过很可能在他开始侍奉的时候，就算他自己希望，也无法接受主教制的按立。

毕竟，这件事并不是很重要。并不是说基督合法的工人必须经过主教制按立，其他教会管理形式都不行，因为主教按

立神职人员的权力并没有圣经根据。英国国教《信纲》的第二十三条明智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任何人在合法地蒙召、奉差遣去履行公开讲道和在信众中间主持圣礼的职分之前，就开始担当这些职分，是非法的。”但《信纲》谨慎地避免过于严密地界定何为有效的圣职，接着又说：“有些人获得了在信众中间呼召并差遣牧师去主的葡萄园的公共权力，由他们呼召、差遣的人才算合法。”无疑，这就是葛诺尔的立场。他开始侍奉时很可能没有接受主教制按立，很可能那时他无法获得这种按立。但他无疑“合法地蒙召，被差遣去了主的葡萄园”，尽管很可能他只是经由“众长老接手”而被呼召出来，差遣出去的。

现在来看葛诺尔人生最重要的事件，这让他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了三十五年。这件事就是他受命担任萨福克郡拉文汉教区的牧师，时间好像是1644年12月，他当时二十八岁。

葛诺尔受命的方式有些特别，是那个奇怪恼人的时节的一个古怪注脚。知名收藏家西蒙德·德威斯爵士是该教区最大的地主，资助他在拉文汉生活。似乎爵士是应教区居民的要求而资助葛诺尔的，而葛诺尔任职是根据议会下院的命令批准的。

议会下院的命令是一份很特别的文件，姆基翁先生从议会下院书吏手中获得了下院通报，从中提炼出了这项命令。在此将他的原文摘录如下：

“1644年12月16日，第20号文件，第一次发布，关于拉文汉教区。

鉴于最近神学博士安布罗斯·科平格去世令萨福克郡拉文汉教会牧职空缺，而拥有受俸牧师推荐权的该教会保护人西蒙德·德威斯爵士提名文硕士威廉·葛诺尔这位博学、敬虔且正统的神职人员担任该职。因此下院颁布命令：威廉·葛诺尔在有生之年应一直担任该教会教区长和教区牧师，并应当获得并享有该教会的什一税，与从前担任该教会教区长和教区牧师的人所获待遇一样。但根据本国法律，如果威廉·葛诺尔免获此待遇，则要将该职任所得初熟的果子和什一税都上交陛下，这将是定例。”

细心的读者不会注意不到，这份文件中有些好笑的地方。其中允许西蒙德·德威斯爵士拥有提名权，而提名又必须由议会下院发布批准命令！文件大体陈述了葛诺尔任职的资格。议会竟说他“博学、敬虔且正统”！文件小心地用了国王的名（尽管当时议会正与他明火执仗地开战），初熟的果子要上交给他！拉文汉属于诺维奇主教区，而诺维奇主教的名号、职位和权柄只字未提，好像他不存在一般！的确，葛诺尔生活在奇怪的年代！

葛诺尔离开剑桥后，因怎样的机缘巧合来到萨福克郡西南

角的拉文汉，我们不得而知。为何离开以马内利学院五年后，他会去萨德贝里和拉文汉，也只能推测，无法确切地知晓。然而，应当注意，1644年，有位詹姆斯·葛诺尔住在拉文汉，当年9月4日，他有个女儿在那里受洗。据姆基翁推测，这位詹姆斯·葛诺尔是林镇的葛诺尔家族的亲属，因此威廉·葛诺尔才会去拉文汉，在那里崭露头角。另外，葛诺尔前任安布罗斯·科平格的父亲、1622年过世的拉文汉教区长亨利·科平格娶了葛诺尔的家乡林镇的女子。拉文汉教堂有一块他的纪念碑，上面写着，他娶了诺福克郡林镇的亨利·费雪之女安。林镇并不太大，葛诺尔一家和科平格先生可能很熟，这可能是葛诺尔定居拉文汉的另一原因。当然这些都是推测，但我认为值得一提。

葛诺尔怎样同西蒙德·德威斯爵士熟识起来，爵士提名他为拉文汉教区长是为公还是为私，都无法确认。姆基翁先生在纹章院找到了一份爱剖顿先生关于萨福克郡的手稿，从中引用了一份明显错误的话，说西蒙德·德威斯爵士“应拉文汉教区的要求，非常乐意地把教区长的职位白白地交给威廉·葛诺尔先生。葛诺尔先生现在负责该教区运营，但当时爵士还不认识他。他的到来令该城在许多方面都获益不少”。爱剖顿显然弄错了。葛诺尔和西蒙德·德威斯爵士的通信保存了下来，第一封信写于1644年3月。此外，西蒙德爵士1640年当选为萨德贝里的

下院议员，住在拉文汉教区，所以他不可能没听说过葛诺尔。

上面所说的葛诺尔同西蒙德·德威斯爵士的通信肯定会引起读者好奇。这些通信总共有八封，用拉丁文写成，用的是最经典的文体，表明葛诺尔对拉丁语颇为精通。根据当今时代的标准来看，这些信里面说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信中充斥着谄媚之语，在我们看来与基督徒的身份很不相称，不像是出自一位清教徒之手。但要记得，这是葛诺尔所处时代的习惯。17世纪给官员的献词和信件通常都充斥着夸张的语言和虚假的恭维。用这种方式写文章就好像我们把落款写成“您顺服的仆人”那样，非常常见。这些话没有什么意义，之所以使用只是出于风俗习惯。如果葛诺尔写给西蒙德·德威斯爵士的拉丁文信没有采用非常啰嗦、夸张、恭维的文风，就可能被认为是没文化的粗人。

这八封信的部分内容也许会引起读者的兴趣。这些信多少能让我们一窥葛诺尔获得拉文汉牧职提名的过程。如果我们知道其中暗含的意思，就能更好地明白他定居拉文汉的历史，他的名字已经同这个地方密不可分^①。

^①总的说来，我摘录的信件内容是姆基翁翻译的，偶尔我会修改他的译文。

第一封信写于拉文汉，时间是1644年3月26日。这封信是为一个在服役中受伤的人请求帮助，貌似送信的就是这个人。信中有些内容概略地说忽视伤兵令信仰蒙羞，国家应当妥当地安置他们。此外，没什么值得注意的。

第二封信写于1644年7月24日，收件人栏写着“住在威斯敏斯特玛格丽特街尊敬的西蒙德·德威斯爵士”，写信的地点并未提及。这封信中葛诺尔任职的事第一次出现，似乎这件事有了点麻烦，当然，年代久远，已经说不清是什么麻烦了。显然，这封信是在问题有待解决期间写的，包含下列的话，姆基翁已经将其译出：

“收到您的信令我欢喜备至，要是没被叫去诺福克处理公事，我本该立即就回复的。回来的路上，我下决心一定要想好一些理由来答复。哎！我要解开的这团乱麻越来越纷乱繁杂，我似乎像圣保罗的那条船一样，遇着两水夹流的地方。当我决定要在拉文汉服侍时，萨德贝里起了轩然大波，人们说我被金钱诱惑了。但若我拒绝神借着您的手所行的这一护理之工，似乎就是在悖逆他，也辜负了您提名我担任此职的一番美意。在这场风波里，我得到了美妙的带领（我指的是所罗门的话）：谋士多，人便安居。因此，我非常愿意听听周围地区一些牧师的建议，由此来做决定。如果我非得死，也情愿死在最高超的

医生手里；如果我定要犯错，也情愿在那群以学识和虔诚而闻名的人中间犯错。我希望尽快解决这件事，那时会再写信给您。”

这封信令人好奇，读到的人会想知道葛诺尔要解决什么问题，要请教的“一些牧师”是何许人。不过，这封信好歹有助于证实葛诺尔担任拉文汉教区长之前，在萨德贝里当牧师。但这只是孤证，因为现在我询问过的萨德贝里居民中，似乎没有人知道葛诺尔跟该地有什么联系。

第三封信写于1644年9月1日，是在萨德贝里写的。此时，事情显然已经解决，葛诺尔可以在拉文汉就职了，尽管任命还没有办妥。信中有一大堆啰嗦的溢美之词，只能说是当时的习惯，但下面这段话值得引用，让读者一窥：

“尊敬的大人，我坚信，在这污秽的世界中，您盼望的唯一幸福就是行善。因此，我谦恭地感激您的安排，您可以奏响凯歌了，因为拉文汉的无数百姓现在可以在您的荫庇下享受福音。”

“不管我做的都是些什么事，属天的亮光会激励我做多少，这些事有多么可贵，如果神祝福我献上的这微不足道的劳作，您就会得安慰，甚至得冠冕，因为我是在您的保护下争战。英格兰现在因内战而满目疮痍，但如果所有教会保护人都像您那样努力奋斗支持福音的传播，那么我们会幸福，而且会越

来越幸福。但是，看呐，许多人不仅不珍惜自己的灵魂，也出卖别人的灵魂！别人售卖神职，您却努力任命合宜的神职人员，您的荣誉因此愈发加增了。”

这封信的附言也很稀奇。葛诺尔说：“写到最后，我差点忘了一件事。您提到了主教。我越来越怀疑去拜访他是否合适，尤其是因为教士和百姓双方的意见我都已经知道了。”

第四封信写于拉文汉，时间是1644年10月26日。这是封恭维的信，当时西蒙德·德威斯爵士新出版了一本文物研究的书，送给葛诺尔一册。信中没有提及葛诺尔在拉文汉任职的事，没什么值得摘录的话。

第五封信写于拉文汉，时间是1644年11月21日，是这八封信中最重要的信之一，因此将全文摘录如下：

“尊敬的爵士，几经艰难之后，我虚弱的声音最终平安抵达拉文汉港。我只有向您表示感谢，正是在您的荫庇之下，我才得享此荣幸，能够将纯正的原则教训给您所交付给我的无数百姓，像父亲一样指导他们。尤其是在目前这样的局面，许多谬误流毒不浅，我们四处弄来已经作古却又死灰复燃的谬误，就像古罗马从世界各地弄来神祇一般。在这个世界上，我现在唯一的安慰就是，借着诚挚恒切的祷告，保守我的会众在众多的败坏之中仍然纯全无暇。”

“您写给亨利·科平格的信说，您听说萨德贝里有些人传言我们之间达成了新的协议。我想知道这谣言是从哪儿来的。我坚决否认。最甜美的爱心之酒有时也会腐败，变成醋，这可不是新鲜事。无论如何，我希望萨德贝里的朋友们能很快恢复到之前的宁静，尽管他们现在群情激动，就像翻腾的大海。至于主教，我希望他能找到其他方式来任命我，或者由至为光荣的议会来任命我。拉文汉的全体居民都极其恭顺地向尤为可敬的大人您道贺，因为在这件事上没有哪块石头您没翻过。我们也恳切地盼望，如有可能，事情在六个月内解决，这事现在很让人厌烦。为了解决剩下的一些事，我愿意去伦敦。愿伟大良善的神祝福您和属您的一切，愿他继续成为您的光和盾牌。您在基督里卑微的仆人、为您热切祈祷的威廉·葛诺尔。”

当然，这封信里提到的事究竟是什么，只有推测了。显然，葛诺尔曾在萨德贝里大受欢迎，因此萨德贝里的百姓不让他去拉文汉当教区长。信中说的“六个月”很可能是指前任教区长死后的六个月。葛诺尔的前任科平格死于何时，不得而知。

第六封信写于拉文汉，时间是1645年1月6日。信的内容显示，不管葛诺尔出任拉文汉教区长曾经遭遇怎样的困难，现在都解决了，他最终就任该职。他说：

“尊敬的爵士，我适时地收到了尊敬的议会的命令。这都

是您一己之力成就的。您对我的看顾已到了极致，最终各样事都妥当了，这份命令就证明了您的友善。没有命令的话，提名又算什么呢？没有制度，命令又算什么呢？然而，您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切事，所以我定当感谢您，不仅因为您是教会的保护人，也是因为您设立此牧职并任命我来担当，这些事都是在您的支持下才得以完成。我很清楚，您的公务有多繁忙，因为国家还有许多艰难的事要您费心，我也知道您费尽心力进行严肃的研究，也要消耗许多时间。因此，您面对许多重要得多的事，却仍忙里偷闲来看顾这些比较起来无关紧要的小事，就更加显出您对我们的厚爱了。但我相信，要不是您这么快解决，让我们得以抽身，恐怕我们都会因无计可施而焦头烂额。”

对于信中所说的事，我们也只能从信中的话来推测了。葛诺尔定然是说，他不管是通过谁获得的任命，都要感谢西蒙德·德威斯爵士的关心。

第七封信写于1647年3月20日的拉文汉。信中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全都是在哀叹当时国家的混乱，并用虔诚的话鼓励西蒙德·德威斯爵士，因为那时他在议会中很不容易。

第八封信写于1648年10月30日，显然是在回复召葛诺尔去下院讲道的命令。其中有段话如下：

“昨日收到信时，我刚讲完道，非常疲惫。今日已经讲完

了一篇道，正在预备明天的证道。因此，尽管我的答复写得简短，未加修饰，相信您也会谅解。您信里说的那件事，即议会下令让我下个月，11月29日，去给你们讲道，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的担子，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我身体很软弱，在户外稍微待一会儿都会有损健康。因此，我恐怕没法在寒冷的冬天长途跋涉。我相信，提议的人并不知道我糟糕的健康状况，没有考虑到路途遥远。因此，我至为谦卑恳切地请求您——您的口才举世无双，在下院极具影响——劝服议会另选他人。因为现在我身体虚弱，要是去了肯定会病倒。”

这封信里有意思的地方不止一处。信中表明，葛诺尔作为传道人得到了高度评价。只有当时最杰出、最有恩赐的神职人员才会蒙召去议会下院讲道。也可以从信里看到，葛诺尔在拉文汉的事奉开始之后，相对来说还没过太久，他的健康状况就很虚弱了。也许，我们可以将他曾经退隐待业，以及我们对他的信息了解得很少，都归因于他的这种健康状况。

现在已经看到葛诺尔如何去拉文汉开始了三十五年的漫长侍奉，那么大部分读者可能有兴趣了解一下拉文汉这个地方。

拉文汉是萨福克郡西南角的小镇，位于一个十一平方公里^①

^①原文为 2800 英亩，此处进行了换算。——译注

的农村教区中，当时约有一千八百居民。葛诺尔时代，该地属于诺维奇主教区，现在属于伊利主教区。镇上曾有一个集市，在蒸汽机发明前，因蓝色布料和毛哔叽制造而闻名。为了更好地管理，镇上建立了三个行会——圣彼得行会、圣三一行会和基督的身体行会。现在，该镇的制造业只有一家丝绸厂了，集市也没有了。集市场地仍然保留着，中央还有一个古老的十字架。牛津伯爵德维雷家族曾是拉文汉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有一座巨大的庄园，几乎占了半个教区。伊丽莎白时期，时任牛津伯爵爱德华把拉文汉的产业，还有受俸牧师推荐权卖给了保罗·德威斯骑士，也就是威廉·葛诺尔的保护人西蒙德·德威斯爵士的父亲。正因为这桩交易，葛诺尔与拉文汉结下了不解之缘。

葛诺尔得到的这个职位无疑是个肥差。当时，每年的什一税约有八百五十镑，而教区长除了宅邸还享有八百五十亩^①土地。考虑到两百年来的通货膨胀，拉文汉教区长收入是非常丰厚的。然而，福勒在《教会历史》中记载了一件稀奇的事，即1577年拉文汉教区的俸禄差点被减半，只是因为教区长的坚持才得幸免。这件事表明，16世纪，平信徒中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经常为害教会，制造混乱，而且往往能成功。福勒说：

^①原文为140英亩。——译注

“亨利·科平格是剑桥圣约翰学院前研究员、约克的受俸教士，曾担任沃里克伯爵安布罗斯（伯爵的葬礼上是他证道）的随扈教士。陛下曾派他担任剑桥莫德林学院院长，不过后来应女王的要求（可以这么说吗？），他辞去职务。1622年，为了避免麻烦，他结束了自己的神职生涯。他是萨福克郡巴克斯霍尔的亨利·科平格绅士的第六个儿子，母亲是托马斯·杰明爵士的女儿艾格尼丝。他父亲临终前问他要走怎样的人生路，他回答说要做神职人员。‘我很欣慰，’老绅士说，‘要不，当我在天上见到马丁·路德，他知道神给了我十一个儿子，我却一个都没有送去当牧师，那我有脸说什么话呢？’这话与路德的看法一致，路德临死前坚持认为圣徒在天上会有意地相互交谈。

“拉文汉教区圣职空缺，该地待遇丰厚，又有需要，所以应该有一位好牧师去任职。最近负责该教区运作的雷诺兹博士逃去了罗马，很可能留下了一些迷信的酵。作为保护人，牛津伯爵提名科平格先生去该教区任职，但加上了一个条件，即他的庄园不支付什一税，而他的庄园占了几乎半个教区的土地。科平格向伯爵请辞，不愿为了罪恶地满足他的要求而出卖教会的权利。‘好！’伯爵说，‘要是你这样认为的话，就把什一税拿去吧。我不屑用教会的利益来增加自己的财产。’不

过，后来为了满足下一任牛津伯爵的代理人以及其他人的要求，科平格先生还是花了一千六百镑用于诉讼，恢复被留滞的权利。他留给教会确定的产权，对神的事热心，对自己的事却粗枝大叶。

“他在拉文汉讨厌的保护人手下过了四十五年。这个集镇有九百人领圣餐，在此期间，他们之中不管有了什么分歧，他都努力调和。他乐善好施而且很富有（兄长死后给他留下了遗产，而且他还获得了其他的财产），他遗赠给教区的穷人二十镑，还有每年十镑的年金。他长眠之地树立了一块精致的纪念碑。他死于圣多马日，享年七十二岁。”

不管怎样，福勒提及的诉讼并没有阻止亨利·科平格的儿子安布罗斯接替他拉文汉教区长的职位。安布罗斯·科平格去世后，葛诺尔受命出任该职。葛诺尔在给西蒙德·德威斯爵士的一封信中提及的亨利·科平格无疑是葛诺尔前任的家人，其祖先任教区长时曾坚定地抵制牛津伯爵剥夺教会生计的无耻企图，保护拉文汉的什一税。

葛诺尔在拉文汉教区讲道三十五年，所以真正仰慕他工作的人，自然会对该教区产生浓厚兴趣。葛诺尔传讲《装备齐整的基督徒》实质内容的讲坛已经不复存在。但教堂还和两百年前一样。

拉文汉教堂是萨福克郡最精美别致的教会建筑。“教堂坐

落在镇子西头，于 15 世纪至 16 世纪初修建，建在一栋古建筑的旧址上，资金主要来自牛津伯爵和斯普令家族，教堂建筑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们家族的纹章。教堂属于晚期英格兰建筑风格，用砂石建成，点缀着燧石，这是萨福克郡教堂普遍使用的材料，因为当地缺乏石料。教堂长 47.5 米，宽 21 米。尖塔尤其漂亮，高 43 米，直径 13 米，有一座美妙的八铃钟，重 1.17 吨^①，是 1625 年铸造的。进入教堂，屋顶上都是雕刻。有两根美轮美奂的长凳是典型的哥特式家具，是亨利七世在威斯敏斯特的教堂那种精雕细琢的风格，曾经属于牛津伯爵和斯普令家族，不过现在已经有些朽坏。窗子上还讲究地保留着古代的染色玻璃，门廊的装饰很精美，带有盾形徽章。”以上描述主要摘自怀特的《萨福克史》，我没有理由怀疑该书所述细节的准确性。

比起两百年前，今日拉文汉的重要性无疑大不如前。拉文汉所在的郡在英格兰各郡中的地位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高了。没有采矿业和制造业，也没有大的港口城镇，东部各郡在物质繁荣方面静止不前，而英格兰西部也在迎头赶上。萨福克郡密布的村镇都在衰退，或止步不前。像艾镇、福瑞林姆、邦吉、

^①原文使用的是英制单位，此处进行了换算。——译注

奥福德、索思沃尔德、敦维奇、奥尔德堡、哈德利、比尔德斯顿、倪德汉、斯特拉德布罗克和德伯纳姆等地的旧日荣光已经不复存在。拉文汉也一样，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农业区的宁静小村，引人注意的只有美丽的教堂和众多古老的慈善机构。

葛诺尔在拉文汉居住、在古老的教区教堂里讲道的三十五年，正是英格兰历史上风云变幻的年代。国王一方被共和国彻底倾覆，查理一世掉脑袋，建立护国政体，奥利弗·克伦威尔死去，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统一令》通过，两千名牧师因该法令而被逐出英国国教，多年小肚鸡肠地迫害不从国教者令国家蒙羞，这些事每个学过英格兰历史的人都熟悉。葛诺尔对这些事怎么看，我们无从知晓。政治和教会的动乱令国家混乱不堪，在这中间他做了些什么，也不得而知。很可能，他的健康问题令他无法经常离家，或去教区外做太多的事。不管原因如何，我不得不承认，关于他人生最后三十五年的记载也非常少。

不过，有些事情或许值得注意。1644~1679年，葛诺尔在拉文汉侍奉期间，部分最优秀、最圣洁的清教徒神职人员曾住在葛诺尔在拉文汉的家方圆二十英里内。他们的姓名我将一一提说。

每个研读纯正英格兰神学的人都会熟悉约翰·欧文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在埃塞克斯郡的福德汉姆开始侍奉，后来又

去该郡的科吉歇尔，直到 1650 年，克伦威尔任命他为牛津基督教堂学院院长，兼大学副校长，当时葛诺尔已经在拉文汉做了六年教区长。

司提反·马歇尔是参加威斯敏斯特会议赫赫有名的神职人员之一，在共和国时期是头面人物。葛诺尔去拉文汉之前不久，他在埃塞克斯郡的维瑟斯菲尔德和芬琴菲尔德做牧师，并在伊普斯维奇度过了人生最后两年，他死于 1655 年。

马太·纽科曼是另一位威斯敏斯特会议的重要成员，协助阿罗史密斯和塔克尼起草了名满天下的要理问答。1629 年，大名鼎鼎的约翰·罗杰斯遭驱逐后，他接任埃塞克斯郡戴德汉教区牧师，直到 1662 年遭《统一令》驱逐。

弥尔顿的导师、另一位参加威斯敏斯特会议的出色代表多马·杨在萨福克郡的斯托马基特任教区牧师十三年之久，直到 1643 年去伦敦的公爵地担任一间教会的牧师。1650 年他被驱逐后，又退隐斯托马基特，直到 1655 年去世。他是举世闻名的争议作品《斯迈克提姆斯》的五位作者之一，这本书在 17 世纪上半叶掀起轩然大波。该书得名于五位作者名字的首字母，即司提反·马歇尔、埃德蒙·卡拉米、多马·杨、马太·纽科曼和威廉·斯波斯托。注意，这五位中至少有三人在离葛诺尔家只有几小时路程的地方去世。

这份名单还可以加上其他伟人的姓名。比如但以理·罗杰斯，1652年于维瑟斯菲尔德去世；布莱克尔比，1648年在大瑟劳去世；费尔克拉夫，1662年从科丁顿任上被驱逐，后由提罗岑接任；欧文·斯托克顿，1662年从科尔切斯特的圣安德烈教堂任上遭驱逐。除了这些好人外，还有些不那么知名的人，比如埃塞克斯郡霍尔斯戴德的威廉·斯巴罗、萨福克郡巴京的约翰·费尔法克斯、萨福克郡科登汉的马提亚·坎德勒、萨福克郡克里汀·圣玛丽的撒母耳·斯普令、萨福克郡哈沃希尔的司提反·斯坎德莱特、萨福克郡赫明斯通的托庇亚斯·勒格、伊普斯维奇的布朗宁和斯东汉姆、斯托马基特的斯托勒。这些都是出色的清教徒牧师，1662年遭驱逐。卡拉米的《不从国教者的回忆》记载了这些人的历史。再强调一下，这些人都生活在葛诺尔家方圆二十英里之内，定然会偶尔与他接触。

若是知道葛诺尔跟这些好人来往多不多，会大有裨益。但我个人的印象是，他没怎么跟他们来往。很可能，糟糕的健康让他只能待在家里。但我怀疑这并非全部原因。我倾向于认为葛诺尔腼腆谨慎，自然不喜欢过多涉入社交。最重要的是，我强烈认为他比许多邻居们更喜欢主教制和祷告文，自然没法与他们亲密相交。不过，这些都只是推测，我只能到此为止，因为葛诺尔人生还剩下一些事需要讲述。

1645年，也就是葛诺尔在拉文汉任职的次年，他娶了内兰边斯托克教区牧师多马·莫特的女儿撒拉·莫特。他们生了十个孩子，其中八个在他死时还活着。妻子比他晚几年去世。

1662年，至少两千名牧师因《统一令》而被逐出国教，但8月20日，葛诺尔却签署了该法令要求的声明。8月21日，著名的诺维奇主教雷诺兹按立他为牧师。8月22日，走了一遍主教制任命拉文汉教区长的形式，由德威斯家族的亲属、埃塞克斯郡布罗姆利厅的托马斯·鲍尔斯提名。日子相隔这么近，很值得注意！结果，他留任拉文汉教区长一直到死，而许多他的清教徒弟兄却放弃了职位。

无疑，应该思考一下葛诺尔的这段历史。乍看起来，这件事有些稀奇。已经侍奉十八年的教区长要从主教之手接受牧师的职位，持清教徒观点的知名传道人要坐下来重新加入英国国教，而几乎周围所有其他的清教徒弟兄都退出了国教，当然很奇怪。确实很奇怪，但确是事实。我从诺维奇的登记册里找到了一份他的题词副本，证实此事毋庸置疑。这份文件很引人兴趣，因为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份葛诺尔手迹。

可想而知，葛诺尔的顺从之举引来了多少辱骂指责。1665年，有人出版了中伤他的书，肯尼特主教引用了其中一段话：

“这些与神的话语和他的圣徒为仇的肮脏事，葛诺尔并非单枪

匹马地参与，而且周围有云彩一般的见证人，甚至在他居住的那个郡都有很多，可以证明有同样的反基督的神甫与他一同行恶。”

可以想到，他的顺从之举定然令自己私底下悲伤不安。就连他的岳父、内兰边斯托克的莫特也是为了良心的缘故而被逐出国教的两千教士之一。首先，拉文汉的圣职待遇丰厚，而他又有一大家子人要养，当然会让人怀疑他这么做是否动机不纯。

但是，毕竟，问题仍有待商榷。葛诺尔做了任何与基督仆人的身份不相称的事吗？他的顺从之举有什么实质的错误？他留任拉文汉，签署《统一令》要求的声明，赞成礼拜仪式，还接受雷诺兹主教按立圣职，但他之前做过什么令他此次的做法显得卑鄙可耻吗？对这些问题，我得说几句。

首先声明，我完全反对《统一令》，尽管我个人对其要求并没有什么为难的。在巴克斯特那章里面我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讲自己对《统一令》的看法，正大光明地谴责该法令。

我反对《统一令》是因为该法令不公正、欠考虑、不慎重、没有风度而且措施强硬，但从来不认为没有好人可能顺从其要求。相反，我很了解，许多圣洁忠信的牧师也会做跟葛诺尔一样的事。他们会坚决主张：我们在今生并不能随意而行；忍耐好过分离；祷告的形式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在教会里接

受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好过放弃做事的机会；接受祷告书的瑕疵，得到传福音的自由，好过拒绝祷告书，却遭禁言；只要《三十九条信纲》仍然纯正，没有改动，就不可能被迫传讲不纯正的教义；只要还可以传讲健全的教义，就不应拒绝讲道的机会，而应该讲道，看顾羊群。这些都是我想到的，好人说服自己不离开国教的理由。当然，葛诺尔是否出于以上理由，我不敢妄言，但我认为有可能。

真相是，任何人在谴责葛诺尔顺从《统一令》之前，都应该想想葛诺尔开始侍奉时的时代和环境。他成为福音的工人之际，正是无法获得主教制按立之时，而且禁止使用祷告书。我并不怀疑，他顺应自己所处环境的做法是正确的。经由主教按立并非担当圣职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否使用英国国教的礼拜仪式也并非教会存亡的根本。葛诺尔开始侍奉时，既没有主教制也没有祷告书，没有这些东西他就开始做工了。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不认为他错了。如果可以传讲福音，就算没有主教和祷告书，也比不能讲道强。

毕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葛诺尔本着良心反对主教制和英国国教的礼拜仪式。从我们已知的资料来看，他从未谴责过主教制和礼拜仪式，否则他后来赞同并采纳这些做法就是自食其言了。那么，对于他服从 1662 年法令的要求，我们有什么权

利指责呢？他接受雷诺兹主教按立，因为若非如此，他就不能在该主教区内任职。但谁能说二十年前如有可能，他不会乐意地接受主教制的按立？他声明自己赞同祷告书中的一切。但谁能说他一生中有任何时候不愿意这样？与那两千遭驱逐的神职人员中的许多人不同，他从未参加威斯敏斯特会议。他也没有像欧文、纽科曼、巴克斯特和许多其他人那样，参与公开的会议、商谈和辩论。他只是一位在乡村教区默默无闻的传道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留在拉文汉任职的举动与此前他所做的任何事不一致。

评价葛诺尔在人生紧要关头的这一举动之时，还有一件事要谨记。执掌他所在的主教区并且重新按立他的人是雷诺兹^①主教，雷诺兹持守清教徒教义，是主教中对良心不安的教士最

^①雷诺兹 1661 年由查理二世任命为诺维奇主教。他是彻头彻尾的清教徒，出席威斯敏斯特会议的重要成员。查理二世让他当诺维奇主教时，也让巴克斯特当赫里福德主教，卡拉米当利奇菲尔德主教，曼顿当罗彻斯特主任牧师，贝茨当考文垂主任牧师。但这些远近闻名的清教徒神职人员都拒绝出任，只有雷诺兹接受了。我斗胆认为，他们的拒绝是英国国教最大的不幸，是教会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突出的错误判断。如果雷诺兹、巴克斯特和卡拉米都当了主教，进入议会上院，曼顿和贝茨也当了主任牧师，1662 年的《统一令》恐怕不能原封不动地获得通过。

为温柔宽宏的。无疑，如果葛诺尔有良心上的顾虑的话，雷诺兹这样的人也会多方努力予以平息。我们也无法怀疑，他绷紧神经尽可能多地挽留主教区内的教士，阻止他们脱离国教。我承认，我非常怀疑这样的境况在葛诺尔心里占了很大分量。很少人为人处世比主教们更能多凭友善，少凭强力。如果葛诺尔1662年对留在国教有任何疑问，我认为很可能是因为雷诺兹主教的品格令他回心转意。简而言之，我大胆猜想，如果诺维奇的主教不是雷诺兹，而是别人的话，葛诺尔就会追随岳父莫特先生，退出英国国教，离开拉文汉教区长的宅邸。

1662年葛诺尔的做法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参详吧。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葛诺尔也拒绝服从《统一令》，与那两千人一同退出国教，那么今日某些人对葛诺尔的评价会更高。但我，也许还有其他人，却因他坚守岗位没有退出而更加赞许他。这两种观点孰对孰错，或许在今世无法断定。我只想表达自己的看法，即在两千弟兄决定离开之际，葛诺尔选择留下也一样是勇敢之举，是认真负责、节操高尚的。1662年那样的运动中，并非只有离开的一方才有恩典和勇气。无疑，有许多例子表明，顺从《统一令》比拒绝要更勇敢，留任比离职代价更大。如果葛诺尔是其中的一个，我不会吃惊。

葛诺尔1662年之后的生活也没有什么文字记载。可以猜想，

1662年的事令他此后多年都伤心不已。如果他留任国教，签署顺从《统一令》的声明，不会在他和退出的弟兄之间造成情感上的疏离，那人性就不是人性了。但我们确实无权对此言之凿凿地说三道四。拉文汉一带有流言说，1662年之后他作为牧师已经不是从前那个葛诺尔了，从那时起他的事工就没有力量、没有神的祝福与之同在了。但我必须直言，我找不到这些流言有任何根据，只能视之为编造的谎话。这样的谎话常常发生在基督出色的仆人身上。其他许多牧师退出国教，而葛诺尔却留任拉文汉，无疑会让萨福克郡最忿忿不平、最极端的不从国教者恼怒不已，因为他这么做是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却在鼓励英国国教。所以，我预计，在他身上当然会有各种虚假的传言。谎言是撒但攻击神的圣徒最主要的武器。

1679年10月12日，葛诺尔去世，葬在拉文汉，享年六十三岁。我们已经看到，在他的信中，还有其他地方，都表明他身体一直很差。但不知道他是突然去世还是久病之后去世。不过，既然他在死前一天写下了遗嘱，那么恐怕他已经病了一段时间。

姆基翁——本书时常参考他写的葛诺尔传记——得到了一份葛诺尔遗嘱的副本，许多读者可能会感兴趣，因此我摘录如下：

“奉神的名，阿们。主后一六七九年十月十一日，我，萨福克郡拉文汉的威廉·葛诺尔，教士——身体病弱，但感谢神，我的思维和记忆仍然良好——把我的灵魂交在神、我主、我救赎主和救主的手中，把我的身体交给大地，由遗嘱的女执行人按她自己的判断来埋葬，至于神乐意交付给我管理的属世财产，我最后的遗愿和约定如下：我所有田产和房屋，以及附属的一切设施物品，不管是在沃尔剖尔还是其他地方，在蒙克兰，在诺福克郡，都交给我亲爱的妻子撒拉和她的继承人，供撒拉有生之年正当使用，直到她死亡，写下遗嘱和约定将这些财产交给我们的哪些子女。我也把我所有的动产、债务和一切个人财产都交给亲爱的妻子撒拉，让她可以维生，过得舒适，最重要的是让她能养大我们年幼的孩子。我也信任她能在我的子女之间合理地保护、处置剩余的财产，按着他们尚未得到抚养的境况，照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和比例交给他们。我只要求，如果我的儿子约翰成为学者，撒拉应该把我的书给他。在此，我提名、指定我亲爱的妻子撒拉为这份遗嘱唯一的女执行人，我已经在上述的日期给这份遗嘱签字盖印了。前面所说的那位威廉·葛诺尔签署盖章，并公告这是他最后的遗愿和约定，我们几位是见证人：多马·莫特、比撒列·皮奇、约翰·品奇贝克。”

第一位见证人很可能就是他的岳父或妻舅。葛诺尔夫人是

多马·莫特的女儿。第二位见证人显然是他的三女儿凯瑟琳的丈夫。第三位也许是起草遗嘱的律师。遗嘱中提到的书可能就是葛诺尔的儿子约翰 1699 年遗赠给兄弟约瑟和外甥纽卡斯尔的莱昂纳德·沙福托的那些书。英语书留给了约瑟·葛诺尔，“其余的书和手稿”给了莱昂纳德·沙福托。这些书就算没有损毁，现在可能也都已失散四方，渺无踪迹了。好人的藏书最终的结局是个令人伤心的话题。很少有什么东西像书这样，一些人无比爱惜，另一些人却轻视忽略，尤其是神学书籍。

葛诺尔的墓地准确地点已经不清楚了。不知道他的骸骨是在教堂里还是在教堂院子里。没有墓碑或纪念碑标出他埋身之地。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树立起纪念他的东西。“唯一能找到的有关他的丧葬信息，”姆基翁说，“是讲坛上的一块黑色大理石板，上面题写着：‘玛丽长眠于此，她是本教区的亨利·鲍顿先生之妻、已故色莫教区长撒母耳·比奇克罗夫特牧师之女、担任本教区教区长三十五年之久的已故牧师威廉·葛诺尔的外孙女。她死于 1741 年 10 月 14 日，享年七十八岁。’这块石板下面是个墓穴，姆基翁推测葛诺尔就长眠在这里，因为鲍顿夫人埋在这里，而没有跟鲍顿家族一起埋在南门的家族墓穴里。不过，这只是推测。”

葛诺尔下葬后不久，颇有名气的新约解经家博济特在拉文

汉教堂进行了一场葬礼证道，他当时是拉文汉附近的米尔登教区长。证道内容保留了下来，题目是“死去的牧师树立了虔诚、有益的榜样，激发人民在圣洁上奋发向上的热心；留给萨福克郡拉文汉教区信众的回忆”。

博济特的证道经文是《希伯来书》13:7：“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这场证道是“应邀”传讲的，也“应邀”出版了，开头题上了“献给我尊敬的朋友撒拉·葛诺尔夫人，拉文汉已故威廉·葛诺尔先生悲伤的遗孀，也献给该镇悲伤的居民”。证道很不错，虽然有些古韵，风格相当浮华。但博济特讲这场道时，还比较年轻，只有二十九岁，所以能讲成这样已经很好了。下面将从证道中选出提到了葛诺尔的内容。

博济特的证道由以下篇章结尾：

“诚实地讲，本篇证道是为了告诉你们，让你们信服，你们对全能的神负有多么重大的责任，因为一方面你们享受了葛诺尔的侍奉那么久，另一方面你们也可以幸福地看到他的榜样；同样，也是要让这个吹毛求疵的时代（有些人对主教制怀有深深的偏见，对服从国教的人，他们看不到优点，只看到跟自己不一样）了解到你们的牧师是服从国教的人，他用得体的话温和地传讲坚固的信仰；他生活虔诚，律己节制，广有爱心，将

珍贵的信仰传给世界；他的全部时间、力量，他的一切，都虔诚地献给了神和他的神圣事工。

“神让摩西拥有高于其他圣人的殊荣。圣人们死时，天使护送他们的灵魂去往福乐荣耀的居所，但摩西死时，有一位天使把他的身体埋在无人知晓的地方，免得以色列人迷信地将他的尸体当偶像，加以崇拜。你们的牧师就像摩西，一生在神的家全然尽忠，当然死时也不会不像摩西。但我可以为生者讲述你们离去的牧师，而无须担心你们会像以色列人那样迷信地崇拜。他谦和的灵魂坐在无法察觉的精致车辆中离开了他的身体，他的死就像现在的犹太传统所说摩西的死，他们之间不再有障碍——他们上去，死了。

“最后，愿你们所作所为同他身上那些值得效法、值得颂扬的优点一致。愿你们死去的牧师在世时的榜样在你们身上发扬光大。愿你们每天都以他为镜，踏上他虔诚崇敬的脚步。愿在审判的那日，你们都能无比惊喜地遇见他，快乐舒畅得无法形容地看见他。这就是现在、将来，我——你们充满同情的仆人和朋友——真心实意的恳求。

“威廉·博济特”

“1679年12月10日，于米尔登”

证道中的下列内容值得一书：

“他日常的谈话给你们树立了多么美丽的信仰标本啊！他照耀出来的圣洁之威严极为有力，赢得了最反对他之人的尊敬，也极有说服力，刺透了他仇敌的良心，令那些因偏见敌视他的人默默承认神与他同在，赐他真理。”

“他虽然死了，却仍旧说话。是的，虽死犹生，他仍是你们的传道人，他的裹尸布和棺材就是讲台，坟墓和墓碑就是殿，尽管他已经静默无声，一个字也没有说给你们听，但他仍在向你们讲道。我的意思是，他留给你们虔诚有益的榜样，在你们中间留下理所当然的美名。”

“我肯定，你们的牧师意识到即将离世之际，有良好的理由盼望，自己埋身黄土后，（作为属灵的父亲）会留下许多孩子，继续在今生担负起基督的事工，这定然给他不小的安慰。”

这篇证道的最后五页都是在讲葛诺尔其人，我觉得最好原封不动地摘录下来：

“最后，我作出结论，你们长久地拥有真虔诚和美德的榜样（我指的是你们故去的牧师），为此你们负有多么大的责任啊！你们的牧师最近走了（恐怕是因为你们的罪）。现在你们要拿出对神的顺服来，尊敬他，珍惜你们自己的灵魂，热心信实地在生活中一丝不苟地效法你们牧师的榜样。不要越过经文的约束，我要诚挚地请求你们以基督徒的样式加倍地顺从以下

责任：

“效法他的信心；效法他的言谈。

“效法他的信心，即加倍地尊重他信心的纯正和信心的坚定。

“效法他信心的纯正。他坚定地认信、教导的信仰是与敬虔相符的教义。这信仰是神直接颁布的，《圣经》是其无误的准则，这信仰是一次交付给圣徒的，并非幻想的结果，而是永恒忠告的产物，已经借着神迹证实，并以一位救主的血封印。一句话，他火热教导的信仰源于《圣经》。他无论何时传讲任何真理，要你们不仅在理智上赞同，还要以信心来顺服、爱慕，他都是一直在用《圣经》正典来证实。如果在他之后有人站在这里，试图引诱你们接受别的福音，或者接受任何《圣经》中没有的教义，就算他假装是天上来的使者，都可咒可诅。

“效法他信心的坚定。他初到你们中间时给你们的信仰原则，他一生都在遵从，并传讲，直到死时。对此我更是言之凿凿，因为有些人恬不知耻地公开宣布，自从他服从教会的纪律，就背叛了起初认信、教导的信心之道。但你们都可以确信，在信心和信仰的大原则上，他都始终如一，至死一直教导你们同样的信仰。我毫不怀疑，如果神呼召他接受猛烈的试炼，他预备着以自己的鲜血来证实这信仰，甚至在最猛烈的火焰中殉道

也在所不惜。

“效法他基督徒的言谈。我的意思是，当初他在生活中展现出来的福音的恩典和基督徒美德，你们要在生活中活出来。

下面列出一些：

“他无比的谦卑。他谦卑地看待自己所有出色的成就，其实这样一来这些成就就更加明显，惹人喜爱了。他看待自己是多么地谦逊啊！他不仅知足，也渴望他人像他一样。没人像他那样如此低估自己的价值和美德。所有他人身上的优点，他认为是卓越的美德，而自己身上同样的，甚至更优秀的优点，他却认为应当轻看。他的眼里看到的都是自己的缺陷和他人的美德。

“一句话，他是可爱的山谷，载满了甜美的植物，浇灌充分，果实累累。所以，请效法他，在这美德上以圣洁的竞争之心超过他，回忆你们从他那里听到的《腓立比书》2:5 精彩的讲解，就能获得帮助：‘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谦卑的心。

“他广博的爱心。这一美德以多种方式展现。

“他对神的爱。他极其爱神，超过自己能献上的爱，因为他深深领会自己的创造主的美善，以至于认为自己最上等、最优秀的情感都不配奉献给如此神圣的一位主。

“他爱圣洁的耶稣。这是他灵里无比快乐的神圣火焰，烧

尽了对世界和所有地上安逸之事的爱。因基督的十字架，就他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可以见证，他达到的程度究竟有多深。

“他爱灵魂。无疑，正是因为这样的爱心令他孜孜不倦地学习，讲道；也正是由此，他全部时间都献给了施恩的宝座、学习、讲台和可怜的邻舍。

“他无比地热爱所有基督徒，尽管他们对他看法不一。他爱基督徒是因他们的信仰，他崇拜基督徒身上救主的形象，即便他们不幸地凭着耻辱的本性，以恶名彼此逼迫。他时常公开哀叹悲泣，说今日宣称持守十字架信仰的人中，最大的爱也不过是朋党之爱，并非真基督徒的爱。那么，请效法他，不偏不倚地操练这一美德，请记住他根据《以弗所书》5:2 给你们的教育：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如果你们还在意自己宣称认信的那位主，就留心别让分裂众人的灵（现在）进入你们中间。团结就是你们的力量，就是你们的美丽之所在。因此，我劝你们坚守基督徒的秩序，他也一生都希望保守你们如此。要及时反对灵魂的仇敌魔鬼狡猾的计谋，以便能够团结一心，因它想趁现在属灵的父亲离开之际兴风作浪（如有可能）。

“他乐善好施。他的施舍就跟他的爱心一样丰盛。无论在哪里看到有不幸，有人缺乏，他都慷慨解囊，令得到帮助的人

对他感恩戴德。他不会掩面不顾穷人，也不会一年只发一次善心来抚慰良心，而是天天都在慷慨地施舍。他在各种土地上都播下了慈善的种子，在神的家中尤甚。我的意思是，他对所有人都行善，但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所以，让他成为你们每日效法的榜样。因为世界是因爱交织在一起的，如果没有了慈善之心，世界很快就会成为碎秸。因此，为了让自己得到更好的帮助，请一一数算劝勉操练这一神圣责任的有力论据，就是他根据《希伯来书》13:16 使徒的教导来敦促你们的：‘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输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

“他殷勤忠信地尽职尽责。可以看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永恒的事工。他不仅绝不闲懒，而且似乎还极其厌恶闲懒，常常在讲道中热切地劝你们，不要闲懒，总要做点什么。正如圣耶柔米所说，‘魔鬼总是忙着找你^①’，所以不要让魔鬼发现你无所事事，就来诱惑你。确实，闲懒之人的脑子不仅是魔鬼的商店，也是它的国，是地狱的模板，地狱的肢体，是生发痛苦和祸害之地。至于葛诺尔牧师自己，最主要的消遣就是各样工作。因为除了自然的需要和日常生活之需占据的时间外，他没有浪费一分钟。现在请激发热心，效法他，我劝你们反复

^①原文为拉丁语。——译注

思量他讲解的《马太福音》20:6：‘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

“他对基督受苦的教会之温柔同情的心。正像锡安的真儿子，他无法在母亲悲哀的时候喜乐，他整日为自己所见所闻感同身受。不奇怪，谁在教会这条船上有货物，就必定在每次风暴的时候哀哭颤抖。他是多么频繁地打探教会的消息，多么热切地为之祷告，多么肝肠寸断地为之哀哭！不管是生是死，教会和国家糟糕的处境都令他忧心忡忡。他看重教会的福祉胜于自己的喜乐。为了获得他里面那种像基督的性情，你们要时常默想他讲解的《尼希米记》1:4，牵肠挂肚的先知看到受苦的教会饮水，就拒绝饮酒。

“最后，总而言之，要效法他日日为了尽所有能力活出信仰而尽心竭力。你们可以见证，神也可以见证，他作为牧师，是多么忠信、本着良心向你们尽责。关于他的牧师工作，如果要责备他有什么疏忽，那一定是他没能更频繁地探访群羊，这是因为他身体软弱，而非心高气傲，不乐意行。软弱的身体给他履行职分造成了障碍，令他不能照自己所愿的来尽职，这不管是在他活着的时候，还是在临终的床上，都是他最大的伤心事。但他可以欣慰，因为身体的软弱是他的苦难，而非罪。再看他身为人子，是多么谦恭孝顺！他总是孝敬给白发苍苍的父

母许多的财物。作为丈夫，他是多么温柔体贴；作为父亲，是多么宽厚慈祥；作为牧师，是多么友善、慷慨！他在一切角色上都尽善尽美，尽心尽力活出信仰。如果你们想效法他，就天天用他这面镜子来反照，这是他正在死去的手最后一次在你们眼前举起的教训。我指的是属天的默想，要让这些有用的真理成为你们自己的，就是你们从他最后一次讲道中听到的，他讲的经文是《提多书》2:12：‘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要是你们确实学会了他忠心地教导你们的功课，我就要大胆地表扬你们，他的百姓，即你们向世界展现了有说服力的范例，表明这个世代的恶行怎样惊人，美德也怎样惊人！

“结论是：我已经尽自己的责任劝你们以基督徒的立场思想你们牧师的榜样，所以我已经满意了。希望不会有人吹毛求疵地说我一直都在给先知的坟墓涂脂抹粉。不，我并不是在说先知本人，我唯一的、诚挚的意图是要你们及时知道曾经有主的先知在你们中间。‘*omnia in se sempiterna praeter corpusculum*^①’，即除了身体以外，这个人的一切都会持续到永恒，只有身体必然死亡，除此之外他没有哪一样会见朽坏。

①原文即为拉丁文。——译注

以妇人之仁哀叹他之死——其实任何口头的哀悼——都会贬损他本人的美德，低估我们的巨大损失。如同他的作品那样，除了圣洁、属天之事，没有别的适于用以纪念他。愿他由此、由自己的美德而得的美名，在一切后来的世代眼中都看为宝贵。当刻在大理石上的挽歌字迹难辨，仿佛是写在水中之时，当所有雄伟的金字塔都化为尘土，所有古时的纪念碑都被时间侵蚀吞没之时，愿这句真实充分地刻画他形象的简短话语，仍然存留，即他是一位‘装备齐整的基督徒’。”

这篇葬礼证道也提及了拉文汉的环境，而我们现在对当时拉文汉的环境还不能确定。显然，葛诺尔在履职的后半段日子里遇到的麻烦不小。人们绝对忘不了1662年他顺从了国教的要求，他人生最后的岁月可能因为教区内某些教众难以释怀的敌意而阴云密布。博济特无疑比其他人更了解葛诺尔的内心世界，但很遗憾，他没有写一份葛诺尔的传记。他本可以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却没有做，太可惜了。

葛诺尔的遗孀在他死后又活了十九年，好像也一直住在拉文汉。不管怎样，1698年9月7日，她在拉文汉下葬，处理她财产的告示上称她为“已故的拉文汉寡妇撒拉·葛诺尔”。

姆基翁说，葛诺尔留下了至少八个孩子，另外还有两个年纪轻轻就死了。

1. 撒拉，1646年4月2日受洗，嫁给了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梅耶先生。
2. 苏珊娜，1650年4月4日受洗，嫁给了萨福克郡色莫教区长、毕业于剑桥以马内利学院的撒母耳·比奇克罗夫特牧师。
3. 凯瑟琳，受洗日期不详，嫁给了萨德贝里附近的比尔斯·圣玛丽教区的教区牧师、剑桥以马内利学院毕业生比撒列·皮奇牧师。皮奇也是葛诺尔遗嘱的见证人之一。
4. 伊丽莎白，1655年4月25日受洗，嫁给了伊普斯维奇的教士、毕业于剑桥基督学院的腓力·理查德森牧师。
5. 安，1655年2月11日受洗，母亲1698年过世前，与她一起住在拉文汉。1700年6月，她嫁给了娄尔斯托夫特的威廉·曼思罗普先生。
6. 又一个女儿，名字不详，丈夫姓夏福拓，来自泰恩河畔纽卡斯尔。
7. 多马，1659年3月13日受洗，定居小沃德令菲尔德，1723年去世，就葬在当地。
8. 约瑟，1662年7月23日受洗，是位律师，姆基翁认为他住在拉文汉。
9. 约翰，1664年12月24日受洗，1685年就读剑桥基督学院攻读文学士学位，后来在布罗克利做副牧师，直到1698年。

1700年2月6日，在拉文汉下葬。

10. 莱昂纳德，1669年5月11日受洗，情况不详。

我没有找到葛诺尔现在还有什么后代。据我所知，拉文汉没有一个人姓葛诺尔。他曾居住的教区长宅邸已经不复存在。拉文汉教区的俸禄已经归给剑桥凯斯学院。除了作品外，一切与他相关的东西都似乎消散殆尽。只有凭借他的作品，“他虽然死了，却仍旧说话”。

至此，我已经穷尽了一切关于《装备齐整的基督徒》作者的信息，只能为自己无法为读者提供更多信息而深感遗憾。的确相当令人沮丧，这样一位17世纪的作者，比大部分清教徒都要出名，住在距离欧文、马歇尔、纽科曼、杨和斯托克顿等人不到二十英里的地方，他三十五年来所居之地是两百年前相当重要的城镇，而且属于当时闻名遐迩的萨福克郡，但这样的人却悄然而逝，留下的信息竟然那么少！但事情就是如此。也许，葛诺尔并不是个案。也许，到末日，我们会看到有些最优秀、最圣洁的人却鲜为人知。

现在，我没有别的可以讲了，只是要说一说葛诺尔的作品，最近首次集结成册出版^①。

^①我指的是布莱基的葛诺尔全集完整版。

葛诺尔的第一本书，也是令他名垂青史的作品，是《装备齐整的基督徒》。这本名垂后世的书同其他 17 世纪神学作品一样，是作者日常的证道或讲座集结而成的，讲的经文是《以弗所书》6:10-20。

这本书最早出版时是小四开本，分成三部分，于不同的时间出版。第一部出版于 1655 年，讲的是《以弗所书》6:10-13。葛诺尔把这本书题献给“拉文汉的居民，我亲爱的友邻”，题献词中包含一项独特的声明，称此书是用于在拉文汉传讲的证道集结而成的。葛诺尔说：“您在本书中看到的，是您自己餐桌上的菜，所以（我希望）会起到更好的作用。尽管本书看起来很平常，但请不要轻视，否则你就是在责备自己，因为厨师是你选的。”题献词最后的落款表明了这本书的出版日期，1655 年 1 月 1 日。我手中的是第二版了。

第二部于 1658 年出版，讲的是《以弗所书》6:14-16。书中包含给萨福克郡肯特威尔大院的“托马斯·达西骑士和他信仰的伴侣西西莉亚·达西夫人”的题献词。似乎达西夫人是葛诺尔的保护人西蒙德·德威斯爵士的女儿。落款是 1657 年 10 月于拉文汉。我手中的是第一版。

第三部出版于 1662 年，讲的是《以弗所书》6:17-20。葛诺尔将其题献给 17 世纪名声不小的提尔贝里男爵夫人玛丽·

维尔女士，她是格洛斯特郡托丁顿的威廉·特雷西骑士之女。落款是1661年8月28日。我手中的是第一版。

也许，葛诺尔的伟大作品已经无须推荐，无须评述了。他去世的1679年，已经出版了第六版，就足以证明该作品的价值已经得到认可。别忘了，时至今日，该作品在喜爱纯正英国神学的人中仍然享有盛誉。其他17世纪神学作品在当时名噪一时，但现在很少人会读。而《装备齐整的基督徒》直到今天仍然有成千上万的读者为之倾心。

《装备齐整的基督徒》另一项特点就是教义陈述健全纯正，符合《圣经》。葛诺尔阐述任何论点，不管是论信心还是实践，都毫无夸大之辞。他没有给什么事涂脂抹粉，也没有把什么掩盖起来。在这方面很像班扬的《天路历程》，在教义上很平衡，加尔文主义者和阿民念派，国教教友和不从国教者，都一致认可，赞不绝口。

葛诺尔作品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充满了举例说明和比较。全书几乎找不到哪一页没有生动地描绘出属天之事，如同一缕阳光一样照亮整个主题。我并不是说他在这方面超过了布鲁克斯、华森和斯温诺克，但我肯定他可以与他们比肩。如果更多传道人拥有阐述说明的恩赐，勤加操练，那教会定会蒙福！要想人们牢牢记住证道内容，就要像神圣的主一样，“设立比喻”。

有句东方格言说：“谁让听众耳闻成眼见，让他们看到自己讲述之事，那他他就是最雄辩的人。”

葛诺尔作品的另一美妙特征是简练扼要，直指要害，字字珠玑。如果从《装备齐整的基督徒》里选取那种简短的金句，将会填满一页又一页。书中时常出现一两句包含某些伟大真理的话，非常简练，却又内涵丰富，让人不禁惊叹这么几句话怎么能表达如此多的思想。

要罗列证据来证明《装备齐整的基督徒》一书的价值，非常容易。巴克斯特和芙莱维尔都对这本书给予高度评价；托普雷第常常在记事本中大段摘录书中的话；约翰·牛顿说，如果在《圣经》之外只能选择一本书，他会选葛诺尔的《装备齐整的基督徒》。塞西尔最后的日子花了许多时间读这本书，一再表达自己的赞赏。但我说得已经足以令读者心烦了，读者最好还是亲自去读一读这本书，自己来判断。最近，梅色尔·布莱基出版了一个漂亮的版本。

除了《装备齐整的基督徒》这本经典之作外，已知的另外两本葛诺尔作品都是在特别场合的单场证道。

其中一篇叫做《神的话语中描绘的治安官形象》。这篇证道是1656年8月20日，“本郡议会重选前”，在萨福克郡的斯托马基特传讲的，并于同年出版。证道的主题取自《以赛亚

书》1:26。这是篇卓越的证道，配得上作者的名。

另一篇叫做《基督徒的劳苦和赏赐》，是1671年1月10日在埃塞克斯郡的赫丁汉城堡传讲的，并于1672年出版。内容主要是在玛丽·维尔夫人葬礼上的演讲。玛丽夫人是提尔贝里的贺瑞斯·维尔爵士的遗孀，《装备齐整的基督徒》第三部就是题献给她的。葛诺尔把这本书题献给玛丽·维尔夫人的女儿，即克莱尔的道维吉尔伯爵夫人伊丽莎白。无疑，这也是篇不错的证道，但如果能再精简一些就更好了。然而，传讲葬礼证道的人很少有充分的时间准备，也许葛诺尔没有时间把证道缩短一些。

有人断言，除了上述作品外，葛诺尔1660年出版了一卷讲道集。姆基翁说，库克1783年出版的《传道人的帮助》一书提到了这卷讲道集，伦敦有位书商告诉他说，曾经看到过一本。

但在大英博物馆找不到这卷讲道集，牛津的博德利图书馆也找不到，伦敦的红十字街图书馆也没有。我也没听任何活着的人，书商也好，神学古书收藏者也好，说自己看到过这卷讲道集。因此，我想姆基翁可能搞错了，这本书并没有出版过。

在结束本章之际，我热切盼望有更多人购买、阅读葛诺尔的作品。恭敬地将《圣经》作为信仰和实践的唯一准则的书，正确看待基督和圣灵的书，清楚、明确、准确地描绘、阐明称

义、成圣、重生、信心、恩典和圣洁的书，才能有益于人。复苏读者对这类书的兴趣，是最为紧要的事之一。

至于我自己，我只能说，所有声称对我主的事工有所启发的书，只要我能获得，我都读了。但读得越多，就越无法赞赏现代神学。研究新派神学教师的作品越多，我就越感到，这种作品要是能满足人心，那真是奇迹。关于大公教会系统或更宏大系统的文献，这些书很模糊、幼稚、肤浅、空洞、未得要领，在我看来，这些东西在脸上就写上了出身。它们是出于地，是属世的。对于所谓的大公教会或普世教会学派领袖的书，葛诺尔的一页作品比五页这样的书包含更多满足人灵魂的思想。在神学这件事上，“古旧的更好”^①。

^①原文引用了《路加福音》5:39 耶稣关于酒的比喻。——译注



詹姆士二世 (1633~1701)



查理二世（1630~1685），因他死后无嗣，弟弟詹姆士二世才得以继位。

詹姆士二世与七主教

自宗教改革以来，对英国影响最大的时期莫过于詹姆士二世在位的岁月。我们的公民和信仰自由，以及对更正教信仰的传承，都要归功于这一时期。因此所有真心实意的英国人都应该关注这一时期。我打算在本章中大致概述詹姆士二世统治时期的重要事件，并详细讲述一下著名的审判七主教的故事。如果本章的整个主题不能为我们今日的立场和责任带来广泛而清晰的启发，那我定是犯了个大错误。

詹姆士二世的统治时期异常短暂，始于 1685 年 2 月，

1688年12月结束。尽管他的统治非常短暂，但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除了血腥玛丽外，这片土地上没有其他任何立宪君主的统治会像他那样因严酷、愚蠢、不公、专横——君主本人可以不受掣肘地行事——而颜面尽失。事实上在英格兰的历史记载中，这段日子一无是处。没有一场可以振奋我们爱国情感的伟大胜利；没有一流的政治家或将军，几乎没有值得我们钦佩的主教，除了肯主教和皮尔森主教外；只有艾萨克·牛顿爵士的伟名孤零零地伫立在科学界。那时这片土地上几乎没有伟人。这是一个平庸至极的时代，不是黄金时代，也不是白银或青铜时代，甚至连黑铁时代都算不上，这是铅的时代。我们羞愧、厌恶地转过头去，不想看到这番景象，但记忆中还是定格下了一幅没有光明只有阴影的画。

这段时期如此丢人，主要原因是，詹姆士二世是一个心胸狭隘、偏执、狂热且彻头彻尾的罗马教会成员。他一登上王位就启用了神甫和罗马教谋士，除了罗马教徒谁也不信任。詹姆士二世登基不到一个月，伊夫林就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那帮罗马教徒在宫里上蹿下跳，信心满满，英格兰自宗教改革后从来不曾看到过这样的事。”在他的加冕礼上，詹姆士二世拒绝按照英国国教的仪式举行圣礼。他在宫廷中设立了一座罗马教礼拜堂望弥撒。他在统治期间竭尽全力鼓励罗马教传播，抑制

更正教。他促成罗马教廷派一位大使来访，并在这位大使面前自贬身份，而自从约翰王以来英格兰君主从未如此。他对法国大使巴立龙说，他最首要的目标是让天主教徒能自由地礼拜，而最终目标是让他们获得绝对的权力。一百多年前，殉道的改教家们让这个国家从罗马教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更正教也形成了组织体系，现在竟有人想在这个国家复辟天主教！谁能想象掌管万有的神不悦了，拒绝在这片土地展现他笑脸的光照？詹姆士二世统治时期是英格兰历史上一段不幸、耻辱的日子，因为国王是个彻头彻尾的罗马教徒。

詹姆士二世统治时期很不光彩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即位后全国上下堪忧的道德状况。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治国无方，劳德大主教实行半罗马教化政策，共和国时期激烈内战，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铁腕统治，查理二世复辟后社会道德反弹变得肆意放荡，极其愚蠢而又不公的《统一令》，打着侍奉神的旗号毫不停歇地迫害真信仰，想统一思想——所有这些都导致了自然而然的苦果。詹姆士二世统治下的英格兰道德败坏，腐朽不堪。宫廷似乎已经把体面扔到九霄云外，完全不认为通奸和淫乱是罪。伊夫林描述了查理二世去世那周他在白厅看到的令人作呕的悲哀景象。1685年的2月1日，星期日，这天的晚上伊夫林似乎也在白厅。一周后他记录下了他目睹此景的印象：

“我绝不会忘记那种难以形容的奢华与褻渎，完全无视神，这是在主日晚上啊。国王坐着，与他的姘头朴茨茅斯、克利夫兰、玛扎琳等人一起狎玩，一个法国男孩在富丽堂皇的走廊里唱着淫曲；与此同时至少有二十个左右的大臣和其他风流人士在一张巨大的桌前打巴塞特牌，他们面前至少堆着两千枚金币。”2月2日，周一的早上，国王就中风了。

查尔斯·奈特（《英格兰史》）忠实写道：

“大公无私的崇高精神，真实的荣誉感，这些使英格兰贵族和上流人士在内战中与众不同的品质，在二十八年的复辟统治中，在自私、卑劣和放荡的包围下消失殆尽。人们正大光明地腐败，孵化出卖国贼；政治家和律师自私自利得令人发指；厚颜无耻的卑躬屈膝成为神职人员的首要信条；贵族总是克扣仆人的口粮；人们党同伐异却打着爱国的旗号；人民大众对任何义愤或迫切的盼望都无动于衷。他们各自干着自己的营生，只要有吃有喝，生活愉快，就不太在乎统治他们的是极权还是宪政。他们已经挣脱了清教徒的严格自律；不仅法庭对正派人士怒火冲天，舞台也嘲笑他们，而且人民大众更是无拘无束地放荡。”

政府高层往往极其无耻地撒谎，乐于收受贿赂。法官自私、腐败、无知成了定律。英国国教本应是对抗邪恶的堡垒，却再

没能从 1662 年《统一令》造成的自杀性失血中缓过气来，虚弱不堪，缩手缩脚，唯命是从。主教和教士跟改教家很不一样了，他们不愿意指出任何大人物的过错，也不愿驳斥国王随心所欲的教权，少有例外。当局小肚鸡肠地对不从国教者毫不宽容，他们被迫转入地下。他们面临罚款、坐牢和迫害，几乎无力为改变时代做些什么，只能勉强从水底下探出头来换口气。

最后，但并非最次要的，我们决不要忘了，过去一百多年里，英格兰不断遭遇不知疲倦的耶稣会会士的阴谋。自从伊丽莎白登基以来，这些恶毒的罗马教代理人就走遍了陆地海洋，要摧毁宗教改革的事工，把我们的国家带回罗马教会的奴役之下。他们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伪装自己，宣称得到教皇的允许和差派，为了实现目的，这些耶稣会会士在整个斯图亚特王朝期间都没有消停。他们不断挑拨国教信众敌对不从国教者，加尔文主义者敌对阿民念主义者，挑起派系争端，以削弱更正教事业。17 世纪，国教人士同不从国教者之间的苦毒纷争，令人世蒙羞的宗教争端，有多少要归功于耶稣会会士，我相信只有到末日才能揭晓。只有读了《帕奇尼回忆》或迪恩·古德《罗马的诡计》的人，才会了解他们干的坏事。简言之，如果近代历史中有哪个时期信奉罗马教的国王可以推广罗马教，毫无阻拦地大行残暴不公之事，那就是詹姆士二世统治的日子。要不是他滚蛋得

太快，那么这样的王，做这样的事，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还真没法说。神以他无比的良善向英格兰施慈爱，救我们脱离恶人的毒计。但詹姆士二世在他掌权期间的所作所为^①，他逾越界限审判七位主教的特别方式，他丢了王位，对于这些，任何英格兰人，只要是真正的更正教信徒并热爱自己的国家，都不应该忘记。

詹姆士二世在位期间，有五件重要的事件应当特别留意。从詹姆士登基到退位，这五件事依次发生，都有同样的目的，即颠覆更正教，在废墟上重建罗马教。

詹姆士二世在位时期第一页耻辱的历史是他野蛮凶残地对待不从国教者。伟大的历史学家麦考利说：“他对清教徒的仇恨来自多个方面，包括神学和政治、家族与个人这几方面。他视清教徒为天敌，是教会和国家所有合法权威的敌人。”真相是，多年来最坚决、热心的更正教拥护者都是不从国教者，而在劳德大主教的危害性政策影响下，国教教众变得不冷不热，不从国教者却同罗马教不共戴天，天生愚钝的詹姆士知道了这些就

^①想要了解詹姆士二世统治期间的历史，可以看看博内特、哈拉姆、麦考利、查尔斯·奈特、兰克等人的书，还有斯托顿的《复辟时期教会史》。

感到受够了。一掌权，他就尝试彻底镇压不从国教者。如果他的前任使用杖来惩罚他们，那他就是用蝎子来惩罚他们。如果他没法让他们皈依，就会借着起诉、罚款和牢房来让他们闭嘴，并且，他像法老一样，用严厉的手段“让他们觉得命苦”。无疑，他的主张是如果能堵住不从国教者的嘴，不久就能除掉国教。他狡猾地先从弱小的一方身上开始。他一厢情愿地盘算着怎么都不会失手。

这段日子里，不幸的不从国教者怎样被传唤、罚款、禁言、逐出家门，甚至没有立足之地，要说起来可以没完没了。有两幅画面足以展现他们受到的是怎样的苦待。一幅是在英格兰，一幅是在苏格兰^①，都是在国王继位三个月之内批准的事。

英格兰的这幅画面就是审判名垂青史的巴克斯特。巴克斯特是《圣徒的安息》一书的作者，这本书直到今日仍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1685年5月，詹姆士可憎的鹰犬、大法官杰弗雷斯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审判巴克斯特，罪名是出版煽动性的书籍《新约释义》影射攻击主教。再不可能找到比这更荒唐、更

^① 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后，王位由苏格兰王詹姆士六世继任，称为詹姆士一世。此后，英格兰和苏格兰成为共主邦联，因此詹姆士二世也统治着苏格兰。——译注

缺乏根据的指控了。这本书流传了下来，任何人都可以看看是否支持检方的指控。审判一开始，裁决如何就很清楚了。英格兰首席大法官的举动就好像他是检察官，而非法官。他屈尊俯就，竟然同辩方争吵，用的是谩骂的语言，似乎是在伦敦的鱼市场骂街，而不是在法庭上。他一次又一次地威逼辩方律师，不准他发言，甚至用猛烈抨击被告的话来打断他。有一次，大法官宣称：“这是个老流氓，用他在基德敏斯特的教义毒害世界。他鼓励所有大姑娘小媳妇用缝衣针和顶针来同蒙福的国王打仗。这是个搞分裂的老恶棍！虚伪的罪犯！”不久，他又骂巴克斯特，“老笨蛋，不知感恩的恶棍，自负顽固的疯狗。”“吊死他！”他说，“这个老家伙羞辱我们教会的制度和原则已经够多了，一百年都擦不掉。但我要为此教训教训他，因为他该受鞭打，在城里示众。”一会儿后，当巴克斯特开始为自己辩护时，说了两句话，杰弗雷斯就打断他，喊道：“理查德，理查德，你以为我会任你毒害法庭？理查德，你这个老家伙，老坏蛋。你写的书可以装满一辆马车，就像鸡蛋里满了肉，每本都充满了煽动性甚至可以说叛国的言论。要是四十年前就鞭打你，让你停笔，那该多好啊。”毋庸多言，在这样的法庭上巴克斯特立即被判有罪。法庭判处他罚金五百马克，显然他无力支付。在付清罚金之前，他不能出狱，而且还要签字保证七年里行为

良好。结果，《圣徒的安息》一书的圣洁作者，这位可怜的老病弱、无儿无女的鳏夫，竟然在南华克监狱待了两年！

不从国教者在詹姆士二世统治之下的遭遇，苏格兰的那幅画面甚至比英格兰的更黑暗。我将大体基于沃卓和麦考利的记载来讲述此事。就在巴克斯特受审当月，两位妇人因信仰的缘故在魏格顿郡丧命于詹姆士二世的走狗之手，一个是上了年纪的寡妇，名叫玛格丽特·麦克拉齐兰，另一个是十八岁的少女，名叫玛格丽特·威尔森。她们都是敬虔的妇人，并无任何罪行，只是不从国教。如果她们发誓弃绝盟约者的造反行径，参加主教制的敬拜，就能活命。但她们拒绝了，被判溺水刑。她们被押到索尔维海岸的一处地方，潮水每天两次淹没那里。刽子手把柱子固定在沙土中，标上高低水位标记，又把她们绑在上面。老妇绑在离水近的一边，当局希望她最后的痛苦挣扎能震慑年轻的姑娘，让她屈服。场面骇人，但年轻姑娘并未丧失勇气。她看到难友被淹没，海水离自己越来越近，却丝毫没有惊恐的表现。她祷告，并歌唱《诗篇》，直到海浪让她哽咽。当她尝到死亡的痛苦之时，刽子手解开她，把她救活，这真是残忍的慈悲。她醒过来后，满心怜悯的朋友和邻舍劝她顺服。“亲爱的玛格丽特，”他们说，“你只要说，神佑国王。”可怜的女孩坚持自己的信仰，喘着气说：“如果是神的旨意，那么愿神

拯救他。”朋友们围着监刑官，喊道：“她说了，她实际上已经说了啊，大人。”“她会发誓弃绝吗？”他坚持。“决不，”她说，“我属于基督，让我上路吧。”他们再次把她绑到柱子上，索尔维的海水最终吞没了她。她的墓志铭直到今天仍立在魏格顿教堂的院子里。

这就是詹姆士登基之初对待更正教不从国教者的方式。对这两件事我没必要说什么，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判断。而这两件事并非特例。克雷弗豪斯谋杀普里斯特希尔的约翰·布朗一案，与玛格丽特·威尔森事件一样令人悲哀。这就难怪苏格兰人民心里根深蒂固地扎下了对主教制的厌恶，直到今日！他们永远忘不了类似玛格丽特·威尔森的这些事件。甚至在英格兰，我也希望这卑鄙的迫害能像巴克斯特那件案子一样，遭到来自国教信众的反对。但看呐！詹姆士一时之间顺风顺水，恣意逼迫，没人反对他。

詹姆士二世在位期间第二页黑暗的历史是，1685年秋，对跟蒙茅斯公爵造反有牵连的英格兰郡县，他的惩罚残忍得令人发指。对于这场不幸的反叛，明智的人当然都会持同样的看法。无法否认，这次短暂的叛乱——终结于赛吉莫之战——属于极为愚蠢的犯罪行为。大家都知道，这次叛乱不幸的带头人蒙茅斯公爵付出了上断头台的代价。但是，对所有同情蒙茅斯

公爵的人，以及拿起武器支持他的人，詹姆士的报复凶残嗜血，在英国历史上无人可比，否认这一点也是徒劳的。

叛军兵败溃散后，军事怪物柯克上校的做法比印度叛乱中我们听说过的任何事都要过分。据说，赛吉莫之战后，他在汤顿一周就绞死了至少一百名所谓的叛贼，许多人甚至连审判的过场都没有走。不少悲惨的遇难者被分尸，头和肢体送往临近的村庄，用链子吊起来示众。“被分尸的死人太多了，”麦考利说，“绞架下的刽子手的脚踝都浸在鲜血里。”

但即便是柯克上校魔鬼般的残忍行径，比起赛吉莫之战两个月后，杰弗雷斯在汉普郡、多塞特郡和萨默塞特郡设立巡回法庭时可憎的判决，也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了。他在多塞特郡绞死了大约七十人，在萨默塞特郡不下二百三十三人。被终身流放的总人数达八百四十一人。他们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没有学问的乡下人，其中许多人品性无可指摘，因为认为更正教处于危急关头才拿起武器。他们仅仅是因为追随政治冒险家蒙茅斯公爵短短几星期，就被剥夺了生命。长久以来，巡回法庭被称为血腥法庭。麦考利说：“在萨默塞特郡，每个大村庄，只要有人给蒙茅斯当兵，那里的草地上就会有栓尸体的铁索在风中咋哒作声，或者人头、碎肢被挑在杆上，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令过路的人恐惧不已。在许多教区，农民聚集到教会时，甚至

都会看到哪个邻居的脑袋挂在门廊上，脸色惨白。”在汉普郡，杰弗雷斯判处一位可敬的七十岁老妇利斯尔夫人死刑，只因她暂时收留了一个叛乱者。只是因为温彻斯特教士激愤地抗议，才令她未遭活活烧死的刑罚。攻克赛吉莫的费弗夏姆大人，还有国王的妻舅克拉伦登大人为她求情，但毫无效果。杰弗雷斯获准照自己的意思办，在温彻斯特的集市上砍了她的脑袋。

所有这些可憎的残酷行径，詹姆士二世难辞其咎。流人血的卑鄙之徒只不过是他的工具，只要他一句话，屠杀就会停止。历史学家哈拉姆特意说，国王是这一切血腥杀戮的始作俑者，杰弗雷斯后来宣称“他的血腥还没达到主人要求的程度”。但国王可憎的野蛮行径真正的秘密是，他决心用恐怖统治来摧毁更正教，让人再也不敢赞同这种信仰。归根结底，必须说出真相。詹姆士所在的教会多年来习惯于“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而詹姆士又是该教会里的顽固分子。他只不过是追随了阿尔瓦公爵在尼德兰的脚步，查理九世在圣巴多罗买日大屠杀的脚步，萨伏伊公爵在皮德蒙特的脚步——只是后来克伦威尔的干预令他不得不停止^①，以及可恶的西班牙

① 阿尔瓦公爵是16世纪西班牙贵族，曾任尼德兰（今荷兰与比利时，即“低地国家”）总督，实施恐怖政策，大肆屠杀当地人；查理九世是1560~1574年在位的法国国王，于1572年对法国更正教胡格诺

宗教裁判所的脚步。有一点可以肯定：罗马教徒詹姆士镇压蒙茅斯公爵造反之残酷血腥，超过了任何一场小型叛乱所遭遇的镇压。血腥是极大的污点。有朝一日，他会看到自己付出的代价，柯克和杰弗雷斯在他批准之下所杀之人的鲜血已经向天哀告，神不会忘记。奥兰治亲王在托贝登陆后，西部各郡都群起响应，背叛詹姆士。

詹姆士二世统治时期第三页黑暗历史是他竟敢对讲道加以限制，阻止所有反对罗马教的传讲。

教会历史的每一时期，讲道都是神用来坚固真理、防止谬误的首要方式。宗教改革在英格兰见效，一种主要的方法就是讲道。罗马教会对此心知肚明，无论在何处，只要他们敢，就总会努力高举仪式，贬低讲台。拉蒂默的话精妙绝伦：“无论何时，只要魔鬼进了教会，就会盘算着要高喊：多点蜡烛，少讲道。”对罗马教事业最大的阻碍除了公开自由地获得《圣经》之外，就是自由的讲台和公开阐释神的道。我们一刻也不用怀疑，詹姆士二世跟所有顽固不化的教皇拥趸一样，对此十分清楚。因此，对于他1686年着手攻击英格兰讲台之举，我们无须惊讶。

派实施了“圣巴多罗买日大屠杀”；萨伏伊公爵曾在意大利西北部的皮埃蒙特地区迫害瓦勒度派，遭致克伦威尔干预。——译注

如果他能让讲台这一大能的途径静默不言，就有希望铺平罗马教前进的道路。麦考利说：

“他命令国教教士在讲道中不得涉及争议教义。因此，当王室教堂每个主日和节日传讲为罗马天主教辩解的证道时，国教，这个国家有大群信众的教会，却不能为自己的原则进行解释和辩护。”

圣殿教堂主管牧师威廉·谢洛克是第一个感受到国王怒火的人。他的津贴停发，并遭严厉申斥。诺维奇主任牧师、圣盖尔教区长约翰·夏普更令国王恼火。他应一位教区居民的请求，生动地驳斥了罗马教会的自命不凡。于是，当局立刻命令伦敦主教康普顿让他立即停职。主教拒绝了，于是他自己被停职，不得承担任何属灵的职分，他的主教区被交给两位趋炎附势的高级教士斯普莱特和克鲁。康普顿讨厌罗马教早就声名在外了。当詹姆士登上王位，他就勇敢地在上院宣布：“宪法危险了。”詹姆士当然渴望镇压他。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条霸道的政策竟峰回路转，发挥了好作用。自从登基以来，第一次有人找詹姆士算账了。对谢洛克、夏普和康普顿主教的打击激起了全体英格兰教士的愤慨，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讲道驳斥罗马教的谬误，以此为荣。伦敦的教士作出了榜样，并为全国教士勇敢地群起效法。各地都无

视国王禁止传讲争议话题的命令。从怀特岛到特韦德河畔伯立克，从兰兹角到北佛兰，违反这条禁令的神职人员每周日都成千上万，因此不可能惩罚他们。此外，会众的情绪完全迸发出来了。伦敦有人的祖父听过拉蒂默的讲道，见过约翰·罗杰斯在史密斯菲尔德烈火焚身。还有人的父母目睹了劳德因为试图让教会罗马化、迫害更正教教士而被砍头。詹姆士的举动激起这类人的厌恶。要是教士不讲道揭露罗马教，他们就会认为教士不忠、犯罪。

除此之外，伦敦、牛津和剑桥的印刷厂也齐心协力地印制反对罗马教的作品，凡能识字的人都可以看到关于罗马教会每一谬误的丰富信息。提罗岑、斯蒂令弗利特、谢洛克、帕特里克、滕尼森、维克、福勒、克拉格特以及其他许多人写了无数各种各样揭露罗马教的专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作品都保留到了今天，许多都收录在了名为《吉布森收藏》的三卷大部头里，而麦考利估计大英博物馆里有多达两万页的这类作品。

这件事突出地证明了，神的大能可以让恶行产生好的效果。这位可怜的罗马教君主以为能让最强的敌人闭嘴，结果却成了毁灭自己的第一步。至此，他似乎已经黔驴技穷。从此，他开始走下坡路。从他用手摸约柜，干涉神的道，压制传道人之时起，他再未得势，后来迈出的每一步都江河日下。他就像哈曼

一样，竟敢攻击神特选的仆人，也就像哈曼一样，一蹶不振。

詹姆士二世统治时期第四页黑暗的历史是 1687 年专横地干涉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的权利。

这两所英格兰泰山北斗级别的大学一直影响力惊人，我相信它们也会如此继续下去。这两所大学的影响力在 17 世纪末达到了顶峰，并非夸大之词，因为除了它们以外，再也没有大学和学院了。那时，伦敦国王学院、杜伦的大学学院、圣艾丹学院、海布里学院、圣比斯学院和卡德斯顿学院都不存在，只有牛津和剑桥。当时，这两所大学是这个国家一切学问的源地，所有最有才干的神职人员和律师、诗人和演说家都毕业于这两所大学。即使是清教徒中，也极少有哪个有才之士没有在这两所大学就读、任职过。简言之，这两所大学是英格兰知识分子的心脏，每一次跳动都能让这个国家感受到。

对此，我们无须怀疑，即使詹姆士二世那颗榆木脑袋也无疑很清楚。他发现，如果不能控制这两所大学，就根本没有机会在英格兰推行罗马教，因此，他决定先向大学下手。牛津和剑桥一直以来对斯图亚特王室可耻的忠心众所周知，这也可能让詹姆士更加乐观。在不幸的共和国战争时期，这两所大学都因为与国王一派过从甚密而大受损害。许多学院的院长都被免职，换上了克伦威尔一派的清教徒。欧文掌管了基督教堂学院，

而古德文掌管了莫德林学院。许多学院的钱柜空空如也，相比旧日的状况十分可悲，因为银子都拿去熔化，援助查理一世购买武器弹药了。自从宗教改革以来，两所大学对王权马首是瞻，坚持君权神授，经常以谄媚之辞讨好国王。我想，詹姆士自以为是，以为他们会事事都就范，天真地梦想几年后他们会完全听从教皇的指令，英格兰年轻人的教育会把握在罗马教会手里。这一前景令他陶醉。但他的如意算盘并没有考虑到这两所大学本身。他对牛津和剑桥的精神一无所知。

詹姆士的行动开始了，先攻击剑桥大学。大学的规定很清楚，不管什么人，若不宣誓，就无法取得任何学位，宣誓的誓言一份叫“无上权力的誓言”，另一份叫“顺从的誓言”。尽管如此，1687年2月，国王还是写信给剑桥，要求授予本笃会修士阿尔班·弗朗西斯文硕士学位。王命和学校制度间的矛盾将大学的官员们置于非常复杂之境地。为了学校的声誉，他们采取了正确的方式，即在国王提名的人选宣誓之前，坚决不同意授予学位。结果，剑桥副校长以及大学理事会任命的代表们被杰弗雷斯执掌的新高级专员会议法庭传唤。庭审的日子到了，副校长佩切尔博士——此人没什么特别的能力——在包括大名鼎鼎的艾萨克·牛顿在内的八位名人的伴随下出现在了实力强大的特别法庭。案子一目了然。他们要求法庭让他们证明

自己并未违反法律和惯例，而仅仅是执行了院规最直白的要求。但杰弗雷斯什么都听不进去。他下流无礼地对待这些人，仿佛他们是在老贝利街^①受审的重犯，没有进行听证就把他们轰出了法庭。稍后，法庭又召他们进去，告知他们，高级专员会议决定免去佩切尔副校长职位，并停发他作为一所学院院长所有薪金。“至于你们，”杰弗雷斯以令人作呕的轻浮态度对艾萨克·牛顿和七位同伴说，“我送你们回家，给你们一节经文：‘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对付完剑桥，詹姆士又开始对付牛津。必须承认，他在这里采取行动时优势很大。罗马教在这里已经有了积淀，在大学心脏地带也有盟友。经国王提名，议会通过，罗马天主教徒马西已经当上了基督教堂学院学监。大学学院在院长俄巴底亚·沃克尔归向罗马教的政策折磨下，已经比罗马教神学院好不到哪里去了。这两所学院每天都望弥撒。但这种状况在整个牛津激起了人们心中的愤懑。本科生对沃克尔的聚会报以嘘声，并在他的窗子外唱讽刺性的民谣，却未遭到学监干涉。其中一首歌的歌词保留了下来，你们可能在这所古老学院附近的大街上听过，歌词是：

^①处理英格兰、威尔士重大刑事案件的中央刑事法院位于老贝利街，因此也常以街名来指代。著名的新门监狱也在这条街上。——译注

老头俄巴底亚，
唱万福马利亚。

简言之，任何细心的人都会预见到，牛津对国王的感情将会大大改变，小小的火星就能燃起熊熊烈焰。

正当此危急时刻，莫德林学院院长去世，根据院规，研究员要从本院或新学院的研究员中推选继任者。国王愚蠢鲁莽得令人吃惊，竟要研究员们选举罗马教徒安东尼·法莫尔。此人是酒鬼，因道德败坏而声名狼藉，而且毫无管理一所学院的经验，根据韦恩弗利特规章，此人完全没有任职资格，因为他既非新学院研究员，也非莫德林学院研究员。绝大多数研究员——他们应得极大的赞誉——拒绝选举国王提名的人选，即使国王不悦也坚决反对，故意选举约翰·霍夫为院长，这是一位有杰出美德、为人谨慎的研究员。国王立即无比粗暴、不公地对待他们，侮辱他们。他坚持要他们接受他的另一位人选，命令他们选举朝廷的一个刻薄小人牛津主教帕克。研究员们拒不让步，说他们已经合法地选出了霍夫，决不会让其他人担任院长。他们遭受了威胁和侮辱，一开始是国王自己亲自出马，后来是从伦敦选派特别专员委员会来对付他们，但这是徒劳的。他们立场坚定，寸步不让。专员委员会最后宣布霍夫是滋事者，解除了他的职位，并要研究员们无须再服从他的领导，只需协助让牛津

主教任职即可。于是，勇敢的霍夫公开向专员委员会慷慨陈词：

“诸位大人，你们今天剥夺了我的职任。我在此抗议你们所有的行动都不合法、不公正、没有法律效力，我要上诉于我们无上之王，由他的法庭主持公道。”尽管霍夫被迫去职，但整所大学乃至几乎每个与莫德林学院有联系的人都支持他。四十名研究员中只有两名出席了他继任者（帕克）的任职典礼。学院的门房罗伯特·加登纳丢掉了他的钥匙。司膳官拒绝从食品配给名册上擦去霍夫的名字。牛津全城找不到一个铁匠愿意给院长宅邸开锁，专员委员会被迫让自己的人用铁棍破门而入。

但事情并未了结。霍夫被解职，由帕克接任那天，专员们邀请 1687 年的副校长一起用餐。当年的副校长是瓦德汉学院院长吉尔伯特·艾龙赛德，后来曾任赫里福德主教。他拒绝了，说：“我的品位跟柯克上校不一样。在绞刑架下，我可没有胃口吃饭。”莫德林学院的学生们拒绝向新院长脱帽致敬。德米奖学金获得者们拒绝操练课业，出席讲座，说合法的管理者被驱逐，他们不会屈服于任何僭越的权柄。国王一方试图提供优厚的奖学金，以此来贿赂他们，但无济于事。本科生一个个拒绝，要是有人接受，就会被其余人赶出校舍。研究员被驱逐，紧接着德米奖学金获得者成批被开除。此后几个星期，帕克就死了，有人说是因为丢尽面子，伤心而死。他葬在莫德林学院教堂门厅，

但没有墓碑标示出墓穴所在。国王的全盘计划奏效了。该学院成了一所罗马教神学院，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博纳文图拉·吉法德成了院长。同一天内，十二名罗马教徒出任研究员。学院教堂里举行罗马天主教崇拜，整项暴力和掠夺的工作完成了。

这就是詹姆士二世对付牛津和剑桥的方式。完全不公，同样也完全失策。国王对罗马教狂热无比，野心大得过了头，难免失败。他让这片土地上两所最有势力的学府对他离心离德，让英格兰成千上万最有才干的人都深深地感到他错了。十八个月后，当他的结局来临之际，这两所遭到他粗暴驾驭的学府，两所伟大的英国大学牛津和剑桥，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乐意抛弃他。

詹姆士二世统治期间第五页黑暗的历史是他轻率地试图把英格兰各郡的贵胄踩在脚下，代之以唯命是从的人，让这些人帮助自己实现目的。

为了理解糊涂国王的这一举动，必须要知道他想建立新的下院，对自己唯命是从，不反对他复辟罗马教的计划。他很清楚，自从西蒙·德孟福尔^①执政以来，每个有学识的英格兰人

^①西蒙·德孟福尔是第六代莱斯特伯爵，1263年曾率领贵族反抗国王，成为英格兰的实际统治者。他掌权期间召开了直选议会，因此被视为现代议会制的创始人之一。——译注

都认为选举出的议会重要无比。他没有完全忘记长期议会在他父亲的时代实施的铁腕统治。他正确地判明，没有下院的批准，就无法成功地颠覆更正教，因此试图获得下院的支持。

麦考利说：“下定决心要构建一个议会后，詹姆士干劲十足、有条不紊地着手了。（1687年底）《公报》上刊登了一项声明，宣布国王决定修改太平绅士和官吏任职条件，只有支持他政策的人才能担任公职。”同时，又为了所谓的“规范”所有在议会中有代表的市镇政府，而在白厅设立了一个七人私人顾问委员会，其中包括野心勃勃的耶稣会会士彼得神父。麦考利接着说：

“詹姆士依靠的人主要是他的王室代表。每个王室代表都拿着他的亲笔书函直接去到本郡，召集所有警官和太平绅士，质询他们一系列问题，为的是了解他们在大选中会怎样投票。代表要记录他们的答复交给政府，并拟出一份适合担任治安官和民兵的罗马教徒和更正教不从国教者名单。代表也要审查本郡所有市镇的状况，提交报告供伦敦的监管委员会参考。国王还暗示，每个王室代表都必须亲自完成任务，不能委任其他任何人。”

这些违宪的鲁莽命令最初的效果可以让任何有常识的国王了解形势。事实证明，在兰尼米德聚头的贵族们的精神并未消失。

甚至就在那之前不久，诺福克公爵在詹姆士礼拜的罗马教教堂门口站住，詹姆士告诫他道：“大人的父亲还会走得更远一点的。”他大胆地答道：“陛下的父亲不会走那么远。”那时很清楚，除了诺福克公爵外，还有很多贵族骨子里就是更正教信徒。英格兰半数的王室代表断然拒绝做国王的肮脏勾当，拒绝屈从加诸他们身上的可憎任务。他们立即被解职，而更趋炎附势、昧着良心的一些职位较低的官员接替了他们。

即使现在，在那难忘的时节拒绝国王旨意的那些高尚的贵胄仍尤为引人注目，应当纪念。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名字接连出现在麦考利的记载中，国王的愚行令人快喘不过气来。埃塞克斯郡有牛津伯爵；斯塔福德郡有什鲁斯伯里伯爵；苏塞克斯郡有多赛特伯爵；约克郡有东区的萨默赛特公爵和北区的法尔康伯格勋爵；什罗普郡有纽珀特勋爵；兰开夏郡有德比伯爵；威尔特郡有彭布罗克伯爵；莱斯特郡有拉特兰伯爵；白金汉郡有布里吉沃特尔伯爵；坎伯兰郡有散特伯爵；沃里克郡有北安普顿伯爵；牛津郡有阿冰顿伯爵；德比郡有斯卡斯代尔伯爵；汉普郡有庚斯博罗伯爵——这些人都会被国王草率地推到了对立面。为了什么？很简单，路人皆知，因为他们宁可失去国王的宠幸也不愿违背良心，要原则不要地位，要更正教不要罗马教。牛津伯爵在埃塞克斯郡被停职，当国王命令他解释为何抗旨时，

他勇敢的话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陛下，如果是为了抵抗敌人，我会站在您这边，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但这是关乎良心的事，我无法服从。”

很难设想出比詹姆士的行动更加卑鄙的忘恩负义之举了。被他撤职的大部分贵胄都代表着内战时期为他父亲作出巨大牺牲的望族。其中有些人，比如德比伯爵，祖父和父亲一辈都有很多人为了查理国王献出生命。他们中的许多人，家里伊丽莎白时代建造的壁炉上方都挂着刀剑和盔甲，上面还留着同议会军在边山、马斯顿荒原和纳西比激战的痕迹。不少人还可以指给人看，在保王党同圆颅党大战的日子，被摧毁的城堡、房屋，被伐光木材的旷地，空空如也的橱柜，不幸地耗尽的财产。然而现在，他们天真地称之为牺牲者查理之子的这人，却翻脸不认人，不顾他们的感受，要他们屈服，昧着良心做事。无须惊讶，他们当然满心怨恨国王的行为！詹姆士一个猛冲就摧毁了半数英格兰各地领袖人物的感情，化友为敌了。

其实，国王的忘恩负义与他的愚妄、失策并驾齐驱。他用于构建唯命是从的议会的新机构开始运作不久，彻底的失败就到来了。国家的各个角落都传来了失败的消息。新的王室代表什么都做不了。治安官和候选议员回避质询，拒绝起誓遵从圣旨。说理也好，允诺也好，威胁也好，都同样落空。人们深深

地怀疑，詹姆士想颠覆更正教，复辟罗马教，他们不能容他得逞。诺福克公爵从诺福克郡传来消息，该郡七十名头面人物中，只有六名有可能支持朝廷。在赫特福德郡，乡绅们告诉罗彻斯特勋爵，如果议会要投票撤销对更正教信仰的保护，那么他们不会派人去议会。白金汉郡、什罗普郡和威尔特郡的上层人士也说了同样的话。康沃尔郡和德文郡的治安官和驻军首领告诉贝思勋爵，他们愿意为了国王献上财产、生命，绝无异议，但更正教信仰比这两者都要宝贵。贝思勋爵对国王说：“如果陛下将他们解职，继任者也会给您同样的回答。”在兰开夏郡，一个相当罗马教化的郡，新任王室代表报告说，三分之一的治安官反对朝廷。在汉普郡，全体治安官，除了五、六个人外，都表明，如果当地的王权代表还是罗马教徒伯立克公爵，他们就不会参与任何民事或军事政务。

整件事情就是这样。詹姆士攻击地方贵胄的独立自主权，就跟他攻击讲台、攻击大学一样，完全是失败之举，有过之而无不及。此举在英格兰各地播下了不满的种子，让成千上万的头面人物疏远了他，本来这些人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跟随他到底的。结果，一年后奥兰治亲王威廉在托贝登陆时，英格兰有一半的郡支持他。神的护理之工借着詹姆士人尽皆知的轻率盲目，铺平了这人毁灭的道路。“大乡绅都背叛他。”贵族们一

个又一个地离弃他，最后他众叛亲离，无依无靠，成了光杆司令。

现在我要开始讲述詹姆士国王的耻辱统治结束的场面，起诉、审判七位主教的故事。这件事极为重要，后果影响深远，所以我会更多地触及细节。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今日有些人试图曲解这次审判，错误地解读主教们的动机，混淆真相。今日，有人不择手段地混淆视听，歪曲历史，为罗马教会涂脂抹粉。但我决心找到关于这个时代的每一权威资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我都可以接受。我也试图给读者展现“事情原原本本的样子”。

审判七位主教始于1688年4月27日詹姆士二世的一项公告，称为《宽容宣言》。不同于1687年4月的宣言，这份宣言附有一份“枢密院令”，要求全国所有教堂全体国教牧师连续两个主日在聚会时宣读宣言。伦敦的宣读时间是5月20、27日，英格兰其他地区是6月3、10日。詹姆士命令主教在各自的主教区分发该宣言。该宣言的实质非常简单，即中止所有对不从国教者的处罚。同时，也允许罗马天主教与更正教不从国教者公开聚会敬拜。宣言称，干扰任何集会都是在阻碍国王的意图，令他不悦。宣言废除了议会所有关于民政和军事公职任职资格的宗教要求。对生活在本世纪的我们而言，这份宣言看起来很合理，没有害处。但对17世纪的英格兰，却有完

全不同的一面！人们知道这份宣言是出自谁手，知道其背后的意图。在似是而非地借口宽容和自由的背后，该宣言是想提倡罗马教，让罗马教会可以自由活动，以便实现重新篡夺英格兰的阴谋。

我们一眼可以看出这份著名的宣言让主教和教士们处在了非常尴尬的位置。他们怎么办呢？用怎样的方式尽责呢？他们完全处在了两难境地。如果他们拒绝服从国王，看起来就是心胸狭窄、气量小、冷酷对待不从国教者，同样也是对君主不忠、不尊敬、不顺服。如果他们屈从国王，宣读了宣言，就是在支持罗马教传播。詹姆士要求他们宣读的正好就是对耶稣会会士和整个罗马教会的纵容，分毫不差。简言之，他们发现自己夹在了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之间^①，不管怎样都要冒犯其中一方。拒绝宣言，他们一定会触怒国王，也许还会激怒不从国教者。同意宣言，就不可避免地会帮助教皇。也许，英格兰的主教和教士从来没有置身于这样困难复杂的位置！

在这紧要关头，不从国教者站出来解开了难题，帮助主教

^①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海妖，分别驻守在狭窄的墨西拿海峡两侧，要通过海峡，必须通过其中一个海妖的地盘。英语中借此比喻进退两难的境地。——译注

们作出了正确决定，在此要向他们致以永恒的敬意。善良的老清教徒们的精明继承人一眼看穿了詹姆士的诡计，看到在似是而非的自由之下，詹姆士要的是一个让英格兰变天的杠杆支点，要借以摧毁宗教改革的事业。如同皮拉斯给高尚的罗马大使看一袋黄金，又给他看一头大象，先是利诱，后是威胁一样，不从国教者们也被利诱威胁，但都不为所动。如果要付出国家的更正教事业作为代价，那么他们宁可不要王室的宽容。巴克斯特、贝茨和豪，还有伦敦的大批不从国教者，都恳求教士站稳立场，对国王寸步不让。年轻的笛福对不从国教的弟兄们说：“我宁可让英国国教罚款、没收财产以致赤身露体，也不愿让罗马教徒对国教和不从国教者都展开攻击，用火和柴扒掉我们的皮。”

当时著名的不从国教者奥利弗·黑伍德在他对那个时代的记述中直接说：“尽管允诺给不从国教者自由，但我们知道并不是因为爱我们，而是别有用心。听说国王讲过，此时他不得不给他心里憎恶的人自由。”

面对不从国教者的举动，伦敦的教士立即开会，提罗岑、谢洛克、帕特里克和斯蒂令弗利特都参加了讨论，会议决定不遵从“枢密院令”。对这一结果贡献最大的是跛子门的圣盖尔教区牧师、知名的宽派教会人士福勒博士。当会议出现僵局，投票结果恐怕难以预料之时，他站起来说：“我必须清楚表态。

问题对我来说很简单，再争论也不会有进展，只能让人发火。是黑是白，每个人都表明态度吧。但我不能拘泥于多数人的决定。对不起，我要制造分裂。这份声明我不能宣读。”这番大胆的讲话扭转了局面。会议起草了一份决意，表明所有在场的人都誓言不宣读这份声明，最终伦敦有八十五名牧会的教士在决议上签了字。

与此同时，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罗夫特表示，他不反对这一紧急措施。他当然是个谨慎、安静，甚至某种程度上胆小的人，最不好战，最不愿意同君权冲突。然而连他也勇敢地站了出来，作出回应。当枢密院的命令一到，他就召集在伦敦的一些主教、神职人员和平信徒来到兰柏宫，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决定抵制国王，拒绝宣读宣言。于是，大主教写信给所有信得过的英格兰主教，让他们立即到伦敦，参与正式的抗议和请愿。但时间太短。当时没有铁路，赶路很慢。博内特说，有十八名主教同意桑克罗夫特的意见。但尽最大努力，也只有六名主教能赶到伦敦支持他。这六位，还有领头的大主教，5月18日聚集到了兰柏宫，仅仅比那个性命攸关的主日早两天，到了主日，国王的宣言就要在伦敦宣读了。夜幕降临前，他们通过了一份请愿书或者说抗议书，所有人都署了名。

除了桑克罗夫特外，应该列出六位签署这份重要文件的主

教姓名，以纪念他们。他们是：圣阿萨富主教劳埃德，伊利主教特纳，奇彻斯特主教雷克，巴斯和韦尔斯主教肯，彼得伯勒主教怀特，以及布里斯托主教约拿单·特里劳尼爵士。很奇妙，除了《早晚圣歌集》作者肯之外，这七个签署请愿书的人不管在哪方面，都没一个称得上非凡之士。除了肯之外，没一个在神学上留下什么印记，也不是名垂青史的作家或传道人。这七个人没有一个能与帕克、惠特吉夫特、格林多尔、杰威尔、安德烈斯或何尔比肩。他们可能是体面、可敬、低调、老派的高派教会人士，仅此而已。但神喜悦用软弱的器皿彰显他的荣耀。不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如何，他们一致洞悉了更正教面临的威胁，决定誓死捍卫更正教。记住，他们并不是嫉妒不从国教者，而是厌恶罗马教，所以才一起迈出这一步。他们十分光荣。他们无可置疑地证明，真正的、忠心的、诚实的老派高派教会人士也跟国教里其他派别一样讨厌罗马教。

在此关头，七位主教起草、签署的这份著名的请愿书是一份奇妙的文件，又短又平淡、小心翼翼，甚至写得还有些笨拙。但是，这些可敬的起草者无疑时间紧急，没有时间润色语言。此外，他们采取了最佳的意见，小心地避免说得过多，无谓地触怒国王。麦考利说：

实质上，也不可能比这份文件更巧妙了。他们恭敬地否认

自己不是不忠于国王、心胸狭窄，向国王保证，教会仍然跟以往一样，忠于君王。他们也向他保证，主教们会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作为上议院议员和制宪会议的成员，表明他们并非不关切不从国教者的良心不安。之前和现在的议会也已经宣布，君权实质上并没有资格颁布关于教会的法令。因此，宣言并不合法。出于谨慎、荣誉和良心，请愿者们不能在神的殿中，在聚会的时候，参与发布一份不合法的宣言。

尽管这份请愿书看起来似乎不得要领、毫无锋芒，但我们绝不要错解其潜在的含义，及主教们拒绝服从国王真正的目的。必须公正地看待他们。他们完全确信，宣言意在帮助罗马教，决心站稳立场，抵制国王。他们并不是厌恶不从国教者，也不想继续压制他们。但他们清楚地看到整个更正教事业面临危险，当下必须冒一切风险来捍卫，否则将再无机会。每位稍有学识的历史学家都会承认这一点，采取其他观点是徒劳的，除非我们要重写历史。在这个问题上，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有海量证据表明七主教断然反对国王的真实原因，是他们决心保卫宗教改革的原则，反对任何向罗马教倒退的做法。一句话，让他们大胆竖起旗帜的原因是更正教反对罗马教的古老而正义的事业。1688年，每个人，不管是国教教友还是不从国教者，都明白这一点，现在谁要否认的话就是可耻至极。谁

要否认，只能说他既无知又不诚实。

5月18日，星期五夜晚，这份请愿书才完成并签署，5月20日，主日上午，伦敦所有教堂都要宣读王室宣言了。因此，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六位主教拿起请愿书，前往白厅宫（桑克罗夫特已经被禁止入宫），晚上10点，与詹姆士二世面谈了。国王拿过请愿书，读了后，既生气又诧异。他表现出自己非常愤怒，又极为惊讶。他从未想到英格兰主教会反对他的旨意。“我没想到会这样，”他说，“这是标准的反叛。”特里劳尼跪下说：

“特里劳尼家的人不会反叛。请您记住，我的家族曾为国王奋战。”特纳说：“我们反叛！我们准备着死在陛下脚前。”肯说：“我希望您给予我们良心的自由，这是您承认全人类都拥有的。”这些话都归于徒然，毫无作用。国王暴怒，叫道：“你们这些鼓动骚乱的家伙，回到你们的主教区去，看着我的旨意定被执行。”“我们有两样职责要履行，”高贵的肯说，“对神和对陛下的职责。我们尊敬您，但我们敬畏神。”谈话结束，主教们离开国王，肯最后的话是：“神的旨意会成就的。”

5月19日，周六早晨日出前，主教们的请愿书印出来了，传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谁做的，今日已经无从考证，但据说印制者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赚了一千磅。整个首都沸腾了，第二天，主日到来，教堂挤满了充满期待的人群，想知道教士

会怎么做，会不会宣读国王的宣言。他们的怀疑不会持续太久。伦敦城和教区一百座教区教堂里，只有四座遵从了枢密院令，而在这四座教堂里，当宣言刚刚开始宣读，人群就齐刷刷起身离开，如同一人。威斯敏斯特学校的男孩们对西敏寺的景象记忆犹新。当主任牧师斯普莱特主教，一个卑鄙、卑躬屈膝的高级教士，开始宣读宣言时，人群交头接耳，一片哗然，完全掩盖了他的声音。他颤抖了，人们看到他手中的纸都在发抖。他还远远没有读完，整个大堂，除了诗班和威斯敏斯特学校的学生之外，就已经空无一人了。臭名昭著的教士提摩太·何尔在星期五街的圣马太教堂宣读宣言后，国王把当时空缺的牛津主教一职赏给了他。但他换取主教法冠的代价太大了。基督教堂学院没有一位法政牧师出席就职典礼，没有一名毕业生来找他按立。

两星期过去了，6月3日，英格兰其余地方勇敢地仿效了伦敦的教士。诺维奇、格洛斯特、索尔兹伯里、温彻斯特和埃克赛特的主教虽无法及时赶到伦敦参加兰柏宫的会议，却在请愿书副本上签了字，自然也拒绝遵从宣读宣言之命。伍斯特主教拒绝分发宣言。切斯特主教区很大，包括整个兰开夏郡，却只有三名教士宣读宣言。在广袤的诺维奇主教区，更正教的坚固阵地，一千两百个教区中只有四个宣读了宣言。简言之，明

显整个英格兰大地苏醒了，这是朝廷未曾料到的。尽管可以镇压主教和教士，却无法让他们屈服。国王是否会镇压还未知晓。6月8日晚，七主教遵命来到白厅觐见枢密院中的国王。他们去的时候已经得到了最佳的法律建议，小心翼翼地照此而行。他们镇定地拒绝承认任何有罪的指控，除非因国王的命令被迫如此。国王的人质问他们请愿书中的话是什么意思，但他们的回答警惕而明智，国王的审查一无所获。他们坚定地站稳了立场，既不撤回请愿书，也不承认自己错了，对自己关于宣言的决定更是毫不退让。最后，国王的人告诉他们，会以诽谤罪在王座法庭起诉他们，但他们遵从律师的建议，拒绝为自由而交纳保释金，于是被正式打入伦敦塔。国王的人拟好授权，命令一条船带他们顺河而下去伦敦塔。

他们被打入伦敦塔，让整个伦敦城一片哗然，热血沸腾，也许伦敦历史从未有过这样的群情激奋。人们很早就知道主教们被带去枢密院，于是焦急的群众围着白厅，长久等待，要看结果如何。但当伦敦人看到兵丁押解七位上了年纪的高级教士走出宫殿，得知他们为了保卫英格兰的更正教而下狱（实质上就是这样），人们的激愤之情难以言表。当他们走下白厅的台阶时，数百人围着他们，为他们喝彩，表明要与他们同仇敌忾。

许多人冲到泥浆里，水漫过了腰，祝福他们，也求他们祝福。河上有许多船载满了人，跟着他们去伦敦塔，一路大声宣泄着自己的感情。人们的感情甚至感染了守卫伦敦塔的兵丁，令他们热心地仰慕自己看守的囚犯。当伦敦塔守备、罗马教徒黑尔斯爵士想要阻止他们时，手下人告诉他没有用，因为他的人“都为主教们的健康举杯庆祝”。

七位高级教士在伦敦塔中关了一星期。此间，群众对他们的热情倾慕之心与日俱增。他们几乎被当作偶像了，好比拒绝讨好罗马教暴君的殉道者，就像玛丽时代的拉蒂默和里德利。英国国教在公众心目中的位置也水涨船高。在那一周中，主教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成群结队的人，其中还有许多贵族，每天都去伦敦塔向这些尊贵的囚犯致敬。还有十位领袖级的不从国教者牧师组成的代表团也去表达他们的同仇敌忾，并且，当国王派人去抓其中四人，申斥他们之时，他们勇敢地回答说，他们“认为忘记过去的争论，与捍卫更正教事业的人站在一边，是神圣的职责”。甚至苏格兰长老会也支持主教们，变得亲切起来，送信来表明与他们意气相投，鼓励他们。每天都有友好、支持的话从英格兰各地传来。康沃尔郡的人对身处险境的同乡特里劳尼的观念十分感动，作了一首民谣来讲述他的事，唱遍

了整个郡。民谣的主要部分流传了下来^①：

特里劳尼会死吗？特里劳尼会死吗？

两万康沃尔男孩都会知道原因。

甚至矿工都学会了这首歌，他们唱的版本稍有不同：

三万在地底下工作的人都会知道原因。

任何比詹姆士更有常识的王都会因被囚的七主教如此大得人心而震惊，找个台阶停止进一步行动。但是很不幸，詹姆士没有那种智慧，不会退让，像耶户那样“赶得甚猛”，结果自取灭亡。他执意要起诉。6月15日，当局把七主教从伦敦塔

① 据说，以下就是那首民谣，但除了副歌之外，其余部分是否是1688年的版本，难有定论：

一把宝剑，一双值得信赖的手，

一颗快活的真心；

詹姆士国王的人会明白

康沃尔人能做什么！

他们定好了时间地点吗？

特里劳尼会死吗？

两万康沃尔人

都会知道原因。

（副歌）

他们会嘲笑特里、坡尔和彭吗？

特里劳尼会死吗？

带到王座法庭，要他们就针对他们的指控作出解释。当然，他们都称自己“无罪”。审判定于6月29日进行，同时，他们交纳保释金就能自由。他们没有请求保释，国王也无所谓。二十一位最高级别的贵族准备给他们担保，每三人担保一名被告，并且城里一位最富有的不从国教者请求得到恩准，让他能够荣幸地充当肯主教的保释人。

离开法庭，返回住处的时候，主教们受到的欢迎几乎跟他们进伦敦塔时一样盛大。许多教堂敲钟庆贺，许多对法律程序一无所知的下层百姓以为事情已经了结，正义的事业奏响了凯

这里有两万康沃尔人，
都会知道原因。
领头的人心直口快，勇敢无畏
是个快活的人：
“就算伦敦塔在米迦勒的手里，
我们也要放特里劳尼出来！
我们会渡过他玛河，
七主教不会留在那里——
我们手拉手肩并肩，
谁能抵挡我们？”
（副歌）
他们会嘲笑……

歌。但是，那么大一群人——不管有没有学问——在宫廷广场上聚集，令他们几乎无法从朋友和倾慕者们中间穿过。而且，人们绝非不知道为什么要聚在一起。众人普遍都怀着同一种感情，即对罗马教的憎恶、对更正教的热心。麦考利记录的一件事证明了这种感情有多么深：

“切斯特主教卡特赖特，该法庭的一个胆小的马屁精，在高尚的弟兄们走出法庭时，稀里糊涂地跟人群混在了一起。有人看到了他的主教法衣，以为他就是被指控的主教之一，于是请他祝福，卡特赖特答应了。有位旁人叫道：‘你晓得是啥人在祝福你哦？’‘当然，’那人说，‘是七主教之一。’‘不是，’这位旁人说，‘这是信罗马教的切斯特主教。’那个伦敦人立刻激愤地咆哮起来：‘教皇的狗，把你的祝福拿回去！’”

最终，6月29日，永远难忘的对七主教的审判到来了。检方在威斯敏斯特的王座法庭指控他们，陪审团则是由他们的同胞组成。法庭上涌入这么多人，真是空前绝后。据伊夫林的日记记载，有六十位贵族，据麦考利记载，有三十五位，坐在四名法官旁边，表明关心此案件。威斯敏斯特大厅、宫廷广场和附近所有街道都挤满了人，焦急地想知道结果。我没法详细讲述那斗争激烈的一天。从早晨到日落，法律斗争继续着：辩方盘问国王的证人，提出质疑；主教们的第四位辩护人索默斯精

彩绝伦地表明，控方所谓的“诽谤”既非作假，也非诽谤，也不是妖言惑众；四名法官起了分歧，其中两位甚至认为不存在诽谤，请陪审团裁定；天色已晚，陪审团退席商讨裁决，关在房间里整整一夜，而被告的仆人们坐在台阶上盯着房门，以防有人耍赖；最终，十二名陪审团成员除了国王的阴谋家阿诺德外，都认为无罪，但当十二人中最大的那位说：“看着我，在我发现主教们有罪之前，我会一直待在这里，直到我比一根烟杆还小。”阿诺德也让步了；清晨六点，陪审团取得一致，并于十点来到法庭，由陪审长罗杰·郎利爵士宣布主教们无罪；当他念出这几个字时，哈利法克斯勋爵脱下帽子挥舞，法庭外至少一万人齐声欢呼，威斯敏斯特大厅老旧的天花板都想要震裂了；街上的人群竞相欢庆，消息传遍了伦敦；许多人喜乐欢呼，也有人喜极而泣；人们鸣枪、敲钟，骑手策马向各方飞奔，要送去战胜罗马教的好消息；陪审团几乎没法离开大厅，因为他们不得不跟成百上千人握手，这些人喊着：“神祝福你们，你们今天救了我们全部人。”当夜幕降临，人们点起篝火，照亮了整个伦敦，人们焚烧教皇的巨幅画像；这一切的一切，在麦考利大人生动的史书中都用闪光的文字记录下来了，所以我不会再班门弄斧。才华横溢的“句法大师”已经生动地记述过的内容，如果我再来一遍，就跟给精金镀金、在百合上画画一样愚蠢。

可以说，在这场审判中，更正教同罗马教打了一场大仗，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詹姆士二世也因为指控七主教，七主教却最终宣告无罪，而丢掉了王位。

绝不要忘了，这次审判的影响无比巨大，后果是6月29日欢呼雀跃的无数人想都没想到的。审判后不到二十四小时，七位英格兰领袖级人物签署了一封信，送去荷兰，邀请奥兰治亲王带兵来推翻斯图亚特王朝；最后的时刻到来了，英格兰需要那个人来。审判后不到四个星期，桑克罗夫特大主教因五、六月份的事备受安慰，热心起来，写了一封信给所有英国国教的主教传阅。这封信是历史上坎特伯雷大主教执笔的最引人注目的信之一，却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他在信中严肃地命令主教和教士“要温柔看待我们的弟兄——更正教不从国教者，拜访他们的家，友好地接待他们，无论何时遇见了，都要善待他们”。最重要的，他要他们“抓住所有机会向不从国教者保证，英格兰主教真心实意地反对罗马教会的谬误、迷信、偶像崇拜和专制，与之不共戴天。”最后，他敦促他们“勉励不从国教者与我们一同热切祷告，祈求神让普天下、海内外的改教教会团结一致”。这真是奇妙的牧者书信！如果兰柏宫一直持类似的论调，没有冷淡下来，忘记伦敦塔的事，那么对于英国国教就太好了。但这只是这场著名审判的最初成果之一。最后——

也非常重要——主教们宣告无罪之后不到六个月，伟大的革命就到来了，罗马教君主失去了王冠，离开英格兰，威廉和玛丽登上了英格兰王位。在他们正式登基之前，议会两院郑重地起草并签署了著名的《权利法案》。这份法案的第一句是什么呢？就是声明“詹姆士二世国王自认为有权颁布法律，并逮捕、起诉好几个高级教士，借此竭力颠覆、根除更正教信仰”。最后一句是什么呢？是著名的“无上誓言”，包含以下字样：“我声明，任何外国的王、个人、高级教士、国家或统治者，在这个国家的教会或者属灵领域，都不得拥有，也不应拥有司法权、政权、特权、主宰权或控制权。所以愿神帮助我。”这就是审判七主教的直接结果，其重要性难以言述。对我来说，这是英格兰历史的地标，好比巴勒斯坦的他泊山一般，任何英格兰人都不应忘记。我们再次得救，脱离罗马教，要归功于这场对七位主教的审判。

现在我还要指出三点根据本章内容自然而然得出的具有实践意义的功课。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关于英格兰的统治者和政治家，不管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詹姆士二世的统治让我们学到一课，即决不能允许这个伟大国家的政府落到罗马教徒的手中。

如果历史没有清清楚楚地显明这项教训，就好比伯沙撒宴

会时手指写出的字，那么我就大错特错了。除非我们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否则都要当心罗马教统治者。我们知道玛丽女王掌权的日子他们是什么样子。詹姆士二世掌权时，我们又尝了第二次。如果我们爱自己的国家，就绝不要让他们再试一次。如果他们不懈地努力颠覆英格兰的更正教，颠倒一切，那就不是真正的、认真的罗马教徒。任何不宽容、搞宗教迫害的人，我都厌恶，不会向其屈服。我一点也不想走回头路，复苏《审查法》中那些可悲之事。对当前的宪法，以及禁止英格兰王冠戴在罗马教徒的头上的法律，我都很满意。我希望我们都小心警惕，不让这些法律废除。

有些人会认为我杞人忧天，说得太多了。但我坦率地讲，展望今日的前景，有很多事令有思想的人不安。有些出名的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逐渐进入了上流社会，我厌恶这种影响。单单把“真挚”当作偶像，却忘记历史，以为罗马教已经改变，真挚的罗马教徒跟任何更正教信徒一样善良，这种日渐增长的倾向也让我厌恶。我厌恶现代的原则，即不管君主是更正教信徒、罗马教徒、犹太教徒、突厥人、不信者还是异端都无所谓，旧时善良的清教徒们可没听说过这些原则。我看到这些事飘荡在空中。我承认，我因此不安。我深信我们需要站稳立场，坚决不能允许教皇重新统治英格兰，愿神帮助我们。要是教皇真

的统治了英格兰，我们一定不会再得到神的祝福了。《圣经》所说的愤怒之神会转脸不看我们，国内的和平，海外的影响力，家庭的舒适，国家的繁荣，都要长久地跟我们说再见了。再说一遍，在允许罗马教首相或罗马教国王出现之前，愿我们撼天动地。1689年1月28日，下院一致决定，“根据经验，罗马教君王统治与这个更正教国家的安全和福祉相悖。”我祈求神，让人们绝不要忘了这一决议，绝不要废除这一决议。

其次，关于英格兰的主教和教士，詹姆斯二世的统治也教给我们一课，即决不能忘记英国国教真正的力量在于对更正教原则的忠诚、勇敢无畏地反对罗马教会。

英国国教从来没有像在劳德的时代那样不受欢迎，从来没有像在七主教的日子那样受欢迎。当劳德试图把教会向罗马教的方向篡改时，不从国教者对国教的恨意升到极点，当七主教宁可坐牢也不愿帮助教皇时，不从国教者对国教的爱意升到极点。为何当劳德被打入伦敦塔时，少有人向他挥手致意，少有人说“愿神祝福你”呢？答案只有一个，人们不信任他，认为他是半罗马教徒。为何五十年后，当桑克罗夫特和同伴们被打入伦敦塔时，伦敦的心都被搅动了，整个首都都向他们致以敬意？答案也很简单。人们爱他们，倾慕他们，因为他们坚持更正教，反对罗马。

最后，詹姆士二世的统治应该教导给所有忠心的国教教友一项功课，即我们有责任采用各种合理合法的手段抵制罗马教经由极端礼仪派之手重新进入英国国教。

不可否认这是时代的要求，不可否认我们中间有人有预谋地想要让这个国家的国教罗马化。主教们看到了，在他们的控诉书中哀哭。政治家看到了，在公共演讲中揭露无遗。不从国教者看到了，轻蔑地伸出手指指出来。搞罗马化的人看到了，欢呼雀跃。外国看到了，惊异地举起手来。尽管这可耻的变节行为成功与否尚未可知，但好歹有一事可以确定，即没有时间闲坐着，抱着手躺卧了。英国国教需要所有他的儿子尽自己的职责，在神的掌管下，成败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平信徒的行动。

有些极端礼仪派总是说，反对他们的人是要收窄英国国教的疆界，让教会只有一个派别，成为排他的教派，但这种说法不正确。我义愤地否认这种指控。我一直诚心诚意地赞成教会要包容，诚挚的高派、低派和宽派教会都有生存的空间。如果有哪个教士喜欢穿着法衣讲道，或者每周都施行圣餐礼，或者举行圣徒日聚会，或者每天晨祷晚祷，我都根本不愿干预，尽管我没法苟同他的眼光。但我坚持教会的包容性是有限度的，即要在《三十九条信纲》和《祈祷书》的范围内。

无疑，争议和宗教争端令人厌恶，但有时却有必要，具有

积极作用。合一与和睦固然非常可喜，但如果要牺牲真理作为代价，就太昂贵了。今天，有些地方充斥着幼稚愚钝的关于合一与和睦的说法，无法与圣保罗的话相调和。无疑，争论太多很可悲，但人性依然败坏如前，魔鬼被放出来进入世界，更是可悲。亚流教导的关于基督位格的谬误很可悲，但如果亚他那修没有反对他，就更为可悲了。帖茨勒兜售教皇的赎罪券很可悲，但如果路德不站出来制止他，就更可悲了。其实，争论也是每个时代用以捍卫真理的手段，忽略争议是没有意义的。

有一件事我很确定。不管人们对今日的罗马化运动支持还是反对，英国国教一旦正式允许罗马教弥撒复活，可憎的告解死灰复燃，那么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很快就会脱离英国国教。正确遵循大能的宗教改革原则，国教就会站立得稳，留住国民的感情，没有什么敌对我们的武器能得逞。违背这些原则，重新接纳罗马教，那国教很快就会倒下，任何做作的、刺激感官的仪式都无法阻止其毁灭。如同以弗所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推雅推喇教会容让耶洗别的教导，老底嘉教会不冷也不热，英国国教的灯台也会被挪去。尊荣会离她而去，云柱、火柱也会挪开。她最优秀、最忠心的孩子会厌恶地离弃她，并且，就像失去士兵、只留下军官和乐队的军队一样，国教会消亡，因为缺少信众而理所应当地消亡。

译名表

一、人名

(按姓氏或称呼译名汉语拼音次序排列)

阿伯特, 乔治	Abbot, George	埃雷, 亨利	Airay, Henry
阿伯特, 罗伯特	Abbot, Robert	埃雷顿	Ireton
阿布乌尔米斯, 约翰	ab Ulmis, John	埃伦	Ellen
阿德尼	Adeney	埃塞烈德	Ethelred
阿尔菲奇	Alphege	艾尔兴	Elsyng
阿尔瓦公爵	Duke of Alva	艾格尼丝	Agnes
阿弗莱斯, 约翰	Avreth, John	艾略特	Eliot
阿拉贡的凯瑟琳	Catherine of Aragon	艾伦, 罗斯	Allen, Rose
阿朗戴尔, 托马斯	Arundel, Thomas	爱德华二世	Edward II.
阿罗史密斯, 约翰	Arrowsmith, John	爱德华六世	Edward IV.
阿蒙德, 约翰	Almond, John	爱德蒙	Edmund
阿莫尔, 威廉	Armourer, William	爱剖顿	Appleton
阿穆斯	Ames	安德鲁斯	Andrews
阿诺德	Arnold	暗嫩	Amnon
阿谢尔	Usher	奥尔德汉姆	Oldham

奥尔德里奇	Aldrich	贝恩顿, 爱德华	Baynton, Edward
奥金, 伯纳德	Ochin, Bernard	贝恩斯	Baines
奥兰治亲王	Prince of Orange	贝肯	Becon
巴茨	Butts	贝里吉	Berridge
巴多罗买	Bartholomew	贝思	Bath
巴恩斯	Barnes	贝斯维克, 罗杰	Beswick, Roger
巴克斯特, 理查德	Baxter, Richard	比尔尼, 托马斯	Bilney, Thomas
巴立龙	Barillon	比奇克罗夫特, 撒母耳	Beachcroft, Samuel
巴罗	Barrow	比塞, 马丁	Bucer, Martin
巴罗夫斯, 耶利米	Burroughs, Jeremiah	彼得	Peter
巴拿蒂斯顿	Barnardiston, N.	波尔, 多马	Ball, Thomas
巴斯特威克	Bastwick	波旁	Bourbon
班扬, 约翰	Bunyan, John	伯顿	Burton
邦德	Bond	伯恩	Bourne
邦纳	Bonnar	伯吉斯, 安东尼	Burgess, Anthony
	Bonner	伯立克公爵	Duke of Berwick
邦尼	Bunny	伯利	Burghley
保罗	Paul	伯纳德	Bernard
鲍顿, 亨利	Boughton, Henry	伯纳, 奥古斯丁	Bernher, Augustine
鲍尔斯, 托马斯	Bowes, Thomas	伯沙撒	Belshazzar
鲍尔斯, 理查德	Bowles, Samuel	博尔顿, 底波拉	Bolton, Deborah
贝茨	Bates	博尔顿, 罗伯特	Bolton, Robert
贝代尔	Bedell	博济特, 威廉	Burkitt, William

博雷	Burleigh	查理二世	Charles II.
博林, 安妮	Boleyn, Anne	查理九世	Charles IX.
博罗夫斯, 乔治	Burroughs, George	查理一世	Charles I.
博内特	Burnet	查诺克, 司提反	Charnock, Stephen
布拉德福德	Bradford	垂格, 约翰	Trigg, John
布莱克尔比	Blackerby	慈运理	Zwingle
布兰德, 约翰	Bland, John	达伯	Dubber
布朗特	J.J. Blunt	达西, 西西莉亚	Darcy, Sisilia
布朗, 约翰	Brown, John	达西, 托马斯	Darcy, Thomas
布朗, 安东尼	Browne, Anthony	达伊, 约翰	Day, John
布朗宁	Brunning	大流士	Darius
布雷克	Blake	戴弗南	Davenant
布里吉	Bridge	丹东	Danton
布里吉, 威廉	Bridge, William	道维吉尔	Dowager
布里吉斯, 爱德蒙	Bridges, Edmund	德策克拉斯, 安娜	de Tzerclas, Anna
布里吉斯, 约翰	Bridges, John	德雷希特	Dressit, Catherine
布林格	Bullinger	德令	Dering
布鲁克	Brook	德孟福尔, 西蒙	de Montfort, Simon
布鲁克斯	Brooks	德斯博罗夫, 约翰	Desborough, John
布罗姆菲尔德	Blomfield	德威登, 阿德里亚娜	de Weyden, Adriana
参孙	Samson	德威雷斯	De Vere
查德顿, 劳伦斯	Chaderton, Laurence	德威斯, 保罗	D'Ewes Paul
查尔顿, 玛格丽特	Charlton, Margaret	德威斯, 西蒙德	D'Ewes, Symond

笛福	Defoe	弗劳德, 理查德	Froude, Richard
丁道尔, 威廉	Tyndale, William	弗利特伍德, 查理	Fleetwood, Charles
多比内	D'Aubigné	芙莱维尔, 约翰	Flavel, John
多德	Dod	福克兰	Falkland
多马	Thomas	福克斯, 约翰	Fox, John
俄巴底	Obadiah	福勒	Fowler
俄姆	Orme	福瑞思, 约翰	Frith, John
恩赛恩, 大卫	Ensigne, David	富勒	Fuller
法尔康伯格	Fauconberg	干大基	Candace
法莫尔, 安东尼	Farmer, Anthony	冈特的约翰	John of Gaunt
菲尔波特, 约翰	Philpot, John	高吉	Gouge
腓力斯	Felix	高吉, 威廉	Gouge, William
费尔法克斯, 约翰	Fairfax, John	格德斯, 珍妮	Geddes, Jenny
费尔法克斯, 托马斯	Fairfax, Thomas	格蕾, 珍	Grey, Jane
费尔克拉夫, 撒母耳	Fairclough, Samuel	格里姆斯托普	Grimsthorpe
费弗夏姆	Feversham	格里姆肖	Grimshaw
费拉, 罗伯特	Ferrar, Robert	格林多尔	Grindal
费什, 安布罗斯	Ambrose Fish	格林多尔	Grindall
费希尔	Fisher	格林希尔, 威廉	Greenhill, William
费雪, 安	Fisher, Ann	格罗斯特	Grostète
费雪, 亨利	Fisher, Henry	格纳尔	Gurnal
佛斯特, 瓦尔特	Foster, Walter	葛林令	Grinling
弗朗西斯, 阿尔班	Francis, Alban	葛令	Goring

洪特, 威廉	Hunter, William	杰弗雷斯	Jeffreys
侯兹沃思	Holdsworth	杰明, 托马斯	Jermyn, Thomas
胡克, 多马	Hooker, Thomas	杰威尔, 约翰	Jewel, John
胡珀, 约翰	Hooper, John	杰威尔	Jewell
护国公萨默赛特	Protector Somerset	金斯顿, 安东尼	Kingston, Anthony
华森, 汤姆	Watson, Thomas	居普良	Cyprian
怀特, 罗林斯	White, Rawlins	卡德梅克	Cardmaker
怀特菲尔德, 乔治	Whitefield, George	卡德沃思, 拉尔夫	Cudworth, Ralph
怀特洛克	Whitelock	卡尔顿	Carlton
惠特吉夫特	Whitgift	卡拉米, 埃德蒙	Calamy, Edmund
霍顿, 多马	Horton, Thomas	卡莱尔	Carlyle
霍尔贝克, 多马	Holbeck, Thomas	卡里尔	Caryl
霍夫, 约翰	Hough, John	卡律布狄斯	Charybdis
霍华德	Howard	卡特, 约翰	Carter, John
霍克斯, 托马斯	Hawkes, Thomas	卡特赖特	Cartwright
霍罗克斯	Horrox	凯尔里斯	Careless
基布尔	Keble	坎德勒, 马提亚	Candler, Matthias
吉法德, 博纳文图拉	Giffard, Bonaventura	康博	Cumber
加德纳, 斯蒂芬	Gardiner, Stephen	康普顿	Compton
加登纳, 罗伯特	Gardner, Robert	考沃威尔, 以西结	Culverwell, Ezekiel
加尔文, 约翰	Calvin, John	柯克	Kirke
简金, 威廉	Jenkyn, William	科贝特	Corbet
简金斯	Jenkins	科顿, 约翰	Cotton, John

科弗代尔	Coverdale	拉蒂默, 休	Latimer, Hugh
科平格, 安布罗斯	Coppinger, Ambrose	拉马的费茨拉尔弗	Fitzralph of Armagh
科平格, 亨利	Coppinger, Henry	拉斯科	Lasco, A.
克拉多克, 撒母耳	Cradock, Samuel	莱彻斯特	Leicester
克拉格特	Clagett	莱特, 以西结	Wright, Ezekiel
克拉克, 撒母耳	Clark, Samuel	兰伯特	Lambert
克拉克, 理查德	Clarke, Richard	兰克	Ranke
克拉克	Clerke	郎利, 罗杰	Langley, Roger
克拉伦登	Clarendon	劳埃德	Lloyd
克兰麦, 托马斯	Cranmer, Thomas	劳德, 威廉	Laud, William
克里斯特马斯	Christmas	劳伦斯, 马太	Lawrence Matthew
克利夫兰	Cleveland	勒巴	Le Bas
克林顿	Clinton	勒格, 托庇亚斯	Tobias Leg
克鲁	Crewe	雷顿	Leighton
克鲁克, 撒母耳	Crooke, Samuel	雷克	Lake
克伦威尔, 奥利弗	Cromwell, Oliver	雷诺兹	Reynolds
克伦威尔, 托马斯	Cromwell, Thomas	李透戴尔	Littledale
克罗夫特	Croft	里德利, 尼古拉斯	Ridley, Nicholas
肯	Ken	里夫, 约翰	Leaf, John
肯尼特	Kennett	里奇	Rich
寇克, 约翰	Coke, John	理查德森, 腓力	Richardson, Philip
库东	Couthon	理查二世	Richard II
库克	Cooke	利, 亨利	Lea, Henry

利斯尔	Lisle	马特尔, 彼得	Martyr, Peter
列维	Lever	马西	Massey
鲁珀特	Rupert	马熙, 乔治	Marsh, George
路德, 马丁	Luther, Martin	马歇尔, 司提反	Marshall, Stephen
伦, 马太	Wren, Matthew	玛丽	Mary
罗宾森	Robinson	玛扎琳	Mazarin
罗伯斯庇尔	Robespierre	麦考利	Macaulay
罗伯塔姆	Robotham	麦克拉齐兰, 玛格丽特	Maclachlan, Margaret
罗伯特	Robert	曼顿, 多马	Manton, Thomas
罗杰斯, 但以理	Rogers, Daniel	曼思罗普, 威廉	Manthorpe, William
罗杰斯, 约翰	Rogers, John	梅	May
罗兰斯, 但以理	Rowlans, Daniel	梅耶	Mayor
罗梅恩	Romaine	蒙盖	Mungey
罗切斯特	Rochester	蒙克	Monk
罗森	Lawson	蒙茅斯公爵	Duke of Monmouth
罗素, 法兰西斯	Russell, Francis	蒙塔古, 理查德	Montague, Richard
罗素, 威廉	Russell, William	蒙特莫朗西	Montmorency
马基雅维利	Machiavelli	弥尔顿	Milton
马拉, 瓦尔特	Marlar, Walter	米尔德梅, 瓦尔特	Mildmay, Walter
马拉	Marat	米尔纳, 约翰	Milner, John
马萨林	Mazarin	抹大拉的马利亚	Mary Magdalene
马斯登	Marsden	莫尔, 托马斯	More, Thomas
马太	Matthews	莫特, 撒拉	Mott, Sarah

莫特, 多马	Mott, Thomas	盆德尔顿	Pendleton
墨兰顿, 菲利普	Melancthon, Philip	彭	Pen
姆基翁	M'Keon	皮尔森	Pearson
奈特, 查尔斯	Knight, Charles	皮拉斯	Pyrrhus
尼布甲尼撒	Nebuchadnezzar	皮姆	Pym
尼尔	Neal	皮奇, 比撒列	Peachie, Bezaleel
尼哥	Nichol	品奇贝克, 约翰	Pinchbeck, John
牛顿, 艾萨克	Newton, Isaac	坡尔	Pol
牛顿, 约翰	Newton, John	珀金斯	Perkins
牛津伯爵	Earl of Oxford	珀特尔	Porter
纽科曼, 马太	Newcomen, Matthew	蒲赛	Pusey
纽曼	Newman	朴茨茅斯	Portsmouth
纽珀特	Newport	普尔	Poole
诺阿雷	Noailles	普金	Pugin
诺埃尔	Nowell	普雷斯顿, 约翰	Preston, John
诺克斯, 约翰	Knox, John	普雷斯特, 艾格尼丝	Prest, Agnes
诺耶斯, 约翰	Noyes, John	普利多	Prideaux
欧文, 约翰	Owen, John	普林	Prynne
帕克	Parker	奇令沃思	Chillingworth
帕克赫斯特	Parkhurst	钱多斯	Chandos
帕森斯	Parsons	乔治	George
潘恩, 汤姆	Paine, Tom	切斯特	Chester
佩切尔	Pechell	琼斯	Jones

裘德, 古德曼	Jude, Goodman	圣耶柔米	St. Hierom
屈梭多模	Chrysostom	什鲁斯伯里	Shrewsbury
萨德勒, 约翰	Saddler, John	史密斯, 迈尔斯	Smith, Miles
萨伏伊公爵	Duke of Savoy	示求保罗	Paulus, Sergius
萨姆内尔	Sumner	司布真, 查尔斯	Spurgeon, Charles
萨森, 劳伦斯	Sarson, Laurence	司丕拉, 法兰西斯	Spira, Francis
萨万纳罗拉	Savonarola	斯巴罗, 威廉	Sparrow, William
塞西尔	Cecil, W.	斯波斯托, 威廉	Spurstow, William
桑德斯, 劳伦斯	Saunders, Laurence	斯蒂令弗利特	Stillingfleet
桑克罗夫特, 威廉	Sancroft, William	斯东汉姆	Stonham
桑普森	Sampson	斯科特, 瓦尔特	Scott, Walter
桑兹	Sandys	斯库拉	Scylla
骚塞	Southey	斯普莱特	Spratt
色尔登	Selden	斯普令, 撒母耳	Spring, Samuel
沙福托, 莱昂纳德	Shaftoe, Leonard	斯塔福德	Stafford
舍伯那	Shebna	斯塔姆福德	Stamford
圣昂康布尔	St. Uncumber	斯特拉福德	Strafford
圣克里斯托弗	St. Christopher	斯特莱普	Strype
圣卢克	St. Rooke	斯特里, 彼得	Sterry, Peter
圣尼古拉	St. Nicholas	斯特里克兰	Strickland
圣珀内尔	St. Pernel	斯托顿, 约翰	Stoughton, John
圣茹斯特	St. Just	斯托克顿, 欧文	Stockton, Owen
圣托马斯·贝克特	St. Thomas à Becket	斯托勒	Storer

斯托马基特	Stowmarket	提罗岑, 约翰	Tillotson, John
斯温诺克, 乔治	Swinnock, George	提特利	Titley
苏保利, 西蒙	Sudbury, Simon	帖茨勒	Tetzel
苏珊	Susan	通布斯	Tombes
索恩博罗夫	Thornborough	佟斯托	Tonstall
索尔蒙, 亨利	Salmon, Henry	托马斯	Thomas
索默斯	Somers	托普雷第	Toplady
索姆斯, 普雷本达里	Soames, Prebendary	瓦汉	Warham
索斯比, R.	Sorsby, R.	瓦特利	Whateley
索伊斯	Soyce	瓦提利	Whately
塔克尼, 安东尼	Tuckney, Anthony	瓦因斯	Vines
泰勒, 罗兰	Taylor, Roland	威伯福斯, 威廉	Wilberforce, William
泰勒, 瓦特	Tyler, Wat	威尔金森	Wilkinson
汤森德, 奥布雷	Townsend, Aubrey	威尔金斯	Wilkins
陶德瑞	Doddridge	威尔莫特	Wilmot
陶恩申德, 卡农	Townshend, Canon	威尔森, 玛格丽特	Wilson, Margaret
特雷尔	Traill	威克里夫, 约翰	Wyclif, John
特雷西, 威廉	Tracey, William	威廉姆斯	Williams
特里	Tre	韦斯特, 约安	Waste, Joan
特里劳尼, 约拿单	Trelawney, Jonathan	维恩	Venn
特纳	Turner	维尔, 贺瑞斯	Vere, Horace
滕尼森	Tenison	维尔, 玛丽	Vere, Mary
滕斯托尔	Tunstall	维克	Wake

维奇科特, 便雅悯	Whichcot, Benjamin	西尔维斯特	Sylvester
维奇寇特	Whichcote	西拿基立	Sennacherib
卫斯理, 约翰	Wesley, John	西普赛德, 乔治	Shipside, George
卫斯理, 查理	Wesley, Charles	希尔, 多马	Hill, Thomas
魏勒尔, R.	Weller, R.	希尔德夏姆	Hildersham
温德班克	Windebank	希曼, 拉撒路	Seaman, Lazarus
文宁, 拉尔夫	Ralph Venning	希思	Heath
沃德, 约翰	Ward, John	夏福拓	Shaftoe
沃德, 撒母耳	Ward, Samuel	夏普, 约翰	Sharpe, John
沃德, 赛思	Ward, Seth	谢尔顿	Sheldon
沃顿, 托马斯	Wharton, Thomas	谢尔菲尔德	Sherfield
沃尔辛厄姆	Walsingham	谢洛克, 威廉	Sherlock, William
沃克尔, 俄巴底亚	Walker, Obadiah	谢帕德, 多马	Sheppard, Thomas
沃里克	Warwick	押沙龙	Absalom
沃兴顿	Worthington	雅茨, 约翰	Yates, John
沃卓	Wodrow	亚当斯	Adams
沃兹沃思	Wordsworth	亚哈	Ahab
乌舍尔, 詹姆斯	Usher, James	亚哈随鲁	Ahasuerus
伍德	Wood	亚历山大里亚的约翰	John of Alexandria
伍德罗夫	Woodroffe	亚流	Arius
伍德曼, 理查	Woodman, Richard	亚他那修	Athanasius
伍卓夫	Woodrofe	亚希多弗	Ahithophel
西布斯, 理查德	Sibbes, Richard	杨, 多马	Thomas Young

耶户	Jehu	尤里乌斯·帕尔默	Palmer, Julius
耶利米	Jeremy	约阿施	Joash
伊夫林	Evelyn	扎卡里	Zachary
伊丽莎白	Elizabeth	詹金斯	Jenkyns
以伯米勒	Ebedmelech	詹姆士二世	James II.
以迦博	Ichabod	詹姆士一世	James I.
以利加拿	Elkanah	征服者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
因格拉姆	Ingram	拽伍尔, 爱丽丝	Driver, Alice

二、地名

(按译名汉语拼音次序排列)

阿冰顿	Abingdon	比尤德利	Bewdley
阿克顿	Acton	比尔德斯顿	Bildeston
亚杜兰	Adullam	伯明翰	Birmingham
奥尔德堡	Aldeburgh	布莱克福莱尔斯	Blackfriars
奥尔德门	Aldgate	布莱克希思校场	Blackheath Field
阿德汉	Aldham	布莱克利	Blackley
阿德汉广场	Aldham Common	布卢姆斯伯里	Bloomsbury
阿莫夏姆	Amersham	博尔顿	Bolton
安特卫普	Antwerp	布伦	Boulogne
阿普利堡	Apley Castle	布拉德瓦丁	Bradwardin
阿斯拉克顿	Aslacton	布拉姆福德	Bramford
阿斯顿	Aston	布雷达	Breda
巴比伦	Babylon	布伦特伍德	Brentwood
巴塞尔	Bäle	布莱德威尔	Bridewell
巴京	Barking	布里吉诺思	Bridgnorth
巴斯	Bath	布里吉沃特尔	Bridgwater
巴特尔	Battle	布里斯托	Bristol
贝尔斯代德	Belstead	宽街	Broad Street
伯克郡	Berkshire	布罗克利	Brockley
特韦德河畔伯立克	Berwick-on-Tweed	巴克登	Buckden

白金汉	Buckingham	克雷弗豪斯	Claverhouse
邦吉	Bungay	科登汉	Coddenham
比尔斯·圣玛丽	Bures St. Mary	柯格索尔	Coggeshall
勃艮第	Burgundy	科吉歇尔	Coggeshall
布里	Bury	科尔切斯特	Colchester
圣爱德蒙贝里	Bury St. Edmund	康普顿	Compton
巴克斯霍尔	Buxhall	康斯坦茨	Constance
坎特伯雷	Canterbury	哥林多	Corith
卡马森	Carmarthen	康沃尔郡	Cornwell
赫丁汉城堡	Castle Hedingham	考文垂	Coventry
切特豪斯广场	Charterhouse Square	考文垂	Coventry
齐普赛街	Cheapside	克里汀圣玛丽	Creting St. Mary
切姆斯福德	Chelmsford	克里克	Crick
切尔西	Chelsea	跛子门	Cripplegate
柴郡	Cheshire	克罗伊兰	Croyland
切斯特	Chester	卡克斯通	Cuckstone
奇彻斯特	Chichester	坎伯兰郡	Cumberland
奇威尔	Chigwell	德伯纳姆	Debenham
奇彭纳姆	Chippenham	戴德汉	Dedham
基督城	Christchurch	德比	Derby
赛伦塞斯特	Cirencester	底里屯特	Deritend
赛伦塞斯特路	Cirencester Road	迪尼顿	Deritend
克莱尔	Clare	德文郡	Devonshire

多塞特郡	Dorsetshire	高卢教会	Gallican Church
达德利	Dudley	盖茨黑德	Gateshead
公爵地	Duke's Place	格拉斯顿伯里	Glastonbury
敦维奇	Dunwich	格洛斯特	Gloucester
杜伦	Durham	大瑟劳	Great Thurlow
东肯特郡	East Kent	哈德姆	Hadham
东区	East Riding	哈德利	Hadleigh
边山	Edge Hill	哈利法克斯	Halifax
埃格尔斯顿	Eggleston	霍尔戴德	Halstead
埃及	Egypt	汉普郡	Hampshire
伊利	Ely	黑斯廷	Hasting
埃塞克斯郡	Essex	哈沃希尔	Haverhill
埃克赛特	Exeter	西姆	Heme
埃克斯顿	Exton	赫明斯通	Hemingstone
艾镇	Eye	赫里福德	Hereford
芬琴菲尔德	Finchingfield	赫特福德郡	Herts
佛罗伦萨	Florence	赫特福德郡	Herts
福德汉姆	Fordham	赫弗宁汉姆	Heveningham
方廷斯	Fountains	杭斯登	Hunsden
福瑞林姆	Framlingham	亨廷顿	Huntingdon
星期五街	Friday Street	伊布斯托克	Ibstock
弗内斯	Furness	伊普斯维奇	Ipswich
庚斯博罗	Gainsborough	打铁巷	Ironmonger's Lane

白金汉	Buckingham	克雷弗豪斯	Claverhouse
邦吉	Bungay	科登汉	Coddenham
比尔斯·圣玛丽	Bures St. Mary	柯格索尔	Coggeshall
勃艮第	Burgundy	科吉歇尔	Coggeshall
布里	Bury	科尔切斯特	Colchester
圣爱德蒙贝里	Bury St. Edmund	康普顿	Compton
巴克斯霍尔	Buxhall	康斯坦茨	Constance
坎特伯雷	Canterbury	哥林多	Corith
卡马森	Carmarthen	康沃尔郡	Cornwell
赫丁汉城堡	Castle Hedingham	考文垂	Coventry
切特豪斯广场	Charterhouse Square	考文垂	Coventry
齐普赛街	Cheapside	克里汀圣玛丽	Creting St. Mary
切姆斯福德	Chelmsford	克里克	Crick
切尔西	Chelsea	跛子门	Cripplegate
柴郡	Cheshire	克罗伊兰	Croyland
切斯特	Chester	卡克斯通	Cuckstone
奇彻斯特	Chichester	坎伯兰郡	Cumberland
奇威尔	Chigwell	德伯纳姆	Debenham
奇彭纳姆	Chippenham	戴德汉	Dedham
基督城	Christchurch	德比	Derby
赛伦塞斯特	Cirencester	底里屯特	Deritend
赛伦塞斯特路	Cirencester Road	迪尼顿	Deritend
克莱尔	Clare	德文郡	Devonshire

怀特岛	Isle of Wight	勒德洛	Ludlow
杰里	Jewry	拉特沃思	Lutterworth
克丁顿	Keddington	林镇	Lynn
科丁顿	Kedington	麦克雷尔	Mackerell
肯特威尔大院	Kentwell Hall	马德拉	Madeira
基德敏斯特	Kidderminster	梅恩瓦令	Mainwaring
科克斯托尔	Kirkstall	曼彻斯特	Manchester
兰彼得	Lampeter	马斯顿荒原	Marston Moor
兰开夏	Lancashire	墨尔本	Melbourne
兰兹角	Land's End	梅尔罗斯	Melrose
拉文纳姆	Lavenham	米德尔顿	Middleton
拉文汉	Lavenham	米尔登	Milden
拉克斯菲尔德	Laxfield	蒙克兰	Monkland
莱斯特郡	Leicestershire	蒙茅斯	Monmouth
刘易斯	Lewes	蒙塔古	Montague
利奇菲尔德	Lichfield	蒙特勒伊	Montreuil
林肯	Lincoln	蒙特索雷尔	Mount Sorrel
林肯旅馆草地	Lincoln's Inn Fields	纳西比	Naseby
小沃德令菲尔德	Little Waldringfield	倪德汉	Needham
利物浦	Liverpool	尼德兰	Netherlands
娄尔斯托夫特	Lowestoft	内特利	Netley
拉得门	Ludgate	纽堡	Newbury
拉得门山	Ludgate Hill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	Newcastle-on-Tyne
		新门市场	Newgate Market

诺福克郡	Norfolk	里米尼	Rimini
北佛兰	North Foreland	罗彻斯特	Rochester
北基布沃思	North Kibworth	罗思贝里	Rothbury
北区	North Riding	鹿特丹	Rotterdam
北安普顿郡	Northamptonshire	罗斯棱奇	Rouslench
诺森伯兰郡	Northumberland	罗顿	Rowton
诺维奇	Norwich	兰尼米德	Runnymede
诺丁汉郡	Nottinghamshire	拉特兰郡	Rutlandshire
老贝利街	Old Bailey	索尔兹伯里	Salisbury
老克里夫	Old Cleve	萨沃伊	Savoy
奥福德	Orford	萨克森	Saxony
牛津	Oxford	斯卡斯代尔	Scarsdale
雅德宫广场	Palace Yard	赛吉莫	Sedgemoor
宫廷广场	Palace Yard	色莫	Semer
彼得伯勒	Peterborough	沈菲尔德	Shenfield
皮德蒙特	Piedmont	什鲁斯伯里	Shrewsbury
博勒	Pole	什罗普郡	Shropshire
庞贝	Pompeii	塞拉利昂	Sierra Leone
普雷斯特威奇	Prestwich	索厄姆	Soham
普里斯特希尔	Priesthill	索尔维海岸	Solway Firth
昆西思	Queenhithe	萨默赛特郡	Somersetshire
雷丁	Reading	萨莫夏姆	Somersham
里士满	Richmond	南华克	Southwark

索思沃尔德	Southwold	提尔贝里	Tilbury
圣艾旦	St. Aidan	廷尼弗利	Tinnevelly
圣阿萨富	St. Asaph	亨特恩	Tintern
圣比斯	St. Bees	托丁顿	Toddington
圣乔治海峡	St. George's Channel	托贝	Torbay
斯塔福德郡	Staffordshire	托特里吉	Totteridge
斯坦顿	Standon	塔山	Tower Hill
斯托克波特	Stockport	天特	Trent
内兰边斯托克	Stoke-by-Nayland	特里尔	Trèves
斯托马基特	Stowmarket	托斯卡纳	Tuscany
斯特拉德布罗克	Stradbroke	泰恩河谷	Tynedale
斯特拉斯堡	Strasburgh	梵蒂冈	Vatican
萨德贝里	Sudbury	瓦尔剖尔	Walpole
萨福克郡	Suffolk	沃里克郡	Warwickshire
苏塞克斯	Sussex	沃切特	Watchet
他泊山	Tabor	韦尔斯	Wells
他玛河	Tamar	西京顿	West Kington
汤顿	Taunton	西提尔贝里	West Tilbury
蒂斯河	Tees	维瑟斯菲尔德	Wethersfielde
散特	Thanet	维冈	Wigan
瑟卡斯顿	Thurcaston	魏格顿郡	Wigtonshire
瑟卡斯顿	Thurcaston	维利蒙兹外克	Willimondswike
台伯河	Tiber	维利蒙茨维克	Wilymontswick

威尔特郡	Wiltshire	约克	York
温彻斯特	Winchester	约克郡	Yorkshire
维滕贝格	Wittenberg	亚利马太	Arimathea
伍尔维奇	Woolwich	埃弗顿	Everton
伍斯特	Worcester	汉诺威广场	Hanover Square
乌伦	Wren	哈沃思	Haworth
罗克赛特	Wroxeter	贝德福德路	Bedford Row
雅茅斯	Yarmouth	伊斯灵顿	Islington

三、书名

(按译名汉语拼音次序排列)

《哀悼克兰麦大主教》	Archbishop Cranmer's Remains
《安立甘宗管理》	Directorium Anglicanum
《宝贵的生命》	Life of Jewel
《备忘和查询》	Notes and Queries
《必要的学问》	The Necessary Erudition
《别了，兰开夏郡和柴郡》	Farewell to Lancashire and Cheshire
《驳斥几条罗马教义》	A Confutation of a few Romish Doctrines
《不从国教者的回忆》	Nonconformists' Memorial
《长期议会史》	History of the Long Parliament
《磁铁般的复原教神学》	Magnetis Reductorium Theologium
《大喜乐》	A Rapture
《复辟时期教会史》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the Restoration
《改革宗牧者》	The Reformed Pastor
《改教史》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革新》	Innovation
《公报》	the Gazette
《古今圣诗》	Hymns Ancient and Modern
《国民盟约》	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
《呼吁未得救者》	The Call to the Un-converted
《基督教信徒守则》	Institution of a Christian Man

《基督是万有之主》	Christ is all in all
《基督徒的劳苦和赏赐》	The Christian's Labour and Reward
《基列的乳香让良心复苏》	Balm from Gilead to Recover Conscience
《吉布森收藏》	Gibson' s Preservative
《纪念索菲亚公主》	Memorials of Princess Sophia
《济贫法》	Poor law
《简明基督教信仰宣言》	A Brief and Clear Confession of the Christian Faith
《讲道文》	Homilies
《教会法》	Ecclesiastical Law
《教会历史》	Church History
《教会时报》	Church Times
《教会史》	Ecclesiastical History
《教会要理问答》	Church Catechism
《决断》	Resolution
《坎特伯雷的命运》	Canterbury' s Doom
《克兰麦给加德纳的答复》	Cranmer's Answer to Gardiner
《宽容宣言》	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
《拉蒂默全集》	Works of Latimer
《拉什沃思选集》	Rushworth' s Collections
《劳德的烦恼》	Troubles of Laud
《礼拜仪式》	Liturgy
《六条信纲》	Six Articles

《论悔改、生与死以及管住舌头》	On Repentance, on Living and Dying well, and 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Tongue
《论怕死》	Treatise against the Fear of Death
《论信心》	On Faith
《罗马的诡计》	Rome' s Tactics
《牛津的雅典》	Athena Oxonienses
《牛津法案》	Oxford Act
《诺埃尔要理问答》	Nowell's Catechism
《帕奇尼回忆》	Panzani' s Memoirs
《评论季刊》	Quarterly Review
《祈祷书》	Prayer-Book
《清教徒史》	History of the Puritans
《权利法案》	Declaration of Rights
《萨福克名人传》	Worthies of Suffolk
《三十九条信纲》	Thirty-nine Articles
《上诉于凯撒》	Appello Cæsarem
《神话语中描绘的治安官形象》	The Magistrate's Portraiture drawn from the Word
《神人》	God-Man
《审查法》	Test and Corporation Acts
《圣徒的安息》	The Saint' s Rest
《时论册集》	Tracts for the Times
《使徒信经》	the Creed
《斯迈克提姆斯》	Smectymnuus
《斯托顿论内战中的教会》	Stoughton' s Church of the Civil Wars

《苏黎世来鸿原文》	Original Letters from Zurich
《他的严格标准》	His Hard Measure
《泰晤士报》	The Times
《坛上的炭》	A Coal from the Altar
《统一令》	Act of Uniformity
《王位继承法》	Act of Settlement
《望弥撒的危害》	The Hurt of Hearing Mass
《沃氏伊普斯维奇方志》	Wodderspoon's Memorials of Ipswich
《消遣书》	Book of Sports
《新约释义》	Paraphrase on the New Testament
《信纲》	Articles
《行道的幸福》	The Happiness of Practice
《行为与丰碑》	Acts and Monuments
《殉道史》	Book of Martyrs
《压伤的芦苇》	Bruised Reed
《叶忒罗的建议》	Jethro's Justice of the Peace
《英格兰史》	History of England
《英格兰制宪史》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英格兰诸女王生平》	Lives of the Queens of England
《早晚圣歌集》	Morning and Evening Hymns
《装备齐整的基督徒》	The Christian in Complete Armour

四、其他名词

(按译名汉语拼音次序排列)

阿珀尔教会	Upper Church
阿塔迪斯·苏	Ætatis suæ
埃克赛特会堂	Exeter Hall
爱尔兰总督	Lord Lieutenant of Ireland
巴塞特牌	Basset
白厅	Whitehall
贝尔格拉夫教堂	Belgrave Chapel
贝克斯利	Bexley
贝利奥尔学院	Balliol
本笃会	Benedictine
毕达哥拉斯学派	Pythagorean
波特曼教堂	Portman Chapel
博川	Bertram
博德利图书馆	Bodleian Library
不从国教者	Dissenter
布拉德利女修道院	Maiden Bradley Priory
布鲁顿修道院	Bruton Priory
布罗姆利厅	Bromley Hall
长期议会	Long Parliament
大法官	Lord Chancellor

大马尔吴恩修道院	Great Malvern Abbey
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大主教	Archbishop
德米奖学金	Demy
多特会议	Synod of Dort
法利修道院	Farley Abbey
法政牧师	Canon
方济会教堂	Grey Friars' Church
非利士人	Philistines
弗利特监狱	Fleet Prison
副牧师	Curate
高级专员会议	High Commission
高派教会	High Church
戈斯托女修道院	Godstow Nunnery
国王学院	King's College
国务秘书长	Secretary of State
国玺尚书	Lord Keeper
黑尔斯修道院	Abbey of Hales
黑修士教堂	Black Friars'
红十字街图书馆	Redcross Street Library
胡格诺派	Huguenot
化质说	transubstantiation
辉格党	Whig

会吏	Deacon
会吏长	Archdecon
基督公学	Christ's Hospital
基督教堂学院	Christ Church
教区长	Rector
教区牧师	Vicar
卡德斯顿学院	Cuddesdon
凯瑟琳学堂	Catharine Hall
凯斯学院	Caius College
坎特伯雷学院	Canterbury Hall
康普特监狱	Compter prison
克莱尔学堂	Clare Hall
宽派教会人士	Broad Churchman
喇川	Ratram
兰柏宫	Lambeth Palace
礼仪派	ritualist
伦敦塔	Tower
洛克教堂	the Lock
玛格丽特夫人学堂	Lady Margaret's
梅色尔·布莱基	Messrs. Blackie
盟约者	Covernanter
莫德林学院	Magdalen College
墨顿学院	Merton

内殿律师学院	Inner Temple
牛津运动	Tractarian movement
帕克教堂	Park Chapel
帕克协会	Parker Society
彭布罗克学堂	Pembroke Hall
三一教堂	Trinity the Less
上院议长	Woolsack
圣埃德蒙教堂	St. Edmund's Church
圣艾丹学院	St. Aidan' s
圣巴多罗买医院	St. Bartholomew's Hospital
圣保罗十字架教堂	St. Paul's Cross
圣比斯学院	St. Bees
圣博托夫教堂	St. Botolph's Church
圣布莱德教堂	St. Bride' s
圣顿斯坦教堂	St. Dunstan' s
圣盖尔教堂	St. Giles' Church
圣公会	Anglican
圣经公会	Bible Society
圣凯瑟琳·克里教堂	Church of St. Catherine Cree
圣马太教堂	St. Matthew' s
圣玛格丽特·摩西教堂	St. Margaret Moyses'
圣玛丽 - 德 - 楼德教堂	St. Mary-de-Lode's
圣玛丽教堂	St. Mary's

圣玛丽塔教堂	St. Mary-le-Tower's
圣墓教堂	St. Sepulchre's
圣尼古拉斯教堂	St. Nicholas' Church
圣潘克拉斯教堂	St. Pancras'
圣乔治教堂	St. George's
首席大法官	Chief Justice
受俸教士	Prebendary
枢密院	Privy Council
四旬斋	Lent
苏格兰圣公会	Scottish Episcopal Church
随扈教士	Chaplain
特别会议	Convocation
特格	Tegg
托利党	Tory
瓦德汉学院	Wadham
瓦勒度派	Vaudois
瓦龙人	Walloon
王凳监狱	King's Bench prison
王后学院	Queen's
王室教堂	Chapel Royal
王座法庭	Court of King' s Bench
威斯敏斯特大厅	Westminster Hall
威斯敏斯特会议	Westminster Assembly

韦恩弗利特规章	statutes of Waynflete
纹章院	Herald's College
无上誓言	Oath of Supremacy
西敏寺	Westminster Abbey
悉尼·萨塞克斯学院	Sydney Sussex College
悉尼学院	Sydney College
熙笃会	Cistercian
逍遥学派	Peripatetian
新学院	New College
星室法庭	Star Chamber
循道会	Methodism
循道主义者	Methodist
亚勒比根斯派	Albigenses
耶稣会	Jesuits
以马内利学院	Emmanuel's College
因功生效	opus operatum
印度叛乱	Indian Mutiny
英国国教	Church of England
英国外国圣书协会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House
犹太人	Judah
圆颅党	Roundhead
真实临在	Real Prensence
主教学院	Bishop